

08

eft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

Richard Wolin

主编 吴冠军 蓝江

左翼前沿思想译丛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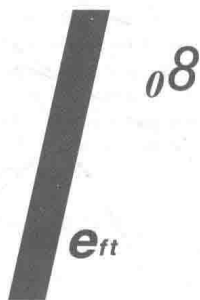
东风

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

[美]理查德·沃林-著 董树宝-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左翼前沿思想译丛08

东风

法国知识分子与
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

[美]理查德·沃林-著 董树宝-译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

Richard Wolin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

by Richard Wolin

Copyright © 2010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s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遗产 / (美) 理查德·沃林著；

董树宝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3

书名原文：The wind from the East

ISBN 978-7-5117-3138-8

I. ①东… II. ①理… ②董…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法国

IV. ① D756.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2483 号

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遗产

出版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球

责任编辑：赵 灿

特约编辑：张少军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352 千字

印 张：16.75

版 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谨以此书献给

2005—2008年在巴黎第十大学和南特大学听过我讲课的学生们!

总序

吴冠军、蓝江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我们经过漫长筹备的一套丛书：《左翼前沿思想译丛》。在汉语学界，“左翼（派）”这个说法长久以来陷于深度混淆：我们触目可见诸种“老左派”“新左派”“极左思潮”标签，但归在这些标签下的种种论述真的可以代表“左翼”吗？

什么是“左翼”？在我们看来，“左翼”有两个定义性的特征。一是态度性的，即对当下既有现状（status quo）持一个批判性的态度。这个“态度”（attitude），亦即福柯所说的“启蒙的态度”：“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历史时代的一个永恒的批判。”以此态度观之，今天汉语学界的许多“左翼”其实是名不副实的。

与此同时，“左翼”还有一个更实质性的特征：它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诉求”。这个实质性内核，就是争取更充分的平等。“左翼”的政治思想或话语，无论再如何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多元性，其最根本层面上的底色不会更改——追求一个更为平等主义的社会

(egalitarian society)。这就是“左翼”的两个定义性特征：批判性的态度与平等性的诉求。通过策划这套丛书，我们旨在在汉语学界重新厘清“左翼”思想的根本轮廓，并带领读者进入到左翼思想的最前沿地带。

以此为旨归，这套丛书将系统性地向汉语学界引入关于当代左翼思想的最前沿成果。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欧陆思想界的政治哲学研究出现了新的状况与新的气象：在政治上，90 年代初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宣告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到来；而在哲学上，“后结构主义”将西方欧陆思想的发展推到了它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极致，标识了“哲学的终结”。而恰恰是在这个双重“终结”的状况下，自 90 年代后期开始，一批卓越的欧陆思想家开始走到国际学术舞台之一线前台，其中具超凡影响力的就有齐泽克、巴迪欧、奈格里（及其合作者哈特）、阿甘本、拉克劳（及其合作者穆芙）、朗西埃、巴里巴、瓦蒂莫等等。这些思想家在过去近二十年间的著述，已然开辟出了欧陆思想的全新气象，打开了“后结构主义之后”的（诸种）新的开端。

二

如何在欧陆思想史脉络中定位这批新一代欧陆左翼领军人物？

让我们先回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前面已提到，当时，一股后来被概述为“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运动，将欧陆思想的发展推向了它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极致。为什么这样说？

古希腊的古典形而上学以“理性”（logos）应治多神时代的“神话”（mythos），以“自然”（physis）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基石。随后基督教神学以“上帝”代替“自然”，作为人的世界最终的根基与根据。欧陆思想史上“哥白尼式革命”的启蒙，则瓦解“上帝”的权威，重新以人的理性作为共同体之维系力量。继之而起的三轮思

想浪潮——历史主义、存在主义、阐释学——完成了从启蒙的普遍主义到后启蒙之视角主义（时代精神、个体意志、视域）的转换。随后兴起的结构主义，则借助语言学与精神分析而彻底瓦解“主体”之范畴（“主体”被构建论）。最后，在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这里，“历史化”与“结构化”相结合，“解构主义”“反本质主义”“无基础主义”“新实用主义”，皆指向了欧陆思想自身的逻辑终点——不再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力量或范畴，可以构成人类共同体的终极支撑。对欧陆思想史深有洞见的利奥·施特劳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便做出如下宣布：除了“回归”——回归古典形而上学或神学（“雅典或耶路撒冷”）——外，别无新的思想突破口。¹

然而，我们已经能在晚近二十年欧陆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中，捕捉到一股新的思想脉动。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降，齐泽克与阿甘本这两位出生于 40 年代的思想家，与比他们略长半辈的奈格里、拉克劳、巴迪欧等人（皆出生于 30 年代）一起，围绕“the Political”（政治）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欧陆思想之前沿地带——一个新兴的“激进左翼”思想阵营。

但我们仍然面对的重要问题是：是什么使得这股“激进左翼”政治哲学在过去十几年内迅猛崛起？这些学者同前代左翼学者（后结构主义者）的根本学理分歧在哪里？他们是否真正打开了全新的思想格局？

三

在我们看来：这一代欧陆思想家的崛起，始于他们不满于后结

1 进一步阐述请参见吴冠军：《现时代的群学：从精神分析到政治哲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年，第 3—152 页。

构主义者在“政治主体”问题上的立场——即“消解主体”后，拥抱微观政治、“私密的反抗”（intimate revolt）、拟像游戏、小叙事与歧见的繁荣、多元主义的族群认同，等等。在这些当代激进思想家看来，后结构主义的政治方案在今天已经彻底丧失反抗性，因为它们已经被整合到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之中：微观政治、“私密的反抗”、拟像游戏、小叙事繁荣、小共同体认同、开放的多元主义宽容等等，都能在被齐泽克称作“后现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秩序中得到实现。而后结构主义的当代传人，如赛蒙·克里奇利、朱迪丝·巴特勒等人，皆发出如下论调：现状永远会持续下去，我们无法击败整个资本主义系统，我们只能进行日常生活中的“私密的反抗”，进而，努力让各种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声音被听到……这种左翼姿态，在当代激进左翼学者眼中，正是把左翼事业引向一条绝路：从哈贝马斯到克里斯蒂娃，顶级左翼思想家们明里暗里皆纷纷放弃社会变革的目标（承认资本主义秩序会不断持续下去）、放弃激进解放的理想（玩玩“私密的反抗”、搞搞小范围的游戏）……

是故，把理论进路并不一致的这批当代学者们联合成一个“激进左翼”思想阵营的，正是他们所分享的这样一种立场：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激进反抗。而在学理上，不论他们的正面主张为何，这批左翼学者旨在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治的主体问题：传统的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之后，什么能成为新的变革既有秩序的主体？

今天“激进左翼”阵营中的成名人物，都在政治主体这个问题上深有建树。若对他们进行细致的理论梳理的话，则可分出四个理论路向。有意思的是，前三个路向正好两两出场：第一对，就是因写作《帝国》三部曲而大名鼎鼎的哈特和奈格里；第二对，是在 80 年代就已成名的拉克劳和穆芙（他们的成名作《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策略》，是左翼政治哲学的地震式作品）；第三对，就是齐泽克和巴迪欧（他们也有了一本合著，即收入本丛书的《当下的哲学》）。而第

四个路向，则是以阿甘本的《神圣人》（亦收入本丛书）三部曲为代表。这四个路向，实则构成了当代欧陆左翼思想之基本框架。

进一步沿着思想史的线索向上追索，我们就能看到以上四个路向各自背后的理论资源：第一对背后站着的是马克思和德勒兹，第二对背后是马克思和葛兰西，第三对背后是马克思和拉康，第四个背后则是海德格尔与本雅明。进而我们想指出的是，这批激进左翼思想家给我们打开的思想视野不仅仅是“回到马克思”，他们更是向上追到了古典德国理念主义（齐泽克），追到了斯宾诺莎（奈格里），追到了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阿甘本），追到了柏拉图（巴迪欧）。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把激进左翼的政治哲学，去放在一个更大的思想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对柏拉图到施特劳斯/巴迪欧、亚里士多德到阿伦特/麦金泰尔/阿甘本、霍布斯到施米特/阿甘本、斯宾诺莎到德勒兹/奈格里、康德到海德格尔/罗尔斯/拉克劳、黑格尔到科耶夫/泰勒/齐泽克等等这些充满“歧路”的思想史线索，去做出一个学理上的内在衡析。¹

四

汉语学界对当代左翼前沿思想的研究，从21世纪初大陆和台湾开始陆续翻译他们的著述以来，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至少在今天，齐泽克、奈格里、阿甘本、巴迪欧等名字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已经不再是陌生语词。

然而，其中很多著作之翻译质量，实是不如人意。究其缘由，我们认为问题出在汉语学界的研究者与翻译者们对当代左翼思想尚

1 以上分析的具体展开，请参见吴冠军：《第十一论纲：介入日常生活的学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19页。

导读

“东风”的法国之旅¹

董树宝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错综复杂，两大阵营斗争激烈，呈水火不容之势。当时毛泽东洞若观火，写道：“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在理查德·沃林笔下，一股强劲的“东风”盘旋于巴黎的街头巷尾，掠过大学的教室饭堂，激发了青年学生的革命激情，造反的浪潮一波波接踵而至，最终演化为一场波澜壮阔的“五月风暴”。毛主义如星星之火一般焚野燎原，孕育了后五月时期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直接催生了持续影响当下的日常生活政治。

关于法国“五月风暴”的研究著作多如牛毛，既有当年参与者的回忆录与反思作品，也有当年旁观者的所见所闻，更有形形色色、视

1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ZDA194）阶段性成果之一，译者亦将本译著列入该项目。

角迥异的研究著作。如何从这些繁多的研究之中独辟新径，重新审视这段历史？这就是理查德·沃林在《东风》一书中努力要探寻的问题。《东风》之所以有别于其他著作而颇具新意，就在于它从众多研究者经常忽略的“毛主义”出发来重新打开那段鲜活的历史，重新描绘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

法国危机重重

“五月风暴”前夕，世界各地爆发了学生造反运动，革命幽灵一再重现，青年学生开始创造一种反映自身诉求的青年文化。当时法国虽处于“光辉三十年”的经济繁荣时期，但是法国社会危机重重，“革命”一触即发，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夏尔·戴高乐的“帝王式总统制”令人压抑、窒息，消费社会的来临令人无聊、平庸，大学扩招导致的就业压力，令青年人苦恼不堪。这些不同的要素相互激发、重叠，持续加剧法国的社会矛盾。

20 世纪 60 年代，戴高乐控制了法国政治局势。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和 1958 年军事政变的背景下重返法国政坛，终结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议会结构和政党分歧，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不过，总统制共和国逐渐蜕变为“帝王式总统制”，爱丽舍宫蜕变为旧式“王宫”。这种政治发展趋势与法国持续进行的现代化完全不同步，出现了政治上的“返祖现象”：“政治制度被认为处于第三共和国时期，而

法国到 20 世纪 60 年代已完全进入第五共和国时代”¹，与此同时，60 年代法国处于“光辉三十年”的重要发展时期，出现了爆炸式的经济增长，法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超现代的后工业国家。法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民阶级消失，工人阶级锐减，出现了一个以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人员、公务员、教师和中层管理人员为主体的工薪阶级，这进一步瓦解了根深蒂固的代代因袭的社会文化观念，显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解释这一快速发展的社会问题。

“二战”后法国人口急剧增长，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成为有见识有教养的公民，他们开始寻求政治参与的新途径与可能性。前所未有的“光辉三十年”的经济繁荣使青年人、特别是来自中产阶层的青年人不再受制于物质条件的约束，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物质保障来接受教育，进行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他们开始寻求更加重视归属感、注重自我表达、追求生活质量的日常生活变革。大学的快速扩张虽然满足了更多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的诉求，但大学的课程和管理没有及时进行调整，以便适应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课程内容枯燥乏味、令人窒息，与青年学生的政治文化诉求极为脱节，大学被讽刺为“贩卖知识的机器”和“文凭工厂”。与此同时，学生人数激增，造成学生宿舍过度拥挤，生活条件恶劣，而宿舍探视权的规定²与当时如火如荼的性革命格格不入，

1 引自本书第 28 页。

2 宿舍探视权规定是指，当时学校规定男同学晚上 11 点之后禁止进入女生宿舍，女同学只有到了 21 岁才可以探访男生宿舍，警察进驻校园，保证探视权规定的严格执行。

压抑了学生正当的情感欲求，一场力比多的革命即将爆发。

消费社会的来临促使企业想尽办法来推销商品，尤其是使用各种性意象的广告接踵而至，撩动着青年男女的深层欲望与情感需求，这无疑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持续深入的性革命。广告无处不在，时时传颂丰裕社会的赞歌，诱惑着消费者购买各种商品。让·波德里亚在《物体系》中描绘了现代消费主义的情欲本质：“广告扮演的角色，是作为整个社会，真实或虚拟的购买力的永久海报……产品是以被观看、被操纵的方式呈现：它被情欲化了……加入了爱情游戏的所有成分：主动接近、竞争、亵渎、调情、卖淫（甚至是反讽的）。（已经存有一份原欲负荷的）购买机制，为一体整套情欲化的选择和花费所取代……而购物和消费的程序本身，便被如此地配上插图、打上灯光，玩弄和破解，就好像作为性交前戏的舞蹈一样。”¹无处不在的广告，无处不在的“物”，充斥着整个世界，物的世界处于支配地位，而人变成了多余的附属物。法国新小说派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创作了《橡皮》《窥视者》等小说，揭示了主体性的丧失与“物的自主性增强”。消费社会最终绑架了日常生活，使人越来越平庸化、枯燥乏味、毫无意义，出现了一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恶心”。面对消费社会的侵蚀，法国思想界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出现了一股“日常生活批判”思潮。虽然富裕丰足的社会给人提供了一系列的文化选择、职业选择、生活方式选择与消费

1 波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195页。

选择，让人貌似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然而消费社会的到来将人整合到社会权力运行机制之中，日常生活失去了自然性、非正式性，权力无孔不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受工人自治传统的启发，法国左派提倡一种“横向的”、平等主义的民主化模式。

毛主义者粉墨登场

3月22日运动是“五月风暴”的导火索，直接激发了一大批愤愤不平、此前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学生。当时新建的南泰尔校园处于大巴黎地区的城乡结合部，周边是冒着滚滚浓烟的工厂和噪音喧天的工地，学习和生活条件很差，学生正当的诉求得不到认可和满足，曾爆发了一场关于宿舍探视权的抗议活动。1968年3月，巴黎爆发了一场反越战的重要集会，警方逮捕了6名学生，于是激进学生在科恩-邦迪的领导下举行抗议行动，这就是被后世不断提及的“3月22日运动”。因为政府和学校的拙劣行动，学生运动中心也从郊区的南泰尔校园转移到位于拉丁区中心的索邦大学。3月22日运动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节点，个别的毛主义者参与并支持了这场运动，也在这一运动中锻炼了自己，为日后的社会政治运动奠定了基础。

5月3日至5月10日，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不断升级，学生们自发地使用铺路石和碎石子建造街垒，出现了法国政治史上被不断赞颂的“街垒之夜”。作为反对警察权力的应对措施，街垒变成学生们领地的象征，更充当了一种与法国革命传统的象征性联系，仿佛学生们变成

了法国大革命时“无裤党员”和巴黎公社成员。¹ 这些学生恰恰是法国中产阶级的儿女，“街垒之夜”使他们接受了刻不容缓的政治教育，将他们变成一大批造反者。5月13日，法国工会和法国左翼天主教民主工会组织大罢工，声援并支持学生的抗议活动，由此形成一个工人与学生联合的反对戴高乐派的联盟，成为史无前例的新事件。这也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法国学生运动不同于其他各国学生运动的独特方面之一。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革命，学生们审时度势，提出了一系列适度的、合理的政治诉求，从而使五月造反者变成一个“自我限制的革命”（self-limiting revolution）的经典案例。

此时此刻毛主义者在哪儿？他们在做什么？面对蓬勃发展的“五月风暴”，毛主义者于 5 月 7 日在巴黎高师举行集会，讨论毛主义者如何应对最新发生的政治事件。毛主义者自认为是“纯粹的”、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是革命的忠实信徒，不屑于与一群主要不满于宿舍探视权的中产阶级青年为伍，他们不认可这场正在发展的学生造反运动，反而鼓励支持者放弃拉丁区，建议支持者“现在到工厂去！”。作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的负责人，罗贝尔·兰哈尔不分昼夜地工作，使他产生了某种政治妄想，错误估计了学生运动发展的形势。自称是革命先锋派的毛主义者有可能蜕变成革命后卫派，错失参与这场运动的最佳时机。

革命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学生与工人成立了工人与学生行动委员

1 引自本书第 84 页。

会，继续传播造反福音。未经批准的罢工浪潮接踵而至，促使工人萌发了独立自主的新意识。他们意识到，中产阶级尽管享受“光辉三十年”的丰硕成果，但是他们得到的报酬却低得可怜，而且他们还发现工会根本没有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开始考虑如何寻求工厂自治，占领工厂，实行自己管理工厂。战后法国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人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他们寻求更高的工资报酬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对革命不感兴趣。一旦工人阶级的要求被满足，他们就会离开街道，返回工厂。尽管如此，社会斗争的形式仍然发生了很大改变，开始解构社会控制的专制模式，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妇女、同性恋者、移民和囚犯），寻求社会民主文化。这些内容成为法国后五月时期的重要主题。

面对法国混乱的政治局面，戴高乐总统寻求应对策略。他获得了军方支持，于5月30日发表了电台讲话，力图整顿国家秩序。当晚，戴高乐主义者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游行，暂时扭转了政治局势，而政府与各工会之间签订的《格勒纳勒协议》也缓解了斗争的压力，巴黎暂时恢复了平静。看似戴高乐力挽狂澜，扭转了政治局势，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并没有解决那些酿成“五月风暴”的深层社会问题。1969年3月，法国举行公民投票，戴高乐落选，他这次永远归隐双教堂村了。

各派对“五月风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分析，致力于探寻“事件”的“解释”。来自右翼的雷蒙·阿隆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将这场造反运动描述为一出“心理剧”，暗示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在心理上是失调的，需要进行治疗。而来自左翼的解释则认为“五月风暴”是

一个“突破口”，意味着学生们不再受制于政党、工会等传统政治形式，而是自发地寻求自己的平等主义。其中一种解释认为，“五月风暴”是一种全面消费社会的表达，是一种生活方式选择的变革，个人身份可以进行自由选择，不再受制于社会阶级预定的身份。纵观各种解释，理查德·沃林对“五月风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左翼批评者还是共和主义批评者，双方都误解了‘五月风暴’的政治特殊性。‘五月运动’的独特性在于它向传统的政治斗争形式提出了挑战，不管这些斗争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还是共和主义的。‘五月造反’符合一种新的、具有多种价值的政治动力，而这种动力早已超越阶级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式。学生和工人援引了开放性、公开性和直接民主的准则，以便反驳控制社会的新型专家治国论模式。由此，那些卷入五月抗议运动的人对统治的变更形态和当代社会作用的限制性本质具有敏锐的认识。”¹

毛主义者的“革命时刻”

当法国社会 20 世纪 60 年代如火如荼地进行变革时，60 年代的共产主义中国又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观？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呢？这是《东风》重点研究的议题之一。

众所周知，毛泽东于 1966 年 5 月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 引自本书第 107—108 页。

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巴黎公社的中国版本，希望红卫兵作为现代的巴黎公社成员停课闹革命、搞批斗，消除官僚主义，重建共产主义中国。早在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之时，毛泽东就开始从苏俄夺取革命主义旗帜，输出中国革命思想和模式，在欧洲左派、拉丁美洲、美国黑豹党中间引起巨大反响。伴随着苏联劳动集中营丑闻曝光和“布拉格之春”，苏联的革命模式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而法国共产党的亲斯大林主义立场，也令法国知识分子与学生所不耻，难以对法国现实面临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文化大革命”恰逢其时，中国道路给青年左派学生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有效的反抗模式，在巴黎学生中间产生了热烈回应。1967年成为“中国年”，巴黎街头到处流行着毛主义元素，毛式服装供不应求，《毛主席语录》持续热销，法国人似乎从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寻到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国范例。“文化大革命”也在巴黎高师一群阿尔都塞的学生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逐渐地演变为毛主义者。这些高师生以路易·阿尔都塞为精神导师，积极参加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的研讨班，在他们疯狂的政治唯意志论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形成了奇特联盟。他们对“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尽管他们不会汉语，对当代中国了解甚少，但是革命中国变成法国毛主义的一块投影屏幕，符合他们内心深处对激进政治的希望与幻想，也成为他们寻求政治反抗模式和解决西方现代化危机的最佳样本。

面对毛主义与红色中国的诱惑，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领导人员罗贝尔·兰哈尔、雅克·布鲁瓦耶勒等人奔赴中国，开启了一次人生转折的革命旅游。他们在中方人员的监督和陪同下参观了预

先炮制好的波特金村庄 (Potemkin villages)，看到了“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满足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幻想和希望。他们一回国就赞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认为中国“可能是世界文明的化身”。这次朝圣之旅满足了他们的“乌托邦”幻想，他们只是重蹈了前辈左派分子罗曼·罗兰等人 1930 年对斯大林主义唱颂歌的覆辙，再次佐证了法国文化自 18 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出现的“东方主义”修辞——试图从非西方国度获取“原始的”能量来注入衰落的法国，以激发法国的新活力。对于大多数毛主义者而言，毛主义变成他们“救赎”或“拯救”的入口，毛泽东的唯意志论非常符合毛主义者的造反言行，亦有助于激发他们虔诚信徒一般的革命激情。在他们看来，伟大舵手毛泽东具有超凡入圣的领导魅力，是一位革命巨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阐释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还是一位诗人，他发动了一场文化的革命，赋予中国共产主义以创造性品质，这无疑是令毛主义者乃至整个西方人赞赏不已的新事业、新道路。面对“天空另一半”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毛主义者们都癫狂不已，中国变成了他们激活政治之希望与幻想的投影屏幕。与此同时，面对国内蓬勃发展的“五月风暴”，他们错误估计了政治斗争的形势，变成了政治教条主义的囚徒。他们没有察觉到法国正在崛起的工薪阶级，没有充分理解“日常生活政治”，以致他们与“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革命浪潮失之交臂，错失了那发生在他们宿舍窗户下的革命斗争时刻。毛主义者束缚于马列主义正统学说，没有理解学生造反的政治本质和意义，也没有理解 50 年代以来“文化革命”的本质和意义。

本来毛主义者只是“五月风暴”宏大背景下的小角色而已，他们

的故事本无足轻重，基本上被人遗忘。然而，蓬皮杜政府的拙劣政治行动将一小撮不成名的毛主义激进分子一夜之间变成巴黎最著名的群体。1970年春，法国当局查禁《人民事业报》，逮捕了两名编辑，这是法国自1881年以来对报刊出版自由的最严重干涉。几周后，法国当局逮捕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分裂后的毛主义者组织“无产阶级左翼”领导人阿兰·热斯马尔。整个巴黎知识界怒不可遏，纷纷声援毛主义者的事业。萨特同意毛主义者的请求，出任《人民事业报》主编，他与波伏娃公然反抗政府的禁令，到巴黎街头散发《人民事业报》。这一系列事件促使本已错失革命良机的毛主义者重新焕发活力，使他们成为后五月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开始抛弃派系意识形态，广泛地参加新的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推动了女权运动、同性恋解放、犯人权和环保主义的长足发展，实现了从“革命政治”向“文化政治”、从“历史唯物政治”向“歇斯底里唯物主义”的转变，促进了欲望解放和“日常生活政治”。

知识分子的“悔悟”

“五月风暴”令法国知识分子感到很意外，他们没有预料到这场革命会来得如此突然，如此地令他们不知所措。自18世纪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就开始享有世俗贵族的地位，是真理、正义与美德的仲裁者，尤其是左拉为德雷福斯事件奔走控诉，充分发挥了先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而“五月风暴”却给法国知识分子上了一堂谦逊课，令知识分子处于追随者而非领导的尴尬境地。他们不再是“主人思想家”，

不再承担向大众解释历史进程的重任，也不再为社会变革提供指导理论，“五月风暴”的造反理论来自“情境主义国际”、《论辩》、“社会主义或野蛮”等左翼边缘群体。20世纪70年代初期，萨特、福柯等知识分子接受了经验教训，与毛主义者接触密切，与毛主义者共进退，极大地改变了法国知识分子的角色。

60年代，萨特及其代表的存在主义遭受了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福柯等人的猛烈攻击。他几乎毫无提防，似乎已成明日黄花，被扫到历史垃圾堆了。而“五月风暴”对萨特的存在主义进行了一次有效的辩护，令他东山再起，对结构主义展开了“报复”。萨特密切关注“五月风暴”的发展局势，联合签署宣言，支持学生们的请求。而真正将萨特推向法国政治生活中心的，是他与毛主义者的合作，他一度担任《人民事业报》《我控诉！》和《一切！》等毛主义出版物的名誉主编，沿街散发《人民事业报》，声援被捕的毛主义者，公开表达他对毛主义者的诚意。萨特还为毛主义者自传作品撰写序言，与毛主义学生领袖皮埃尔·维克多联合出版政治谈话录《造反有理》，又与毛主义者塞尔日·朱利共同创办《解放报》，该报之后成为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之一。萨特与毛主义者的这一系列亲密合作使萨特重新散发出政治活力，意味着他重获政治新生。这一系列合作也促使萨特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就其他法国知识分子来说，萨特的毛主义插曲是容许他摆脱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责难的中继站与必经阶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与毛主义者的联合允许他彻底想清楚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萦绕他心头好多年了。……从此时开始，知识分子将不再体现为一种外在于大众的绝对。相反，他或

她反而可能是‘人民的朋友’。”¹

福柯错失了“五月风暴”，当时他正在突尼斯教书，他的伴侣丹尼尔·德菲尔通过电话告知了他巴黎正在发生的事情。福柯一回法国就出任新建的、“实验的”文森大学哲学系主任，他聘任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和雅克-阿兰·米勒等一批毛主义激进分子来系任教，以致福柯被警方怀疑是文森大学毛主义支部的领导者，而这些毛主义者日后成为法国哲学界的中坚力量。福柯与毛主义者并肩作战，成立了以毛主义者为主体的监狱信息小组，而监狱信息小组的毛主义调查策略和政治战斗精神直接影响了福柯日后的写作，促使他的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福柯提出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洞察到权力在微观物理学、微粒子层次上起作用的方式，从而发展和完善了“生命政治”思想。当福柯领导监狱信息小组时，他开始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他有意与萨特所代表的普遍知识分子区分开来，他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就是“特殊知识分子”。面对权力的渗透，特殊知识分子不是拒绝进入权力之网，反而是进入权力之网内部进行工作，以“局部知识”与权力展开斗争。虽然福柯区分了普遍知识分子与特殊知识分子，但他在具体的斗争实践中还是承继了萨特的衣钵，变成了介入型的普遍知识分子。《太凯尔》一反萨特的“介入”概念，20世纪60年代如变色龙一般追逐新小说、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知识时尚。因忠诚于共产党，《太凯尔》派与“五

1 引自本书第197—198页。

月风暴”失之交臂，站到了造反学生的对立面，痛失其表达文化革命信心的绝好机会。不同于萨特与福柯，《太凯尔》派成员与毛主义关系极为特殊，他们没有接触学生毛主义者，而是直接从北京获得政治指示，迷恋“文化大革命”的中国。70年代初，《太凯尔》开始赞扬“文化大革命”，大胆宣扬“革命中国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1972年，《太凯尔》出版两期中国专号，介绍和宣传中国革命。《太凯尔》主编索莱尔斯开始穿毛主义者的服装，与同人用大学报布置编辑部。他还与妻子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学习汉语，并将毛泽东的诗歌翻译成法语，还译介了毛泽东的《矛盾论》等哲学文章。一旦时机成熟，索莱尔斯和克里斯蒂娃等人在罗兰·巴特的陪伴下前往共产主义中国朝圣，进行了一场“革命旅游”。他们在中方人员的陪同下参了模范工厂、模范学校和模范出版社，享受了皇室般的待遇。回到巴黎后，索莱尔斯及其同人保持了他们的约定，撰写并发表了歌颂中国社会主义成就的文章和著作，克里斯蒂娃出版了《中国妇女》，罗兰·巴特出版了《中国行日记》，也基本上为他们的“中国迷”时期画上了句号。一旦革命幻想破灭，《太凯尔》派成员于70年代末期转而支持东欧持不同政见者，变成了坚定的人权主义者。他们解散了《太凯尔》，创办一份纯文学刊物《无限》，以埋葬他们的文化革命的过去。

当一切尘埃落定，“五月风暴”及其后五月时期的文化思潮持久地改变了法国的政治文化生活。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法国社会党上台，曾活跃于后五月时期的毛主义者也逐渐退出了历史的前台，不过“五月风暴”及后五月时期所追求的改革诉求在20世纪80年

代获得实现，最终法国社会从文化革命转向了结社民主，法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篇章。尽管毛主义者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他们代表了法国一代人的政治文化诉求，改变了政治与文化的边界，对法国当代社会产生着持续的影响。“只要毛主义者的故事代表了一种建设性政治学习过程的范式实例，它就值得一讲。毛主义者开始是政治教条主义者、虔诚信仰者，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他们不可能调和他们亲华的‘意识形态眼罩’与‘五月风暴’的解放精神。一旦他们不再以革命口号欺骗自己，他们就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来理解政治。因此文化革命的观念完全被改变了，它不再是一个中国独有的参照点，它反而逐渐代表一种思考政治的全新方法：这种方法放弃夺取政治权力的目标，反而试图在习俗、习惯、性征、性别角色和一般社会交往中发起一场民主革命。”¹

1 引自本书第 16 页。

序言

如果你能记得 60 年代的任何事情，
你就没真正身处其中。

——保罗·坎特纳，“杰斐逊飞船乐队”成员

根据一条人们经常引用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现在史”（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不管历史学家们怎么努力，他们还是不能抽取同时代的诸种问题与关切之事来进行历史研究。实际上，即便他们这样做，那么他们的工作肯定像古文物研究一样索然无趣。历史学家至多能够清晰地表述他们的偏见，以确保他们不要对他们的陈述和研究结果施加一种公然扭曲性的影响。

这种“过去的在场”（presence of the past）尤为适用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分析家和评论家已经激烈地讨论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意义与重要性，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这十年是一个转折点。无论它们具有什么样的终极意义，20 世纪 60 年代都是一种意味着不可能重返原来状态的

停顿。因而，时至今日，对那些试图理解政治现状之本质的人来说，20 世纪 60 年代仍然是一个无法逃避的必经阶段（rite of passage）。首先，这十年的跨度与范围具有真正的国际性。在一个即时的大众传播的时代中，全球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可以免除 20 世纪 60 年代的影响及其遗产。其次，这十年的效应不局限于某种特殊的症候或模式，援引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话来讲，它们是一种“总体的社会现象”（total social phenomenon）。20 世纪 60 年代及其余波影响了——并永久地改变了——政治、社会、时尚、艺术和音乐等诸多领域。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也已成为历史，因此这十年为那些正试图提炼和理解当代政治与社会的起源和基础的解释者们提供了一片沃土。然而，作为历史，20 世纪 60 年代——关于这个年代的研究有可能转移到另一个学术增长的研究领域——借由一种对历史现在时产生的特殊而又深刻的影响而具有一种时间性（temporality）。就其自身而言，作为一种文化政治现象，这十年仍然是一个通往理解“我们是谁”与“我们想变成什么样子”的旅途上的关键性中继站。因此，促成 20 世纪 60 年代的历史化同时也是一种处理“现在史”的方法。

根据一条著名的原理，20 世纪 60 年代是一种探寻“事件”（event）的“解释”（interpretation）。确实，一种令人晕眩的解释涡流已经浮现，试图理解和阐明发生之事及其原因。因为我既研究了这些事件，又在年轻时经历了这些事件 [尽管不可否认的是许多记忆仍然笼罩在亨德里克斯式的（Hendrix-esque）“紫雾”（purple haze）中]，所以，在这一点上，当有人问及它们的最终意义时，我经常想求助于中国总理

周恩来那个不朽的回答——当他被问及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的历史意义时，他回答道：“下结论还为时尚早。”（It's too soon to tell.）

然而，如若我迫不得已来界定 20 世纪 60 年代“理性核心”（rational kernel），那么我也许会说，正是这个时代才重新发现了“参与政治”（participatory politics）的价值。20 世纪 50 年代见证了政治上的专家治国论（political technocracy）的巨大成功，当时流传着一种知识分子的陈词滥调——精英（大多数情况下是白色人种的男性精英）管理的政府要比大众参与（popular participation）的冒险更可取。来自底层的政治动员被视为无理性的、靠不住的，是一首以其或“右”或“左”的变体来演绎的极权主义序曲。20 世纪 50 年代是一个所谓福利战争国家（welfare-warfare state）上升的十年，这种福利战争国家最后以越南战争的惨败与类似的外交政策灾难而告终，而这些外交政策灾难经常导致大规模的、令人厌恶的人权侵害。[遗憾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关于这类侵害的本票（promissory note）依然是延期未付的。]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20 世纪 60 年代意味着一种从精英手中抢夺“政治”控制权的尝试：通过诉诸基层政治参与的逻辑来反击“专家治国论的自由主义”（technocratic liberalism）的弊病，并由此恢复对基本民主准则的信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 60 年代也是政治效价（the valence of the political）本身经历巨大变革与极度扩张的重要时刻。从此以后，政治不再局限于竞选活动的粉饰与仪式：登记投票、拉票活动、民众集会、“新闻原声短播”（sound bite）、电视辩论，最后经

常是虎头蛇尾的、冷冷清清的无记名投票。政治反而被重新定义，包含了“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含义。政治开始包括自我改造的行动与对个人本真性的探求。公民意识到（而且在这一点上，美国民权运动是一个突出的证据）他们不是从同一模子刻出来的。政治成为个人身份新探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新探求也反映在同时期的许多文献资料中，因为身份在现代世界中不再呈现为预成型的、现成的，反而身份必须被创造、塑造和培育，这一发展有助于解释文化与政治之间新出现的临近性。如今，文化已经成为政治自我肯定和群体自我表达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20 世纪 60 年代至关重要的遗产之一就是文化政治的观念。我们已经汲取的经验教训是：文化的即是政治的。

就其本身而言，我认为《东风》首先是一部政治著作。它不是——或者说我希望它不是——一项尼采痛斥为“古文物研究史”（antiquarian history）意义上的练习。反之，它在方法上采纳了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建议：历史学家并不试图“按它本来的样子”（一种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的理想状态）描绘过去，而是以一种面向其现实性或当代关联性的眼光来使时代或事件“现实化”（actualize）。在本雅明看来，这一建议意味着历史学家解释过去“以便把一个特别的时代从同质的历史进程中剥离出来——把一种特别的生活从那个时代中剥离出来或者把一篇特别的作品从一生的著述中剥离出来”。本雅明使用了“当下”（*Jetztzeit*，或“now-time”）这个概念作为他的基准或准则，并将这一概念与“弥赛亚式的事件中止”（a Messianic cessation of happening）的神学观念联系起来。作为政治弥赛亚主义遭受重创

的后继者，我们的政治原则反而是内在的、现世的、导向一致的和民主的。¹

《东风》是一次以“迂回方式”（*indirection*）来捕获 20 世纪 60 年代之意义的谦恭尝试：通过关注法国青年所采取的一种具有异国情调的、时而严肃时而戏谑的政治迂回战术——或者是其中突出的部分——他们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20 世纪 70 年代迷恋中国“文化大革命”，一般来说他们迷恋一种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毛主义的魅力最初只是一种边缘现象，然而，这种魅力很快就以参与者自己都无法预料的方式转换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政治陶醉。在某种意义上讲，好像整个巴黎都被蔓延的毛主义所控制。及至尘埃落定之时，法国许多重要知识分子——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太凯尔》群体（*Tel Quel group*）——在这股令人眼花缭乱的左翼政治漩涡中被清除出局。

然而，重要的是，随着毛主义现象的自然发展，这一现象经历了种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改变与调整。最初作为一项革命教条主义的练习最终演变为文化多元主义与差异权利的狄奥尼索斯式的庆祝。待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政治的学习过程，法国青年经由这一学习过程矫正了其幼稚的革命渴望，以便他们聚焦于那些关乎日常生活变革和公民社会复兴的、更加受限制的任务。尽管法国的毛主义没能因政治力量的这

1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263. (译文参见汉娜·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275—276 页。——中译注)

一有益改向而赢得好评，但是它仍然是这段史话的必要组成部分。它也对法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有益影响，同时祛除了这种官僚等级制度所残余的精英主义，并由此激发了一种全新的、更加谦恭和民主的文化敏感性，因为在“五月造反”（May revolt）¹的余波中，毛主义到达鼎盛之时，法国知识分子学会了听从，也学会了领导。福柯创造了恰如其分的新名词，在很大程度上捕捉到了这一发展：特殊的知识分子取代了普遍的知识分子。在更深层的微妙变化或意想不到的转折中，民主的知识分子将取代雅各宾派－布尔什维克气质的先锋的知识分子。

撰写当代史最令人欣慰的方面之一就是许多主要参与者还尚在人世，他们经常还会积极地（有时会滔滔不绝地）谈论他们的经历。与下列参与者的谈话令我获益匪浅：丹尼尔·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让－皮埃尔·勒高夫（Jean-Pierre Le Goff）、前情境主义者穆斯塔法·卡亚蒂（Mustapha Khayati）、托尼·莱维（Tony Lévy）[后期“无产阶级左翼”（Gauche prolétarienne）的领导者班尼·莱维（Benny Lévy）的哥哥]、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以及许多“五月运动”（May movement）的旁观者和步兵。科恩－邦迪和

xiii

1 本书作者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1968年5月巴黎爆发的、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五月风暴”，以凸显这场社会运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为了传达这些术语之间的微妙差别，译者也对这些术语进行了差异性表述。译者将May 1968与May '68译为“五月风暴”，将May events译为“五月事件”，将May movement译为“五月运动”，将May uprising译为“五月起义”，将May revolt译为“五月造反”，将May insurrection译为“五月暴动”，将May rebellion译为“五月反抗”。——中译注

图海纳对“五月事件”(May events)进行了现场分析[他们分别撰写了《过时的共产主义：左派的抉择》(*Obsolete Communism: The Left-Wing Alternative*)与《五月运动》(*The May Movement*)],时至今日这些分析对试图理解“五月风暴”发生之事及其原因的任何人来说仍是必不可少的参照点。科恩-邦迪一度发誓说他对“五月风暴”“无话可说”,我想感谢他慨然忽略了这一誓言。图海纳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行动者归来”(return of the actor)理论已经从“五月事件”中得出了许多正确的结论与见解。历史进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件”发生了,富有意义的历史变化出现了,这曾是结构主义一代所否定的东西。这种变化是由那些行动一致的人们发起的,他们试图重申对他们的人生与历史变化的步伐进行有意义的控制。

第7章“福柯与毛主义者：生命政治与介入行动”,是我与Ron Haas合作撰写的。Ron Haas是我以前的学生,也是我的朋友,他精通法国“五月运动”及其相应的左派背景和小派别,这曾让我惊讶不已。10年前,Ron与我在赖斯大学就开始讨论这些事件了。从那以后,他独立研究了一个相对来说未被颂扬的后五月时代的核心人物:同性恋解放的先驱者居伊·奥康让(Guy Hocquenghem)。Ron的著作一旦出版,他的奥康让研究无疑会让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这个时代及其重要意义。

在过去几年里,我有幸到法国教书,在那儿我有机会与许多法国学生和同行讨论本书所包含的观点。我感谢东道主Emmanuel Faye教授(巴黎第十大学)和Muriel Rouyer教授(南特大学)的盛情邀

请，感谢他们对我不甚优雅的、带有美国口音的法语的宽容。在本书杀青之时，巴黎第二大学和法国大学研究院（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rance）的 Philippe Raynaud 教授补充了一些极有价值的见解。我也要感谢我的朋友 Ed Berenson，他是纽约大学法国研究所的主任，曾邀请我在那个说法语的奇妙的避风港阐述我的论点的初级版本。

xiv

我要感谢我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中心的同事们，感谢他们所营造的团结与融洽的友好氛围。我尤其要感谢历史项目执行主任 Josh Freeman 和主席 Bill Kelly 的慷慨资助与鼓励。我在研究中心有幸得到了研究助理 Ran Zwigenberg 和 Scott Johnson 的及时帮助。我与我的朋友、同事 Jerry Seigel 共同召集的纽约地区知识分子与文化史研讨班，已经证明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令人愉悦的智力激发的发源地。我也要感谢我以前的学生 Martin Woessner 的帮助，感谢他对初稿所做的富有智力激发意义的评论。

原稿的修改非常受益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所委托的两位见解深刻的匿名读者所做出的评价报告。虽然此时他们的身份变得不那么匿名了，但是我仍要公开地感谢他们富有洞察力的评价。在关键性阶段，Martin Ja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 Carolyn Dean（布朗大学）以其深刻的见识阅读了《太凯尔》那一章，帮助我重新表述了我的解释。出版社的资深编辑 Brigitta van Rheinberg 对初稿进行了令人深思的、极为详尽的、逐章式的（几乎是逐行逐行的）评注，如若没有 Brigitta 的敏锐洞察力，这本书的最终版本毫无疑问将是极其乏味的。至此她已忘我地、谦和地编辑了我的三本书，我很幸运，她还愿意为我再编辑三本书。

最后我尤其要感谢我三个可爱的孩子 Emma、Seth 和 Ethan, 因为他们率真自然而又快乐活泼!

纽约市

2009 年 1 月

导论

毛主义的诱惑

事实情况的确如此：数百万人有工作，但工作不能提供生活的理由；无论生产还是消费都不能给存在提供意义……如果当前的历史阶段可以根据弹道导弹、热核武器、月球竞争和军备竞赛来定义的话，那么一部分学生徘徊于嬉皮士的否定、救赎性暴力的渴望与向新乌托邦的逃逸之间，我们还该对此感到惊讶吗？

——雷蒙·阿隆，《无法探寻的革命》

(*La révolution introuvable*)

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大约 40 年后，1968 年仍然是一个当代政治必不可少的参照点。在 2008 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 参加竞选的承诺之一是他会超越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各种分歧，将美国政治推进到一个和谐平稳期。就其本身而言，约翰·麦凯恩 (John McCain) 的竞选活动不停地爆料奥巴马在早

年政治生涯与 20 世纪 60 年代前激进分子威廉姆·阿耶斯 (William Ayers) 的交往, 想方设法使奥巴马的政治生涯黯然失色。同样, 在 2007 年法国总统选举期间, 双方主要候选人都感到他们不得不对“五月风暴”的遗产表明立场。对于最后获胜者尼古拉·萨科奇 (Nicolas Sarkozy) 来说, “五月事件”充当了一种消极的检验标准。因为萨科奇利用了移民郊区爆发的一系列骚乱所造成的国家不安全, 所以他将“五月风暴”称为法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当时对权威的敬意渐行下降, 道德的无政府态势大行其道。而社会党候选人赛格琳娜·罗雅尔 (Ségolène Royale) 则强调她最后的选举集会将会在夏莱蒂体育场 (Charléty Stadium) 举行, 因为该地曾是“五月造反”中一场大规模政治集会的地点。

2

在德国, 20 世纪 60 年代也充当着一个理解当中政治的重要参照点。2001 年, 一组照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其中有一张照片展示了外交部长、“前六八分子” (ex-sixty-eighter) 约施卡·费舍尔 (Joschka Fischer) 在 1973 年一次示威游行中愤怒地向警察扔砖头。在保守派中间, 这张照片——描绘了一场将近 30 年前发生的冲突——激起了潮水般的谴责, 他们声称费舍尔不适合担任外交部长一职。一般说来, 这种事件会促使全面反省的浪潮迅速高涨, 关涉到如何将 30 年前那场令人不安的政治骚乱加以历史化。

在许多方面, 1968 年是一个具有全球性政治反响的奇迹之年。革命幽灵突然显现在北京、墨西哥城、纽约、芝加哥、柏林、华沙和布拉格。悲惨的是, 在布拉格, “具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 (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 的希望被残暴地碾碎在苏联坦克的履带之下。

不过，在法国，事件却按照某种截然不同的逻辑发生了。与其他地方一样，造反肇始于学生，但是“五月起义”的独特方面之一是，法国工人在两周内决定与学生示威者联合起来。这种强有力的学生—工人联盟导致了大规模的总罢工，致使中央政府瘫痪，一度迫使夏尔·戴高乐总统逃离巴黎。一切烟消云散之时，总共800万到1000万法国人参加了罢工，法国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激烈的一次社会动乱。

《东风》对理解这些挑战性的、喧闹性的事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书通过聚焦“五月风暴”一个被忽视的背景事件——随后十年达到顶点的亲华浪潮，试图阐明这一事件的全貌。

故事始于一小撮左派分子——自称是法国共产党左翼的政治积极分子，他们来自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简称ENS），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学生。由于他们对那些正发生于世界另一端的政治事件神魂颠倒，激情澎湃，所以他们开始深切地认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他们逐渐地将其视为医治法国本土各种政治弊端的灵丹妙药。

这些人当中没有人会说汉语，关于当代中国的可靠信息几乎不可能获得，因为毛泽东基本上禁止外国人入境。这只是点小事儿而已。这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对当代中国了解得越少，那就越合他们的心意。对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激进政治希望与幻想来说，“文革的中国”变成了一块投影屏幕（projection screen）、一项罗夏测试（Rorschach test），而这些激进的政治希望和幻想在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已经被剥

夺了现实世界的出口。中国变成“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radiant utopian future）的化身。通过“生成中国人”（becoming Chinese），通过采取中国红卫兵（Red Guards）之法国化身的新身份，这些持不同政见的阿尔都塞追随者试图彻底改造自身，借此他们不仅将涤除他们作为殖民者子孙的罪恶，而且在更普遍意义上涤除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罪恶。

渐渐地，“真实的”中国不再发挥影响，相反，争论最激烈的是政治末世论问题。中国共产主义的“成功”——或者它所想象的成功——会神奇地弥补其他地方共产党遭遇的完全失败。青年左派分子认为他们是“强硬派分子”（pur et dur）——拒绝与当代法国的肮脏现实进行妥协的虔诚信徒。在他们眼中，法国共和制的荣耀已经不可挽回地消退了——这一传统在他们看来已经不幸地被殖民主义的遗产与戴高乐派的专制主义所损害。人们感觉到，即便“文化大革命”不存在，左派分子也会捏造出来的。在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压抑本质不可否认地达到极不协调的比例的时代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为学生们提供了一条永葆狂热的法国革命传统的道路——巴士底狱的荣耀、瓦尔密的光荣与巴黎公社的辉煌。

法国共产党乐于贬低毛主义者，因为他们人数少，被贬称为一个小派别（groupuscule），一个小团体而已。若不是蓬皮杜政府政治上的拙劣行动——1970年春突然逮捕毛主义领导者，并查封他们的报纸，那么他们的故事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五月事件”的映衬下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故事。然而由于政府的拙劣行动，未

被注意的毛主义者的活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项著名的事业。让-保罗·萨特接管了毛主义报纸，大胆反抗政府独断的、残暴的政治清扫行动。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一度中断巴黎体育馆（Palais des Sports Stadium）的演出，请求释放被拘捕的毛主义者。在这一极为突然且出人意料的情境下，毛主义成为一种政治时尚，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开始引起了著名知识分子——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及《太凯尔》杂志的杰出人物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兴趣，他们从毛主义中察觉到一种创造性方法，用以解决法国当时令人难以忍受的政治保守主义。毕竟社会党完全陷入混乱之中，共产党变成一个“秩序党”（party of order）。戴高乐主义者与当时掌权的蓬皮杜断然拒绝放弃权力统治。然而，正是一个活跃在拉丁区（Latin Quarter）的左翼小派别在许多方面成为“五月风暴”之解放诉求的继承者。

由于“五月事件”以及他们与毛主义者的接触，法国知识分子告别了他们以前迷恋的雅各宾派（Jacobin）—列宁主义的、专制主义的政治模式。他们的行为举止不再像达官贵人一样，而是使民主谦逊的美德内在化。在“五月风暴”的余波中，他们接受了社会斗争的新形式和新方式。他们有关不公正的自上而下政治的“后五月意识”提醒他们注意“社会”的美德和自下而上的政治斗争。因此，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完全被改变了。虽然萨特的介入知识分子（engaged intellectual）模式得以延续，但是它的内容完全被重构了。对衰弱的政治先锋主义（vanguardism）的这种洞察力促使法国作家和思想者重新评价普遍知识分子的德雷福斯事件的政治遗产：这种普遍知识分子

通过卖弄永恒的道德真理而令当权者羞愧不已。

只要毛主义者的故事代表了一种建设性政治学习过程 (constructive political learning process) 的范式实例，它就值得一讲。毛主义者开始是政治教条主义者、虔诚信仰者，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他们不可能调和他们亲华的“意识形态眼罩” (ideological blinder) 与“五月风暴”的解放精神。一旦他们不再以革命口号欺骗自己，他们就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来理解政治。因此文化革命的观念完全被改变了，它不再是一个中国独有的参照点，它反而逐渐代表一种思考政治的全新方法：这种方法放弃夺取政治权力的目标，反而试图在习俗、习惯、性征、性别角色和一般社会交往中发起一场民主革命。

最终，左派分子开始意识到人权和自由社会主义的价值并非反向作用的，而是互补的。毕竟，正是法国人最早在 1789 年创造了人权与公民权。在更具当代性的人权伪装下，他们当时想重返的正是这一遗产。

一种探寻事件的解释

人们经常说，也许只是半开玩笑地说，法国的“五月风暴”是一种探寻“事件”的“解释”，历史学家、权威专家和政治家如此一致地努力将理性意识强加于一系列事件，以致这些事件似乎总是公然反抗严谨的概念一致性。

在法国和美国，20 世纪 60 年代完全是一场十足的灾难，这种观念已经成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大西洋这边，新保

守主义历史写作的陈词滥调之一就是战后时期的社会不稳定——城市骚乱、毒品泛滥、快速上升的离婚率和对权威敬意的下降——一律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据称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最具灾难性的十年。诺尔曼·波多霍雷兹（Norman Podhoretz），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奠基人之一，认为 20 世纪 60 年代见证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文化消亡过程：“奥登所谓‘卑下的、虚伪的十年’，当然是指 20 世纪 30 年代，其‘睿智的希冀’集中于苏联工人天堂的建设。我们与之相对应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其不甚‘睿智的希冀’并不集中于建设……而是集中于破坏，是摧毁那些构成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体制。”¹ 在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看来，美国历史到 20 世纪 60 年代拥有了 350 年的叙述连贯性，当时由于自由主义精英的过激行为和反文化享乐主义，一切都成了未解之谜。² 施特劳斯派政治哲学家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暗示了新左派本质上是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的复活。“历史总是重复自己，”布鲁姆说，“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大学像 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大学一

1 Norman Podhoretz, "America at War: 'The One Thing Needful'", Francis Boyer Lectur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Washington, DC, February 13, 2002.

2 引自 "The Revenge of the Squares: Newt Gingrich and Pals Rewrite the 1960s," by Fred Barnes, *New Republic*, March 13, 1995, 23: "伟大社会搞糟了一切: 不工作, 不吃饭……从 1965 年到 1994 年, 我们整个国家做了许多离奇怪诞之事, 现在我们受够了, 该恢复一切了。"

样，正经历着理性探索结构瓦解的过程。”¹ 布鲁姆的解释向我们提供了令人不安的大学图景，这些大学被有暴力倾向的非裔美国学生团体扰得焦头烂额。通常，自由主义大学的行政部门懦弱地顺从这些团体的要求。大多数学生像绵羊、旅鼠一样被非理性的党派偏见所煽动，也不过是凑凑热闹而已。与此同时，知识渊博的精英——布鲁姆和他的挚友们——虽然拥有“正当理性”（right reason），但他们被边缘化了、被冷落了。就像柏拉图洞穴隐喻的主角一样，他们已经看见了太阳光——只有他们知道真理所在的确切地点——但是被激情所羁绊的大众拒绝听从他们的忠告。然而，一旦涉及评价“治安武装力量”（forces of order）的暴力和蹂躏，布鲁姆的著作竟令人奇怪地保持沉默。

布鲁姆的解释便于从时代的过激行为中提取以下主题：无处不在的种族主义、反应迟钝的政治精英、深刻影响少数族裔和下层阶层的城市衰落，最后尤为重要的是一场显然以不道德的手段进行的非正义战争——汽油弹、不加区别的空中轰炸和残忍的搜索歼灭行动。在美国人全力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的过程中，大约有两百万越南人丧生，他们大多是平民。在新保守主义的知识体系中，越南冲突最终是一场“正义的战争”（good war）。然而美国人的战斗意志被自由主

1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Student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313. (译文参见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译林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65 页。——中译注) 关于新保守主义对 20 世纪 60 年代的观点，更详细的阐释参见 Peter Steinfels, *The Neoconservatives: The Men Who Are Changing America's Politic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9), 44-48。

义者、抗议者和逃兵役者的诡诈行为逐渐削弱了。最后，国内的代际之争悲剧性地、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国外的战斗成果，使美国丧失了战胜不信神的、有害的地缘政治敌人的机会。

假如人们把握新保守主义者关于“60”一代人的“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并加以颠倒的话，那么人们可能更接近于真实。“60”一代人不是激增的不道德的根源，实际上他们极具道德素养。对于许多积极分子来说，社会正义的规则成为魂绕梦牵之事，并且“生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成为真正的教条。新保守主义的兄弟情谊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需要深刻的公民勇气源泉才能成为南方黑人（Jim Crow）社会中的自由乘车运动参加者（freedom rider）；冒着逮捕的危险争取自由言论或集会自由；示威游行反对不道德的战争；烧毁征兵证以示良知行为；自愿迁居国外而不愿像武装部队经常要求做的那样去杀死无辜平民。

文明的崩溃？

在法国，对六八一代人及其遗产的怨恨同样流传甚广。当“五月事件”进入高潮时，夏尔·戴高乐总统就定调了，他叹息道：“进行改革，可以；完全无序，不行！”在戴高乐将军看来，学生积极分子没有提出可辨别的政治目标，他们引爆了纯粹的无政府状态。治安武装力量根本控制不了局势，由此导致了“文明的崩溃”（breakdown of civilization），只有严厉地恢复政治权威才能补救这种“文明的崩溃”。在戴高乐主义者中间，全球性“文明危机”（crisis of civilization）的

观念深受欢迎。在这一观点看来，并不是戴高乐特有的专制领导地位应该受到指责，反而法国是更普遍的全球性混乱的不幸受害者。技术进步的速度——“现代化”的步伐——太快了，超出了公民从道德和心理上进行调整的能力。这些适应性困难导致了各种形式的社会道德沦丧行为：暴动、抗议、造反和广泛的社会动乱。戴高乐悲叹法国青年不情愿接受现代消费社会的甜言蜜语，但是他也担心更普遍的生活“机械化”开始发挥作用，其中个体不可能逃避被碾碎的厄运。¹

关于“五月造反”最具影响力的保守主义解释是由法国右派元老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阐发的。随着事件的发展，阿隆为《费加罗报》撰写了一组文章，他以其独特的洞察力将学生造反描述为一部“心理剧”（psychodrama）、一场“准革命”（quasi-revolution）。阿隆的批评者臆断他试图将“五月起义”贬低为一场在愤愤不平的、无法适应社会的青年人中间发生的反抗。阿隆并没严肃地考虑学生们的政治要求，他声称要将讨论转换到青少年社会心理的“临床”层面。

阿隆的批评抓住了“五月运动”的基本方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其他目击者注意到了。尽管造反者反复地在口头上承认法国革命传统的理想，但是这些提及在很大程度上是修辞层面的，他们仍停留在引用或模仿的水平上。“六八分子”（sixty-eighter）正效仿着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前辈们，“五月事件”只不过是一部革命哑剧的浮夸之作。因此，这是造反的修辞维度与参与者的真实意图之间的分歧，参与者的意图

1 Boisseau, *Pour servir le générale*, 89.

是“改良主义的”，而非“革命性的”。阿隆认识到“五月暴动”不是法国革命传统的辉煌顶点，而是法国革命传统的苟延残喘。

同样厌恶“五月风暴”遗产的是这场造反的共和主义诋毁者。在共和主义者中间，“五月运动”意味着这样一个转折时刻：法国青年人不再尊重权威，转而赞成自我放纵的享乐主义。此前，法国社会已经被神圣庄严的社会建制结构化：大学体系、天主教会、军队、工会、政党等等。随着“五月风暴”反专制主义信条的胜利，这些建制突然丧失合法性。“五月造反”使法国加速转向了一个离心破碎的原子社会（atomistic society）：一个由自我关注的、自我迷恋的个体构成的政体。更糟糕的是，这也是一个法国持续的、无法逆转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时刻。从这种观点看，在“五月风暴”的余波中，形成有意义的、持久的附属关系变得不可能。社会团结已经被持续地侵蚀了，牺牲在美国式的“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的祭坛上。¹

共和主义者对“五月风暴”的诅咒在20世纪90年代曾一度复苏，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像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和让-皮埃尔·勒·当泰克（Jean-Pierre Le Dantec）等小说家的声望。维勒贝克的小说多充斥着人格不健全的浪荡子形象，他们散漫地离开了无聊透顶的工作——经常是高科技部门或性旅游产业——游荡到冷

1 关于这一观点有影响的代表，参见以下著作：Debray, *Le pouvoir intellectuel en France*; Ferry and Renaut, 68-86; Le Goff, *Mai '68*; and Lipovetsky, *L'ère du vide*。对20世纪60年代持普遍敌意的精彩叙述，参见Lindenberg, *Le rappel à l'ordre*。

漠无情的人际关系之中，其中弥漫着匿名的、机械的性。维勒贝克的主人公由于不能表达情感或建立联系，他们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小说家以其雄辩、直率的语调写道：

你的纳税通知书是最新的，你的账单要准时支付。没有身份证，你无法外出。另外你没有任何朋友……事实上没有东西能够中止那些持续增加的、反复重现的时刻：你彻底的与世隔离、耗尽一切的空虚感、你的生存正接近痛苦而明确的结局的预感，这一切联合起来使你冲向真正痛苦的状态……你曾拥有人生。曾有些许时刻，你体味着人生。当然你对这一切不会记得太多，不过有照片可以证明这一切。¹

尽管维勒贝克笔下的人物太年轻，不会是“六八分子”，但是他们的心理缺陷和情感缺陷有意要反映那个时代灾难性的政治文化遗产。

毫无疑问，“五月造反”直接的反响之一就是极大地提高了乌托邦政治期望的门槛。左派分子相信“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只有数月之遥，戴高乐专横的第五共和国确实大限将至。不久，想象力将会接任权力，正如五月风暴著名的口号“想象力当权！”（L' imagination au pouvoir!）所预言的那样。

法国社会在“五月起义”的余波中的确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

1 Houellebecq, *Extension du domaine*, 8.

这一转变确实不像许多前“六八分子”所希冀的那样影响深远，或者横扫一切。这些变化更微妙、更长久，更具演变性（evolutionary）而非革命性（revolutionary）。它们多半发生在文化政治学更加不确定的领域，而文化政治学有助于解释中国“文化大革命”在各类左派学生群体的眼中所呈现的重要意义。这里讨论的转变关乎社交模式与社会角色的感知，关乎性征问题、对权威的诉求以及此前未被充分代表的或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妇女、移民、同性恋者和失业者）的地位问题。

本质上，“五月造反”实现了一场日常生活彻底而激动人心的转变。日常生活的政治策略发挥了一种“退出策略”（exit strategy）的功能，由此允许法国青年人逃避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也逃避法国共产党所强加的“意识形态紧身衣”（ideological straitjacket）。它能够使积极分子表达各种先于政治的、“存在主义的”关注：一系列关乎心理学、性征、家庭生活、都市生活和基本的人际亲密关系等领域的议题。通过日常生活的话语，学生激进分子能够更新当代社会批评的词汇，由此使之切合于现代世界的特殊挑战。¹ 积极分子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统治不再局限于对马克思而言是核心的劳资对立关系。而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商品化的逻辑——人际关系由此变成量化的、难理解的和物化的过程——超出了工作地点，由此渗透和弥散到整个社会生活。

1 关于日常生活的政治策略，参见两个经典文本，一是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一是 Vaneygem, *Treatise on Living*。关于“五月起义”的知识背景，参见必读文献 Epistémon, *Ces Idées*。

天空的另一半

11

20 世纪 60 年代，毛主义的流行伴随着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的迷恋。毕竟，中国——“天空的另一半”——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国家。1949 年，经过 20 年的持久斗争，毛泽东成功地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逐出中国大陆。借此，他成功地向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以农民阶级的中心角色为基础的革命模式，这种模式似乎很适合一个全球反殖民斗争的时代。不久，中国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吸引力通过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古巴夺权和越南摆脱美帝国主义枷锁的英勇斗争而被放大了。

20 世纪 60 年代是一个对西方现代性剧烈祛魅的时代。发达工业社会的居民发现，不仅富裕没有与幸福相伴而生，而且两者好像悖逆而行。一系列消费选择令人眼花缭乱，加剧了对身份地位的焦虑。通过购买能力来定义自身，西方人忽视了人的基本要素：家庭、友谊以及愉悦能力，且不提那些所谓文化工业制造的虚假快乐。¹ 在 1968 年的竞选演讲中，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雄辩有力地概括了一代人普遍的、根深蒂固的不满：

在纯粹持续的经济进步中，在无限累积的世俗商品中，

1 参见 Horkheimer and Adorno, "The Culture Industry: 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 in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120-167。

我们既寻不到国家目的，也看不到个人满足。我们既不能通过道琼斯平均指数（Dow Jones Average）来估量国家精神，也不能通过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来估量国家成就。因为国民生产总值包括空气污染和我们清除高速公路交通伤亡事故的救护车……国民生产总值包括红杉的毁坏和苏必利尔湖（Lake Superior）的毁灭。它随着汽油弹、导弹和核弹头的生产而增长……它包括……美化暴力向孩子推销商品的电视节目……它不考虑我们的孩子们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不关心我们工厂的行事准则和我们街道的安全等类似问题……总之，它衡量一切，除了那些令生活有价值的东西。¹

12

新闻记者、学者和知识分子惊呼，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否有可能是一条通向现代化的、切实可行的道路，是否有可能是一条可以避免主导性西方模式的扰乱与错位的道路。由此，中国的社会主义为那些对一切政治劝服和政治意向感到破灭的西方人兼做了一块投影屏幕。

从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Sino-Soviet Rift）开始，毛泽东试图从苏俄夺取革命主义的旗帜。苏联被嘲笑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一个对促进它自己的地缘政治目的更感兴趣而对推动世界革命的目标没有兴趣的政权。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

1 Robert Kennedy, speech at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March 18, 1968, in *RFK: Collected Speeches*, ed. Edwin O. Guthmann and Jeffrey Shulman (New York: Viking, 1993) 330.

革命”（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理论试图将中国革命斗争的模式应用于其他遭受西方帝国主义不公正待遇的发展中国家。他的理论提出了与反殖民主义的时代精神非常吻合的两阶段论。第一个阶段界定为反对殖民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第二阶段将着手于向社会主义统治的政治和经济的过渡。

在左翼支持者的中间，中国之星伴随着苏联之星的衰落而冉冉升起。有关强制劳改营的揭露、对 1956 年匈牙利事件（Hungarian Uprising）的残酷镇压，还有赫鲁晓夫卖弄的“和平共存”异端邪说，这一切联合起来使人们对苏联在“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进行的试验产生怀疑。越来越明朗的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已经丧失了所有的进步诉求，退化成为一种令人厌恶的、专制的“合法化科学”[鲁道夫·巴霍（Rudolf Bahro）]。而共产主义中国的名声受益于那些误导性的、单纯快乐的人民的形象，他们一起肩并肩地建设一个真正人性化的社会主义。

13

1966 年，伟大舵手毛主席发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时，毛主义的全球性声誉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对于局外人而言，“文化大革命”似乎像一次值得赞赏的、有助于重新激活中国共产主义原初的革命活力的努力，由此避免那种困扰苏联共产主义的、僵化的官僚体制。事实上，当时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可靠信息很难获得，这对中国极为有利。西方记者那些美化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庆祝性报道有助于强化已有的亲华倾向和信念。

不像苏联，中国并不想精心策划一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凭着共产国际（Comintern，1943 年解散）的经验，俄国人占有太多的先

机。此外，中国国内政治反复无常，正如政治声明突然改变所诠释的那样——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Let 100 Flowers Bloom, 1956—1957年）到“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 1959年）再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伴随着社会混乱，这都使中国看起来是一个不太令人满意的政治模式。

然而，毛主义在第三世界革命的众多倡导者中间赢得了支持，尤其是在南美国家和亚洲国家。令人信服的是，毛泽东的农民共产主义观念能够卓有成效地应用于拉丁美洲、秘鲁的“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后者诉诸毛主义谱系。在尼泊尔，毛主义游击队仍活跃在反君主的斗争中。¹20世纪60年代，毛主义也在西方左派圈子中间赢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德国，一种教条的、斯大林化的毛主义变体扎根于众多所谓的K团体（K groups, K即共产党员）中间，而这些团体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得十分迅猛。²在意大利，一些意大

1 参见 Somini Sengupta, “Where Maoists Still Matter,”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30, 2005。

2 关于这些团体及其活动的讨论，参见 Kühn, *Stalins Enkel*。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红军派（Red Army Faction）的奠基性文献——俗称“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Baader-Meinhof Gang）——《都市游击队的观念》（The Concept of the Urban Guerrilla, 1971年），引用毛泽东红宝书的语录作为它的箴言：“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本书作者引自 Mao Tse-tung,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tu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6), 15。〔中译文参见《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载《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1页。——中译注〕

利共产党的持不同政见者流露出对“民粹主义”（populism）的偏爱。

14

在美国，毛主义在黑豹党（Black Panther）成员中间享有声誉，他们曾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史鲍尔广场（Sproul Plaza）销售“红宝书”（Little Red Book），为购买武器筹集资金。激进分子的日报《黑豹党》（*The Black Panther*）充满了毛泽东的口号。黑豹党人相信，毛泽东将被践踏的民众提升到革命中心位置的策略与被压迫的非裔美国人的命运存在着显著的相似之处。然而毛主义的大部分吸引力与其说与严格的教义学说有关，倒不如说与政治战斗精神的审美层面有关。像休伊·牛顿（Huey Newton）和艾德利契·克利佛（Eldridge Cleaver）等黑豹党的魅力型领导者迷恋于毛泽东的口号，例如“枪杆子里出政权”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在法国，民众对苏联和法国共产党（French Communist Party，简称 PCF）的失望致使毛主义的声望上升。法国共产党作为抵抗运动的战斗者在纳粹德国占领时期曾有过一段英勇的政治经历。在法国解放后的第一次全国选举中，共产党人是主要的吸引选票的候选人。在法国政治制度中，法国共产党享有舒适的位置，通常会获得大约 20% 的选票。然而，在许多左翼人士眼中，共产党人变得过于自满了，常规的选举胜利似乎胜过共产党实现彻底的政治变革的承诺。此外，法国共产党在欧洲共产党中间拥有不太好的名声，作为最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对莫斯科卑躬屈膝，令其声名狼藉。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充满传奇故事的文化动荡的时代——一个新小说和新浪潮电影的时代。在“左岸”（Left Bank）圈子中间，存在主义者与结构主义者发动了一场历史上有名的、为了知识分子主导性而进行的斗争。就其自

身而言，法国共产党似乎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就陷入了不合时宜的争论之中。党内知识分子停滞不前的表现是可以察觉到的、无法否认的。然而，更加令人烦恼的是，其领导能力在发展新党员方面正遭遇着巨大的困难，在法国青年人中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因此，当中苏争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爆发时，中国共产党人在平衡苏联马克思主义与乏味的“修正主义”之间所做出的努力在大多数人看来似乎是有说服力的。1964 年，许多前共产党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脱离党派的亲华核心小组——马列主义者联盟（the Fédération des cercles marxistes-léninistes）。1966 年，随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团体在北京官方的许可下重新命名为“法国共产主义运动联盟（马列）”（Mouvement communiste français marxiste-léniniste，简称 MCF-ML），并将其自身改造为一个真正的政党。不过，这个政党没有在复兴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的无望努力中走得更远——在 MCF-ML 的坚定分子看来，法国共产党的主要罪孽在于它仍然是“不充分斯大林主义的”（insufficiently Stalinist）。MCF-ML 从未成功地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它在北京受到了中国在欧洲唯一的同盟者——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派出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宴请，但是它注定在法国政治局面中留下一个微不足道的光点而已。

据估计，1968 年，法国大约有 1.5 万名毛主义者，大约有 35% 聚集在乌尔姆路（rue d'Ulm），即法国最著名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所在地。在法国学生中间，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是法国最优

秀的学生 (la crème de la crème)。然而，总的来说，他们不满于第五共和国毫无生机的政治体制，并被越南战争的新殖民恐怖所激化。在他们眼中，美国只不过接管了法国在 1954 年撤离的印度支那 (Indochina)。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们的亲华妄想因新浪潮电影的神童让 - 吕克·戈达尔 (Jean-Luc Godard) 所执导的、极具煽动性的电影《中国姑娘》(La Chinoise) 而永存后世。如今，许多前毛主义者经历了“体制内长征”(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已经成为法国文化政治生活的杰出人物：哲学家、建筑师、学者和社会党的顾问。

16 令人好奇的是，1968 年春，随着“五月事件”的进展，毛主义者无处可寻。他们成为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的囚徒，他们很难理解的是，起初引发学生造反的东西或许变成一种普遍的政治造反的催化剂。他们对“五月风暴”的政治内涵的错误判断将会在们大多数人的脑海中萦绕好多年。如果法国学生对毛主义的叙述中断于 1968 年，那么这一传奇故事只不过是更加普遍的社会动荡的一个奇特政治脚注而已。

毛主义者只有到了后五月时期才发挥出他们的政治干劲，他们支持一个由少数群体组成的松散联盟——移民、失业者、囚犯、同性恋者——让他们赢得了相当多的公众关注与赞赏。当时法国政府在戴高乐的继任者乔治·蓬皮杜的掌控之下，认为如若逮捕毛主义者的领导者、没收他们的出版物，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威胁。然而，这样行动的结果是，法国当局只是成功地将他们变成了殉道者。

知识分子的时刻

20世纪70年代初期，萨特、福柯和《太凯尔》群体等重要知识分子倾向于毛主义，将其作为实现“介入”（engagement）价值的最有效途径。在1970年春天处于领导位置的毛主义激进分子被逮捕之后，萨特变为一些毛主义报纸的名义主编，他在许多毛主义者的抗议和“行动”的过程中陪伴着他们。为了公开地标榜他对毛主义的政治诚意，萨特沿巴黎大街叫卖一份被禁的毛主义报纸的复制品，险些激怒法国当局逮捕他。萨特为毛主义者自传作品的选集撰写了序言，并出版了一大册他与毛主义学生领袖皮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的政治谈话录《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evolter*）。他也将著名的知识分子政治月刊《现代》的版面留给他的毛主义者同仁。他与毛主义者塞尔日·朱利（Serge July）共同创办了左翼通讯社《解放报》（*Libération*）。几年内，这个很会把握分寸的新闻出版企业迅速发展成为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之一。¹对于年老的哲学家萨特而言，与“亲华的”左派分子的亲密联姻意味着，他在结构主义者公开宣告他是一个“废物”（dead dog）的时代之后获得了政治重生。

17

“五月风暴”期间，福柯正在突尼斯教书，他的伴侣丹尼尔·德

1 参见 Lallemont, *Libé*。

菲尔 (Daniel Defert) 电话告知他巴黎正在发展的形势。一回到巴黎，他就成为新建的、“实验的”文森大学 (University of Vincennes) 的哲学系主任，他热切地聘任毛主义激进分子来系任教：阿兰·巴迪欧 (Alain Badiou)、雅克·朗西埃 (Jacques Rancière)、安德烈·格鲁克斯曼 (André Glucksmann) 和雅克-阿兰·米勒 (Jacques-Alain Miller)。福柯一度被警察盯梢，他们臆断福柯肯定是文森大学毛主义支部的领导者。¹

福柯从“五月事件”中总结出对其日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教训，他理解了“政治”的界限已经被永久地扩大了。政治既不能被简化为“阶级斗争”，也不能被简化为消极自由与公民自由的资产阶级理想。相反，新的政治利害关系关涉到知识政体转译为特定的建制性实践的方式：监禁技术、人口控制以及据称是中性的科学分类方法——正常与反常、偏差 (deviance) 与整合 (conformity)，等等。

福柯在文森大学的任期很短。1970年，他被授予法国最高学术荣誉——法兰西学院 (Collège de France) 教授席位，法兰西学院的唯一要求是他每两周就要公开演讲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其知识分子角色封圣的重要时刻，他全身心地与毛主义的“监狱信息小组” (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简称 GIP) 一道投入到政治行动主义之中。“监狱信息小组”开始是一个支持狱中毛主义激进分子的团体，当时大多数毛主义激进分子积极参加遍及全法

1 参见 Macey, *Lives of Michel Foucault*, 228。正如 Macey 所证明的那样，“福柯的思想自然倾向于毛主义者”。

的绝食抗议。然而，这个知识分子与毛主义积极分子的松散同盟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囚犯的宣传队（advocacy group）。

尽管“监狱信息小组”是由知识分子创立的，但是它的灵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鼓吹公民充分自由权的毛主义团体——“革命万岁！”（Vive la révolution！）。“监狱信息小组”的基础结构和组织实践完全是毛主义的。正是毛主义者提供了油印机、设备和会议厅。它的收集法国监狱条件的方法立基于支持毛主义的调查策略：深入到群众之中——“到群众中去”——以便允许被压迫者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描述他们的困境，这种实践符合毛主义者的座右铭——“下马观花”。

18

福柯这一受毛主义者启发的政治战斗精神的时期很少被仔细考察。然而，如若有人想洞察“谱系学”（genealogy）、“生命权力”（biopower）和“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等福柯式概念的酝酿过程，那么对这一阶段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因为他与毛主义者一起工作，所以福柯才得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 of power）这一概念，而这一概念成为他后期著作的标志。此后，福柯不再根据司法模式将“权力”构想为压制、否认或拒绝的能力。他反而将权力视为生产性的，视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机制，而这一机制在身体、习俗和思想模式上烙下了可以辨识的清晰印记。

在菲利普·索莱尔斯的管理下，《太凯尔》杂志一开始就对萨特的“介入”（engagement）观念提出了文学上的挑战。在《太凯尔》看来，通过努力使艺术附属于政治，萨特冒着忽视或歪曲艺术真正特性的危险，这种特性与其说与“改变世界”有关，倒不如说与促进

某些内在的形式特征有关。《太凯尔》通过赞扬以阿兰·罗伯-格里耶 (Alain Robbe-Grillet) 和娜塔莉·萨洛特 (Nathalie Sarraute) 的作品为代表的新小说 (nouveau roman) 而开启了它的历史使命。此后, 它恰好赶上了结构主义浪潮, 将它的版面向福柯、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等人开放。然而, 当左岸知识分子开始爆发反越战抗议时, 马克思主义再度流行开来。从这种新的政治优势来看, 萨特的“介入” (commitment) 理想似乎焕然一新。

19 起初, 《太凯尔》杂志试图联合法国共产党——根据法国共产党对“五月事件”的批评, 这种联合证明是一个策略性错误。在后五月时期, 索莱尔斯及其他同仁试图通过将杂志与毛主义联盟来弥补他们的失误。《太凯尔》的亲华阶段是独特的, 这个群体讥讽萨特和福柯与之共命运的毛主义学生组织。相反, 它希望其毛主义的介入仍然像当初与苏联共产主义联盟那样保持纯粹性和坚定性。《太凯尔》开始出版“文化大革命”专号, 索莱尔斯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努力学习汉语, 将毛主席的诗歌翻译成法语。1974年, 在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的陪伴下, 这个群体前往共产主义中国朝圣, 然而那时候情况变得很清楚, 即中国在政治方面的试验已经变化了。

知识分子的悔悟

自 18 世纪以来, 法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就开始享有世俗贵族的地位。在法兰西共和国, 他们作为真理、正义与美德的仲裁者发挥作用。这一趋势的巅峰出现于德雷福斯案件 (Dreyfus Affair) 时期, 当时在爱

弥尔·左拉 (Emile Zola) 的指导下, 知识分子帮助撤销了令上校遭受囚禁的不公的司法误判。

“五月暴动”为法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学习谦逊的机会, 没有人预料到这一点。众所周知的是, 结构主义者宣布历史变化是虚幻的, 他们声称“事件”已是过往之事。主流左派指望法国工人阶级扮演他们被指定的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角色。但是, 实际上法国工人很乐意享受“二战”后丰裕的成果——“光辉三十年”(les trentes glorieuses)。因此, 当“五月造反”爆发时, 知识分子被放逐了, 扮演着一系列小角色和支持性角色——这些卑贱的任务是这个骄傲的群体极不适应的。“二战”后法国政治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 (marxisant) 偏见仍显著地集中于车间。然而, 造反已经在其他地方爆发: 南泰尔校园、索邦大学以及拉丁区的斜巷。只有那些准确地预见造反的变数的知识分子才是那些处于“左派的左翼”(left of the Left) 的知识分子: 这些左派分子与革新的“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论辩》(Arguments)、“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 or Barbarism) 等先锋组织关系密切。“五月造反”的标志之一就是直接民主 (direct democracy) 和工人管理的理想从外围转到了中心。

20

事后看来, 嘲弄法国知识分子过度轻信毛主义的政治沉醉是容易的。如今“文化大革命”中的暴行已是有据可查, 中国本身早已长久地离开伟大舵手所绘制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本来是一个天才的军事战略家, 但是一旦掌权, 他的政策就有些反复无常, 并被一种意识形态的狂热所驱策, 导致混乱。

如若说法国知识分子和毛主义的传奇故事纯粹是一出政治闹剧的

话，那么它几乎不值得详细叙述。事后看来，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曾经影响法国的毛主义陶醉凸显为一代人的必经阶段。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认同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变成一种逃离正统马克思主义束缚的“退出策略”。在早期，革命的中国不再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参照点，它反而变成了一个隐喻：一个左派政治想象的投射。正如毛主义者自己后来所解释的那样，议题变成了“我们头脑中的中国”（China in our heads），“文化大革命”的形象已脱离它在亚洲的地缘政治的锚索。在无法预料后果的教科书案例中，它出乎意料地与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文化先锋派所详尽阐述的“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相融合。

“五月运动”标示了“先知知识分子”（prophetic intellectual）——声称对历史进程拥有独特洞察力和为愚昧大众指示前进路线的著名作家或思想家——的黄昏。学生积极分子有助于彻底改造政治激进主义的词汇，通过恶毒地反对革命先锋队的观念，他们在将列宁模式丢弃到历史垃圾箱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这种新的谦逊精神也许在福柯的“特殊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的概念中找到表达，而特殊知识分子要在具体、局部的斗争中承担“论战”（contestation）的行为。由此福柯与他的同盟者摈弃了传统的“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的革命期望，支持那种总是处于某种境况的、特殊地点的“抵抗”。

21 然而，福柯对特殊知识分子的认可不可能有定论，“六八分子”意识到他们不能完全摒弃德雷福斯事件中所体现的普遍知识分子的理想——普遍知识分子可以在道义上令当权者面对正义和真理的高尚理

想时感到羞愧不已。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对苏联古拉格群岛令人震惊的揭露文字于1974年在法国第一次出版，同时还有对柬埔寨“杀人场”（Killing Fields）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幕揭秘——另一场在文化革命中彻底失败的试验，这有助于使法国知识分子相信人权观念值得加倍重视。极少有人会认为人权是政治的灵丹妙药，然而大多数人承认法治发挥了“魔墙”（magic wall）的作用——一种司法政治的权宜之计，这堵“魔墙”可以遏制暴政，并因此有助于避免最坏的局面。这样，“五月运动”的反专制主义精神滋养了审慎的、持久的反极权主义政治信条的发展。

目录

- 001 - 总序
- 007 - 导读 “东风”的法国之旅

- 001 - 序言
- 011 - 导论 毛主义的诱惑

第一部分 造反的时刻

- 003 - 第1章 决战布鲁亚安纳特瓦
- 021 - 第2章 20世纪60年代法国纪事
- 061 - 第3章 “五月风暴”：力比多政治的胜利
- 110 - 第4章 谁是毛主义者？
- 168 - 附录：论阿兰·巴迪欧的宗派毛主义

第二部分 知识分子的时刻

- 197 - 第 5 章 让 - 保罗·萨特的完美的毛主义时刻
- 266 - 第 6 章 穿梭于文化政治地狱的《太凯尔》
- 336 - 第 7 章 福柯与毛主义者：生命政治与介入行动
- 415 - 第 8 章 不可能的遗产：从文化革命到结社民主
-
- 441 - 参考文献
- 456 - 索引

第一部分

造反的时刻

第1章

决战布鲁亚安纳特瓦

我们在我们的想象中发动战争和革命。我们佯装信以为真。这好似分娩前的阵痛，还没展开实际行动。痛苦是内在的，完全是戏剧性的，并且仍允许我们逗留在地狱门外——也就等同于谋杀。

25

——罗兰·卡斯特罗 (Roland Castro)，
毛主义学生领导者

1972年4月6日，事故发生在诺曼底大区 (Normandy) 的采矿城市布鲁亚安纳特瓦 (Bruay-en-Artois)。布丽日特·德韦伏尔 (Brigitte Dewevre)，一个年轻的工人阶级女孩，遭到了虐杀，衣服被剥光，尸体遭肢解，暴露在一片空地上。犯罪现场显示出法国完全不能接受的残暴程度。使这一事件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是，布丽日特的尸体是被他的弟弟第二天在一场临时的足球比赛过程中发现的。

在谋杀案发生的两周内，警察逮捕了当地的名人皮埃尔·勒鲁瓦

(Pierre Leroy)。勒鲁瓦是一名公证员，擅长房地产交易，他是当地扶轮社 (Rotary Club) 的重要成员。有大量的旁证将这位嫌疑人与犯罪联系起来。当天早些时候，有人在犯罪现场附近看到了勒鲁瓦的白色标致车。布丽日特的尸体的发现地点毗邻勒鲁瓦未婚妻莫妮卡·马耶尔 (Monique Mayeur) 的别墅。在布丽日特失踪不久前，有人看到她跟一个穿高翻领毛衣的男子说过话，而勒鲁瓦当天的确穿了一件高翻领毛衣。当天晚上，勒鲁瓦的母亲用氨水手洗了他的衣服，而不像往常那样把衣服送到干洗店。在嫌疑人的辩护中，还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十五分钟间隔。此外，有谣言称勒鲁瓦是一个不太正常的色情消费者。近来，他已经卷入了多起不正当的房地产交易之中。

26

然而，取代了那些更具体的、显然将勒鲁瓦与受害人或犯罪现场联系起来的调查结果的是，地方预审法官意识到他处理了一个相对来说缺乏说服力的案件。因此，勒鲁瓦被捕不久后就被释放了。他再次漫步在布鲁亚安纳特瓦的大街上，又是一个自由人了。

毛主义者希望不要让布丽日特受二度谋杀——这一次是由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司法体系来完成——以确保她的谋杀者归案受审。对支持中国的“无产阶级左翼” (Gauche prolétarienne) 的智囊团而言，勒鲁瓦的罪恶是毋庸置疑的。他的释放是资产阶级司法不负责任的典型案例。情节线索是简单的，是毛主义者一再观察到的情节线索：一个资产阶级杀死了一名工人阶级成员，没有判定任何罪行，罪犯没有受到惩罚就被释放了。对于毛主义者而言，尽管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勒鲁瓦的罪行已成定局。作为一名资产阶级分子，他客观上是有罪的。他的罪行只不过是日常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工人阶级成员忍受资产

阶级折磨的逻辑延伸而已。（“首先他们在矿井底下杀死我们，现在他们杀死并肢解了我们的孩子，”矿工们在得知布丽日特的死讯后悲伤地说道。）¹让毛主义者徒增愤怒的是，近年来这个地区的一些妇女——所有受害者都出身低下——以类似的方式被谋杀。在每起案例中，尽管妇女没有被强奸，但是她们的身体都被肢解了。警察对拘捕罪犯似乎没感到什么压力。每起案件蕴含的影射意义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它暗示了受害人是“放纵的女人”——这种普遍的假定在这个区域关系到矿工的女儿——因此，从本质上是应该受到指责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主义者几乎都是师范生——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精英。就其自身而言，他们的出身背景主要是上层中产阶级。那么他们正竭力为自己作为资产阶级的儿女赎罪吗？谁可以怀疑这一点？

毛主义日报《人民事业报》（*La Cause du Peuple*），以萨特为其名义主编，迅速开展行动，捍卫布丽日特的名誉，还有她所属那个阶级的名誉。5月1日报纸的煽动性标题大声疾呼道：“布鲁亚：现在他们正在屠杀我们的孩子！”毛主义者试图将问题的讨论从犯罪行为层面转移到阶级斗争层面。他们严厉斥责勒鲁瓦和马耶尔所谓的引起淫思的性剥削，还严厉斥责（有点儿可笑）传说的、勒鲁瓦和马耶尔在饮食方面的挥霍无度：“谁在布鲁亚安纳特瓦购买了龙虾，而且附加条件是龙虾的触须仍连在一起？价格不是问题，关键要保证质量，即

27

1 Philippe Gavi, "Bruay-en-Artois: Seul un bourgeois aurait pu faire ça?" *Les Temps Modernes* 312-313 (July-August 1972): 196.

使一周花费 300—400 法郎……谁在犯罪的当天晚上吃掉了 800 克肉？勒鲁瓦！工人阶级的女儿只是温和地探望她的祖母，却被撕成了碎片：这是一种吃人行为。”

一个补充性报道宣布：“只有资产阶级才会做这种事！”青年左派分子仍然固守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二元对立模式，后者只是与当代法国社会现实具有一种模糊的相似性。在“二战”后的法国，工人阶级——马克思曾赞颂过这个阶级的革命潜力——不再是主导的政治经济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被由白领工人和中层管理人员（cadres）构成的“工薪阶层”（saliariés）所取代。毛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的构想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启于路易·阿尔都塞的著作和研讨课。

令人费解的是，法院一度签发了对德韦伏尔住宅的搜捕令。一群愤怒的矿工迅速涌入了勒鲁瓦的花园，他们严词谴责，口头威胁，强烈要求法律制裁。他们甚至提议，只有与布丽日特所遭受的暴虐行为相等的死亡才可以了事。石头纷纷掷向了与犯罪现场毗邻的马耶尔的别墅。几天后，一群矿工的妻子直接向地方预审法官昂利·帕斯卡尔（Henri Pascal）请愿：“作为母亲，我们从心底里呼吁：布丽日特是我们的孩子。资产阶级像虐待奴隶一样虐待我们的孩子。假如他们想寻开心，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虐待我们的孩子。”¹最终，法国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发现帕斯卡尔法官偏袒勒鲁瓦，鉴于当地居民

1 Philippe Gavi, “Bruay-en-Artois: Seul un bourgeois aurait pu faire ça?” *Les Temps Modernes* 312-313 (July-August 1972):188.

的愤怒，最终让他退出了这一案件的审判。

一块纪念牌匾被放在发现布丽日特尸体的空地附近。此外，还有人吁请市民组成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案件真相，维护司法公正。毛主义者的想法是通过这个委员会向地方预审法官施压，确保杀害布丽日特的凶手被绳之以法。“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在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mass line）理论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根据真理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原则，他们回避了一种积极的领导角色。城市的老年人，站到了勒鲁瓦一边，因为他们与勒鲁瓦有业务往来，设法干扰委员会的活动。一个矿工的女儿谈及她所遭受的拘留——一旦有人散发传单，就被逮捕，拘留当地警署两小时。“他们威胁说要将我们遣送到贝图纳地方法院（一个邻近的城市），”她解释说，“警长说我们没权散发这样的传单。”¹

毛主义者已经在这个地区安插了一些激进分子，他们不择手段地利用亲共的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简称CGT），以赢得工人阶级的忠诚。在毛主义者看来，工人阶级愤怒的表现显然是一种积极的发展，这意味着矿工们克服了他们的“惰性的被动性”（inert passivity）的日常状态——或者运用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的术语，他们的“序列化”（serialization）——并且他们找到了公开抨击阶级不公的勇气。

“人民法庭”（people's tribunals）的问题在1970年2月朗斯（Lens）

1 Philippe Gavi, "Bruay-en-Artois: Seul un bourgeois aurait pu faire ça?" *Les Temps Modernes* 312-313 (July-August 1972):190.

附近发生的矿难之后第一次引起公众的注意，这次矿难中，16名矿工因瓦斯爆炸而丧生。不出所料的是，一提到因大量违反安全的操作而检举矿业官员时，地方法官就采取不合作态度，然而他们却认为起诉6名将燃烧弹扔向矿业公司办公室的工人阶级激进分子是合适的。12月，萨特赶来召开人民法庭，以便发挥公众压力来将那些对爆炸负有责任的人绳之以法。医学专家证实了环境因素对死者的晚期硅肺病或者黑肺病有影响。

朗斯法庭裁决国有矿业公司乌里耶尔公司（Houillères）犯有谋杀罪，因为该公司视利润优先于工人安全。萨特运用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论证说，乌里耶尔公司的管理层“有意选择产量先于安全，也就是说物（things）的生产优先于人民生命（people's lives）”¹。法国审判官仍然无动于衷，而且从没有人因为灾难而遭到起诉。在朗斯，萨特所取得的一个适当成就就是保证了6名已被指控纵火罪的积极分子无罪释放。

两个月后，米歇尔·福柯和“无产阶级左翼”领导者皮埃尔·维克多（埃及出生的犹太人班尼·莱维的化名）深深迷恋革命的第三世界主义思潮，在萨特的《现代》杂志上讨论了大众司法（popular justice）的价值。对于学生一代来说，切·格瓦拉、毛泽东和胡志明（Ho Chi Minh）都成为新一代的政治偶像。切·格瓦拉的口号“一个、两个、

1 关于萨特的结论，参见“Premier procès populaire à Lens,” in *Situations*, vol. 8, *Autour de '68*. 亦参见 Simone de Beauvoir 的解释, *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 (Paris: Gallimard, 1981), 25。

无数个越南”成为全世界左翼青年吟诵的祷文。谁会怀疑反美帝国主义的越南战争本质上的正义性？学生激进分子希望第三世界的激进主义将意义和实质注入一项行将消亡的全球革命事业。随便看一看克里姆林宫僵化的、七十多岁的领导层就有助于解释这种绝望的政治赌注。

在与福柯的辩论中，维克多认为，由于现存法院体系显而易见的阶级偏见，所以左派需要建立自己的革命人民法庭。他完全接纳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民粹主义”精神——对专家和官僚的不信任[“先红后专”（better Red, than expert）成为一句流行的口号]，对民意的卢梭式崇尚。维克多擅长将激进主义推向极致，正是这种能力让他在左派分子同仁中间赢得了赞扬。

然而，在这一特殊的个案中，恰恰是福柯在革命热情方面超过了维克多。福柯几乎不信任现存的法律制度，或者就此而言，他几乎不信任任何未来的“无产阶级的”法律制度。毕竟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发动的大清洗审判——期间大约有100万人丧命，已经成为苏联共产主义记录在案的永久性耻辱。因此，一方面，福柯像维克多一样支持资产阶级合法性的简易排除程序，另一方面，他激烈地反对设立维克多、萨特和其他“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所赞成的人民法庭。他认为这样的机构对民意的自发性表现出太多的形式束缚。用当时的行话来讲，这样的法庭冒着凝固成“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阿尔都塞特别喜欢的术语之一）的危险。因此，它们有可能在大众与权力官方智囊人物之间制造一条不必要的分界线。

福柯提出的司法模式令人回想起法国大革命的太平盛世：1792年的“九月大屠杀”，当时数百名无助的囚犯被处死——大众唯恐囚犯

在反革命武装集聚法国东部边境的情形下威胁到法国大革命的完整性。福柯的逻辑是客观而近乎冷漠的，并且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现在我的假设与其说法庭是大众司法的自然表达，还不如说法庭的历史功能通过将法庭重新铭刻到以国家机器为特点的**种种建制**之中去诱捕它、控制它和窒息它。例如，1792年，当时与邻国的战争爆发了，巴黎工人被号召上战场，去送死，他们回答道：“除非我们先把我们的国内敌人送上法庭，否则我们就不上战场。当我们上了危险重重的战场时，他们将由关他们的监狱保护着。他们只等着我们离开，以便从监狱里出来，再次建立旧秩序……”

九月处决同时是一次反对内部敌人的战争行为，一次反对当权者操纵的政治行为，一次反对压迫阶级的报复行为。难道这不是——暴力革命斗争期间——一次非常接近大众司法的行为吗？一次对在策略上有益的、在政治上必要的压迫的回应吗？¹

在福柯看来，自发性的**大众行动**具有超越法官与行刑者之间的“资产阶级的”劳动分工的额外优势。从此以后，大众将具有**双重的功能**。根据革命高人一筹的逻辑，福柯轻而易举地赢得了争论。维克多不习

1 Foucault and Victor, "On Popular Justice: A Dialogue with the Maoists," in *Power/Knowledge*, 1-2.

惯在意识形态上遭受侧翼包抄，他几乎不相信他所听到的事实，惊愕地退缩了。

话题还是回到布鲁亚，全法国记者突然抨击萧条的小煤矿城市，这些小煤矿城市有可能充当左拉长篇小说《萌芽》(*Germinal*)的背景。矿工的寿命短，黑肺病盛行，生活环境肮脏。1906年，一个附近的矿井发生坍塌事故，致使1101人丧命。矿工们讲述了那些困在坍塌矿井里的同伴们的可怕遭遇。有人因此被解雇了。老板们要求矿工们继续工作，而不是给予死者应有的尊重。许多有问题的事故是把利润置于工人安全之上的结果，而这本是可以避免的。正如一个矿工所解释的那样，他说：“矿井里，只有一件事情是有意义的：你的工作能力和你的健康状况。你处于一种你越老赚得越少的境况之中。当你的健康状况恶化、丧失工作能力时，你会被打入最底层。你有10年时间每天可赚70法郎，而你接下来的20年时间每天可赚30—40法郎。”¹

在新闻媒体看来，勒鲁瓦的逮捕而非布丽日特的谋杀才是真正的丑闻。《星期天周报》(*Journal de Dimanche*)断言，一个具有勒鲁瓦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的人真若犯了这么可耻的罪行，那是无法想象的。《世界报》(*Le Monde*)甚至掩盖布鲁亚居民对布丽日特·德韦伏尔悲惨死亡的愤怒。对于有案可稽的法国报纸来说，阶级不公是无关紧要的，反而是布丽日特谋杀案被贬低为一个社会新闻(*fait divers*)，一

1 Gavi, "Bruay-en-Artois," 118.

个“富有人情味的故事”（human interest story）。

毛主义者被勒鲁瓦的突然释放激怒了，他们决定召集一个独立的真相与正义委员会。“无产阶级左翼”领导层，与萨特和福柯等同路人（他们以“民主人士”著称，因为尽管他们在“亲华的”方面意气相投，但他们未能成为完全成熟的毛主义者）一起奔赴布鲁亚。假如法国司法制度与当地资产阶级沆瀣一气，未能对布丽日特遭受的残暴谋杀施以公正惩罚，“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将确保民意一定会实现。

无产阶级左翼的好战趋势被“二月枪杀案”激发了——一个在巴黎郊区雷诺汽车厂工作的年轻毛主义者皮埃尔·奥维尼（Pierre Overney）被杀害。几周前，工厂管理人员揭露一些毛主义激进分子有组织地渗透到工厂。一旦他们的身份被发现，秘密的毛主义者就会被立即开除。暴力冲突与抗议游行的浪潮随之发生，毛主义者配备全副防暴武装，人们经常看到维克多本人多次率先冲锋。

奥维尼，年仅 23 岁，他的突然死亡在毛主义者中间引发了一场重大危机。多年来，在与他们作为激进分子的自我认识保持一致的情况下，他们赞美过革命暴力的优点。毫不妥协的革命主义的这种气质在一定程度上把毛主义者与法国共产党人（更不用说公开赞成改革的社会党人）的改革方向区分开来，法国共产党人自从法国解放以来始终在法国选举制度中享有舒适的位置。但是，面对奥维尼这起毫无知觉的谋杀案，毛主义者不得不面对他们自己的过激言辞所传达的政治暗示。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暴力阶级对抗学说要对这名年轻工人毫无知觉的死亡负有间接的责任。许多“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在不得不直接面对他们自己的政治激进主义所造成的流血冲突后果时，的

确惊骇不已。根据一些报道的说法，人们注意到英勇的维克多泪流满面地离开了雷诺汽车厂现场。

几天后，奥维尼的遗体下葬拉雪兹公墓（Père Lachaise cemetery）。引人瞩目的是，一支20万人的送葬队伍跟随灵车来到墓地。走在送葬队伍前面的有许多备受瞩目的毛主义支持者：萨特、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日后代表社会党出任法国总理的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还有女演员西蒙娜·西涅莱（Simone Signoret）和简·方达（Jane Fonda）[当时方达正好在巴黎，参加让-吕克·戈达尔歌颂法国工厂占领新高潮的电影《一切安好》（*Tout va bien*）的拍摄工作]。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毛主义，起初只是少数刚愎自用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们的想法，同时又以激进的风格赢得了相当大的文化声誉。然而，作为法国毛主义的教父，路易·阿尔都塞在奥维尼葬礼期间贴切地说道：“今天他们正在埋葬的不是皮埃尔·奥维尼，他们正在埋葬的是左倾主义。”¹

为了对杀害奥维尼的行为施加报复，“无产阶级左翼”的“军事派”，所谓的“新人民抵抗运动”（Nouvelle résistance populaire，简称NRP），劫持了雷诺汽车厂的工头罗贝尔·诺各热特（Robert Nogrette），两天后就把他安全释放了。²直到那时，毛主义者仍被视为政府镇压的受害者，享有广泛的民众支持。然而，劫持诺格热特的决定却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后果。毛主义者的“行动”不仅遭到“资产

1 Althusser, *L'avenir dure longtemps*, 197.

2 有关毛主义者的人民抵抗运动的小说化叙述，参见 Rolin, *Paper Tiger*。

阶级的”媒体的强烈谴责，而且也遭到其他左派分子的强烈谴责。

法国的政治情绪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公众对政治情绪激烈的暴力行为的容忍可以忽略不计，但人们看到了邻国意大利和德国发生的左翼恐怖主义的结果，并发现这些结果令人极其讨厌。¹

后来毛主义者声称他们劫持诺格热特期间所使用的武器并没有装弹药。与革命暴力的诱惑力相比，一种类似的癖好与厌恶可以概括为整个过程中所体现的毛主义战斗精神。这个团体的名字以“抵抗”（résistance）一词加以描绘几乎不是个偶然事件，它显示出左派分子的坚定信仰——在戴高乐的统治下（从 1971 年开始，在蓬皮杜的统治下），法国人仍生活于右翼独裁统治之下。根据极左派的政治视角来看，法国是一个尚需要“解放的”“被占领的”国家。

34

紧随皮埃尔·奥维尼死亡而来的是，对于法国左倾主义来说，决战布鲁亚安纳特瓦意味着没有回头路。对前所未有的、“五月风暴”革命高潮的记忆正在快速逝去，一个政治常态的时代到来了。许多“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开始怀疑他们是否还生活在一个革命的年代里。此外，一些著名的毛主义者——他们中间有哲学家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对勒鲁瓦的罪行提出了严肃质疑。他们觉得，他们的同志由于对勒鲁瓦做出的预先判断才致使他们鲁莽行事，不负责任。

如果毛主义者判定勒鲁瓦是有罪的，他们会怎样行动呢？他们会如他们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已经采取行动的同仁们那样越过底线实施政

1 关于左倾主义与恐怖主义关系的更详细论述，参见 Sommier, *Violence politique*。

治谋杀或恐怖行动吗？

受圣茹斯特（Saint-Just）的启示，维克多说，在当时情况下，采取革命暴力完全是正当合理的。正如他在《人民事业报》上所说的那样：

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必要的：如若勒鲁瓦被释放，那么民众抓捕他是正当合理的吗？我们的回答：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受辱的民众当然可以实施**短期的恐怖行动，并攻击一小撮卑劣的、可恶的个体……**压制那种自然的司法过程的“大众的”司法的原则对多数人而言将成为一种压迫原则，后者再产生基于剥削的全部司法机构的原则……对于我们来说，阶级仇恨是具有创造性的，它是必要的出发点。¹

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位强烈赞成克制的“民主人士”竟是萨特。一方面，萨特衷心支持布鲁亚的矿工参与斗争，来决定勒鲁瓦的犯罪或清白。他们的行动主义证明他们拒绝被制度欺骗，阶级意识依然生机勃勃。另一方面，萨特极力反对《人民事业报》所发表文章的控诉论调。在《处以私刑还是大众司法？》（*Lynching or Popular Justice?*）一文中，他表达了他的担心——矿工们内心深处的阶级仇恨会胜过无罪推定。² 毕竟勒鲁瓦犯罪的证据仍是不充分的。此外，正如萨特所指

35

1 Victor, *La Cause du Peuple*, May 17, 1972;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2 Sartre, "Lynchage ou justice populaire," *La Cause du Peuple*, May 17, 1972, 12.

出的那样，处以私刑是一种反动的司法形式，一种盛行于美国南部的群氓暴力。就其本身而言，它几乎不是一种忠诚的左派分子可以效仿的模式。萨特也断言，按照阶级属性的要求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是一种悲剧性的错误。因此，他仍忠实于他后来的哲学使命：调和存在主义对个体自由的聚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动力和阶级斗争的强调。取代勒鲁瓦令人信服的犯罪证据的是，毛主义者的立场只不过是対治安委员会的政策（vigilantism）的一个刺激而已。

然而，在维克多的领导下，毛主义者仍然是坚贞不屈的。他们在同一期《人民事业报》上回复了萨特，控诉他离间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与作为个体的勒鲁瓦。因此，编辑们暗示，由于萨特仍为勒鲁瓦和法定诉讼程序的规则辩护，所以他的分析就像他的整个哲学一样仍然受惠于一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petty bourgeois individualism）的气质。他们争辩道，萨特没有看到勒鲁瓦事件的“阶级性”（class character）。编辑们声称，在普通的布鲁亚居民心中，“勒鲁瓦集团”与“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同义词。

但是，被践踏者名义下的阶级司法是不是真的比资产阶级的阶级司法更可取呢？与斯大林和波尔布特（Pol Pot，曾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巴黎最好的大学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教义问答）的名字联系起来的历史教训则与此截然不同。一位观察者正确地指出：“如若这场革命成功地实施了‘共产主义教义问答’（Communist catechism）……结果证明是有益于一种暴虐的、意在根除懒惰、‘变态’和边缘性的专制主义，那么这场革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权力？完美的社会将是由诚实的家庭、善良的工人、忠诚的同志、英勇的抵抗运动成员、勇敢

的女人和高尚的劳动者组成的社会。”¹失控的左派分子冒险用共产党的“常态”（normalcy）定义来取代资产阶级的“常态”定义，由此产生的“思想健全的”（right-thinking）个体似乎不过是对与他们相对应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拙劣模仿而已。在后五月时期，法国左派分子意识到，调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朴素原理与反文化所探索的“快乐的知识”（尼采）是不可能的。

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迫使许多著名的“无产阶级左翼”坚定分子变成忠诚的人权倡导者。他们亲身经历了左倾主义的过激行为，并对他们看到的一切感到恐惧不已。有人会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人权主义（droit-de-l’hommeisme）社会思潮是左派经历主要的、要不就是意想不到的结果之一。

在帕斯卡尔法官调离这一案件之后，新法官没有召集一个庞大的陪审团来复审证据，并且勒鲁瓦从未因布丽日特凶杀案而受审。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布丽日特的死亡仍是一起没有解决的犯罪案件，杀害她的凶手仍然逍遥法外。

布鲁亚安纳特瓦变成了一个左翼政治正确性的微型实验室。不久，左倾主义的错误路线完全暴露了，而且左倾主义的妄想开始化为泡影。因为“无产阶级左翼”领导层仍忠诚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理论，所以他们相信真理掌握在大众手中。与萨特的立场相反，他们坚决主张，如若大众司法遭到了规则和程序的形式上的阻碍，那么“对多数

1 Gavi, “Bruay-en-Artois,” 200.

人而言的自然司法运动”将遭受致命的阻碍。因此，“外在于大众的”、形式上的司法机构将会处于有利地位。¹

37 虽然福柯像萨特一样是一位著名的毛主义支持者，但是他在所谓的民主人士或怀有好意的同路人中间是屈指可数的。福柯对布鲁亚安纳特瓦事件的态度充满了矛盾情绪，一方面，他相信勒鲁瓦犯了罪；另一方面，当时一触即发的政治局势令他感到非常不安。因此他甘心扮演旁观者或观察者的角色。²

尽管在与维克多的争论中，福柯摆出了大众司法倡导者的样子，但是他在布鲁亚近距离观察了这一现象时，他对他所看到的一切感到厌恶。在他看来，布鲁亚抗议事件很冒险，随时会退化为未经思索的群氓暴力的最粗野形式。因此，尽管福柯对“九月大屠杀”有理论兴趣，但是他最终意识到，这不是一种可供效仿的或倍受鼓舞的政治模式。反而他逐渐洞察到了未经调停的大众暴力的潜力，他视之为完全法西斯主义的大众暴力。他开始想知道：左派分子对革命暴力的陶醉难道不仅仅是一种对政治施虐狂的法西斯式迷恋的左翼翻版吗？毕竟极权主义的批评者长久以来不是暗示了左翼独裁和右翼独裁只是彼此的镜像吗？在他同年早些时候为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所撰写的序言中，他清晰地阐述了他对这些富有挑战性的政治主题的思考。他质询道：“一个

1 Victor, *La Cause du Peuple*, May 17, 1972.

2 关于福柯的观点，参见 Claude Mauriac, *Une certaine rage* (Paris: Laffont, 1977), 254。亦参见 Hamon and Rotman, *Génération* 2:428-439。

人如何避免自己成为法西斯主义者，甚至当（特别是）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激进分子的时候？我们如何从我们的言语与行为、我们的内心与快乐中清除法西斯主义？我们如何搜寻出根深蒂固于我们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¹ 此处指的是左翼激进分子不能免除的专制主义的诱惑。

在布鲁亚，一支不断增加的毛主义小分队突然拒绝维克多的领导。实质上，维克多面临着一场“宫廷政变”，其中著名的背叛者是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克里斯蒂安·让贝（Christian Jambet）和《人民事业报》的编辑让-皮埃尔·勒·当泰克（Jean-Pierre Le Dantec）。他们拒绝这样的主张——勒鲁瓦事件是维克多与其同盟者所说成的工人阶级历史上的转折点。维克多觉得，他在布鲁亚清教徒式的思想路线逐渐被毛主义的“自由论者的”思想潮流削弱了。在“五月起义”发生不久，法国毛主义分裂成两种派别：一种是更加教条的、新列宁主义的正统派，以维克多和“无产阶级左翼”为代表；一种是聚焦于“日常生活政治”的“狄奥尼索斯式的”趋势：妇女解放、同性恋认同与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的实验。事后看来，维克多将这场发生在布鲁亚的危机视为法国毛主义所谓的“力比多派”（libidinal wing）的复仇。

38

多年来，毛主义者致力于建设一种可供选择的政治现实，以弥补匮乏的、可以信赖的国内政治抉择。这样“无产阶级左翼”领导层将

1 Foucault's preface to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x.

无产阶级妄想的末世论图景捏造为“历史之谜的解答”（马克思）。在布鲁西安纳特瓦的歇斯底里和混乱无序中间，这种妄想被证明是不能成立的。

第2章

20世纪60年代法国纪事

谁会真相信我 67 岁才开始独裁者的新事业呢？

39

——夏尔·戴高乐（1958年）

人不能进行纯洁的统治。

——路易 - 安东万·圣茹斯特
(Louis-Antoine Saint-Just)

6月18日发表演讲的人

从1958年到1969年，夏尔·戴高乐将军完全控制了法国政治局势。如若没有研究将军的核心角色，人们就不能理解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也就不能理解“六八分子”所反抗的政治制度的本质。同样，将军下令执行的政治封锁激起了一系列尖锐的反抗性文化批判，最终这种文化批判成功地削弱了戴高乐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模式的可信度。随

着这十年的逐渐发展，小说、电影和理论等领域的开创性著作出现了，同时形成了“六八分子”可以洞察“二战”后法国社会缺陷的文化样板。

及至 1958 年春，阿尔及利亚战争激烈地持续了四年。对于双方而言，暴行已是司空见惯之事。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简称 FLN）经常采取恐怖行动来攻击欧洲移民（大约有一百万），并将其作为他们为了获得独立所付出的努力的一部分。鉴于法国政府毫不妥协地拒绝谈判，民族解放阵线觉得它没有选择的余地。

那一年，反抗者越过了底线，将目标对准了法国领土上的军事重地。就其本身而言，法国军队无视国际法，例行采取严刑拷打的暴行。根据一项 1957 年 9 月的报告，多达 3000 名阿尔及利亚人受到审问，“他们再没被看到过，一些人死于刑讯；一些人被杀死，以阻止他们提出非正式的抗议；其他一些人立即执行处决或被射杀，‘以防逃跑’¹。这完全是一场“清洗的”战争，报复性的野蛮行径反而变成了日常之事。

1958 年 5 月，事态突然出现了不祥的转折。正当法国政客们开始严肃地考虑谈判的想法时，成群的移民袭击了阿尔及利亚的首都，推翻了殖民地的行政管理。这是一个法国军队〔还在从四年前奠边府（Dien Bien Phu）的羞辱性战败中恢复元气，休养生息〕似乎正在等待的导火索。这时将军们开始行动了，也许他们在阿尔及利亚会重新获得他们曾在印度支那受损的荣誉。市民暴动之后，也就是在 5 月 13 日，他们开始介入，宣布以前的政权是无效的。在雅克·马

1 Maurice Larkin, *France since the Popular Front, 1936-1986*(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60.

苏（Jacques Massu）将军和拉乌尔·萨朗（Raoul Salan）将军的领导下（效仿着成问题的共和主义传统的脚本），他们宣布了以萨朗将军为首的公安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的统治。

将军们的政治目的是双重的。首先，他们希望他们能够阻止即将上台的皮埃尔·普弗蓝林（Pierre Pflimlin）内阁，普弗蓝林是一名政治温和主义者，他在近期的一次访谈中提出了经由协商谈判的方式解决危机的前景。他们的另一个目标是为戴高乐攫取权力铺平道路，戴高乐的两名支持者莱昂·德尔贝克（Léon Delbecque）和雅克·苏斯戴尔（Jacques Soustelle）已经与马苏、萨朗进入秘密谈判阶段，将军们试图插手当时极其软弱的政府，促成一场只有像戴高乐那样的军事强人才能解决的危机。

既然殖民地的将军们不再服从平民领导者，选择了造反，巴黎当局当时就面临着煽动性叛乱。然而，正当局势似乎跌入低谷时，法国本土好像处境艰难，危机重重。造反的空降兵入侵了科西嘉岛，他们在那儿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它实质上是一个军人集团。接下来可能是法国本土吗？事实上，将军们早已计划着“军事复兴行动”（Operation Resurrection），一场计划于5月27日发动的以巴黎为目标的军事政变。政治分析家洞察到了这一切与二十多年前弗朗哥攫取权力具有相似的诡异之处。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一位将军利用一个非洲基地挑起西班牙内战，最终导致了37年的独裁统治。

就其整个发展而言，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始终遭受没完没了的议会欺诈，为此困扰不已。共产党人凭借“二战”时他们作为抵抗运动成员的名声而成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领导党派之一，乐于扮演“拆台

者” (spoiler) 的角色，同时抓住每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来暗中破坏达成政治共识的前景。然而，正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和 1958 年五月军事政变证明是法国无法承受的致命一击。没有人会相信共和国熟知的、善意的政治庸才们能够化解危机。他们的可信度长期以来被第四共和国在国内外的软弱表现损害了。这种局势需要一位政治救星，似乎只有一个人能够扮演这一角色——夏尔·戴高乐，“1940 年 6 月 18 日发表《告法国人民书》演讲的人”。正如《世界报》记者所说的那样，“共和国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只有一道防线，中间矗立着夏尔·戴高乐这样的务实之人”¹。

18 年前，当法国屈服于那些踏正步跨过莱茵河的纳粹征服者时，戴高乐在伦敦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广播演讲，号召法国人进行持久的抵抗运动。戴高乐的确是一个独裁者。但是，不像贝当 (Pétain)，他是一个共和主义的独裁者。1946 年，他突然离弃了第四共和国，因为第四共和国的议会结构和“政党制度”是他所鄙视的。20 年后，当法国摇摆于内战边缘之时，戴高乐似乎是一个双方都觉得可以信赖的人物。

42

在戴高乐将军 1958 年 5 月被召唤领导法国后，他精心策划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戏剧性政治行动。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他对造反的殖民地居民宣布：“我理解你们！”法裔阿尔及利亚人将这一声明解释为是对他们事业的认可——对阿尔及利亚永恒的法国性

1 引自 Berstein, *Republic of de Gaulle*, 8。第四共和国也因苏伊士运河事件的惨败而名声受损。在埃及总统纳赛尔于 1956 年秋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之后，英法远征军以保证“航行自由”为借口驱逐埃及人。在一片严厉的国际批评声中，英法远征军撤离埃及。

(Frenchness) 的肯定。然而这份声明太模棱两可了，足以容许戴高乐安抚双方。戴高乐重返政坛暂时解决了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危机，但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争论又需要花费四年时间才能解决。

尽管戴高乐设法平息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争论，设法让所谓的“极端分子”(ultras)或暴动者(putschist)回归正途，但是他只不过是推延了必然发生之事。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发生在非殖民化狂热的鼎盛时期。近些年，法国承认印度支那、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独立。一个完全自主的阿尔及利亚(当地人以10:1超过了欧洲人)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1961年，一群心怀不满的将军试图再次夺取阿尔及尔的政权。那一年，“秘密军事组织”(Organisation de l'Armée Secrète, 简称OAS)以一系列残酷的恐怖袭击震惊法国本土。9月，戴高乐自己勉强避开暗杀。一年后，法国穆斯林发动了一场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示威游行，惨遭巴黎警察镇压，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一百人。

为了解决1958年5月的危机，戴高乐被授予应急权力，同时被授权起草一部新宪法，方案借鉴他于1946年提出的巴约复国计划，其标志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行政部门。鉴于法国先前的两个共和国是彻底的议会制，第五共和国将是一个总统制的共和国。戴高乐的声望提高了，他从自我流亡中重返法国政坛之时发现传统的政党制度破产了。无论是社会党人还是激进分子，他们都在处理阿尔及利亚危机时优柔寡断，这令他们的追随者倍感失望，而且他们的领导层就接受戴高乐为共和国救星这样的利弊参半之事产生了分歧。

9月，新宪法提交全民公决，几乎没有投票者希望返回以前的、动荡的议会模式，新宪法赢得了80%的赞成票。当然诉诸全民公决

是 20 世纪专制统治的标志之一。这是戴高乐喜欢玩弄的策略之一，因为这可以让他绕开议会，并直接吁请国民或人民支持。

12 月，戴高乐以绝对优势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总统制共和国”到一定时候变质为“帝王式总统制”（imperial presidency）。在他任职期间，总统官邸[爱丽舍宫（Elysée Palace）]恰恰被称为“王宫”（Le Château）。尽管时代精神完全以青年人为导向，但是法国在随后的十年里将由一个傲慢自大的七旬老翁来统治。然而，同时代没有其他政治人物能够与将军的超凡魅力相匹敌，戴高乐从科隆贝双教堂村（Colombey-les-Deux-Eglises）“下野之年”（wilderness years）的戏剧性归来证实了法国政治文化长期形成的循环：革命高潮与独裁政治之间的摇摆不定。

血腥的、分裂的阿尔及利亚冲突对当时的高中生一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并不将戴高乐视为救星，反而认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不负责任地让悲剧又持续了四年。在 1940—1944 年那段“黑色岁月”（les années noires）里，法国始终是一个惨遭占领的受害国。在法国年轻人看来，阿尔及利亚战争及其相伴随的暴虐行为将法国从一个“受害国”变成了一个“作恶国”。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自己变成了“占领者”（occupiers），冲突强化了法国青年一代的政治异化感、反专制主义，到处滋生着对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的冷嘲热讽。这种对主流政治的不满为左倾主义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微观政治的群体激增，它们明确标出了共产党左派及其同盟者的范围。

阿尔及利亚冲突根本没有产生法国自吹自擂的、最佳的知识分子领袖阶层。萨特为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的著作《全世界受苦

的人》(*Wretched of the Earth*) 撰写了一篇煽动性的序言, 其中他赞颂政治暴力的救赎性质。他主张, 对于被殖民者来说, 杀死欧洲人是一项基本的、政治上自我肯定的行为。然而, 由于萨特拒绝区分平民与好斗者, 他的序言默认民族解放战线的恐怖主义。他没有意识到民族解放战线的暴力变成法国军队实施有计划的暴行的理由。

加缪 (Camus), 一个在阿尔及利亚出生并在阿尔及利亚接受教育的法国人, 似乎陷入了一个伦理的与政治的真空地带。起初他警告双方保持克制, 只有少数人准备接受这一警告。他对被压迫的阿尔及利亚当地人命运的同情是真诚的。同样, 加缪从未明确地发表很多左派分子所期待的、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声明。他的崇拜者倍感失望, 因为他在 1957 年诺贝尔获奖演讲中没有提到阿尔及利亚战火。事后看来, 加缪没有践行他在诺贝尔获奖演讲中详细阐述的、有关知识分子良知的两条戒律: (1) 拒绝对已知之事撒谎; (2) 反抗压迫。

加缪接受诺贝尔奖时犯了暴露实情的口误, 当他被问及对阿尔及利亚冲突的看法时, 他声称尽管他相信即将到来的正义, 但是他觉得保护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母亲更重要, 由此暗示了他毫无批判的、与殖民者团结一致的立场。“当他面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和对他而言意味着作为曾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 (pied noir) 的苦恼决定时, 加缪并不仅仅践行了他自己的、有关知识分子责任的定义。”¹ 三年后, 加缪死于圆满的存在主义——他成为一场毫无意义的交通事故的受害者。

1 David Schalk, *War and the Ivory Tower: Algeria and Vietn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61.

在法国学生中间，阿尔及利亚战争是“五月事件”的一个重要前奏。当时，法国学生联合会（Union 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de France，简称 UNEF）英勇地抗议这场战争，支持阿尔及利亚人的民族自决，并谴责法国军队滥用酷刑。法国学生联合会还主办了许多宣讲会，以提高学生对阿尔及利亚冲突的认识，这是一种反越战抗议高潮时再度复兴的实践。事后看来，法国学生联合会的政治敏锐性远远超过已有的左派组织——共产党、社会党和激进派，这些组织的代表寻求更为谨慎小心的方式。法国学生联合会也是参加 1962 年 2 月反对“秘密军事组织”抗议活动的主要参加者，当时警察在沙隆地铁站（Charonne metro station）开火，致使 9 人死亡，150 多人受伤。¹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步伐继续进行现代化。法国政治阶级反而在戴高乐的领导下仍然与这种发展速度完全不同步。在许多方面，政治制度是一种“返祖现象”：法国的政治制度被认为处于第三共和国时期，而法国到 20 世纪 60 年代已完全进入第五共和国时代。这种在社会与政治之间出现的显著性断裂是“五月起义”的根本原因之一。有人可能会说，在“五月起义”中，法国公民社会对政治制度应受谴责的超然态度进行了报复。²

1 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叙述，参见 A. Belden Fields, *Student Politics in France: A History of the Union Nationale des Etudiants de Fra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2 参见 Serge Berstein, “Les forces politiques: Récomposition et réappropriation,” in *Les années 68: Le temps de contestation*, ed. Geneviève Dreyfus-Armand (Brussels: Editions complexe, 2000), 487. “从党派的角度看，六八事件似乎是一场残酷无情的社会辩护……未经政治语言的调解所过滤，这种调解将由共和国争论（的传统方式）来解决（问题）。”

“光辉三十年”

在法国，1945—1975年经常被描述为“光辉三十年”——参考的是空前爆炸性的经济增长与消费者富裕。评论家描绘这一时期完全是第二场法国大革命，法国社会经历了如此巨大而又彻底的蜕变。观察者（夸张地）断言，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才最终摆脱了“中世纪”（Middle Ages），因为只有在1945年以后，法国才不再是一个农业占主导的社会，断断续续地变成“现代的”（modern）。

社会学家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在其著作《光辉三十年》（*Les trentes glorieuses*）中以一个寓言故事开篇¹，他对比了法国两个村庄的社会条件——马代河（Madère）和色萨克（Cessac）。马代河是不发达村庄的一个典型，中肯地讲它让人以为它可能是一个位于巴尔干或南欧的村庄。马代河的居民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经常去教堂做礼拜。他们大多数人出生在一个方圆5英里的村庄里，并在那里度过一生。在马代河的574名居民中，其中274人是活跃的雇工。而在其余的人当中，有208人，即大约75%的人口从事农业劳动，他们的耕种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全村只有两台拖拉机。农业生产是马代河唯一的收入来源，完全可以想象的到，那里的居民是贫穷的，他们每周只能吃一次肉，他们很少购买黄油。他们吃的唯一的奶酪一定是本

46

1 Jean Fourastié, *Les trentes glorieuses* (Paris: Arthème Fayard, 1979).

地生产的，因为村民买不起外地的奶酪。正如富拉斯蒂耶所解释的那样，马代河在过去的一百年几乎没有发生改变。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涯的主导模式类似于 19 世纪中叶被确立起来的模式。

相反，色萨克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向上的社会流动的典型，其生活水平是马代河的 4—5 倍。其中有 215 名居民是活跃的雇工，只有 50 人从事农业劳动。大多数人（有 102 人）从事服务业或第三产业，他们是金融业或商业领域的办公室职员或管理人员。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采用大大提高了村民的生产力，这使色萨克的农民只花一个小时就能达到马代河农民花十二个小时的产量。50 年前，每个周日早晨，当地教堂挤满了人，是现在人数的两倍。如今，只有到了宗教节日才会出现这样的盛况。然而，不是色萨克所有的变化都向好的方向发展。与其他大城市一样，城市街道经常发生交通堵塞，噪音喧天，停车位也很难寻得。

在这项富有启迪意义的对比研究的结尾，富拉斯蒂耶坦言道，他拿读者找些乐子，他对比的两个村镇是凭空虚构的，他所描述的差别实际上是纵向的而非横向的。社会学家描绘了一个特殊的村落 [凯尔西 (Quercy) 的杜尔勒村 (Douelle)] 从 1945 年到 1975 年的现代化。如若有人想评价杜尔勒村在这个时期显著的社会经济上升——下降的死亡率和不必要的辛苦劳作，教育、信息和文化可得性的增加，易于获得的最新用品和舒适产品，有人也许想下结论说，一个夏尔·傅立叶 (Charles Fourier) 的社会乌托邦已经实现了。

杜尔勒村的案例具有典范性，30 年间法国变成一个超现代的、后工业的国家。人口从 4200 万猛增到 5600 万。1945 年，法国三分之

一的劳动者在农业部门辛苦劳作，而到1975年只有百分之十还从事农业劳动。农民的消亡——传统上曾是法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中流砥柱，也曾是“深厚的法兰西”（la France profonde）的主要支柱——标志着—场持续而显著的社会学转向。

城市工人阶级是法国快速现代化的另一受害群体，如在其他西方社会中一样，法国采矿和冶金等核心工业部门在“光辉三十年”期间经历了一场快速的衰落。自动化技术偏爱没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者，而非有技能的劳动者，这使学徒制成为多余之事，并削弱了阶级凝聚力。工业的非技能化也意味着许多职位当时可以让大量涌入的北非移民来填充，这进一步改变了传统工人阶级的构成。到20世纪80年代，传统上投票支持共产党的许多工人转而拥护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领导的反移民政党——国民战线（National Front）。20世纪60年代，女性加入劳动大军的人数空前高涨。

工作的结构性转变和富裕社会的吸引力联合起来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过时了。《告别工人阶级》（*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1982年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的研究题目，恰当地总结了法国左派的退场。假如无产阶级不再是革命变革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动力，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变得失去意义。

到20世纪70年代，法国85%的劳动力以工薪雇员的身份赚取日常生活费用，工薪雇员在广泛的意义上包括专业人员、服务业员工、公务员、教师和中层管理人员。这个群体成为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所领导的社会党的主导性支持者，他们的支持为社会党1981年5月赢得令人震惊的选举胜利做出了解释，这一胜

利经常被视为“五月风暴”的事后证明。

48 随着工薪雇员人数的增加，小农所有者（零售店主、个体经营者和独立农民）——法国传统的职业“主力”，变得日益稀少。与此同时，一个重要的、新的职业类型 [中层管理人员 (cadres)] 出现了。说到底法国在“光辉三十年”时期比整整上个世纪经历了更加根本的社会文化变革。

这一时期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整个法国既被貌似无限膨胀的发展潜力迷得狂热不已，又被社会文化变化的惊人步伐扰得心绪不宁，这一惊人步伐瓦解了许多根深蒂固的、代代因袭的、有关习俗、家庭、住所和信仰的假设。

“平庸化”

“光辉三十年”见证了蓬勃发展的平装畅销书、青年文化以及消费社会 (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的兴起。广告业的影响力似乎无处不在：广告牌、杂志和电影院传唱着消费者富裕的赞歌。广告符号学哀求市民参与社会管理的享乐主义新思潮。一篇有预见性的批评文章曾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评论道：

一场精神疾病横扫地球，那就是平庸化。每个人被便利产品搞得神魂颠倒——排水系统、电梯、盥洗室、洗衣机。这种发展事态源自于与贫穷斗争的结果，超越了它的终极目标（人从俗物俗事中解放出来），并变成威胁当下的强迫性

图景。如若在爱或垃圾处理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各国年轻人更喜欢垃圾处理器。通过暴露被忘却的欲望并通过创造全新的欲望来进行一场彻底的精神变革，这变成必要的。并且通过制造一场密集的宣传（an intensive propaganda）来支持这些欲望。¹

劳动社会的艰辛劳作让步于富裕社会的甜言蜜语。面对现代消费主义的诱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好像完全不合时宜。正如马克思所主张的那样，异化的中心不再存在于车间里，它取决于流通领域。在这个时期，符号学（关于符号的研究）变成了知识时尚，也就不足为怪了。作为一种范式，似乎只有符号学才能利用无处不在的、作为“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表达的“消费者选择”（consumer choice）。

49

在《神话学》（*Mythologies*）中，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出色地分析了晚期现代商品拜物教的表象世界：摔跤比赛、清洁剂盒、电影妄想、旅游指南以及变成图腾崇拜的偶像的畅销产品。在《物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s*）中，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描绘了现代消费主义的情欲本质：

广告扮演的角色，是作为整个社会，真实或虚拟的购买力的永久海报。不论我实际上是否拥有，我都在“呼吸”此

1 Ivan Tehechgov, "Formulary for a New Urbanism," in *The Situationist Reader*, ed. Ken Knabb (Berkeley, CA: Bureau of Public Secrets, 1980).

一购买力……（已经存有一份原欲负荷的）购买机制，为一体整套情欲化的选择和花费所取代。我们的现代氛围，因此是一种没有休止的强迫情感和强迫关系，特别是在城市之中，因为它充满了光影、形象，以及它对威望和自恋的勒索，这是一种冷酷的节庆，纯形式化，但却带有电力的节庆，也是感官的空洞恩赐的节庆，而购物和消费的程序本身，便被如此地配上插图、打上灯光，玩弄和破解，就好像作为性交前戏的舞蹈一样。¹

渐渐地，似乎物的世界繁荣昌盛，而其所有者却备受折磨。阿兰·罗伯-格里耶反心理小说构想了客观冷静的、非个人化的世界，似乎是对这一趋势的完美诠释。在《橡皮》（*The Erasers*）和《窥视者》（*The Voyeurs*）等作品中，物的世界似乎处于支配地位，人变成了多余的人——多余的附属物。新小说描绘了一个这样的社会：“其中个体……丧失了他们全部的、真正原初的重要性，并跌落到无关紧要的逸闻趣事层面上”，与个性重要性的这一下降趋势相对应的是“物的自主性的增强”²。

1 Jean Baudrillard, *The System of Objects*, trans. James Benedict (London: Verso, 1996), 172-173. (译文参见尚·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4—195 页。——中译注)

2 Lucien Goldmann, "The Nouveau Roman and Reality," in *Toward a Sociology of the Novel*, 134.

结构主义浪潮折射出类似的趋势。作为一种知识范式，结构主义的兴起与人文主义的衰亡相对应。结构主义试图抵消人类自主性的幻觉，消除那种认为思想和行动会对世界产生有意义影响的自恋式炫耀。与之相反的是，结构主义认为主体性受到一系列不可改变的文化常量制约：语言、神话和无意识。然而，什么构造了结构主义？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说的那样，结构主义的兴起与第五共和国严峻的社会政治困境具有相关性，与戴高乐任总统期间变得不可动摇的独裁统治的情绪有关系。通过宣告主体性是无效的，结构主义者难道不是正在概括他们这代人根深蒂固的政治挫败感吗？

当时不足为怪的是“六八分子”——口头上被称为“马克思和可口可乐的孩子”——将他们的文化关注置于他们造反的中心，也不必惊奇他们会觉得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传统——一场信奉兰波口号“改变生活！”（Changez la vie!）的运动——与他们的情趣竟然如此相投。政治上理解“五月风暴”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它与其说与夺取政治权力有关，倒不如说与拯救日常生活逃离殖民它的“隐匿劝说者”（hidden persuaders）的险恶控制有关。马克思曾预言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将成为革命的推动力，但是“五月造反”却吊诡地爆发在空前丰裕的社会氛围之中。

文化现代化与法国特有的政治传统主义（如戴高乐“帝王式总统制”所体现的那样）之间的显著不一致无疑是朝向“五月造反”的重要促进因素之一。“二战”后一代人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罪行仍旧记忆犹新，他们只是对第五共和国的自我变革能力失去信心。

法国在其他方面仍旧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社会。一个沾沾自喜的精

英小圈子垄断了“权力走廊”（corridors of power），也垄断了文化威望的场所，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机会仍然受到了相应的限制。¹

高等教育制度是个“过时的恐龙式庞然大物”，课程设置极为传统，其拿破仑一世时期延续下来的、令人窒息的集权化意味着这种教育制度仍然与当代年轻人的文化关注极为脱节。教育方法折射了一种枯燥的笛卡儿形式主义，后者阻碍了创造力和个体主动性。更广泛的文化趋势刺激了无节制和即时满足的快乐，而法国的教学法仍旧是说教的、严厉的。教师假设学生不会促进教育进步，因此两个群体之间的对话是极为罕见的，学生把大学讥讽为“贩卖知识的机器”和“文凭工厂”。

1955 年至 1967 年间，学生人数以 300% 的速度增长，数量从 15 万增到 51 万。此前高等教育始终是社会精英的权利，然而考虑到最新的人口结构变化，这些期望不再是切实可行的。公开的招生政策——法国共和主义的民主遗产——形式上保证了每个顺利通过中学毕业会考的学生的学习机会。扩招计划是过时的、不认真的。人文学科注册人数猛增，然而极少有切合实际的规定被制定出来以适应这种增长。毕业生能否找到与其复杂的教育训练相匹配的工作，这谁也拿不准。因此，尤其是在人文学科，学生的焦虑情绪高涨。1967 年，政府笨拙地回应了这些问题，提出了富歇改革计划（Fouchet reforms，以当时教

1 参见经典研究 Pierre Bourdieu and J-C Passeron, *The Inheritors: French Studen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Culture*, trans. Richard N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参见布尔迪约、帕斯隆：《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中译注)

育部长克里斯蒂安·富歇的名字命名), 建议把“选择性录取”作为一种削减法国迅速增长的学生人数的方法, 这显然是一种令学生焦虑情绪处于一触即发境地的策略。在许多方面, 大学制度是一颗有待爆炸的定时炸弹。在1964年一篇有预见性的文章中, 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瞥见了不祥之兆: “如果国家不能以合理的方式控制大学人数的增长, 那它将经历一场如同民族大灾难一般的学生爆炸。”¹

旧体制的残喘

“宫廷社会”的返祖性遗迹充斥着法国的社会政治生活, 法国家长式的管理文化恰好是一个完美的案例。在《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中,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哀叹法国的行政制度试图“预见一切, 负责一切, 总是比被治理者本人更了解被治理者的利益, 它不停地活动, 却毫无收获”²。自托克维尔时代以来, 法国状况几乎没有发生改变, 法国组织生活的主导心态依然是等级制的, 同时又极其厌恶参与性决策(participatory decision making), 其结果是在管理精英与其仆从之间出

1 Paul Ricoeur, “Faire l’université,” *L’Esprit*(May–June 1964) 1163.

2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Stuart Gilbert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5), 291。(译文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 冯棠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250页。——中译注)

现了一道似乎无法跨越的鸿沟。那种挑战精英决策垄断权的输入先天地被拒绝了，适应了上司的低级雇员乐意接受自我审查政策。他们推论道，为什么要费心地给上司提供不受欢迎的信息呢？由此那些掌权者最终愚蠢地剥夺了他们所需要的、可以让他们做出明智决定的信息。正如一名分析者所悲叹的那样，“集权化与科层化竟然是如此无法逾越的交流障碍，以致‘官僚主义的’决策的（不利的）结果要花费很长时间才会变得清晰明了。这种制度不能从它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并且它总是不断地逼近自身”¹。正是这种僵化的组织模型，是“六八分子”努力要推翻的。

“二战”后对管理技能的强调意味着法国社会越来越屈从于冷漠的国家计划部门的谋划与设计。从民主的视角看，似乎专家治国论取代了政治学，专家取代了公民。高等教育与这些发展有着莫大的关联，比如国家行政学校（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简称ENA）是一个负责培养政治精英和行政精英的官员学院，毕业生被俗称为“行政后备干部”（*énarques*）。在批评者看来，其井然有序的社会的理想似乎像一场疯狂的启蒙实验。正如一名持怀疑态度的评论者所评论

1 Michel Crozier, *The Stalled Society*, trans. Rupert Swyer (New York: Viking/Compass, 1970), 79. Crozier 继续写道：

“假如我们从这意义上并依据成本来考虑法国行政制度的实际后果，那么我们会立即就明白它是越来越过时的。首先，它没有提供交流和参与的充分可能性，由此没能有效地利用其人力与物力的资源；其次，它缓慢而艰难地适应变化；最后，这样一种制度常常使知识日益贫乏，丧失自我更新与革新能力。”（第87页）

的那样，“行政后备干部的历史就是巴黎衰落的历史”¹。按照法国国家行政学院诋毁者的说法，它的毕业生是一群冷漠无情的技术专家，是 T. S. 艾略特笔下“空心人”(hollow men)的直系子孙。这些新的“组织人”(organizationmen)目前正管理着法国。

在一个专业化的时代里，大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管理人员和专家。知识丧失了其原初的纯洁性，正如福柯在一些开创性著作中所暗示的那样，知识几乎不是中立的，或者说几乎不是价值中立的，它被卷入了社会权力的维护之中，是“规训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在法国学生中间，社会学领域是罪魁祸首，其对数量方法和经验研究的依赖意味着它只不过变成“数据提供者”(data provider)——“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力量的侍女。

54

许多杰出的“六八分子”主修社会学专业，这几乎不可能是一种巧合。“五月反抗”之前的几个月，丹尼尔·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是社会学家?”(“Pourquoi des sociologues?”)的文章，讨论了社会科学与政治专家治国论的罪恶之间的关系。在职业政治家和专家的统治下，他们认为大众是管理控制的无用之人，他们否定了民主规范之核心的自我决定的理想。

科恩-邦迪的另一个批评目标是蓬勃发展的工业社会学领域。社会科学家正越来越多地被聘为提高工业效率的企业顾问。信息社会渴求技术专家，在大学培养的社会科学家中，它找到了供给充足的、心

1 Louis Chevalier, *The Assassination of Paris*, trans. David Jord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22.

甘情愿的帮凶。科恩 - 邦迪特别批评了 1924 年至 1932 年在美国芝加哥西电公司霍桑工厂 (Western Electric Hawthorne Works) 进行的梅奥实验, 这一实验论证了工业产量是如何由小组形式组成的孤立工人来提高的。根据科恩 - 邦迪的观点, 梅奥偏见性的数据收集依旧没有注意到社会哲学的价值——也就是说社会学清楚地表达实质问题和关注的能力, 并开创了经验社会学 (empirical sociology) 的时代。经验主义在消除规范思考的同时试图客观地记录“事实”, 培育了一种政治消极性的心态。正如科恩 - 邦迪所观察的那样, 他写道:

学院社会学向以科学的夸耀口吻进行的独立研究(分支)的转变, 与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国家控制的经济的转变相一致。从这一点来看, 新的社会心理学被资产阶级用于促进社会的理性化, 既没有损害利益, 也没有危及稳定。证据就在我们的周围。工业社会学主要关注的是让人适合工作的问题, 而让工作适合人的逆向需求被忽略了。社会学家由雇主提供报酬, 因此他们必须为我们的经济制度的目标工作: 为利益的最大化寻求生产的最大化。¹

既然大学在具有成熟的社会良知的学生中间发挥着使知识满足管理效率的新需求的核心作用, 那么它自然就成了批判的目标。

1 参见 Cohn-Bendit, *Obsolete Communism*, 36-37。

吊诡的是，尽管法国人在“二战”后的岁月里在物质财富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民族似乎是相当不满足的。实际上，马代河居民（文化社会学回溯性的虚构原型）无疑比与其相对应的、精于世故的城市居民更容易满足于他们的命运。尽管存在着各种局限，但是传统的法国社会拥有稳定性和亲密性的优点。20世纪60年代的富裕社会反而给城市居民提供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虚假选择：文化选择、职业选择、生活方式的选择和消费者选择。同样，随着戴高乐任期的延续，法国市民觉得他们几乎被剥夺了有意义的政治选择。

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法国从一个组织严密的阶级社会转变为一个由原子化个体组成的分层聚合体。对物质财富的期待显著增加。不过，作为一个民族，法国人似乎越来越不满足，因为富裕就其自身而言不存在天然的停止点。不管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变得多么富裕，似乎总是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法国社会似乎愈发贪得无厌，枯燥乏味。不断提升的物质满足感转化为一种弥散的、而且无可争辩的“存在主义意义上的恶心”（*existential queasiness*），法国人很快意识到幸福是不能被量化的。

1968年3月，一篇发表在《世界报》的文章宣告“法国人百无聊赖”¹，似乎法国正冒险变成这样一个社会：毫无特征的、非个人化的工作人员专心于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毫无意义的官僚差事。社会生活凝结成

1 Pierre Vianson-Ponté, "Quand la France s'ennuie," *Le Monde*, March 15, 1968.

一堆徒劳无功的、日常熟知的例行公事，这种情形被贴切地概括为“地铁—工作—睡觉”（metro-boulot-dodo）。在“五月造反”前夕，一份“情境主义国际”的小册子声称：“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以‘死于无聊’为代价来保证不会‘死于饥饿’的世界里。”¹ 出于同样的精神格调，一幅著名的“五月风暴”街道画宣称：“无聊是反革命的！”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同一个月《世界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南泰尔校园爆发的学生罢课 [著名的 3 月 22 日运动 (March 22 Movement)]，几周之内就蔓延到拉丁区中心。作为一名教师，迪迪埃·安齐厄 (Didier Anzieu) 以笔名埃皮斯狄蒙 (Epistémon) 写道：“我不再无聊了！”²

日常生活革命

20 世纪 60 年代文化批评的核心主题之一是“日常生活批判” (la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在古典资本主义 (classical capitalism) 的条件下，统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在车间，一个人的私人生活 (或者说 16 小时工作日之后的剩余部分) 是属于自己的。然而消费资本主义的需求完全改变了这幅图景，不再存在关于私人生活的“私人的”事情。在“闲暇时间”的伪装下，私人生活被工业力量殖民了——在

1 Raoul Vaneigem, *Traité de savoir-vivre à l'usage des jeunes générations* (Paris: Gallimard, 1968), 8.

2 Epistémon, *Cesidées*, 12.

某种程度上说到处弥漫着对富裕消费者的种种诱惑。日常生活被剥夺了它的自然性、非正式性，由此也被剥夺了它的完整性。无论一个人坐地铁、看电影、漫步于林荫大道，还是看电视，消费的图像萦绕人的左右，令人无处可逃。“二战”后的岁月里，法国物质文化被改变到无法辨认的程度。正如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有影响力的著作《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中所观察到的那样，他写道：“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对我们的旧‘价值’进行痛苦而又过早的修改，闲暇不再是节日，不再是劳动的奖赏，它还是一种自我探究的、自由选择的活动。它是一种普遍的展示：电视、电影、旅游。”¹

57

左倾主义阐发了一种容许学生激进分子来表达其政治变革渴望的解释框架，依据的是：（1）共产主义史诗般的历史性失败；（2）权力开始渗透到日常生活空隙的新方式。凭借其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衰弱的洞察，左倾主义发展了一种激进民主的理论。受工人自治传统的启发，左倾主义提倡一种“横向的”、平等主义的民主化模式：社会自组织。左倾主义的政治“黑色怪兽”（*bête noire*）是列宁主义及其复本：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毛主义。它们被视为左翼专制主义的形式，而这种左翼专制主义不断地镇压与其竞争的、致力于工人自治的左派

1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54。关于法国新左派的影响，参见 Ingrid Gilcher-Holtey, “La contribution des intellectuels de la Nouvelle Gauche à la définition du sens de Mai 68,” in *Les années 68*, ed. Dreyfus- Armand, Frank, Lévy, and Zancarini-Fournel, 89-98。

运动。与此同时，在一种跨文化的思想变换的讽刺中，日常生活批判最终融合了“文化大革命”概念。重要的是，这种概念上的融合有助于发扬这样一种观念——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虔诚观念相比，文化主题是解放斗争的合法性目标。

“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 or Barbarism，简称 S or B）开始成为托派分子的机关刊物，它坚持“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ist）的观点，即苏联是“堕落的工人国家”，这意味着它有可能从内部被改造。然而，这个团体很快明白，苏联社会主义的缺陷远非只是斯大林独裁统治的结果，可以追溯到列宁关于政党的构想，列宁曾将政党构想为负责向无产阶级灌输“阶级意识”的专制主义先锋。这个团体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远非是“客观上社会主义的”（objectively socialist），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初的解放承诺的歪曲。在《社会主义或野蛮》创刊人克劳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和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Cornelius Castoriadis）看来，苏联意味着政治统治的一种新形式——“官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bureaucratic state socialism）。

58

最终在《社会主义或野蛮》的批判性框架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对抗让位于更普遍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受马克斯·韦伯“科层权威”（bureaucratic authority）分析的影响，《社会主义或野蛮》团体将官僚政治理解为一种独立的统治形式，既不依赖于也不可化约为市场。

这些深刻见解转化为一种对法国共产党及其同盟者（例如共产党主导的法国总工会）的彻底不信任。后来卡斯托里亚蒂斯得出了更加

激进的结论，即马克思主义政权的失败需要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的缺点。作为一种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暴露出对总体性和统一性的强调，这种强调与人类条件的多样性不相容，也与历史斗争形式的复数性不相容。卡斯托里亚蒂斯与他的同事们意识到当代现实经由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既不能被理解，也不能被渐进地改造。¹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各种缺陷的深刻见解致使这个团体得出如下结论，即对官僚制度和统治的批判应该被转移到“家庭与性征、教育与文化，总而言之就是对日常生活的批判”²。但是卡斯托里亚蒂斯和他的同事们避免从这一系列的论证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被玷污的形式，那么革命观念本身难道就没有被玷污，因而是不能成立的吗？

在与马克思主义决裂后，卡斯托里亚蒂斯的后期思想集中研究“自我建制社会”（self-instituting society）的观念。在这一点上，他的思考深受“工人自治”（autogestion）理念的影响，这种“工人自治”的理念在“五月造反”时就曾在不断蔓延的工厂占领运动中获得过支持。卡斯托里亚蒂斯主张，以官僚主义方式被调节的社会必须变成自行调节的，被管理的社会必须变成自行管理的。他在1961年注意到：

1 Cornelius Castoriadis, "Marxism and Revolutionary Theory," in *The Castoriadis Reader*, ed. David A. Curtis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7), 139–195.

2 Cornelius Castoriadis, introduction to *Socialisme ou barbarie* (1961; repr.,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es Editions, 1979), 8.

大多数个体，不管他们的技能水平或薪酬如何，都被改造为领薪水的零碎劳动执行者，他们坦然地感觉到工作的异化与制度的荒谬，而且越来越厌烦这种工作。工薪雇员和办公室职员（所谓第三产业部门的成员）与体力劳动者的差异越来越小，他们开始以类似的方式与制度展开斗争。同样，文化危机和价值溃败将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推向了制度的激烈批判。¹

科恩-邦迪在他的著作《过时的共产主义》中枚举了左倾主义的优点，公开宣称自己是卡斯托里亚蒂斯和勒福尔富有创新精神的政治学说的信徒，这也就不足为怪了。²

以志趣相投的《论辩》团体（1956—1962）为例，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决裂更加唐突。1951年，创刊人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因为传播异端观点被清除出法国共产党。他的过错是什么？只是他在以新闻与观点为主的《新观察家》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温和地批评法国共产党的文章而已。镇压匈牙利事件——一场遭到华沙公约组织（Warsaw Pact）的坦克残暴镇压的工人自治实验——五年后几乎没有在关注“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功绩的《论辩》团体成员眼中留下什么质疑。

1 Cornelius Castoriadis, *Socialisme ou barbarie* 6 (33) (December-February 1961): 84.

2 Cohn-Bendit, *Obsolete Communism*, 16.

《论辩》编辑们声称他们对“论辩”感兴趣，而对“教条”不感兴趣，此后形形色色的异端知识分子实验一发不可收拾。这个团体成员包括昂利·列斐伏尔、考斯塔·阿克塞劳（Kostas Axelos）、皮埃尔·富热罗拉（Pierre Fougereyrollas），他们公开声称他们自己是与苏联正统理论的政治正确性相对的“修正主义者”¹，他们对有组织的共产主义的厌恶使他们反对政治宗派主义和集体决策。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Marxist humanism）的复兴中找到了哲学灵感 [《论辩》开风气之先，翻译发表了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和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等主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Western Marxists）的文章]，他们将其看作是一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决定论形式的自我认识的建构性选择。

60

《论辩》团体反对萨特在《何谓文学？》（*What Is Literature?*）中所宣称的政治含义，即知识分子必须是“介入的”（engagé），这个团体成员反而充当非介入的、“自由行动的”知识分子。同样，通过接受个体作为一个社会哲学的有效起点，他们的事业与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existential Marxism）具有鲜明的亲缘关系。

《论辩》团体意识到，鉴于制造业的衰落，无产阶级在后工业社会中难以胜任正统马克思主义所赋予的末世论角色。他们意识到，不要等待那注定不会到来的“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进步的社会变化必须要通过小先锋群体加以鞭策。在这一点上，他们逐渐将列斐伏

1 例如参见 *Arguments* 14 (1959): 1-19。

尔与 20 世纪 20 年代超现实主义的联系视为一种模范，超现实主义者们坚定相信诗歌精神应该注入日常生活实践，列斐伏尔受超现实主义者的启发阐述了“瞬间理论”（theory of moments）：情境——其中崇高能够暂时突破日常生活的物化连续流，“活跃时间”（lived time）能够暂时穿透异化劳动或商品生产社会的“呆滞时间”（dead time）。

《论辩》团体的另一创新之处是为了历史现在时批判的终结而吸收社会科学的方法。他们意识到，既然统治形式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扩张了，那么一种新的、多元论的解释框架是必须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方法与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一个由“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同志般的团体）的方法具有鲜明的相似性。

《社会主义或野蛮》团体与《论辩》团体的革新性政治学说是居伊·德波（Guy Debord）《景观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的出发点，这本著作是“五月风暴”之前社会批判最具影响的标本之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界定“商品拜物教”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¹，其结果是一个颠倒的社会世界，其中作为商品的“物”优先于人。19 世纪商品拜物教仍局限于车间，而到了晚期资本主义，它的影响蔓延到上层建筑或文化领域。

61
1 Karl Marx,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 Robert Tucker (New York: Norton, 1978), 294. [译文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9—90 页。——中译注]

在《景观社会》中，德波分析了从工厂向所谓的“图像领域”（image sphere）的物化性扩展，商品化呈现出无所不包的总体化性质，它生产了一个本真性的探求处处被表层或表象所颠覆的世界。现代生活需要一系列恶毒的颠覆或取代：符号取代物、图像取代真实、表象取代本质。“六八分子”觉得，只有彻底争论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才能重新捕获一个完全异化的生活世界。作为“物化意识”（reification of consciousness，卢卡奇）的最新表现，“景观”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变成“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确定形态。在它的影响下，现代社会的归化者似乎化约为梦游般顺从的境况，或者正如德波所观察到的那样，景观是“永远照耀现代被动性帝国的不落的太阳”。

观看者的异化为了被静观的对象（是他自己无意识活动的结果）就这样被表达出来：他静观得越多，他体验得就越少；他越愿意在需求的主导图像中进行自我认识，他就越不理解他自己的存在和欲望。就起作用的人而言，景观的外在性表现在这一点上：他自己的姿态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将这些姿态再现给他看的另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观看者无处感觉轻松自在，因为景观处处存在。¹

1 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23. (译文根据法文版译出，参见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Gallimard, Paris, 1992, p16.)

因为知识分子致力于社会争论的种种价值，所以这样的发展培育了一个令人焦虑的幽灵：工人阶级，不去积极地反抗资本主义的不公，反而被诱人的物质刺激所收买，消费社会的小玩意儿平息了阶级意识的危险性。正如列斐伏尔所评价的那样，他说：“异化正在传播得或者变得如此强势，以至于它消灭了全部异化意识。”¹且不管其贫乏的物质处境，传统工人阶级至少被允许思考自己的思想，似乎晚期资本主义的归化者不再拥有这种奢侈性乐趣。本真性被消费享乐主义的诱惑重新定义。在“为了艺术而艺术”的名义下，文化充当了人类乌托邦憧憬的储藏宝库，而文化在“二战”后则变成发达工业社会的侍女。

暗杀巴黎

在“二战”后的岁月里，巴黎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国人口的急剧增长（33%的净增长）刺激了相应的建筑狂潮。在巴黎西部郊区，拉德芳斯（La Défense）庞大的玻璃钢铁大楼拔地而起。它们唯一的好处就是暂时避免对巴黎市中心类似的破坏。

很快现代城市规划的阴影也影响了巴黎。尽管一些更加声名狼藉的建筑灾难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出现，但是概念化倾向和城市规划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了。

Les Halles，曾是一个位于“右岸”（Right Bank）中心的、生机

1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94.

勃勃而又多姿多彩的市场，它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为超现代的购物综合服务中心腾地方。正如一位喜欢法国的人所悲叹的那样，“随着 Les Halles 的消失，巴黎消失了”¹。只要 Les Halles 的摧毁是这一趋势的象征，那么这种悲叹就是相当贴切的。一种相似的命运降临到玛莱 (Le Marais, 巴黎最古老的地区之一)，当时蓬皮杜中心 (the Centre Pompidou) 褻读了邻近区域。因其过分地炫耀外部管道设施，“波堡” (Beaubourg, 是大家口头上熟知的简称) 被一致批评为是一个过分装饰的、超现代的庞然大物。

63

最终，建筑畸形的瘟疫也蔓延到“左岸” (Left Bank)。蒙帕纳斯地区 (Montparnasse District) 的中心 (作家和艺术家的传统庇护地) 矗立着 58 层高的蒙帕纳斯大厦 (Tour Montparnasse)，像一个贪得无厌的摩洛神 (Moloch) 一样使周围的街区显得相当矮小。因此，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巴黎的风景被一批难看的高楼大厦糟蹋了，这些难看的高楼大厦就像那些日本恐怖电影中的怪物一样，可能要毁掉它们的周边环境。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关于现代城市是工业化的“居住机器” (machine for living in) 的构想出现了鲜明的反乌托邦转向。

不幸的是，这种新野兽派的、丑陋难看的建筑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战后岁月也见证了急剧增加的零售连锁店、银行支行、自助餐厅，以及第一批乏味的、极其豪华的超级市场，没有一个巴黎老城区不受影

1 引自 Chevalier, *Assassination of Paris*, 246。

响。文化历史学家路易·谢瓦利埃 (Louis Chevalier) 1977 年出版了《暗杀巴黎》(*The Assassination of Paris*)，这本著作的题目贴切地捕捉了这些趋势。对于从波德莱尔到印象派画家之间的艺术家和文人骚客来说，巴黎曾是一幅富有灵感的风景、一个独立存在的文学人物。对于超现实主义者们来说，它的街道小巷曾是“奇迹”的贮藏宝库：意外邂逅和“客观机遇”(*objective chance*) 的场所。突然，这一切都改变了，巴黎变成一个遗失纯真的地点。正如谢瓦利埃所观察的那样，他说：

没有什么东西会比物的新奇性、亲密性的匮乏更加迫使巴黎人去认识消费社会……而且没有什么东西比对他们城市的畸形发展（最终是他们城市的破坏）的责任更加清晰……这些新建筑是庞然怪兽、吃人妖魔，而且它们已经开始了饕餮之旅。整体来看，即使它们继续处处蹂躏和偶尔毁坏邻近地区，它们可以造成的罪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现在能做的一切就是诅咒它们、拒绝宽恕它们，还有就是尽量容纳它们。¹

64

在这个时期的文学和电影中，这种剧烈的社会文化错位感变成一个核心主题。1966 年，波伏娃出版了《美丽的形象》(*Les belles images*)，她将其定位为一部关于“专家治国论的社会”的小说——杂

1 引自 Chevalier, *Assassination of Paris*, 71。

乱无章的社会现实，似乎处处存在，无处不在。正如波伏娃所解释的那样，“正是这样一个社会，我尽可能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它是一个我生活其中的社会——通过报纸、杂志、广告和广播；它从四面八方把我包围了”¹。

波伏娃小说的主人公劳朗丝（Laurence）受雇于一家广告公司——奥威尔式的“公共信息委员会”（Pub-Info）。她的工作就是构思诱人的广告词和形象，以便引诱消费者购买他们原本可能蔑视的商品。一天，她到了办公室，打开了她目前的一个计划的文件夹。她体验了一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启示，一种关于她天天必须忍受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职业烦闷的意识（*prise de conscience*）。正如劳朗丝所详述的那样，一切都是“沉闷的、压抑的。光滑、明亮、灿烂；滑翔的、冰一般完美的梦；情色的价值和幼稚的价值（天真）；速度、控制、温暖、安全。一切兴趣爱好可能通过这种原始的幻想被解释吗？”²

劳朗丝意识到她始终生活在物的表层，这是一种空洞的存在，与罗伯-格里耶小说的无深度性和非人格性正相称。（然而波伏娃进而嘲笑罗伯-格里耶是一个回避情节的作家。这类作家，她继续说，“为了写作而写作，正如你堆积石头一样，为了享受其快乐而已”。）它还值得被称为“生活”吗？“幻想”接管了，“美丽的形象”实际上只是美丽的而已。劳朗丝是一个遭受分裂之痛的严重患者，正如叙述者

1 Simone de Beauvoir, *All Said and Done*, trans. Patrick O'Bria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4), 122.

2 *Ibid.*, 51.

65 所评论的那样，“她知道一些令人痛苦的分裂，某种愤怒、悲痛、困惑、空虚、无聊。尤其是无聊。不存在关于无聊的颂歌”¹。劳朗丝感到了厌倦。

劳朗丝的女儿 10 岁了，她提出一个简单的人生意义问题——“人为什么活着？”，这让劳朗丝大吃一惊。她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她的丈夫试图用一些毫无意义的、关于“进步”的陈词滥调来填充这段对话的空白。他乐观地认为科学在 20 年内将消除人类不幸福的物质根源，但是他忘了说我们同时该如何使自己忙碌起来。

“幻想”也已接管了闲暇时间，正如劳朗丝、她的丈夫 [让 - 夏尔 (Jean Charles)] 与两个朋友 [吉尔贝尔 (Gilbert) 和杜夫海纳 (Dufrené)] 之间进行的下列对话所提到的：

“你必须星期五来。我希望你来听听我新买的高保真音响设备……它确实令人震惊，” 吉尔贝尔说，“一旦你听了，你就不会再用普通设备听音乐了。”

劳朗丝说：“那我不想听它了，我喜欢听音乐。”

让 - 夏尔似乎很感兴趣：“你估计一套好的高保真音响设备最低要花多少？”

“最少嘛，你最少要花 30 万旧法郎才能买到一套单声道设备。但那不是真玩意儿，根本不是真玩意儿。”

1 Simone de Beauvoir, *Les belles images*, trans. Patrick O'Bria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68), 26.

“要想获得真正好东西，我猜想你该花100万左右吧？”

杜夫海纳说道。

“听着：一套好的单声道设备要花60万到100万。至于立体声设备，要200万。我建议买一套单声道设备，而不要买非常不好的立体声设备。一套值钱的组合音箱大约要花50万。”

“那我说过了，至少要100万。”杜夫海纳叹息道。

“有更加愚蠢的花100万的方式呢。”吉尔贝尔说道。¹

在某些方面，劳朗丝是萨特小说《恶心》男主人公洛根丁 (Roquentin) 的女性版本。不过，洛根丁被“事实性” [facticity, ‘是’ (Being) 或者物的执拗性] 打败了，而劳朗丝的异化是社会的：“景观社会”产生的意象消除了完整性、本真自我的成就感。只有青年人[劳朗丝的女儿卡特琳娜 (Catherine) 是青年人的化身] 才免受总体社会化的有害影响。从这一方面看，波伏娃的小说也预示了“五月造反”的逻辑——在这段短暂而光辉的时光里，法国青年夺得了政治舞台。

66

1965年，若尔日·佩雷克 (Georges Perec) 的小说《物：六十年代纪事》 (*Les choses: Une histoire des années soixante*) 出版了。像波

1 Simone de Beauvoir, *Les belles images*, trans. Patrick O'Bria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68), 16. 关于“五月风暴”文学前兆的更多研究，参见 Margaret Atak, *May 68 in French Film and Fiction: Rethinking Society, Rethinking Represent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d Patrick Combes, *La littérature et le mouvement de Mai 68* (Paris: Seghers, 1984)。

伏娃小说的主人公劳朗丝一样，佩雷克的人物居住于一个日常生活被消费享乐主义思潮主导的世界里，一个“是”（being）让步于“持有”（having）的唯物主义律令的世界里。

《物》的主人公西尔维（Sylvie）和热罗姆（Jerôme）是巴黎人，他们二十多岁，来自中产阶级，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就职业来说，西尔维和热罗姆是“心理社会学家”：有抱负的心理管理师。用佩雷克的话说，他们是意气风发的“行至成功中途的技术专家”。¹他们天天设计和分析“有关动机的”问卷，这些问卷解释人们为什么发展特殊的消费习惯。

西尔维和热罗姆热切地追逐贪婪社会的时髦，在这个贪婪社会里，一个消费选择的璀璨世界等着他们。“他们依然迷恋那些唯有时尚才推崇的东西：埃皮纳尔的假画像、英式版画、玛瑙、拉丝玻璃制品、‘新蛮族’的小饰物、近代科学以前的小古玩……他们觉得他们越来越善于控制自己的欲望：他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有明确的想法。他们知道什么是他们的幸福，什么是他们的自由。”²他们的闲暇时间专心于冥思获取之“物”的无限前景：为了便利，为了名望或为了获得纯粹快乐。人们可以将他们描绘为有抱负的“物—世界”的鉴赏家，物品的积累是他们的存在理由。他们居住在恣意挥霍的物质过剩的世界，佩雷克这样描绘道：

67

1 Georges Perec, *Les choses*, trans. Helen Lane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 41.

2 Ibid., 24. (译文参见佩雷克：《物：六十年代纪事》，龚觅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译文有所改动。——中译注)

欲求超过购买力，这在他们所属的世界中几乎成了一条规则。这规则不是他们自己制定的，它是一种文明法则：广告、时尚杂志、展示会、街道景观，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文化的生产都是这种文明现象的最恰当的表现。¹

可供他们利用的选择都是虚假的选择，可供他们支配的唯一选择就是自由地屈服于“物”的诱惑。

社会上的批判要素也充斥着电影语言。在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进程中，以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的电影《四百击》（*The 400 Blows*）和《朱尔与吉姆》（*Jules and Jim*）为代表的新浪潮人文主义让位于让-吕克·戈达尔所引领的、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时事电影”（*topical film*）。

伴随着戈达尔电影生涯的不断发展，这位电影制作者断定传统的叙事电影完全被好莱坞吸收借鉴，达到了电影作为一种批评媒介完全变得无用武之地的程度。假如晚期资本主义的图像领域主要是社会整合（*social conformity*）的媒介，那么电影也完全是妥协让步的。在戈达尔看来，它变成“幻觉电影”（*cinema of illusion*），它通过强化坚定顺从的统治心态助长了社会被动性。

吊诡的是，戈达尔得到的结论是“拯救”电影的唯一方式就是摧

1 Georges Perec, *Les choses*, trans. Helen Lane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 40. (译文参见佩雷克：《物：六十年代纪事》，龚觅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译文有所改动。——中译注)

毁电影——至少在其当前的化身中。因此，作为一个电影人，他密切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像一个和谐悦目的图像供应商一样拆解电影。¹他变成资产阶级自足的、精心创作的艺术作品理想的坚定敌人。似乎本质上有点令人怀疑的是，资产阶级文明推动了尽善尽美的理想，而社会自身却被容许遭受肮脏之苦。为了与这种理想进行斗争，戈达尔越来越依赖各种源自于 20 世纪先锋派作品的技巧。他喜欢的手法之一是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间离效果(Verfremdungseffekt)，这确保了临界距离与艺术对象的一种尺度。戈达尔将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等苏联电影导演视为他的电影榜样，以此来反对他在《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工作期间捧为名人的好莱坞导演。

戈达尔的《周末》(*Weekend*, 1967 年)是一部转型期的电影——导演最后一次痛快地玩弄叙事电影的程式，同样这也是他在整部电影中竭力瓦解的程式。《周末》的讽刺目标对准了好莱坞电影的陈词滥调和叙述程式。通过将电影拆毁为一个愉悦幻觉的自足领域(可以说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延伸)，戈达尔希望促使电影再生为一种政治教育的工具。正如电影最后标题恰切地宣布的那样：“故事的终结，电影的终结。”

1 参见 Colin McCabe, *Godard: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t Seventy*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2004): “就才智而言, 1968 年让戈达尔引人注目的是他在 10 年内已经从纯粹古典风格(使用既定的类型和合乎常规的语言来面对既定的观众)的立场转换到了纯粹现代主义(解构既定的类型和语法来面对理想的观众)的立场。” 207。

《周末》以惊人的八分钟推拉镜头结束，这一镜头目所能及地展现了一次发生在乡村道路上的严重交通堵塞。当然，没有什么会比汽车更能象征着“二战”后法国社会对技术完善的狂热追求。然而，随汽车文化而产生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街道堵塞、废气排放、噪音污染，还有可怕的撞车事故，导致了金属与肉体的、无法区分的混杂之物。作为一种象征对象，汽车代表了“唯物主义与对社会的侵犯，这一社会为它自己盲目迷恋的商品所击溃”¹。戈达尔传奇的推拉镜头以一个暴力事故场景而达到高潮。变形的身体胡乱丢弃在路上，但是摄像机拒绝逗留，由此暗示了现代社会反常地接受这种大屠杀，将其视为日常生活固有的、可以接受的一部分。

69

电影，一种法国人根深蒂固的爱好，在“五月风暴”爆发之前的事件中发挥着更直接的作用。1968年2月，法国政府突然解雇人们喜爱的法国电影资料馆（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主管亨利·朗格卢瓦（Henri Langlois），巴黎馆藏电影放映厅就设在夏乐宫（Palais de Chaillot）。朗格卢瓦是一名无与伦比的电影鉴赏家与档案管理员。20世纪50年代，正是在这个电影资料馆，特吕弗、戈达尔、克劳德·夏布洛尔（Claude Chabrol）和阿伦·雷奈（Alain Resnais）等领导性的新浪潮电影导演接受了他们的电影史教育。为了回应电影资料馆的关闭，一场大规模的抗议游行爆发了——事后回想，这次动员凸显为一个“五月事件”的重要前兆。

1 David Sterritt, *The Films of Jean-Luc Godard: Seeing the Invisib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93.

日后看来，1962 年（此时阿尔及利亚冲突已经解决了）与“五月起义”之间那些寂静绝望的年月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法国社会在物质财富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在美丽表象的伪饰下，一场全面的、实在论意义上的不满情绪沸腾了。富裕社会的胜利以其他的、法国人所珍视的、实质性的政治文化价值为代价出现了。第五共和国的总统制适宜于危机局势。但是在政治常态的条件下，它似乎是相当不民主的。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青年渴望表达他们的政治抱负和意愿，但是在戴高乐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实际上被剥夺了有意义的意见。为了补偿，他们需要创造出与他们的希望和梦想相符的乌托邦政治形式。

“五月风暴”：力比多政治的胜利

快乐原则被现实原则代替，这是人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巨大的创伤性事件……但是无意识保存着受挫的快乐原则的追求目标。尽管遭到外部现实的挫折……快乐原则不仅幸存于无意识中，而且以多种方式影响着取代了快乐原则的唯一现实。被压抑物的这种回归构成了文明的禁忌史和隐蔽史……这种对**逝去时光的追忆**成了未来解放的手段。

70

——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¹

我们经历了一场不可能的革命：没有革命的革命时刻。我们一定不要混淆在域外治权的索邦大学中进行的革命自我

1 中译本参见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译文有改动。——中译注

表达与真正社会革命的政治准备。革命意识不能取代革命。

——阿兰·图海纳《五月运动》

“英勇游击战之年”

71

有先见之明的政治预言从不是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特长。但是，在这位古巴革命领导人的 1968 年新年演讲中，他似乎多多少少“预言正确”。尽管他让前一年切·格瓦拉被玻利维亚军事政权草率处决事件搞得不知所措，但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仍预见 1968 年将是“英勇游击战之年”（the year of the heroic guerrilla），他的预言也许并不遥远。

无论想象力多么丰富，1968 年的确是一个奇迹迭出之年，一个多事之年。历史学家试图不断地弄清楚声势浩大的青年造反运动如何有可能在 12 个月之内响彻四大洲。尽管各国学生的目标和要求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这些世界范围内的政治造反运动毫无疑问具有某种共同点，但是，确切地说，这种共同点是什么？

对全世界的学生来说，一个重要的聚焦点是越南战争，这场战争成为随后所谈的大多数事件的必要条件。战争的特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强国使用最致命的技术手段迫使倒霉的发展中国家降服。美国努力“拯救”越南脱离共产主义胁迫的结果是，大约一两百万越南平民死于非命。尽管其武器装备和物质条件不尽如人意，但是勇敢的越南人玩起了大卫（David）与美国歌利亚（Goliath）的游戏，一再英勇地抵抗。从世界舆论的立场看，美国在东南亚进行的反共产主义肃

清行动完全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这场战争试图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理论以新的活力。美国暴行的图片——令人恐惧的 B-52 轰炸机所进行的地毯式轰炸、燃烧弹攻击、令人毛骨悚然的平民大屠杀——不断地出现在全世界夜间新闻报道中。

1968 年 1 月，越共（the Vietcong）发动了新年攻势（Tet Offensive），时间与越南的农历新年一致，攻击包括对位于西贡（Saigon）的美国大使馆发起了肆无忌惮的夜间突袭。从军事的角度看，这次进攻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待到烟消云散之时，北越不得不放弃他们占据的大部分阵地。不过，作为一种象征行为和宣传策略，新年攻势意味着一个清楚明了的转折点。美国军队指挥官一再描述他们完全掌控了战争，但是新年攻势证明这种断言是靠不住的。军官们看起来像傻子一样，而勇敢的越南人似乎是不可战胜的。

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运转着，对越南战争的谴责成为“国际左派”（International Left）最重要的凝聚点。在法国，基层越南委员会（Comités Vietnam de bases，简称 CVB）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积极分子，他们在“五月风暴”及其余波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72

这一年政治事件的更迭步伐似乎令人眼花缭乱。在美国，1968 年是一个历史变更的政治谋杀之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死于 4 月；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死于 6 月。这两起谋杀事件意味着美国自由主义事业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挫折，美国自由主义的光辉因越南战争而黯然失色。

8 月，捷克进行的“具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实验〔所谓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领导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 遭到华沙公约组织的军队的残酷镇压。令人沮丧的现实开始弥漫东欧，因为自此以后从内部改善东欧共产主义的缺陷将是不可能的。

在墨西哥城，蜂拥而至的学生集合起来抗议对大学自治的侵犯，并引起人们对政治犯虐待的关注。很快全世界的目光将聚焦于墨西哥的首都，夏季奥运会定在那里举行。10月2日，数万名学生集聚到特拉特洛尔科广场(Tlatelolco Plaza)来表达他们的诉求。警察恐慌不已，屠杀随之发生了，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学生示威者惨遭杀戮。官方对这一暴行的解释只有到了三十年后才着手进行。¹

这些完全不同的政治事件具有什么共同点？一部分解释将其归之于人口统计数据。“二战”后，人口急剧增长，出现了婴儿潮。这一代人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长大成人，此时对政治激进主义的支持开始扎根于整个欧洲和北美地区。青年时期，作为一个童年时代和成年时代之间的显著的过渡期，变成一个自主的文化政治变量。二战后的经济繁荣不需要青年人直接加入劳动力大军，中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人反而拥有了可供支配的、自我反思与自我修养所必要的闲暇时间。

73

通过音乐、服饰和品行，“二战”后的青年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小生境(cultural niche)。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意味着当代青年人在智力和文化方面正变得更加有教养。“60”一代人拒绝被动地默认有问题的决策，而这些决策是由政治精英自上而下强加的。反之，作

1 James McKinley, "Mexico Charges Ex-President in '68 Massacre of Students," *New York Times*, June 30, 2006, A3.

为见多识广的公民，他们开始积极地找到政治参与的途径和可能性。发达工业社会声称是民主国家，难道它们不该被迫地实行它们特有的平等主义的政治诉求吗？

20世纪60年代开启的社会风俗方面的变革被描绘为“一个后唯物主义价值的转向”。一位观察者解释说：“发达工业社会正经历着一场转变——从经济与人身安全……转而更加重视归属感、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¹这是这一代人——也许是历史上第一代人——物质需要的律令对他们而言不再支配着日常生活。因此，不像前几代人，“二战”后的青年人越来越能够将注意力转向品质的和精神的追求。前所未有的“光辉三十年”的丰裕为之提供了可以这样做的闲暇时间和物质享受。

艺术的终结与争论的开启

两年来，学生积极分子抗议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预。印度支那发生的战争以差不多与10年前阿尔及利亚冲突所具有的类似方式激化了法国学生。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生也试图讨论他们特有的、存在主义的、一代人的诉求——对“日常生活政治”具有影响的诉求。

1966年，“五月造反”的预演发生在斯特拉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事件以小册子《论学生生活的贫困》（*On the Poverty of Student Life*）的出版和发行为中心，这本小册子是由一

1 Inglehart, *Culture Shift*, 11.

一个叫“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简称 SI）的不出名先锋团体出版、发行的。尽管当时斯特拉斯堡事件似乎是一个相对较小的事情，但事后看来它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对“五月风暴”力比多—政治的狂热的奇特融合的神秘期待。

“情境主义国际”由居伊·德波创建于 1958 年，它源自于两个先前创立的文化小组——波特拉齐小组（Potlatch）和意象主义包豪斯国际运动（the International Movement for Imagist Bauhaus）。20 世纪 50 年代萦绕着这两个“情境主义国际”雏形的问题是，艺术终结之后文化的角色是什么？宣称艺术终结似乎是不祥之兆。怎么会断言“艺术”已经“死亡”？德波和情境主义者有非常特别的想法，他们正仔细思考这样一个事实——现代艺术，尤其是超现实主义，显然丧失了震撼力，它反而变成常见的、非威胁性的某种东西。曾经具有挑衅性的先锋派在 20 世纪文化的经典中找到了值得尊敬的位置，艺术变成“体面的”（presentable）。情境主义者认为艺术和社会名望是以相反的目的发挥作用。自从 19 世纪以来，艺术发挥着现代社会“良心谴责”（bad conscience）的功能，它揭露了社会整合的虚伪、奸诈和罪恶。既然先锋派变成经典的，那么人们到哪里找到一个能够充当其社会批判角色的替代者呢？

因为德波对文化失去了信心，所以他试验了各种令人想起达达主义（Dada）的“反艺术”形式，由此希望复活文化的社会批判功能。1952 年，他的电影《为萨德疾呼》（*Howlings in Favor of Sade*）首次上映。随着屏幕游移于没有影像的黑白背景之间，精选的语录和理论的趣闻时不时打断没完没了的沉默片段。“电影艺术死了。电影

不再可能，”一个声音在开场的连续镜头中宣布。“如果你想的话，让我们进行一场讨论吧。”¹20分钟后，观众离去了。在另一个臭名昭著的事件中，情境主义者在巴黎圣母院制造了一起丑闻，当时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扮成一个牧师，虔诚地登上了讲坛，以尼采的方式惊恐地宣布“上帝死了”。

然而，不知为什么这些新达达主义的挑衅缺乏特色——只是“艺术终结”观点的枯燥乏味的图解而已。这需要不同寻常的策略。要是艺术消亡不服从**审美**的解决方法的话，那该怎么办呢？反之，要是问题只有借助“**激进的政治变革**”（radical political change）才能解决，那又该怎么办呢？

75

20世纪60年代，情境主义者的聚焦点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他们不再抱怨当代文化的缺陷，而是开始探求激进政治的历史基础和哲学基础。除了科恩-邦迪的无政府主义外，情境主义者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将变为对“五月风暴”积极分子产生最重要理论影响的理论之一。

1966年秋，法国学生联合会斯特拉斯堡大学分会在一小撮左派分子的煽动下决定资助出版《论学生生活的贫困》，这是一本由情境主义者穆斯塔法·卡亚蒂撰写的小册子。

卡亚蒂毫无保留地叙述了学生的幻觉，学生们喜欢把自己看做是自主的，然而他们实际上依赖作为他们虚假家庭的大学。他们自认为是大学功能的批评者，批评大学是培养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的职

1 关于该事件的解释，参见 Japp, *Guy Debord*, 49。

业学校，然而他们提出的大多数改革建议恰恰强化了大学的角色，而不是真正地挑战大学。人们只不过想追求一种更有效率的大学结构，而不是追求质的不同。毕竟，最新一轮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简化大学的招生程序，以便促进高等教育与私人企业之间更好地进行对接。学生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前卫的文化商品（新浪潮电影、加缪和阿尔都塞）的高手，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忠诚与选择的因循守旧的本性。（情境主义者尤为关注戈达尔，他们认为戈达尔戏弄革命思想和革命主题，而不是证明真诚的介入。）¹此外，正如在大学环境中消费的那样，这些前卫的文化建构仍然是去潜能的、没有结果的。卡亚蒂评述道：

学生是禁欲的奴隶：当局对学生施加的束缚越多，他在幻想上就越自由。他与他的新家庭（大学）分享着对一种求知自主权的信仰。真正的独立在于直接向两种最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制度献媚：家庭和国家。它们是它们的行为端正的、受人欢迎的乖孩子，他极其渴望像一个温顺的孩子一样讨人喜欢。他赞美这种社会控制制度的一切价值和神秘化，同时以

1 参见 Guy Debord, "On the Role of Godard," in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177-178:

戈达尔的批评没有超越乏味的、同化的夜总会或《幽默杂志》(Mad Magazine)的谈谐。他所标榜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观众的文化是相同的，他的观众恰好在相同杂货店的平装书中读到了相同的页码……他从外省大获成功是可以效仿的，当时这种制度正竭力引导很多“文化上遭剥夺的”平民百姓进入值得尊敬的文化（甚至“先锋”文化）消费。

一切吃奶婴儿般的焦虑来摧毁它们。¹

1.6万名学生注册斯特拉斯堡大学。左翼学生使用学生基金出版了一万本卡亚蒂激烈的情境主义抨击的复印品，随后在集会上分发这些复制品。所有的城市名流，从市长到主教，都到场了。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左派分子有时也扰乱课堂秩序——尤其是一位心理学教授的课堂秩序，这位教授因其对“城市人口控制”学科的贡献而著称。²学生们也仿制了情境主义政治连环漫画《杜鲁提兵团的归来》（*The Return of the Durutti Column*，这个名字参考了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一个无政府主义兵团 Durruti Column），并继续在校园里分发这一连环漫画。这种漫画嘲笑了与其竞争的左派分子，提倡“剽窃”（theft）作为反击商品化逻辑的一种手段。《杜鲁提兵团的归来》例证了情境主义者偏爱的一种技巧——“挪用”（détournement）：利用另外一种的俗套文化对象，对它加以重构，以实现激进的政治目标。

当时斯特拉斯堡的社会氛围相当保守，极为传统，当地媒体一获悉了这些抗议和分裂时就开始猛然攻击，主流的巴黎日报《曙光》（*L'Aurore*）、《法国晚报》（*France-Soir*）和《世界报》（*Le Monde*）紧随其后。它们的头条新闻谴责了新出现的、应受谴责的“极端革命者”

77

1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On the Poverty of Student Life* (Berkeley, CA: Contradiction, 1972), 2.

2 关于情境主义者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参见“*Our Goals and Methods in the Strasbourg Scandal*,” in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204–212。

(ultrarevolutionaries)、“垮掉的一代”(beatniks)和“情境主义者”——他们设法霸占和腐化一个在其他方面值得尊敬的学生管理机构。《世界报》的回应具有典型性：“这本小册子因其‘高调’(high tone)而必定被认为是彻底地排斥我们在西方国家所熟悉的全部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彻底地排斥当前正试图改造它们的全部团体。”¹（《世界报》抱怨另一出版物的“高调”，对这一抱怨的讽刺实在是太妙了，因而是不能被忽略掉的。）媒体暗示了从情境主义者在巴黎所处的地位来看，他们是幕后指导学生自治行动的“阴谋者”。实际上，《论学生生活的贫困》的出版完全符合现行的学生自治守则。在一次教师集会上，一位教授慷慨陈词：“我完全支持言论自由……但是如果情境主义者在场，那么他们必须离开！”²换言之，言论自由应该被授予除情境主义者之外的每个人！

“五月起义”引人注意的方面之一是一系列学生抗议很快变形为一场对法国社会可感知到的缺陷与不足的全面攻击。情境主义者的印刷资料在证明大学危机是更大的社会危机的必要组成部分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后五月时期，情境主义者集中探讨了与文化革命理论相融合的日常生活。一场日常生活革命的计划就这样诞生了。“革命”不再意味着夺取权力或者使生产方式社会化，它反而意味着一场人际关系和生活条件的基层改革。

1 *Le Monde*, December 9, 1966.

2 对这一事件的叙述参见 Dumontier, *Situationnistes et mai '68*, 90。亦参见 Daniel Lindenbergh, “1968 ou la brèche du situationnisme,” *L'Esprit* (May 1998): 127-140。

危机重重的大学

关于法国大学制度，斯特拉斯堡事件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而已。一所位于巴黎市郊昂托尼（Antony）的郊区大学不断地爆发抗议活动，反对那些控制学生宿舍探视权的规定。这些规定禁止男同学晚上11点以后进入女生宿舍，女同学只有到了21岁才可以探访男生宿舍。充当监控任务的警卫室不吉利地进驻校园，以确保探视规定被严格地执行。

在其他大多数方面，学生被视为成年人。消费社会从内衣到汽车到肥皂都使用性意象来推销一切商品。性革命如火如荼，发展迅猛。然而，法国大学制度正不合时宜地去竭尽全力坚持一种过时的、贝当派的道德准则，可悲的是，这种道德准则与更加显著的社会趋势不合拍。戴高乐本人似乎对学生的诉求漠不关心，有一次他说：“他们确实只需要在大教室里相互看看就行了。”¹看来是教育部自酿苦果了。

1962年，受挫的昂托尼学生摧毁一个可恶的监视门房。三年后，1500名学生签了请愿书，要求自由的探视权和可负担起的租住房。然而，大学管理部门仍然无动于衷，唯恐任何的妥协都会为全国大学开了先例，致使示威游行接连发生。法国政府预感到“五月事件”即将发生，鲁莽地召集防暴警察，由此将曾是一个公民抗议运动的事件

1 Joffrin, *Mai '68*, 44.

转变成一种充斥着暴力对抗可能性的事态。警察逮捕了 8 名示威者，其中 5 人被学校开除，其他 2 人保留学籍 1 年，1 人被释放。果不出所料，在新一轮示威游行中，学生开始抗议开除学籍。这些示威游行是新一轮警察干涉的结果，导致了新一波的逮捕行动。

昂托尼只是对抗整个法国大学制度诸种问题的一个缩影而已。那里的抗议活动是“五月风暴”的怪异前兆。¹

79 政府艰难地意识到它遇到了一场棘手的危机。为了改善这种局势，它于 1967 年公布了以教育部长克里斯蒂安·富歇（Christian Fouchet）命名的富歇改革方案。其中一个有关学生的重要议题就是极为可怕的过度拥挤问题。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法国大学入学人数基本上翻了两倍。从政府的立场看，造成这种过度拥挤问题的一个原因是开放性的入学制度。任何人，只要他通过了全国资格考试（中学毕业会考），就可以上大学。

富歇改革方案设想的主要补救措施之一就是引入竞争性的入学制度，但这是一个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措施。在一个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培养中层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必要条件的时代里，限制大学入学将冒着暗中削弱法国经济竞争力的危险。所谓“大学校”（Grandes écoles）（高等师范学校和国家行政学校）已经实行竞争性的入学制度，但是社会学研究表明这种入学程序在维持法国社会的阶级偏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一项估计，只有 6% 的大学生来自工人阶级的背

1 参见 Seidman, *Imaginary Revolution*, 37-43。

景。¹这一关于竞争性入学制度的提议向当时的一代学生发出了错误信号。从本质上讲，教育部长通过除旧革新来回应这场危机。

1967年秋，巴黎西部南泰尔校园的氛围极为紧张。年初，一场关于宿舍探视权的抗议活动被警察粗暴地中断了。南泰尔校园本身就是一片冷漠的玻璃钢荒地。开往巴黎的交通车辆是不定时的、不靠谱的，从巴黎开往南泰尔的最后一班公交车晚上9点发车，到了晚上，学生无事可做。1964年南泰尔校园投入使用时，大学还没有一个独立的图书馆。1967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爆发了，抗议拙劣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埃尔韦·阿蒙（Hervé Hamon）和帕特里克·罗特曼（Patrick Rotman）描述了南泰尔校园的形势，兹述如下：

如若有一位一意孤行的社会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想象到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所有矛盾交错的几何核心，那么新建的大学的所在地——南泰尔——很容易满足要求。它建在一小片几百英亩的土地上，那里是城市与郊区、富裕与贫穷、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结合部。它恰好毗邻公共住房工程的不祥之门，这些公共住房工程就矗立在工厂烟囱排放的、新铁路线挖掘产生的浓雾之中，格外引人注目……那里推土机不停地挖掘，噪音喧天，铁路线上的临时工棚曾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堡垒，湮没在混乱的工业仓库之中，铺

80

1 参见经典研究 Bourdieu and Passeron, *Héritiers*。

设了据说是精灵飞舞、科学胜利的圣所。¹

1968 年 1 月，青年与运动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 (François Missoffe) 参观了南泰尔校园，帮助缓解局势。他主持南泰尔校园新游泳池的启用仪式，以此来证明政府在努力补偿学生各种抱怨方面的诚意。

随后他与学生领导者丹尼尔·科恩-邦迪发生了争辩，这成为“五月风暴”口头传说的一部分。在米索夫成功完成游泳池开幕式准备离去的时候，科恩-邦迪贸然上前跟他搭讪，提到了去年秋季的示威游行，他询问：“我们的性问题怎么办呢？”米索夫以戴高乐派的高压语调回复说：“如果你有性问题，那就跳进游泳池！”科恩-邦迪以当时的反法西斯精神的口吻反驳道：“这是希特勒青年团曾说的！”²

81 事后看来，这次交流成为一代人不信任的经典案例。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想象到它会充当全国青年造反的导火线，但是，正是因为这次交流以及科恩-邦迪对抗毫无保证的当局的意愿，他才开始作为当代法国青年狂热崇拜的形象凸显出来，激进派 (enragés) 的时刻敲响了！

触发“五月事件”的争辩主要与性问题有关，这几乎不可能是一个意外事件。学生希望被当作成年人对待，他们认为那些调整法国大学校园里亲密行为的“代替父母”法律 (in loco parentis laws) 是极其幼稚的。在爱欲对抗文明的经典案例中，学生们渴望他们的欲望的

1 Hamon and Rotman, *Génération* 1:385.

2 这一事件曾多次被叙述，参见 Daniels, *Year of the Heroic Guerrilla*, 155。

合法性获得认可。此外，他们强烈地感觉到法国大学正变成冷漠的、高度官僚化的“知识工厂”。为了抵消过度理性化的时代趋势，学生们试图将他们的身份确定为力比多的存在物（libidinal beings）——或者如德勒兹和加塔利在五月事件后将其叙述为“欲望机器”（desiring machines），这个主题将成为“五月运动”的引导线索之一。

3月22日运动

科恩-邦迪是五月运动最具超凡魅力的政治领导人。他的父母是20世纪30年代定居法国的德国犹太难民，他于1959年选择德国国籍，以逃避法国兵役制度，因此他在法国的合法身份是不确定的，因为作为一名非国民（noncitizen），他只拥有一张学生签证。

1968年5月下旬，科恩-邦迪离开法国，去柏林参加示威游行。法国当局抓住机会，禁止他再次入境，这充当了学生抗议者的聚焦点。法国共产党人既受到了科恩-邦迪领导魅力的威胁，又受到了他坚定的反专制主义的威胁，他们诽谤他是“一个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政府屈从了犹太人的指责，描述他只是“一个德国犹太人”。值得赞扬的是，学生们拒绝被这种排犹谎言欺骗，大声宣布：“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由此将科恩-邦迪的“他性”（otherness）变成了积极的战斗口号。

科恩-邦迪极为熟悉20世纪左翼政治。俄国革命决定性的转折点之一就是托洛茨基镇压1921年喀琅施塔得起义（Kronstadt Uprising），这次起义直指布尔什维克统治的独裁本质。一年前，列

宁发表了一篇严厉的论战性文章，批评左翼共产党员安东·潘涅库克 (Anton Pannekoek) 和赫尔曼·戈特 (Herman Gorter)，他们俩曾信奉“工人委员会” (workers' councils) 直接民主的理想。科恩-邦迪完全明白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镇压时有发生，不仅仅局限于右派敌人 (他们或许是相当邪恶的)，而且还无情地指向了可以察觉到的左派敌人。

科恩-邦迪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缺点的深刻洞察与“五月运动”的力比多-自由论者的组成部分相互配合，协调一致，这种对专制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批评非常适合被解放的欲望的政治策略。一幅关于“五月风暴”的著名涂鸦画宣布道：“我错把我的欲望当成了现实，因为我相信我的欲望是现实的。”¹ 不过，实际上讲，问题是这场运动偶尔对权威和等级表现出的故意厌恶感简单地转化为对组织的抵制。正如一位造反领导者所解释的那样，“(我们的运动) 在这一术语的社会学意义上有很多‘领导者’，但没有‘首领’，没有执行者，更别说官僚机构了。任何参与者都是‘白费口舌’ (to the four winds)；集会没有表决，它挑选出许多‘力量线’ (lines of force)，任何一场运动的激进分子都能表达这些‘力量线’。”²

科恩-邦迪阐发了对大学的批判，与情境主义者的观点相得益彰。法国的大学入学统计数字证实了人文专业的兴盛，不过有一种深层的

1 此处英语译文有误，依据法语原文译出，法语原文为 Je prends mes désirs pour la réalité car je crois en la réalité de mes désirs。——中译注

2 引自 *French Student Revolt*, ed. Bourges, 54。

张力存在于这种人文主义与政府努力推动的技术专家的职业目标之间。科恩-邦迪表达了这一困境：

自由的大学允许学生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条件是只要他们不挑战大学教育的基础：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为返回他们临时缺席的统治阶级行列做准备。实际上，大学变成了一台“绞肉机”（sausage-machine），大量生产没有真才实学的毕业生，他们不会独立思考，反而被训练去适应高度工业化的社会经济制度。学生可能会为其大学地位的声誉感到自豪，但实际上他正被喂以“文化”，如同鹅被喂以谷物一般——以便献祭于资产阶级食欲的祭坛上。¹

83

在科恩-邦迪看来，这种挑战没有纠正迷失方向且跌落低谷的大学，反而改善了大学赖以产生的、造成大学诸多棘手问题的社会。

游泳池事件之后，流言蜚语到处散播，说法国政府启动了驱逐科恩-邦迪出境的程序。学生们也担心便衣侦探正暗地里监视他们的集会和活动。新一轮的抗议活动爆发了，警察又一次被召集，来镇压抗议活动。

3月，基层越南委员会举行了一场重要的反战集会，位于巴黎市

1 Cohn-Bendit, *Obsolete Communism*, 27.

中心的美国运通公司办事处也遭到攻击。6 名学生被逮捕，其中 4 名学生被警察从他们自己的家中拽走。在科恩 - 邦迪的领导下，激进派贸然采取行动，抗议逮捕他们的同伴。他们自己将这次行动命名为 3 月 22 日运动，以纪念这个逮捕日。

3 月 22 日运动之前的学生逮捕事件意味着一个不可逆转的节点。正是这一事件刺激了一大批愤愤不平的、此前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学生。南泰尔的入学注册人数大约有 1.2 万人，而在发起 3 月 22 日运动的集会上，只有 140 名学生参加。不过，恰好 10 天后，也就是 4 月 2 日，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简称 SDS）领导者卡尔 - 迪特里希·沃尔夫（Karl-Dietrich Wolff）前来学校发表演讲时，大约 1200 名学生想尽一切办法挤入水泄不通的报告厅听演讲。

84 直到此时，学生们还集中讨论与校园有关的“生活质量”议题：学生的过度拥挤问题、反民主的管理结构、过时的课程和难以忍受的“代替父母”规定。然而，三月逮捕事件之后，学生们开始将他们的个人诉求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¹，宣讲会大量增加。可供选择的或者“平行的”大学结构逐渐形成，以便学生们能够表达迫切的政治议题：越南战争、政府镇压和国际学生运动。本着这种精神，3 月 29 日，“批判大学日”（Critical University Day）召开了集会。

这时教职人员昂利·列斐伏尔、埃德加·莫兰、保罗·朗西埃和

1 Dumontier, *Situationnistes et mai '68*, 97-110.

阿兰·图海纳在警察的残暴驱逐下解散了管理有序的队伍。在左翼自由主义教授的眼中，学生们有许多合理的关注与要求，以镇压的方式来应对这些关注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图海纳曾写过一本关于“五月风暴”的著作（是同类题材最好的著作之一），总结了他当时观察到的、弥漫于持不同政见的教师中间的情绪：“法国人对他们的领导者不感兴趣。”¹

因此，南泰尔校园在几周之内就变成学生战斗精神的滋长地，这场运动甚至要扩散到巴黎地区的其他校园。以南泰尔为根据地的激进派计划于4月末、5月初开展新一轮演讲会。4月，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者鲁迪·杜切克（Rudi Dutschke）遭到右翼狂热分子的袭击，伤势严重。抗议活动在德国爆发。整个欧洲，政治紧张的程度也相应升级。

4月27日，科恩-邦迪离开公寓时被警察逮捕。总理蓬皮杜担心科恩-邦迪的监禁会将他变成一名殉道者，次日就下令释放他。因其为新近赢得的名声感到自豪，所以科恩-邦迪就他的释放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嘲笑那些胆怯心虚的捉拿者。那么，谁在操纵着这场表演（show）呢？

同时，在巴黎，毛主义者与一个极右的、反共产主义团体“西方团”（Occident）发生冲突。这些右派分子遭受重创，扬言要立即报复。毛主义者以这样的横幅进行反击：“空降兵（Paras 系 paratroopers 简写），

1 Touraine, *May Movement*, 50,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你们可能逃离莫边府，但是你们逃离不了南泰尔”（这条横幅就悬挂于即将发生冲突的预期地点）。其中个别的毛主义者曾支持了3月22日运动。

院长皮埃尔·格拉潘（Pierre Grappin）希望两周的复活节假期能耗尽学生们的狂热，然而他的期望遭受了粗暴的打击。科恩-邦迪和其他7名学生被传唤，面临着一场预定于5月6日进行的强制性惩罚听证会。学生们于5月2日至3日举行了大规模的宣讲会。鉴于高度紧张的政治氛围，格拉潘，作为一名前抵抗运动成员和左派人士，唐突地关闭大学。激进派及其支持者只好将他们的活动转移到了位于拉丁区中心的索邦大学。

巴黎正燃烧

“谁控制了巴黎，谁就控制了法国”是一条经常被援引为对法国坚定的革命传统做出地缘政治学解释的格言。自从马萨林（Mazarin）和路易十四时代以来，法国过度的中央集权意味着控制了巴黎就等于控制了法国。在法国历史上，这种场景于1789年、1830年、1848年和1871年一再上演，“五月事件”证明了这一格言的持久力。

5月3日，科恩-邦迪和300余名学生集聚到索邦大学的主庭院，讨论最近发生的事件：警察镇压事件、南泰尔大学关闭和一连串的学生逮捕事件。政府最害怕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南泰尔大学的骚乱正迅速从郊区扩散到巴黎市中心。总理蓬皮杜一贯支持安抚政策，但他当时到伊朗和阿富汗进行10天的旅行，让内政部长克里斯蒂安·富

歇 (Christian Fouchet) 掌管政府。此时戴高乐刚过 77 岁，他通知富歇说他希望立即停止学生骚乱，但是不清楚部长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缓解迅速扩大的局势。

当局再次蠢笨地采取行动，这次后果不可挽回。索邦大学校长让·罗什 (Jean Roche) 唯恐南泰尔事件重演，向警察局局长莫里斯·格里莫 (Maurice Grimaud) 发出了书面申请，请求“清除”索邦大学的庭院。在令人畏惧的、手持警棍和盾牌的共和国治安部队 (Compagnies républicaines de sécurité, 简称 CRS) 防暴警察分队的陪伴下，警察一起跳下警车来镇压学生。学生人数大大超过了警察人数，他们的谈判暂时休战。警方有条不紊地拉起警戒线，封锁了该地区，进而逮捕了 600 余名学生，将他们拖进了待命警车的后箱里。在他们看来，最好逮捕更多的学生以平息对峙的局势。

大规模的逮捕学生证明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数百名学生旁观者被警方恣意逮捕的暴行激怒了，他们开始向警车投掷石头，希望解救他们可能有危险的同伴。警方迅速做出反应，连续向学生扔了几颗催泪弹，接着他们开始随意用警棍打市民旁观者，并逮捕他们。每日往返上下班的人们走出当地地铁站，不料却发现自己陷入整个拉丁区正在爆发的混战之中。在一些情形中，他们也被逮捕了。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报复，学生们开始松开街道铺路石，建立了临时街垒。

在接下来的两周内，这种场景一再出现。学生示威者的人数很快暴涨到好几万人。两名曾目睹 5 月 3 日索邦大学争辩的英国记者描述了这些事件，兹述如下：

这些最初几分钟的造反树立了一种整个 5 月悲剧性重演的模式。当局渗透到索邦大学，拘捕大批青年学生，铸成了大错，而学生们的唯一过错就是制造了一点儿噪音而已。接着当局错上加错，将他们的犯人展示在犯人的同伴面前。屡见不鲜的是，镇压酿成暴力，而不是遏制暴力。当局粗鲁地展示力量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大多数未被监禁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团结起来支持激进派……街头战斗、抓起石头扔向警察的简单行为、战斗人群酝酿的闪电式团结——这是刻不容缓的政治教育，将学生群体变成一大批造反者。¹

87

尽管大部分被逮捕的学生第二天就被释放了，但是其中 4 名学生在周末被判处监禁两个月。作为回应，主要的学生领导者阿兰·热斯马尔（Alain Geismar，法国高校教师工会副秘书长）、雅克·索瓦热奥（Jacques Sauvageot，法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和科恩-邦迪（3月22日运动领导者）宣布于5月6日星期一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学生们清楚地表达了三项要求：（1）重开索邦大学；（2）全部警察撤离拉丁区；（3）立即释放被囚的同伴。

这是法国自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所遭遇的最激烈的骚乱，巴黎人被罪恶昭彰的警察暴行击退了，其中许多暴行恰好就发生在他们的窗户之下。耐人寻味的是，公众舆论的导向到了星期三从反对“治安武

1 Seale and McConville, *Red Flag, Black Flag*, 69.

装力量”戏剧性地转向了各种学生团体。5月8日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五分之四的巴黎人支持学生，实际上学生事业每次都被政府的错误估计和过度反应所激化。戴高乐发布命令说国家面对动乱时要显示出坚定的决心，他的部长们努力效仿他，亦步亦趋。不过，不再是阿尔及利亚移民正遭受巴黎警察施加的残酷暴行，而是法国中产阶级的儿女们。

在总理蓬皮杜呆在无法与外界联系的阿富汗乡村的情况下，政府发现很难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最终管辖权是属于教育部长还是属于内政部长？这肯定没有人知道。部长们勉强同意学生们的前两个要求——重开索邦大学和撤离警察，但是对于释放被囚的学生这一要求，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根据后来的报告，戴高乐亲自介入此事，拒绝了这一要求。）

与此同时，学生抗议运动的势头呈几何指数增长，支持巴黎学生的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到法国乡村。学生领导者号召5月10日星期五举行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不妥协态度，并为了他们被监禁的同伴向政府施压。

5月10日的抗议活动——所谓的“街垒之夜”（Night of the Barricades）——成为一个法国政治史上的传奇事件、一个法国革命传统中真正值得纪念的日子。到目前为止，法国首都的学生力量暴增到近4万人。高中生也派出优秀代表，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诉求。无论是他们还是大学生，都没有享有政治言论的自由。

一开始这次示威游行与任何其他示威游行一样，学生们集聚到宽阔的丹费尔-罗什洛（Denfert-Rochereau）十字路口。他们的目的是

穿过巴黎，到达法国广播电视公司总部(ORTF)。不久，消息传来说“治安武装力量”挡住了所有通向右岸的主要桥梁。既然他们首要的目的地被拦截了，学生领导者不得不临时改变决定，他们临时改道去桑德监狱(Santé Prison)，他们认为他们被囚的积极分子同路人就被关押在那里。接着，他们在警察和共和国治安部队的严密监视下沿着圣日耳曼大道(Boulevard Saint-Germain)行进，警方似乎让他们退回到拉丁区的狭窄小巷。

转折点最终还是到来了。警方明显占优势，他们成功地堵住了示威游行者的道路，游行者当时面临着意志消沉的危险。学生领导者们意识到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重新获得主动权或者返回被践踏、被打败的校园。他们接到令人沮丧的消息——代理总理路易·若克斯(Louis Joxe)与科恩-邦迪之间举行的最后关头的谈判失败了。

面对即将到来的另一场警察袭击，学生们开始自发地使用铺路石和城市碎石子建造起街垒。正如一位观察者所报道的那样，“街垒是对这样一种社会秩序的回答，这种社会秩序化约为缄默的、大规模的警察权力”¹。学生们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策略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地盘。警察正在占领索邦大学，当时拉丁区的其他地方属于他们！不过铺路石也充当了一种与法国革命传统的象征性联系。那一刻学生们变成了“无裤党”(sansculottes)和“巴黎公社社员”(communards)。几个小时内，这些临时建造的微型小堡垒多达 60 个，出现在毗邻索

1 Touraine, *May Movement*, 176.

邦大学的附近区域。科恩-邦迪命令他的队伍分散为小群体，以便更好地保护自己，应对预期到来的警察猛攻。他认为这对培养一种有助于负责的集体行动的心态是必要的。他试图瓦解缺少一致性和目的性的群众运动所遭遇的被动性和“序列化”（萨特）。

街垒的建造是一项革命浪漫主义的完美行为、一项纯粹喜悦的行为。在回忆录中，科恩-邦迪以恰当的抒情般热情描述了这一事件：

在一个试图粉碎个体、强迫个体轻信相同谎言的社会中，集体力量的深层情感喷涌而出，而且人们拒绝被恐吓。我们不再是无数的、被碾在一起的小原子，而是一群可靠的、意志坚定的个体……“青年人的鲁莽”没有源自于绝望、无能为力的愤世嫉俗，反而来自于我们集体力量的探索，这种力量感和统一性统治着街垒。在这些集体狂热的时刻，既然一切都看似有可能的，那么没有任何东西会比所有游行者的、尤其是小伙子与女孩子之间的亲切关系更自然、更单纯。一切都是容易的、不复杂的。街垒不单单是一种自卫的手段：他们变成个人自由的象征。¹

学生的快乐将是短暂的，防暴警察做好了袭击的准备。午夜时分，他们收到了若克斯部长和富歇部长、还有新任教育部长阿兰·佩尔菲

1 Cohn-Bendit, *Obsolete Communism*, 63.

特 (Alain Peyrefitte) 的袭击许可。

警察展开了攻击，齐发催泪弹，残酷的混战随之发生，鲜血横流。一位目击者描述了这种混乱的场景，兹述如下：

90

凌晨 2 点，当时警察显然正准备一次强有力的攻击。广播宣布我们被包围了，政府下令警察发动攻击……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掀翻了汽车来阻止警察的公交车和坦克（广播说坦克正驶来，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我必须再次强调整体气氛是防御性的，不是攻击性的；我们只想如一场坚定的静坐罢工一样固守着地盘……他们的策略是简单的：他们以步枪为掩护，每 100 码的距离发射毒气榴弹，使我们看不见，让我们呼吸困难，使我们昏迷过去。这种毒气是梅西液态催泪剂 (MACE, 这让人想起了越南战争和底特律梅西催泪弹)。还有爆炸性手榴弹。我们附近的一个学生捡起了一颗手榴弹，扔了回去；他的整只手炸飞了……不过警察同时攻击三个点：盖-吕萨克 (Gay-Lussac) 路两端、我们的街垒和乌尔姆路……最后，我们被迫后退。我们的街垒烧毁了。这时我能记住的一切就是我因缺氧而晕了过去。¹

陷于混战的无辜旁观者被击昏了。当地居民尽力帮助学生，给他

1 Jean-Jacques Lebel, "The Night of 10 May," *Black Dwarf*, June 1, 1968.

们提供水、绷带和避难所。在许多情形下，警察直接闯入了私人住宅，搜捕学生。有一次，他们袭击了一名根本没参与示威游行的年轻妇女，把她赤裸裸地赶到街上。¹ 战斗持续到清晨，此时学生们终于解散了，回家包扎伤口。370 名学生受伤，460 名学生被逮捕。

当局仍然假定他们正面对一场通过显示坚定的决心就能安全控制的学生造反，他们怕疏远警方，拒绝释放四名被囚的抗议者，因为警方是居于政府和完全“无政府”之间的唯一力量。

然而，街垒之夜后，这些假定不再适用了。从那时起，当局将面对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事实上来自法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正如雷蒙·阿隆所观察到的那样，这场运动肯定震惊了戴高乐政权，而这个政权将一切都押在了权威和命令的戒律之上，此时才意识到它着实令人感到憎恶。² 当一个政权在公民眼中丧失合法性时，镇压变成它唯一的解救办法。

此前，共产党人将学生暴动贬低为一场由被宠坏的“爸爸的儿子们”（*fils à papa*）所领导的造反，因此从工人阶级的立场看，这场造反是缺乏时代性的。但是5月10日，另一场流血大屠杀发生在巴黎市中心。此时，法国共产党害怕来自左派的竞争，因其拒绝介入冲突，共产党人开始损失政治资本。他们的领导人就像胆小的“修正主义者”那样循规蹈矩，马列主义者指责他们的这种行为表现。是时候采取行动了，由此或许能为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赢得一些学生造反者的

1 Seele and McConnville, *Red Flag, Black Flag*, 88.

2 Aron, *Elusive Revolution*, 9.

称赞。

共产党人控制的法国总工会（CGT）自诩有 200 万左右的工人会员。法国共产党领导层宣布大罢工，以支持 5 月 13 日星期一进行抗议活动的学生，法国左翼天主教民主工会（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简称 CFDT）也效仿法国共产党，支持学生抗议活动。

周末，学生领导者们宣布周一举行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共产党人同意帮助他们，共同参与，他们准许科恩 - 邦迪、阿兰·热斯马尔和雅克·索瓦热奥“三巨头”领导游行队伍。这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游行队伍啊？根据最可靠的估计，30 万人参加了！小派别的时刻敲响了，其中一条伴随示威游行行进的横幅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一时刻，颇具讽刺意味地宣布：“我们是小派别！”（Nous Sommes un Groupuscule!）——然而这次是一个包含了几十万人的小派别！

92 5 月 13 日意味着一场激进派进行的出色辩护，他们可是从“五月风暴”的不祥开端就被突然推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在 5 月 3 日至 6 日的造反之后，共产党日报《人道报》（*L'Humanité*）以这样措辞讥讽科恩 - 邦迪和 3 月 22 日运动：“不负责任的左派分子以政府失效和学生骚乱为借口，意在破坏教师工作、阻止大多数学生参加考试。这些虚伪的革命分子客观上表现为戴高乐当局的同盟者，表现了一种令大多数学生厌恶的策略。”¹ 从这番话看，毫无疑问的是法国共产党放弃

1 引自 Cohn-Bendit, *Obsolete Communism*, 58。

了政治斗争，变成一个“秩序政党”（party of order）。

七天后，激进派领导了巴黎自人民阵线时代以来所经历的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共产党人及其同盟法国总工会懊悔地跟在后面。科恩-邦迪后来叙述说：“令我高兴的是我们走在示威游行队伍的前面，而那些斯大林主义狗崽子们正在队伍的后面担任行李员。”¹

一场自我限制的革命

最终戴高乐对“无序”特有的厌恶感几乎令其政权倒台，由此这一阶段被设定为一个关于“五月造反”展开的叙述中无法预测的篇章。以巴黎郊区发生的学生暴动为开端的事件演变为一个庞大的反戴高乐派的学生工人联盟，工人与学生的联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发展。1968年间没有其他地方——既不在美国、拉丁美洲，也不在欧洲其他地方——形成一种类似的战线。

政治学者不考虑发达工业社会发生革命的可能性，据说技术效率的考量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战胜“意识形态”，“五月事件”证明这种诊断是错误的。学生领导者们审时度势，拒绝过激行为和要求，他们不再提出宏大的政治要求——例如威胁要“夺权”，他们明确的政治目标就是消除戴高乐主义。因此，5月13日示威游行的标语是“十年足够了！”（1968年5月13日是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危机期间再度出山

1 Joffrin, *May '68*, 139.

的周年纪念日。)总而言之,学生们提出了一系列适度的、合理的政治诉求,由此他们几乎处处给反应过火的当局设下了圈套。¹

“五月造反”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现象,除了美国民权运动外,它也许是第一个“自我限制的革命”(self-limiting revolution)的例子。这个短语因波兰持不同政见者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而永载史册,他描述了面对国家社会主义几乎完全被政治控制的条件下创造一个自治的公民社会(“自由的领域”)的诸多努力。在“五月风暴”中,学生积极分子也试图阐述与戴高乐主义可谓大一统的政治主导地位相对的行动自主领域。这两种革命运动共享的一个重要政治维度是一种内在的、对雅各宾派中央集权模式的不信任。按照这种图式(似乎以被列宁“完善”了),国家作为唯一合法的政治行动者发挥作用。通过培育政治争论可供选择的形式,也就是说那些源自于独立的公民社会的形式,“五月运动”和东欧持不同政见者全力以赴与政治集权

1 关于学生领导者判断客观政治局势的清醒能力(他们的“现实主义”)的一个证据是发表在《新观察家》的萨特对科恩-邦迪的访谈。在访谈中,科恩-邦迪一再指出五月危机不是古典的、旧式的革命局势:

我对形而上学没兴趣,对“制造革命”的方法没兴趣。如前所述,我认为我们正走向一场连续不断的社会变化,这一社会变革是由每个阶段的革命行动制造的。在我们社会的结构中发生一场激进的改变将是有可能的,例如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一场强大的工人运动的行动和充满活力的学生活动突然聚合。不过这些条件如今还没有实现。从最乐观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期望推翻政府,但是我们不必梦想着摧毁资本主义社会。那并不意味着无事可做,相反我们必须在全球挑战的基础上按部就班地进行斗争。

(Cohn-Bendit et al., *French Student Revolt*, 76-77)

做斗争。¹

通过接受反专制主义和坚决放弃“国家主义”(étatisme)——戴高乐主义者、共产党人和共和党人同样推崇的政治形式,学生革命分子重提无政府主义隐秘的政治传统。在19世纪,其最有说服力的代言人是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蒲鲁东最初是一个圣西门主义者,但是他很快就憎恶圣西门主义者们对国家权力的歌颂,他恰当地指责他们试图以一种更加现代的、专家治国论的变体来取代一种政治独裁主义的形式——君主专制主义。蒲鲁东推崇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开端,但是他将雅各宾派两年的独裁政治(1793—1794年)视为一种对法国大革命起初的解放承诺的背叛。蒲鲁东认为法国随后的政治历史——拿破仑、王朝复辟、第二帝国——进一步证明了中央集权政府的内在罪恶。

在考察法国政治文化缺陷的过程中,蒲鲁东对卢梭专制主义的主权论横加指责。与这种持久的国家主义者的憧憬(既存在于右翼的变体之中,又存在于左翼的变体之中)相反,蒲鲁东赞美局部的、分权的民主政治观念,由此期盼着“工人掌权”(workers' control)的理想。正如蒲鲁东所说的那样,当“工作自行组织,不再需要立法者或统治者”的时候,车间将会取代政府”²。

1 参见 Michnik, "The New Evolutionism," in *Letters from Prison*。关于“六八分子”与东欧异见运动的对比,参见 Berman, *Tale of Two Utopias*。

2 Pierre-Joseph Proudhon, *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dix-neuvième siècle*(Paris: Garnier Frères, 1851), 395。

在其一生中，蒲鲁东的学说总是遭到嘲笑，他是马克思在《贫困的哲学》(*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中谴责的对象，他在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 1864 年)的创始阶段就被马克思的追随者策略性地打败了。对其所受责难的澄清姗姗来迟，并且是以 20 世纪工团主义的形式进行的，而这一发展趋势就是拒绝工会和政党，以支持劳工政治上的自行组织。

95 事后看来，蒲鲁东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反专制主义的工人自治思潮的先驱者，而这种工人自治思潮在“五月风暴”的余波中快速蔓延。不仅他的学说预期了工团主义，而且这些学说也预示了工人自治浪潮，后者促成了 20 世纪 70 年代“第二左翼”(Second Left)和法国左翼天主教民主工会(CFDT)。¹

那么，在 5 月 3 日至 10 日把日常平静的拉丁区变成真正战场的政治冲突期间，毛主义者在哪儿呢？毕竟，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与巷战最密集的索邦大学周边地区只有咫尺之遥。

在高师生傲慢的典型姿态下，毛主义者因其缺乏阶级性而解散了学生造反。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场造反缺乏必要的“无产阶级内容”(proletarian content)，所以它没有符合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约束。马列主义的教义问答反复强调革命是由工人阶级发起的，而不是由一群主要不满于宿舍探视权的中产阶级青年发起的。而毛主义者自封为

¹ Hayward, *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7.

革命先锋，为他们的禁欲主义感到骄傲。

毛主义者下达指令，命令他们的支持者放弃拉丁区，反而去偏远的工人阶级地区“煽动”。¹高师生也许才华横溢，但是他们经常缺乏苏格拉底式自知之明之美德。在大多数情形下，他们远比南泰尔大学和索邦大学的学生享有更多的特权，不过他们极其傲慢，拒绝考虑南泰尔大学与索邦大学的学生们的政治动机。

在5月3日至6日的关键性冲突中，毛主义者领导层沾沾自喜地躲进了乌尔姆路的避难所。到此为止，最初只是局部的学生造反运动迅速获得了发展动力。整个国家的注意力——很快是世界许多地方的注意力——热切地关注拉丁区。那么，对于毛主义者来说，是否到了改变他们政治进程的时候？

5月7日，星期二，毛主义领导者罗贝尔·兰哈尔（Robert Linhart）号召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举行一次集会，来商讨这些问题。毛主义领导者全部到场了，有皮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他在后五月时期接替了兰哈尔）、蒂耶诺·格兰巴克 [Tiennot Grumbach，他是激进社会党前总理皮埃尔·芒德-法郎士（Pierre Mendes-France）的外甥，是未来有影响力的后五月刊物《革命万岁！》（*Vive la Révolution!*）的合作主编]、克里斯蒂安·德·波特臧巴克（Christiane Portzamparc，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平面造型艺术专业的学生）。1994年，波特臧巴克获得了建筑学领域最高奖项——普利

96

1 参见 Kessel 主编的文献资料 *Mouvement maoïste*；尤其是 *Et maintenant, aux usines! Appel du UJC (ML) et des cercle servir le peuple,* May 7, 1968, 41-44。

兹克建筑大奖（Pritzker Prize）。

这次会议的目标是讨论毛主义者应该如何回应最新发生的政治事件。根据毛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路线，兰哈尔建议下一轮的示威游行转向大多数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以便使学生和工人团结起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毛主义者继续在整个拉丁区分发枯燥乏味的政治小册子《现在到工厂去！》（*And Now to Factories!*），不过就与学生抗议运动联合而言，兰哈尔仍然是坚定不移的。

在最近这些时日里所进行的狂热政治煽动中，兰哈尔与其他学生领导者一样几乎没怎么睡觉。毫无疑问，这一事实对他的判断产生了负面影响，容许了某些政治妄想生根发芽。在兰哈尔的领导下，毛主义者相信戴高乐主义者和社会党人正进行密谋，想引诱法国工人阶级走向街头，正是在大街上，法国工人阶级将在一种令人回忆起“六月起义”（June Days）或巴黎公社的场景中惨遭“治安武装力量”的大屠杀。

毛主义者自认为是革命的忠实信徒——“纯粹的”、坚定的马列主义者。从心理上讲，承认其他政治派别可能是正确的与承认这些政治派别可能是错误的，这对他们来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不过，对于兰哈尔的政治顽固性来说，也可能有一种更务实的、利己主义的理由，因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Union des jeunesses communistes marxistes-léninistes*，简称UJC-ML）迟迟才去联合其他重要的学生团体——南泰尔激进派、索瓦热奥领导的法国学生联合会，或者与阿兰·克里维纳（Alain Krivine）领导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Jeunes communistes révolutionnaires*）有联系的托洛茨基分子，所以承认错误

有可能破坏他们的全部革命信条。由此，自称是革命的先锋派将有可能被揭露为政治迟到者——革命的后卫派（*derrière-garde*）。

因此，当罗贝尔·兰哈尔发表5月7日演讲时，他的重要助手莱维/维克多、蒂耶诺·格兰巴克和罗兰·卡斯特罗都到场，但是没有人公开反驳他，尽管他们大多数人开始深刻地地质疑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的政治进程。显然，在这个特殊的关头，利害攸关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罗贝尔·兰哈尔作为领导人的声誉与日剧下。在这个时候承认他错误判断学生运动的重要性和潜在性几乎是不可接受的。

97

讨论快结束时，房间的后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是尼克尔·兰哈尔（Nicole Linhart），罗贝尔·兰哈尔的妻子。她情绪激昂地说道：“罗贝尔，学生们正在外边战斗。秘密地呆在这儿是愚蠢的。是时候参加了……无产阶级想加入示威游行，以学生为榜样，举行罢工！”¹

罗贝尔·兰哈尔无情地回复道：“滚开！你没有权力在这儿说话。滚出去！”尼克尔含泪离开了房间。罗贝尔·兰哈尔跟着离去，以糟糕的状况（失眠、难以忍受的政治压力等等）为借口不停地道歉，不过这都无济于事，尼克尔没有原谅他。

因此，毛主义者依然袖手旁观，直到5月13日那一周，当时共产党号召举行大罢工。

1 关于这一情景的描述，参见 Hamon and Rotman, *Génération* 2:368-370。

从拉丁区到工厂

98 尽管学生和工人于 5 月 13 日携手举行示威游行，并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力争保持他们的联盟，但是他们几乎不是天然的同盟者。尽管如此，未经工会批准的罢工浪潮在随后的几周内让法国人停止了工作，这是一次引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新发展。共产党人打赌说，他们的选民在大罢工之后将会忠实地返回到工作场所，但是他们的期望破灭了。传统上，法国工人运动展示了一种显著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受街垒之夜和激进派煽动性言语的激发，政治激进主义的这一张力在“五月风暴”期间再度勃然兴起。5 月 13 日示威游行之后，工人与学生行动委员会成立了，以便传播造反福音。¹几天内，大约 200 万人举行罢工。到 5 月 22 日，人数上升到近 900 万人。

法国工人中间萌发了这样一种意识——工会没有代表他们的利益。总之，法国工人得到的报酬低得可怜。²当中产阶级尽情地享受消费者富裕的好处时，工人阶级显然是迟缓地获得好处。“五月事件”意味着他们宁可更自在地考虑自己的事务，也不愿继续依赖无能的工

1 参见 Vienet, *Enragés et situationnistes*。

2 Seale and McConnville, *Red Flag, Black Flag*, 155: “在五月、六月工资结算之前，四分之一的法国工人的月收入不多于 500 法郎（110 美元），三分之一的法国工人月收入不多于 720 法郎（144 美元），大约 150 万的工薪族处于这一工资结构的底层，他们是没有特殊技能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他们的月收入只有 400 法郎（80 美元）。”

会代表。

未经工会批准的罢工最初发生在法国西部，南特附近的南方航空公司工厂（Sud Aviation plant）的工人夺取控制权，开始按照工人自治的严格要求来管理工厂，接着雷诺公司一些工厂的工人停止了工作——包括了巴黎郊外的克里昂（Cléon）、弗兰（Flins）、勒芒（Le Mans）和布洛涅—比扬古（Boulogne-Billancourt）等地的工厂。在克里昂工厂和布洛涅—比扬古工厂，工人们扣押了工头，进而自己管理工厂。

法国工人的阶级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日益重要的是技术能力和管理效率，这种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阶层更善于接受学生积极分子的要求。“五月风暴”期间，质量要求在这两个群体中间是至关重要的。技术工人和学生试图挑战法国组织文化准封建的等级结构。在这两个群体证明了他们的能力后，他们感觉到他们更有发言权说法国制度生活妨碍了管理。分析者指出技术工人的要求与其说与物质利益有关，不如说与管理部門行政特权的不公有关。¹

然而，一旦法国新的专家阶级的质量要求被满足了，新的“工人贵族”（worker aristocracy）就会迅速返回到原来的组织结构，因为他们的职业兴趣取决于现有制度的保持与改善。作为有抱负的管理精英，法国“新阶级”是真正的圣西门主义者。另一方面，学生激进分子证明是很难被安抚的。

法国工人阶级的突出特征之一始终是厌恶革命。几十年来，法国

¹ 参见 Mallet, *Essays on the New Working Class*。

无产阶级的利益被共产党及其工会联盟充分满足了，因此法国阶级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被成功地体制化。煤矿和钢铁等传统工业部门的衰落有助于解释工人阶级要求的突出的、“防御性的”本性。主流的工人阶级对所谓的质量议题或质量关注几乎不感兴趣——尽管在“五月事件”的影响下，这种态度在未经工会批准的罢工和工厂占领的情况下开始发生改变。因此，劳工的关注始终是经济的或数量的，工人寻求更好的报酬、增加的收益和改善的工作条件。这些议题在五月下旬的格勒内勒谈判（Grenelle negotiations）期间曾被讨论过，这次谈判成功地使工人离开街道，返回工厂。

就其标志着新型社会斗争的转变而言，5月是一个转折点。旧式斗争关注的是更高工资的要求和改善的工作条件。新型斗争以两个重要主题为中心：

1. 社会控制的专制模式的解体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民主化；
2. 为了容纳各类迄今仍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妇女、同性恋者、移民和囚犯）而进行的斗争。

5月之后，他们的斗争和要求将占据中心舞台。

将军的回归

1968年5月29日，无疑是法国政治史上最诡异的日子之一。

这一天戴高乐通知工作人员说他将离开巴黎回到科隆贝双教堂村 (Colombey-les-deux-Eglises)，这对于一个面对全面暴动的领导人来说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决定。两周来，法国首都因为大罢工瘫痪了。在大多人的眼中，在这种情形下离开巴黎简直就是屈服投降。

但是将军那天没有回科隆贝，而是旅行到了德国巴登巴登 (Baden-Baden)，会见了驻扎在那里的法国军队统帅雅克·马苏将军。[10年前，马苏将军曾在阿尔及尔领导了“将军造反”(revolt of the generals)，这一事件促发了戴高乐重返政坛的政治危机。] 将军的巴登巴登之行引起了不断的揣测，法国总统大概希望从这一旅行中得到什么呢？

对于这样一个77岁的法国国家元首来说，政治局势似乎是难以掌控的。他觉得他耗尽了所有的政治选择能力，并考虑退出政治舞台。他对马苏哀叹说：“一切都毁了！共产党人令整个国家陷入瘫痪状态。我不再管任何事了，我决定辞职；因为我感觉到了威胁……我到你这里寻求庇护，以便决定该如何采取行动。”¹

对于马苏来说，他试图支持戴高乐的决心。“这不是屈服的时候，”马苏说，“而是一个需要重新决断的时刻。”在回忆录中，马苏毫不谦虚地认为他凭一己之力阻止了将军辞职。

但是，这次将军到巴登巴登的神秘之行背后可能还隐藏着另外的原因。戴高乐毕竟是一个军人，既然他看出恶化的政治局势无路可走，

1 Massu, *Baden* 68, 79-80.

所以他考虑这样一种选择，即召集法国军队回巴黎恢复秩序。一位研究“五月运动”的历史学家证实说：“这次巴登巴登之行背后隐藏着……内战一触即发的威胁，并向军队发出求助。”¹戴高乐从未公开声称他考虑过这种选择。如若承认他考虑动用法国军队来反对共和国公民，这有可能玷污他几十年来的声誉。但是这次巴登巴登之行不是一次随意的逃避行为，而是一项深思熟虑的应对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管这次诡异的逗留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戴高乐一返回巴黎就能重整国家秩序。5月30日，他通过法国广播电台[30年前法国遭受纳粹德国的“奇异的溃败”(strange defeat)后用来团结整个民族的同一媒体]坚决地宣布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辞职。他将他自己描述为“共和国合法性”(republican legitimacy)的化身，并坚称他将完成他的使命。他宣布他正着手解散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新一轮选举将于6月举行。当时他巧妙地打出了反共产主义的牌，因为他宣称“五月起义”是由某一具有极权主义政治目的的政党煽动的。如同1940年一样，法国再次遭受着“独裁政治”的威胁——但是这一次是来自政治左派。只有戴高乐有办法和勇气来拯救国家摆脱这一耻辱的命运。

当天晚上，戴高乐主义者组织了一场从杜伊勒里宫(Tuileries)到星形广场(Place de l'Etoile)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支持被围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戴高乐将军。这一次集会是一个显著的象征性标志，

1 Joffrin, *Mai '68*, 283.

意味着政治趋势开始转向了支持政府。在几十条支持戴高乐反对共产党的横幅中，其中一条尤为醒目：“科恩 - 邦迪滚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Cohn-Bendit à Auschwitz)

戴高乐的表演是一次巧妙的政治行动。将军意识到既然他的声誉急剧下降，那么他总统任职期间举行公民投票的决定将会是失策的。不过他也敏锐地察觉到法国中产阶级厌倦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厌倦了与其朝夕相伴的、不断恶化的社会条件。一般“头脑正常的”法国人都渴望回归政治常态——那恰恰是戴高乐承诺提供的。

政府与主要工会协商签署的格勒纳勒协议 (The Grenelle Accords) 使最低工资增长 35%、工资增长 10%，使社会保障金降低、每周工作时间减少 1 小时。5 月，法国共产党始终提心吊胆，担心被众多小派别从左翼包抄：无政府主义者、毛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格勒纳勒协议取得了减少工人阶级战斗性的预期效果，这是按照共产党人和戴高乐主义者双方的政治优势达成的结果。正如一名评论家曾恰当指出的那样：“共产党完全是戴高乐主义的，专心于‘秩序’、权威、自上而下传达命令，专心于个人崇拜，致力于引导大众愿望变成令人满意的‘协议’。”¹

对戴高乐主义者来说，六月议会选举引起了一次令人震惊的胜利，联合起来的左派（左派、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联盟）失去 100 多个席位。中间偏右的政党反而获得了近 100 个席位。正如一位历史学家

1 Caute, *Year of the Barricades*, 250.

所说的那样，“1968 年 6 月的选举到处充满了恐惧”¹。法国选民受够了政治试验，渴望恢复稳定。也许“无聊”也没那么糟糕。选民信心高涨，政府动用军队强力驱逐罢工者离开他们在大巴黎区占领的工厂。7 月，戴高乐惩罚了整个冲突中持温和节制立场的蓬皮杜，向他下发了免职书。蓬皮杜被平庸的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 (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 取代了。在顾夫·德姆维尔领导政府的情境下，至少将军不会冒相形见绌的风险。

戴高乐将 1968 年的六月选举的结果解释为一张委任状，类似于他 10 年前，也就是 1958 年 12 月接受的委任状，然而他极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戴高乐选举的胜利只不过是一个使法国回归停滞状态 (holding pattern) 的政治权宜之计，潜藏于“五月造反”的深层结构问题没有被解决。戴高乐被自信冲昏了头脑，他于 1969 年 3 月宣布新一轮的公民投票，这次他的提议被粗暴地、迅速地驳回了。4 月，将军离开巴黎，回到科隆贝双教堂村——这一次是永远归隐了。

解释的冲突

“五月造反”让时事评论员和知识分子完全放松了警惕。几周内，一个职业作者与业余作者组成的小圈子试图回顾关键性事件，破解它们的意义。作坊式工业 (cottage industry) 蓬勃发展，可以最好地解

1 Berstein, *Republic of de Gaulle*, 224.

释这次造反。许多同代人的描述（或者由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写成，或者由反思的目击者写成）保留了他们的活力和洞察力。¹

让-皮埃尔·勒高夫恰当地将五月遗产描述为“一份不可能的遗产”²。伴随着促使戴高乐重返政坛的第四共和国的突然崩溃，“五月造反”仍旧是战后时代关键性的政治事件。相应地，卷入解释“五月事件”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赌注是激烈的。争论的焦点是第五共和国各种政治化身（戴高乐主义者、中间偏右派、社会党等等）的合法性问题。

在“五月风暴”的保守性解释方面，雷蒙·阿隆是最好代表。当时，阿隆为中间偏右的《费加罗报》撰写了一系列时事评论文章。一方面，阿隆清醒地承认法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例如大学）亟需改革；另一方面，他像戴高乐一样痛恨“五月起义”有倾向性的无政府主义。在一篇令人想起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著作《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的批评中，阿隆谴责了这场基于抽象的乌托邦思想之传播的造反运动，而这些乌托邦思想源自于左岸“主人思想家们”的写作：阿尔都塞、拉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萨特。因此，在阿隆看来，“五月造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背叛”[暗示了朱利安·邦达（Julien Benda）1927年出版的

1 除了已经引用的 Cohn-Bendit、Seale 与 McConnville、Touraine 的著作外，Aron (*May '68: The Elusive Revolution*), Cornelius Castoriadis, Claude Lefort, and Edgar Morin (*La brèche*) 等人的研究也属于这一范畴。关于这一问题的精彩概述，参见 Weber, *Vingt ans après*。

2 参见 Le Goff, *Mai 68*。

经典著作《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 的经典案例。¹左翼教授群体在摒弃了一切职业特征后介入考虑欠妥的、厚颜无耻的政治党派性行为。在一条经常被引用的评论中，阿隆将这场造反描述为一场“心理剧”，暗示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在心理上是失调的。他们挣扎于“左翼情绪论”(left-wing emotionalism) 的痛苦之中，就其本身而言也需要治疗。

关于“五月造反”最深刻的左翼分析，也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写成的，是埃德加·莫兰、克劳德·勒福尔和让-马克·库德海(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蒂斯的笔名)共同撰写的《突破口》(*La Brèche*)。²在他们看来，“五月起义”是对社会专家治国理论的具体反驳，这种理论声称革命不可能发生在现代世界。“五月运动”证明了发达工业社会容易受到社会争论的新型民主逻辑的攻击。从各位作者的观点看，“五月风暴”就学生和学生而言构成了一个突破点，只要他们不再信任政党、工会等政治代表的传统形式，他们自己就会自发地组织成自主的、平等主义的集体——“苏维埃”或“委员会”。在他们眼中，工人自治的精神代表了一种对社会主义专制道路的左翼选择，此前这种社会主义专制道路在历史上始终是主导的。也许作者们希望“五月风暴”是新型的自由社会主义的开端，这种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先例曾是巴黎公社、喀琅施塔得起义、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1939年)的无政府主义集体和匈牙利起义(1956年)。

1 Benda, *Trahison des clercs*.

2 Morin, Lefort, and Coudray, *la Brèche*.

20世纪70年代，随着“五月事件”的衰退和法国回归政治常态，一种对这场造反愤世嫉俗的解释在理想幻灭的前左派分子中间获得支持。在这种解释中，“五月风暴”仅仅是一个法国持续地转向社会现代化的中继站。如前所述，20世纪60年代法国组织生活仍然受制于准封建的传统主义。通过挑战等级制度，“五月运动”一般被认为是更有利于快速转向一种更加精简的、有效率的组织文化。“五月造反”似是而非的最终结果是通过消除返祖性的文化阻碍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关于“五月风暴”的修正主义观点无疑接受了托克维尔的观点，认为这些事件从长期的社会政治趋势看不是不连续的，而只是进一步走向具有社会平衡能力的民主化。

105

这种对“五月运动”愤世嫉俗的批评也哀叹“新个人主义”的兴起，“五月事件”的诋毁者将“新人文主义”视为一种全面消费社会的表达¹，声称“五月暴动”始终是一个错误的开端。通过强调文化造反和身份政治的逻辑，“五月运动”只不过为一个扩大的、空虚而短暂的“生活方式选择”的领域铺平了道路。个体不再受制于社会阶级预先确定的身份，他们可以在文化虚假选择的新范围中间进行自由选择。从这一视角看，自由社会主义的理想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事后回想而已，反而“自恋文化”（culture of narcissism）全力以赴地到来了。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众所周知地描述了与民主政治文化的胜利同时到来的“道德软化”（softening of morals）。在《空虚的时

1 Ferry and Renaut, 68-86.

代》(*Era of the Void*) 以及其他著作中, 吉尔·利波维茨基 (Gilles Lipovetsky), 托克维尔思想的当代继承者之一, 描述了后五月时代的相似性, 兹述如下:

“五月风暴”是一场“软”革命, 没有死亡、背叛者、正统观念或清洗异己行动。的确, 它显示了社会习俗的逐渐软化过程, 这与托克维尔在以个人主义的、民主的时代为特征的人际关系中首先观察到的软化过程是一样的……五月精神重新捕获了历史上曾是消费社会核心原则的内容——享乐主义。通过强调放纵、幽默和娱乐, 五月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其在政治中所谴责的唯一事物塑造了……消费时代的欣快感 (euphoria)。¹

106

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两极相同” (les extrêmes se touchent), 好像有关“五月事件”政治遗产的左翼与保守派的痛斥之声通力合作一样。对于像雷吉·德布雷 (Régis Debray) 这样的前左派分子来说, 五月后革命目标就被放弃了, 以支持零碎的社会渐进性变革, 这

1 Gilles Lipovetsky, “May '68, or The Rise of Transpolitical Individualism,” quoted in *New French Thought*, ed. Mark Lill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14–15, 216. 当然, 政治家也经常提出他们的观点。2002年, 法国财政部长 Nicolas Sarkozy 就“五月风暴”提出了这样轻蔑性的解释: “时光倒流, 让我们回到这样一个时代里, 当时一切价值都失去意义, 只有权利, 却没有责任, 人们互不尊重, ‘禁止禁令’。”引自“Faut-il rompre avec l'esprit de 1968?” *Le Monde*, May 19, 2002.

一事实意味着这场造反的结果按照定义来说是退步的，但是德布雷的视角在纯粹革命主义与全盘守旧主义之间提供了一个错误选择。此时，昔日阿尔都塞学生的马克思主义超我的强烈痕迹正呈现出来。¹ 同样，利波维茨基、吕克·费里（Luc Ferry）和马塞尔·戈歇（Marcel Gauchet）等保守派共和主义思想家深受托克维尔的影响，他们假设个人主义的兴起意味着法国政治文化屈从于英美政治文化的离心式衰弱：自由主义、占有性个人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共和主义的信念反而严厉斥责了各种鼓吹共产社会的排他主义，它也鄙视各种调解团体或机构，反而要求个人为了祖国的更大利益而牺牲自己。因此，从新共和主义视角看，个人主义的兴起和早期共和主义共识的破产意味着法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坚定拒绝英美自由主义）成为后五月时代的主要原因之一。

无论是左翼批评者还是共和主义批评者，双方都误解了“五月风暴”的政治特殊性。“五月运动”的独特性在于它向传统的政治斗争形式提出了挑战，不管这些斗争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还是共和主义的。“五月造反”符合一种新的、具有多种价值的政治动力，而这种动力早已超越阶级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式。学生和工人援引了开放性、公开性和直接民主的准则，以便反驳控制社会的新型专家治国

1 参见 Régis Debray, *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The Intellectuals of Modern Franc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德布雷许多深刻的见解被泛泛而谈的、不堪一击的夸张性言辞抵消了：“我们正看到大学团体和更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自行放弃了它自己的组织、选择和再生产的逻辑，并接受媒体运作固有的市场逻辑。”（第46—47页）

论模式。由此，那些卷入五月抗议运动的人对统治的变更形态和当代社会作用的限制性本质具有敏锐的认识。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评论的那样，“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与别人给我们做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在社会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工作不仅仅是活动、生产和职业。它是关系、交流和地位。闲暇不再是退回到自身、家庭或街坊邻居。文化集中地被操控和传播。”¹

“五月风暴”的积极分子认识到“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从车间转移到整个社会关系。²随着消费社会的胜利，曾经神圣的人类亲密关系领域几乎无一幸免。学生激进分子试图纠正和抵消这些发展，因为他们始终意识到，在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放弃全部官僚主义在社会学意义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五月运动”瞄准了非人格化的、官僚主义的和高度形式化的社会化，而这种社会化的运转“不会考虑人”（马克思·韦伯），因此，法国的日常生活被永久地改变了。“五月风暴”的积极分子成功地推翻了一种不假思索地赞美社会等级和专家技能的制度文化，这种文化在“五月造反”之后不再拥有同一的、毫无争议的自明性。对于托克维尔来说，民主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稳定”。它反而指出了一条政治路径，这一路径规定权威必须按照逻辑推理的方式证明自下而上的形式是合法的，而非默默被接受。

1 Touraine, *May Movement*, 59.

2 *Ibid.*, 132.

在这一点上，《突破口》的作者们根据个体和集体的自治的新逻辑来理解“五月事件”，他们的分析与实际情况出入不大¹，因为“五月造反”试图重新校准发达工业社会中社会化的基本动力。它体现了一种尝试，试图将社会权力的场所远离“异化的体制”，转向联合个体的控制。在后五月时期，这些个体在各种社会运动中重组了自身：女权主义、生态学、工人自治、公民主动权、囚犯权利和同性恋权利。正是在这一点上，阿兰·图海纳根据“行动者归来”理论恰当地描述了后五月时期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或新共和主义的观点使这些发展概念化将会曲解它们的范围与意义。

108

1 Castoriadis, *Philosophy, Politics, Autonomy*.

2 Touraine, *Return of the Actor*.

第4章

谁是毛主义者？

109

我们混淆了一切：政治委员哲学家的机枪、慷慨大方的无政府主义娼妓、狡诈的黑格尔哲学概念、西班牙内战、《人的境遇》(安德烈·马尔罗的小说)主人公清(Kyo)……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和列宁、(保尔·)尼赞和(路易·)阿拉贡、抵抗运动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总之，我变成一名共产党员，因为我相信这是像小说一样生活的必由之路。

——让-保罗·道雷，前毛主义者

“一场没有枪声的内战”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年轻的红卫兵小将们批斗中国共产党的坚定分子和被怀疑具有资产阶级习惯

的城市居民。¹对于大部分外部世界而言，“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一次高尚的尝试，试图重新激起中国共产主义衰退的革命热情。由此，中国也许能够逃避那种折磨苏联和东欧同盟的官僚主义僵化。

然而，如今我们知道毛泽东当时正迅速失去对权力的控制，他作为领导人的可信度因“大跃进”的溃败而大大受损：损失惨重的农业现代化计划导致1958年到1961年有许多人毫无意义地死于饥荒。此外，毛泽东年事已高，他当时满73岁了。他在党内领导层中的竞争对手正逐步将他推到一边。为了强调他的青春活力，毛泽东于1966年7月畅游长江，并被广泛地宣传报道，由此他试图让怀疑者相信革命的命运与他作为英雄和领导人的个人地位永不可分。

110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对那些被怀疑不能够胜任革命的人来说充满了迫害和虐待，包括“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主义者”（Khrushchevites）和“资产阶级走资派”（bourgeois roaders）。毛泽东教导红卫兵：“不要怕引起麻烦。你们引起的麻烦越多，你们造成的好局面维持得越久。混乱和麻烦总是值得注意的……引起麻烦就是革命。”²这种“教导”或“通知”证明是造成群众混乱的秘诀。同时，“文化大革命”意味着向党内假定存在的“右派”倾向宣战。伟大舵手担心共产党面临着产生一个新精英集团的危险，而这个精英集团由沾沾自喜的专家治国论者构成。他在1965年警告党的领导层：“坐沙

1 引自“Les illusions fécondes de Jean-Paul Dollé,” *Le Monde Dimanche*, October 2, 1983。

2 参见 Mao, *Mao Papers*, 26-29。

发，吹电风扇的生活不行。”¹

近年来，毛泽东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苏联政治方面的发展：赫鲁晓夫在 1956 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讲话中公开指责“斯大林时代的罪行”，以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于 1964 年 10 月突然被政治局免职。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公开立基于斯大林主义的专制模式。从毛泽东的优势地位看，赫鲁晓夫于 1956 年对斯大林“个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的攻击太露骨了，毛泽东将去斯大林化视为一次威胁全世界共产主义成功的、可耻的意识形态退步。

111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突击队红卫兵由中学生和大学生组成，“文化大革命”给他们发了红袖章，允许他们搞破坏，不会受惩罚。如同许多大字报所宣称的那样，他们的座右铭是：“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² 他们的确这么做了。

毛泽东一度唐突地要求学校停课，由此放手数百万学生到全国各地执行他的命令，各种妨碍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传统返祖现象都是攻击的对象。学生们“破坏他们居住乡镇的传统建筑物、

1 引自 Wakeman, *History and Will*, 306。

2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104。（参见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载《人民日报》，1966 年 6 月 2 日。——中译注）

庙宇、艺术作品，攻击教师、学校行政人员、党的干部，以及自己的父母”¹。“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害者被迫游街，他们头戴高帽子，脖子上挂着侮辱性标语，在大批怀有敌意的人群面前陈述他们的罪行。其他受害者不得不连续站上几个小时，“后背痛苦地弯着，两只胳膊伸向后方，这被称为‘喷气式’”²。尤其是知识分子经常被批斗、被羞辱，还有许多人在忍受了难以忍受的公开羞辱后自杀。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被强制下放到农村，他们在那里接受繁重劳动的“净化的”影响。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巴黎公社的中国版本。他曾经声称，这将是一场“没有枪声的全面内战”³。其中一个目标是消除阶级调和论（例如有关“和平共处”的修正主义准则）的危险，强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毛泽东词汇中的一个关键词）。作为现代的巴黎公社成员，红卫兵将捣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在一个牢固的意识形态基础上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在这一点上，其中具有讽刺性的一点是，尽管官方称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中国工人阶级只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1968年12月，在放纵的社会混乱似乎无法控制的时刻，毛泽东逆转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下放红卫兵到农村去，以便学习来自农民身上的“无产阶级意识”。如若

112

1 Spenc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575。(译文参见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温怡溢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818页。——中译注)

2 Ibid.

3 Mao Tse-tung, "Vice Chairman Lin's Instruction," *JPRS*(90): 19。

没有一大堆矛盾，毛泽东思想就会毫无价值。

接下来发生的混乱使中国经济发展延缓了15年左右。在1981年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官方历史中，“文化大革命”被描述为是造成“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¹的原因。毛泽东死后流传着一个玩笑，说“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消灭文化。

毛泽东重要理论文本之一是《矛盾论》（1937年），其中毛泽东试图描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对称关系。鉴于辩证唯物主义在传统上赋予经济基础优先地位，毛泽东质疑道，当政治和文化的因素具有优先性时，这是不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去问一个人应该如何回答。“不！”毛泽东断然回答道，因为当承认社会存在（social being）先于意识时，我们必须也承认“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²。

尽管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落后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毛泽东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著作的政治意图之一就是为了提高中国在革命斗争先锋队中的地位。毕竟中国只是最近才开始脱离封建历史的国家。尽管大城市建了工厂，但是中国大多数人口仍然是农民——距离马克思乃至列宁所展望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形还很遥远，尽管俄国有很多的农民，

113

1 *Resolution on CPC History, 1949-198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1), 32. [原文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中译注]

2 Mao, *On Contradiction*, 36-37. [原文见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中译注]

但是列宁总是把领导地位归属于工人阶级。

因此，在—项对第三世界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知识策略中，毛泽东理论著作赋予农民具有与马克思归属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样的潜力。众所周知，马克思主张阶级意识随着人与生产方式的关系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因此，无产阶级被认为处于有特权的革命有利位置。伟大舵手修改马克思（的主张）以适应中国形势，宣称阶级意识不必从如此狭隘的社会学意义上被解释。他主张阶级意识随—个群体意识形态的立场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因为在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农民遭受了残酷压迫，也存在着充分的反抗诱因。毛泽东对上层建筑相对自主性的强调也准许革命领导人员向工人和农民灌输思想，使他们达到其阶级意识可以胜任历史使命的高度，这种强调实质上赞同—种教育的或文化的专政理论。

然而，人们怎样才能精确地确定哪一种矛盾会在特定历史时刻发挥着主导作用？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唯意志论”（voluntarism）开始发挥作用——这种从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到列宁的“唯意志论”体现了一个雅各宾派革命传统的特点。在每个关键时刻，人们需要有见识的革命精英来解决各种矛盾，为真正的阶级意识指认道路。因此，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时而赞美“群众路线”的优点（也就是从“人民”的意向和定位进行领导），时而赞美列宁和罗伯斯庇尔的先锋主义。在—个危机重重的时代里，毛泽东机敏地强调政治领导层的优点。最终，—谈到革命，人民是善意的业余人员，而党的领导干部是有见识的、值得信赖的专业人员。

“1967年将是中国年”

114

1967年是中国年。¹ 巴黎，到处充斥着毛主义流行的符号。毛式领套装，俗称为“毛式领”（les cols Maos），极为流行。不管它们怎么努力，位于巴黎时髦的第十六区的服装店仍不能提供现货。对左岸书商而言则是《毛主席语录》（*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持续脱销。*Lui*，法国版的《花花公子》（*Playboy*），决定追逐亲华潮流，给了八页版面的显著位置来刊登衣着暴露的模特图片，这些模特头戴草帽、佩红五角星，穿着红卫兵服装，附图的说明文字选自“红宝书”。一张引人注目的图片描绘了一位年轻女子赤裸裸地端着一把自动步枪，正从一个巨大的白色蛋糕中脱颖而出。图片文字写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²。

在电影界，让-吕克·戈达尔执导的影片《中国姑娘》，怪诞离奇与政治宣传交替出现，试图理解巴黎当年达到巅峰时期的亲华浪潮，因此这部影片成为一部臭名昭著的影片。此时戈达尔处于电影才华的巅峰时期，当年春天上映了《周末》，出色地描绘了资产阶级的堕落，赢得批评界的一片喝彩。

1 Hamon and Rotman, *Génération* 1:329.

2 Han Suyin, “La Chine aux mille vertus,” *Lui*, June 1967, 36. 我非常感谢 Ron Haas，他在博士论文 *The Death of the Angel* (PhD diss., Rice University, 2006) 中指出了毛主义陶醉的这一方面。

戈达尔在1967年8月《世界报》进行的访谈中描述了他的意图：

为什么要拍《中国姑娘》？因为人们到处谈论着中国。无论是石油问题、住房危机还是教育，总是有中国的范例。中国提出了独特的解决方法……中国革命与众不同之处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象征就是青年（Youth）：不受偏见束缚的道德和科学的追求。人们不赞同一切形式……但是这种史无前例的文化事实要求最低限度的关心、尊重和友谊。¹

115

《中国姑娘》几乎完全是在一个位于巴黎米罗梅尼尔路（rue Miromesnil）15号的私人公寓中拍摄完成的。这种空间隔离方式使这部电影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左倾的《鲁滨逊漂流记》式的船只遇难故事。影片中的青年毛主义者完全摒弃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堕落和诱惑。就其本身而言，这部电影变成了一场实验室试验，或者变成了左翼意识形态可行性的试验场地。

戈达尔起初想检验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各自优点，但是到了他开始拍摄的时候，苏联模式的衰败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令那些具有较为传统的观影期待的观众恼怒的是，《中国姑娘》大部分是由圣茹斯特、列宁，当然还有伟大舵手本人的说教式政治演讲构成。这是戈达尔从布莱希特的说教剧（didactic plays）中吸收的

1 Jean-Luc Godard, interview with Jean Baby, *Le Monde*, August 24, 1967, 10.

一个策略，他故意颠倒电影和戏剧的现实主义的矫揉造作。戈达尔运用这一技巧来使观众困惑不安，或者“间离”观众：剥去影迷最可靠的幻觉。情节、叙事、人物发展——这些都是资产阶级“肯定性的”电影的某些遗迹，戈达尔将其视为意识形态上妥协的产物而草率地抛弃了。通过突出电影经验的建构性本质或虚构性本质，戈达尔希望瓦解影迷通常看电影所具有的自满感，因此他试图使电影彻底摆脱娱乐世界或现代消费主义。

幸亏《中国姑娘》还包含了轻松诙谐的时刻，令人回想起戈达尔开创性的新浪潮电影，如在哲学系青年学生薇洛妮克（Véronique）[由戈达尔的妻子安娜·维亚泽姆斯基（Anne Wiazemsky）饰演]发表宣言的镜头中：“革命就是起义，就是一个阶级借以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至于我，我属于哲学阶级。”在那个时刻，银幕切换到一张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照片。

《中国姑娘》的结尾是薇洛妮克与她现实生活中的南泰尔大学哲学教授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进行了一场冗长而乏味的、关于革命暴力价值的政治争论，让松是一名“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追随者”（Sartrean），他因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民族解放阵线的“行李箱携带者”（porteur de valise，意即“金钱操作者”）而臭名昭著¹。薇洛妮克一度激烈地宣布她想“用炸弹迫使大学关闭”。让松指出，

1 参见 Hamon and Rotman, *Porteurs de valise*。

当他是一名激进分子的时候，他有全体人民支持他的行动，而薇洛尼克及其毛主义同伴们在政治上是孤立的。让松听天由命地总结说：“我认为你正奔向一条绝路。”但是对戈达尔而言，他后来声称他当时更赞同薇洛尼克的观点。¹

《中国姑娘》有助于宣扬毛主义的政治时尚。在短短的几年内，许多名流都追逐毛主义时尚。正如一位观察家冷嘲热讽地说的那样，在左岸知识分子中间，“激进的时尚变成一种道德课税减免的形式”²。除了戈达尔之外的电影导演可能会侥幸成功地把如下的阿尔都塞式的修辞精华纳入到影片之中：“只有政治经济学家团队的差异和决心容许他们克服事态的不确定性，持续革命的观念才是有效的。”³

戈达尔继续制作其他的亲华影片，包括《东风》（*The Wind from the East*, 1969年）和《英国之声》（*British Sound / See You at Mao*, 1971年），在此期间他与同事、导演让-皮埃尔·高兰（Jean-Pierre Gorin）共同建立了吉加·维尔托夫小组（Dziga Vertov group），并与该小组一道作为一名“游击队导演”（guerrilla filmmaker）进行限额制作。1970年，当毛主义日报《人民事业报》被蓬皮杜政府取缔、编辑人员入狱时，戈达尔成为著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他公然挑战禁令，沿着巴黎大街叫卖被禁的《人民事业报》。

如果戈达尔通过拍摄《中国姑娘》来讨好毛主义学生激进分子（这

1 Godard, *Jean-Luc Godard*, 303.

2 Caute, *Year of the Barricades*, 259.

3 Godard, *Made in USA*, 1967.

些人严厉地拒绝在影片中露面)的话,那么他的努力没有达到目标。一副“五月风暴”著名的涂鸦画嘲笑这位瑞士导演是“亲华瑞士人中间最大的傻瓜”(le plus con des suisses pro-Chinois)。

“师范学校”

毛主义的诱惑开始出现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里路易·阿尔都塞的一群学生中间。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是法国知识分子精英的培养基地,那些被录取者获得一份为期四年的生活津贴。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娃、莫里斯·梅洛-庞蒂、雷蒙·阿隆、路易·阿尔都塞和米歇尔·福柯都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¹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中苏关系破裂激起了学生们对毛主义的兴趣。1963 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开挑战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苏联突然从中国召回大约 1400 名技术人员和专家,严重扰乱了中国的工业发展。

法国共产党,在一群顽固不化的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下,变成了意识形态僵化的化身。1956 年,令萨特等同路人沮丧的是,法国共产党竟然毫不犹豫地支持苏联残暴地入侵匈牙利。然而,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法国共产党向莫斯科卑躬屈膝的态度有点让人觉得

1 有关个人材料参见 Henri Bourgin, *L'Ecole normale et la politique: De Jean Jaurès à Léon Blum*(Paris: Fayard, 1938)。亦参见 Diane Rubenstein, *What's Left? The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and the Right*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0)。

耻辱，它越来越难在法国自吹自擂的知识分子领袖阶层中间发展新成员。法国共产党反复使用了同样守旧的、“强调工人利益的”(workerist)政治路线，但是它的口号越来越脱离法国职业生活的现实，当时白领工人和服务业工人正在壮大队伍。此外，法国共产党一向对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政治新鲜事充耳不闻：非殖民化，第三世界主义，更别提让学生一代对“文化革命”的痴迷。那么，青年左派分子转而去哪里找到切实可行的、反抗的政治模式呢？

118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许多毛主义者一度试图在法国共产党学生组织共产主义学生联盟(Union des étudiants communistes, 简称UEC), 期间干得很出色。他们秘密策划了一个名为“打入内部”(entrisme)的马基雅维里式方案，试图从内部循着更少教条色彩的路线来改造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想以意大利语来命名，因为在西欧共产党中，意大利共产党显示出脱离莫斯科的最大独立性。但是他们的密谋一旦被揭露，他们就会立刻被以彻底的布尔什维克方式清除掉。1966年，学生毛主义者创办了自己的组织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UJC-ML)。后缀“marxistes-léniniste”是时代的标志，它表明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支持者是真正的革命者，不同于法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者”，这些“修正主义者”似乎更关注选举成功和工会获益，而不会关注武装斗争的优点。

因此，令人好奇的是，当美国“最优秀、最聪明的”哈佛毕业生效力于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进行越南战争时，与他们相应的法国毕业生们，所谓“乌尔姆分子”(Ulmards)(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位于拉丁区中心的乌尔姆路)正计划到中国旅行，他们滔滔不绝地引

用“红宝书”，赞美“阵地战”（war of position）反对资产阶级敌人的优点。¹

与阿尔都塞一起去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

119 最新的政治发展将毛主义者的精神导师路易·阿尔都塞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阿尔都塞是一名虔诚的共产党员，他将斯大林主义尊崇为共产主义运动的辉煌顶峰。他将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时代的罪行”的报告视为一次对正统学说的背离，为软弱乏力的修正主义异端学说大开方便之门。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阿尔都塞就感觉到了新的、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词汇向苏联正统学说表现出的威胁。在东欧，以“具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为幌子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将在 1968 年注定失败的布拉格之春中达到高潮。阿尔都塞恢复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可敬地位的理论努力，（在结构主义的庇护下）直接针对声誉正隆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提出了威胁，法国“马克思人道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法共哲学家罗杰·加洛蒂（Roger Garaudy）和萨特。在阿尔都塞看来，政党路线的软化、为支持衰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哲学立场而从“科学”中的撤离，这意味着冒险抹掉真正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之间存在

1 参见 André Glucksmann, “Strategy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1968,” *New Left Review* 52 (1968)。

的非常重要的差异。¹

在法国共产党内部，异议等于褻渎，是驱逐的理由，因此阿尔都塞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中苏关系破裂后，一个人不可能既是法国共产党正式成员，又是亲华分子，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情况。1967年，当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出版杂志专号来赞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时，阿尔都塞投稿了，但没有署名，以免与共产党的权威发生冲突。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决定忽略他们自己的政治“唯意志论”（他们对“革命意志”的颂扬）与阿尔都塞坚定不移的结构主义（贬低人的作用以支持毋庸置疑的科学原理）之间的张力。正如一位评论者恰当指出的那样，阿尔都塞与左派分子之间的奇特联盟“使得下列行为成为可能：把经常疯狂的政治唯意志论（一种孤注一掷的行动主义）与类似于神秘承诺的无主体过程的概念吊诡地结合起来”²。

高师学生打赌说，他们以自律的“主体”的身份牺牲自己，并与“历史逻辑”融为一体，由此他们将会获得救赎。作为一个额外收益，他们因而将否定他们自己资产阶级出身的污点。在他们通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的激进分子渴望一种确定性的要素，这曾是一种结构主义思想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20

1 参见 Maurice Merleau-Ponty 在 *Signs* 一书中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Maurice Merleau-Ponty, *Signs*, trans. Richard McCleary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2 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1:299。[译文参见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 20 世纪思想主潮》（上卷），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99 页。译文有所改动。——中译注]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能够赋予其他学科和领域的要素。阿尔都塞哲学信条的朴素风格折射出一种毫不妥协的理论严谨的氛围，年轻的高师生们从中感觉到了诱惑力。他们渴望一种绝对，并且阿尔都塞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妄想）之间固定不变的差异提供了这一点。但是，是不是结构主义因其过度聚焦“话语”与“理论”而致使结果明显是“理想主义的”？从此与作为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条件格格不入？高师生们对“能指的物质性”（materiality of the signifier）进行了不太严密的思考，试图合理地解释这种困境。

当时黑格尔主义和现象学——如同 3H [黑格尔 (Hegel)、胡塞尔 (Husserl) 和海德格尔 (Heidegger)] 统治的那样——是法国哲学的前导链 (leading strand)。从知识的立场看，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提供了一种新颖的非学院派方法，这种方法让学生对共和国人道主义迂腐的虔诚观念感到耳目一新。结构主义语言抨击作者的妄想 [不是我们说话 (language)，而是“话说我们”]；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抨击“意识”的范式；对阿尔都塞追随者来说，他们试图“欢欣地埋葬了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好像是一个胜利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逝去时代的可怜残余物”¹。

1 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291. [译文参见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 20 世纪思想主潮》（上卷），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89 页。译文有所改动。——中译注]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关于列维-斯特劳斯的趣闻：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完演讲后，他的陪同人员到餐馆订餐，餐馆老板俏皮地问：“牛仔裤制造商还是人类学家？”

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状态是一个自闭合的、自生的概念体系。马克思的理论文献包含着绝对真理——只要人们知道如何阅读它，知道在找什么。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一致性，阿尔都塞试图保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纯洁性，不管这种理论在现实中会如何糟糕地进行到底。斯大林也许犯下了滔天罪行，苏联可能是堕落工人的国家；不过马克思主义原初的理论真理依然未受伤害。但是，当马克思主义被当作真实历史来解释时，使马克思主义不朽为一具原初的先天真理之躯体，会有什么意义呢？

121

事后看来，指向阿尔都塞的“科学主义”似乎潜藏着对斯大林主义的一种怀旧之情：一种对随机的观点和视角根深蒂固的排斥。在许多方面，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做的工作就是日丹诺夫（Zhdanov）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对艺术领域所做的工作。20世纪30年代，阿尔都塞属于一名激进的天主教组织“天主教行动会”（Action Catholique）成员。评论家们推测，阿尔都塞“二战”后对绝对真理的炽热追求从教堂转移到共产党。阿尔都塞到了晚年打算与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一起游说罗马教廷支持秘密听众，这难道只是巧合吗？¹

法国共产党以轻蔑的态度看待结构主义，因为结构主义鄙视历史，支持不受时间影响的“结构体”（construct）。马克思主义引以为荣的是它的历史理论，因为这种历史理论预言了资本主义的衰落和无产阶

1 根据熟知这段经历的原始资料看，阿尔都塞的请求获得许可。不过几周后，他掐死了妻子伊莱娜，计划立即被放弃了。

级的必然胜利。不过，因为当时结构主义空前流行，法国主导性思想家罗兰·巴特、布罗代尔、福柯、拉康和列维-斯特劳斯都是结构主义者，所以共产党容忍阿尔都塞的理论观点，认为是一种非常需要的知识分子威望的来源。阿尔都塞复兴了马克思的理论，这一努力也许抵消了共产主义遭遇 1956 年匈牙利溃败后在法国知识分子眼中的污点。

阿尔都塞支持中国共产主义的方向。在他看来，中国领导者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展示了一种革命活力，而这种革命活力在其衰老的东欧同路人中间销声匿迹好长时间了。吊诡的是，阿尔都塞赞赏中国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领导者们仍是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赫鲁晓夫主义以其调和的“和平共处”论调向各种各样的政治懈怠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因此，阿尔都塞早期的一些文本谨慎地提及了中国的发展。

122

阿尔都塞 1962 年的论文《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Contradiction and Overdetermination*）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¹ 尽管毛泽东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文章中，但是这篇论文对伟大舵手的专题演讲《矛盾论》进行了广泛的评论。因为直接引用毛泽东的文章有可能成为被直接开除的理由，所以阿尔都塞援引了恩格斯 1890 年的一封信作为替代品，这封信声称经济的“基础”尽管是必不可少的，但远非是完全决定性的，由此允许文化政治发展的准自主性。阿尔都塞肯定察觉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凝结为一种不可动摇的经济决定论。毛泽东论

1 Althusser, "Contradiction and Overdetermination," in *For Marx*.

文的价值就在于它承认了“基础”和“上层建筑”不一定总处于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之中，反而它们经常处于相互矛盾之中。在寻求这种策略的过程中，阿尔都塞试图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以便它能够介入新的文化与知识的挑战。

阿尔都塞的学生反而在没有这种禁令的条件下采取行动，他们对革命中国的巨大兴趣是热诚的、无条件的，但是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读汉语，关于当代中国的可靠信息是极度匮乏的。从1965年[阿尔都塞的奇异之年，当时《保卫马克思》(*For Marx*)和《阅读〈资本论〉》(*Reading Capital*)都出版了]起，学生们开始在自行出版的《马列主义笔记》(*Cahiers marxistes-léninistes*)中宣扬激进的政治观点，编辑者是罗贝尔·兰哈尔、雅克-阿兰·米勒和雅克·朗西埃。1967年，认识论学者多米尼克·勒库尔(Dominique Lecourt)接任主编。学生积极分子开始认为他们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为期四年的生活津贴是容许他们全职搞斗争的补助金。

法国毛主义实施了一种脱离现实原则的危险排除行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对学生狂热的革命幻想而言变成了一种投射(一种罗夏测试)。在苏联社会主义基本上失去信任的条件下，革命的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古巴等)进行的其他第三世界试验似乎表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紊乱进行左翼抉择唯一剩下的、最美好的期望，这些紊乱是：拥挤的城市、城市衰退、贫民区暴动(至少在美国是这种情形)、工业造成的凄凉景象和严重污染。

回顾过去，罗兰·卡斯特罗，一位主导性的毛主义激进分子，解释了学生迷恋毛主义的根据，兹述如下：

我们从中国接到的第一条消息：革命内部闹革命（revolution within the revolution）。我们接到的第二条消息（但是这次只有我们当中的几个人接到了这条信息）：文明的革命（r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我们接到的第三条消息是：七亿中国人民不是一个“集体农庄”（kibbutz）；它不是一个傅立叶空想的法伦斯泰尔公社（phalanstery）；它不是一个分裂的群体。它是世界的四分之一，是一个位于世界中心的帝国，是一个位于它将要使之向内聚爆的世界的中心的帝国。我们能够听见内爆声。¹

“革命内部闹革命”意味着，毛主义强调文化主题和意识形态主题的优先地位有利地拓展了革命斗争的范围。革命话语不再被东欧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心态所控制。“文明的革命”意味着激进政治不再属于社会工程的问题，如列宁曾臭名昭著地将“社会主义”定义为“苏维埃加电气化”。它反而预示了日常生活的质变，因此，“五月风暴”流行的口号借用了兰波的诗句：“改变生活！”（Changer la vie！）“七亿中国人民不是一个‘集体农庄’”意味着“文化大革命”不能被贬低为附带现象或暂时现象。利害攸关的就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些事件仅仅预示了人类政治自组织能力的完全转变。

1 Castro, 1989.

革命旅游

1967年8月,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领导人员罗贝尔·兰哈尔、雅克·布鲁瓦耶勒(Jacques Broyelle)、克里斯蒂安·里斯(Christian Riss)和让-皮埃尔·勒·当泰克到中国进行了一次人生转折的朝圣之旅。他们一回国就在《红卫兵》中称赞中国第一次氢弹爆炸声是“一次毛泽东思想永垂不朽的胜利”¹。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正处于大规模政治清洗“文化大革命”的阵痛之中,兰哈尔就决定他的团体应该加以效仿,清除“小资产阶级的唯智论”(petty bourgeois intellectualism)的最后残余。就在这个时候,毛主义者以古老的俄狄浦斯情结转而反对阿尔都塞,因为阿尔都塞曾屡次拒绝放弃共产党籍,并拒绝与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通力合作。

124

那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朝圣的亲华派积极分子参加了“革命旅游”(revolutionary tourism)的盲目行动,他们参观了预先炮制好的波特金村庄(Potemkin villages),始终有党指派的“操纵者”陪同着。他们返回法国,出版了辞藻华丽的、赞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优越性的回忆录。²正如意大利共产党员作家玛丽娅-安托尼耶塔·马齐奥奇

1 Bourseiller, *Maoïstes*, 81。有关精彩的概述参见 Julian Bourg, “The Red Guards of Paris: French Student Maoism of the 1960s,”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4 (31)(2005): 472-490。

2 例如有影响力的解释,参见 Claudie Broyelle, *La moitié du ciel* (Paris: Denoël-Gonthier, 1973)。

(Maria-Antonietta Macciocchi) 在旅行回忆录《论中国》中所热情赞美的那样：

(这里的) 人民正迈着轻快的步伐热情地奔向未来。这个民族可能是世界新文明的化身。中国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历史跳跃……毛泽东基本上是反教条主义的、反专制主义的。他重视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优先于(生产)设备，他坚持平等原则，重申党不能取代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必须解放自己。¹

当代中国政治的复杂状况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的错觉得以维持。因此，对于毛主义高师生们的一切造反来说，他们只是重复了前一代左派分子的错误，20 世纪 30 年代，这些左派分子曾在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和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等著名文学家领导下不加鉴别地为斯大林主义俄国唱赞歌。²

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参观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雅克·布鲁瓦耶勒，一名共产主义联盟(马列)领导者，又返回中国对质中国共产党指派的陪同监督人员。“你只是带我们参观中国共产主义的积极方面。”布鲁瓦耶勒抱怨道。“我们向你们展示了你们想看到的东西。”中国陪同人员反驳道。

1 Macciocchi, *De la Chine*, 466; 亦参见 Moravi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2 参见 Hourmant, *Au pays de l'avenir radieux*。值得赞扬的是，Gide 在 *Retour de l'URSS* 中提出了质疑之声。

学生的毛主义陶醉证明了法国文化生活一个不朽的修辞“东方主义”(Orientalism)——其理念是注入非西方国度的“原始的”能量将补偿欧洲的衰落,给衰落的宗主国法国注入新活力。欧仁·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关于东方衰落的潦草描绘、安德烈·马尔罗在《人的境遇》中抒发的革命浪漫主义(以20世纪20年代后期发生的中国内战的早期阶段为背景)和保罗·尼赞的青春自传《亚丁,阿拉伯》(*Aden, Arabie*),这一切都符合这一模式。与前辈们不一致的是,学生激进分子因宗主国法国的文化狭隘性而苦恼,他们在戴高乐11年专横统治下感到政治上无家可归,他们找到一种可供选择的政治现实光年(political reality light-years),这种差距可以排除他们感到深陷其中的、单调乏味的历史现在时。

似乎是学生们拥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信息越少,中国地理和文化离欧洲越远,他们就有更大的灵活性来投射他们特有的乌托邦希望与梦想。尽管如此,他们亲华世界观的重要方面仍然以现实为基础。他们尊敬毛泽东是一位20世纪革命传统中的巨人,认为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造性阐释者,一个既是积极分子又是理论家的重要人物。他对阶级斗争的阐释包含了农民阶级,这是一个对亚洲和南美洲的第三世界主义而言都是最重要的创新。然而,伟大舵手的传奇故事——一个经历了无数军事挫折和政治挫折仍然坚持不懈,直到他最终成功地驱逐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逃离大陆的人物——是一个令全世界革命浪漫主义者着迷的故事。

除了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外,毛泽东还是一名知识分子——在左岸社交圈的常客中间,这是一种无法估量的威望源泉。除

了气宇恢宏的理论著作外，他还写诗！毛泽东发动一场文化的革命，这一事实在巴黎文人中间极具影响力，这就解释了中国共产主义与单调乏味的、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苏联共产主义相比所具有的创新品质。在高师学生们及其支持者中间，中国学生被号召扮演革命先锋队，这似乎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因此，从法国人的视角看，“文化大革命”似乎触动了所有人的心弦。

自从开始以来，“文化大革命”就引发了全世界对中国事业的支持和赞赏，而不仅仅在左派分子中间。汉学家、外交人员和全世界的业余中国观察家都相信革命的中国代表了一条现代性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避免西方的可耻暴行和失策的道路。1972 年，哈佛大学汉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写道：“人们看起来是健康的、吃得饱饱的，他们清楚地表达了他们作为毛主席缔造的新中国的公民角色……乡村的变化是令人惊奇的……总而言之，毛泽东的革命是几个世纪中发生在中国人民身上最好的事情。”¹

20 世纪 60 年代，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深层觉醒占据着优势地位，达成的共识是西方现代性彻底出问题了。美国大城市（芝加哥、底特律和洛杉矶）的贫民区时不时地毁于熊熊燃烧的激情之中。无政府主义者和学生革命分子以暴力抗议的形式令欧洲各国首都惊魂不定。在德国和意大利，恐怖分子的基层组织造成一种“受困心态”（siege mentality）。对于大多数观察家来说，中国成为西方丧失自信的受益者。

1 John K. Fairbank, "The New China and the American Connection,"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72): 31, 36;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在毛泽东的亲切指导下，中国学会了如何驾驭大众的力量，它寻求一条显然是更具人性的工业化道路。新中国看起来为每个人都提供了可做之事：“对于清教徒而言，这是一个勤劳的、朴素的、高效的现代化国家；对于文化权威来说，这是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延续；对受挫的左派分子来说，这是一个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好名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体；尤其重要的是，对大多数参观者来说，这是一个神秘、美丽、坚定和有序的国度，这曾是一个需要权力和尊严的受害国。”¹当西方应付没完没了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冲突时，革命的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似乎体现了令人精神振作的坚定团结，不承认7亿中国人旺盛的政治热情是很难的。

127

像许多左派分子一样，毛主义学生激进分子自称是宗派主义者。由于他们脱离法国主流社会，所以他们的政治狂热就为他们的人生提供了毅力与意义。从社会心理学的立场看，毛主义允许一批有天赋的法国青年队伍在一个动荡的、令人困惑的时代中去解决身份构成问题。参与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的关系（稍后与其继承者“无产阶级左翼”的关系）为学生积极分子提供了一种基本的信条或世界观，在献身于他们选择的政治事业的过程中，毛主义者们显示出虔诚信徒一般的热情。此外，资产阶级的自我憎恨在他们亲华世界观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完全介入的道德观保护追随者免除社会原子化的危险。在顽固的

1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287.

激进分子中间，毛主义变成马克斯·韦伯所称的“入世救赎”（inner-worldly salvation）的工具。作为信徒，积极分子被“拯救”或“救赎”。雅克·布鲁瓦耶勒回顾往事时承认：“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微型社会，尽管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差异：我们没有权力操纵社会主义国家中决定人们生活的物质参数。再者，这是一种我们自愿赞同的奴役。”¹

128 学生毛主义者抓住了他们觉得与他们的目标一致的中国共产主义理论。毛泽东的唯意志论（他相信革命没有取决于客观条件而是取决于英勇的意志行为）非常适合他们特有的、青年人的造反言行。² 由于他们相信自发性，毛主义者在法国共产党支持者中间被嘲弄为“毛派舒帮分子”（les Maos-Spontex），Spontex 也恰巧是一种广泛宣传的、快速清洁的海绵。毛泽东也被视为一位真正的“民粹主义者”，他首先将人民的利益牢记心中。他的政治著作洋溢着对“群众”的赞美之情，在他看来，“群众”拥有与生俱来的革命潜力，这种潜力正等着被政治上启蒙的干部队伍开发。最后，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permanent revolution）的观念也在巴黎左岸的常客中间产生了共鸣，这一观念保证中国共产主义不同于苏联共产主义，将不会屈从“修正主义”的异端学说。

1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337.

2 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Search for Modern China*, 546）指出：“毛的激进思想一想建立在人类意志与群众力量自发的、英雄式的实践之上，早在四十年前的著作中，毛曾盛赞这种实践精神。”（译文参见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温怡溢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79 页。——中译注）

就其自身而言，法国共产党在地域上是保守的，它在第五共和国政党制度中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致它不太情愿去破坏良好的现状。法国共产党以不理解和傲慢态度来迎接五月学生造反，将学生激进分子贬为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们的“阶级性”意味着他们本质上不能胜任革命目标。假如学生造反缺乏可以辨认的无产阶级成分，那么为什么还要费心支持它，共产党人推论道。

工作台的传奇故事

毛主义者的政治路线是与“车间”（*établissement* 字面意义是“车间”）的传奇故事分不开的。如前所述，毛泽东认为群众是政治可靠性的检验标准。在各种场合下，他都教导党员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作为一种提高政治意识的方法。他在1957年的讲话中宣布：“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¹

129

学生毛主义者将这条建议牢记心中。在践行毛泽东口号“下马看花”的过程中，他们下到外省艰苦的工厂工作。他们在那里融入无产阶级中间，始终竭力将工人的关注点引离工会的要求（加薪与改善的

1 引自 Dressen, *De l'amphi à l'établi*, 7。[原文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8页。——中译注]

工作条件)，转向政治斗争的目标。这种处境使学生积极分子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他们为了在工友中间赢得认可，不得不隐瞒他们是特权阶级儿女与高师学生的背景。

在毛主义者中间，在外省工厂中“确立”自身变成一个必经阶段、一种兼作检验革命勇气的政治自我牺牲的行为。在鼎盛时期，大约有两三千名学生参加了工作台（*établi*）运动，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毛主义者。工作台现象是一种左派分子借以剥去资产阶级出身与证明他们的无产阶级真诚的工具。毛主义者为他们献身于与“理论”相对的“实践”而感到自豪，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因为作为高师学生，他们代表了法国知识分子精英。此外，重点强调与大众的亲近性必然伴有一个显著的反知识的维度。共产主义青年同盟（马列）领导人罗贝尔·兰哈尔解释说，在他那段工作台的岁月里，他曾连着两年没打开过任何一本书。

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前毛主义者，包括兰哈尔，撰写了披露真相的回忆录，叙述了他们工作台期间的经验。工作条件经常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因为他们大多数出身于特权家庭，所以他们当中许多人在他们的整个生活中从没有做过一天体力劳动。因此，他们经常很难完成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一个青年毛主义者叙述了她是如何在生产镀铜的工厂中工作的。到下午三点左右，她的双手流血了。工头有礼貌地建议她去找另外的工作。她含着泪离开了工厂。¹另一部回忆录极富洞

1 Bourseiller, *Maoïstes*, 84.

察力地描绘了一个外省汽车厂中令人心烦意乱的、西西弗斯式的、单调而乏味的工作：

汽车一旦被装上装配线，它就开始了半圆式旋转，穿过每个连续位置进行焊接或者另外的补充性操作，如锉磨、研磨、捶打……敲几下，火星闪烁，然后焊接完成，汽车已经离开这个位置三四码远。下一辆汽车已经进入工作区。工人又开始了工作。有时如果他工作快，他会有片刻休息时间，等待着下一辆车的到来；或者他利用这个时间歇息片刻，要不他就加倍努力、“冲向前线”，以便他能赢得一点点儿时间，换言之，他工作向前推进一步，出了他的正常工作区，连同带动了他前面位置的工人。两三个小时后，他就积累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两三分钟的时间资本供其利用，他将用来抽一根烟……短暂的快乐：下一辆车已来了。这次他不得不在他通常的位置上继续工作，竞赛又开始了，希望赢得一两码，并在另一段安静的吸烟时光的渴望中“向前移动”……

通过这条阴沉的、滑动的装配线中的间隔，我瞥见了一场消耗的战斗：死亡对抗生命、生命对抗死亡。死亡：陷于这条装配线，静静滑动的汽车、重复的同一姿势、永不终止的工作。如果一辆车完成了，下一辆车还没来，不过它已等在那儿了，在刚刚完成的准确地点被拆焊，在大致精确的地点刚刚被抛光……每个人都极度体验着装配线侵略性的耗

损：城市工人和农民、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移民和法国人（原文如此）。一个新招聘的工人工作一天后就辞职，这不是稀奇的事情，他被乌七八糟的东西逼疯了：噪音，火花，非人的速度压力，永远重复性工作的刺耳声，老板的专制主义和指令的严厉性，沉闷的、使车间非常冷漠的监狱般气氛。¹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激进分子被认为是小派别，这是一种法国共产党官员杜撰的一个侮辱性词汇，用以嘲讽毛主义者缺乏支持者。究竟谁阅读了那些发表在《马列主义笔记》上的晦涩难懂的文章？马列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员一度游说北京方面予以官方认可，不过被委婉地回绝了。学生革命分子的人数（1967年大约有 35 名激进分子）太少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主义者在全法中学和大学、基层越南委员会中间发动了一场全国反对越战的示威游行，亲华积极分子的数量立刻激增到两千人。

在践行另一条毛泽东格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过程中，毛主义者也实施了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以便于他们熟悉这个阶级的习惯和心态，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义问答，这个阶

1 Robert Linhart, *The Assembly Line*, trans. Margaret Crosland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1), 15, 17, 26.

级代表了人类的未来。¹下面就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积极分子和与其共事的激进分子一起到法国东部孚日（Vosges）地区进行调查的证据。对他盲目的意识形态虔诚的描述与他像工作台一样面对的困难抉择都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

我于1967年加入了共产主义联盟（马列）。当时人们觉得，如果一个人想理解工人阶级的现实，那么他不得不直接去那里，投身于……毛主席曾经说过：“假如一个人与工人阶级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他就不能理解工人阶级。”我没有决定住在工厂里进行理论研究，这是我与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的同志们所做的集体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1967年），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研究毛主席的著作，他不断地说一个人的思考必须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大多数人”是指人民。一个人如若没有理解人民的想法，那么他就不能思考革命。因此，那个夏天我们启动了关于农村生活的调查，我们去了农村，生活在农民中间，我们称之为**农村调查（Investigations**

132

1 关于毛泽东对这个观点及其重要性的解释，参见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230。

[原文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中译注]

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发言权的。

in the Countryside)。

那年夏天结束时，我们决定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应该留下来继续调查。我愿意留下来。我想这样可以满足我接近工人的需要，因此我把这项工作视为在一所训练建筑工人和泥瓦匠的学校中做学徒。月末，我意识到我没有理解这个地区工人生活的实际情况……除非我进入工厂工作。只要我高兴地坐在咖啡厅里或者站在工厂门口，我就一无所获。我不得不走进工厂，与工人们打成一片。

我呆了六个月，太艰苦了！我不知道如何管理工作。我读了毛主席的书，但也就这些了……严冬到来了，我不得不逃离那个地方！¹

迷失的错觉

最终证明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意识形态的不灵活性是它溃败的原因。随着 1968 年的逝去，激进分子对毛主义理论的卑躬屈膝致使他们误解了“五月造反”的本质和范围。他们变成他们自己的政治教条主义的囚徒。

由于“五月起义”最初是一场学生反抗，而且由于学生主要是资

1 Manceaux, *Maos en France*, 54-56.

产阶级，所以毛主义者将这场造反贬低为在政治上是缺乏时代性的。这场造反不符合他们的政治阶级的狭隘理想。他们没有理解将像中国这样一个乡村的、半封建的发展中国家所构想出来的政治斗争模式转移到像法国这样的超现代社会是徒劳无功的。

不同于中国，法国几乎不是一个农民社会。大量的研究证明，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人的职业生活是高度分层的。因此，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上的预设几乎没有什么相似性：一边是大量的贫困无产者，另一边是少量的富有资产者。法国工人阶级尽管遭受了压迫，但他们远非是贫困的。此外，它的人数急剧萎缩，一个新的工薪阶级正在崛起，他们大部分集中在第三部门或服务部门。

“五月起义”的目标不是按照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去夺取政治权力，而是使政府、教育和车间中的决策过程民主化。大体上讲，它对准了法国管理精英的专制支配权。学生抗议者与其说聚焦于阶级政治的传统问题，倒不如说他们对准了有关“日常生活政治”的性质议题：消费社会的兴起、现代化的加速进程与法国大学的破落条件。

在前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斗争的条件被重新定义了。“情境主义国际”等左翼小派别直接讨论了这些问题。但是，既然这些问题和关注没有一个在“红宝书”中被论述过，那么它们对于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的智囊团来说仍然是无关紧要的。用皮埃尔·维克多的话来说：“我们对学生运动极其不信任。我们具有非常、非常狭隘的无产阶级视角。我们认为：假如学生不走进工厂大门，那么他们就

没有未来；他们的未来将是资产阶级的。”¹ 毛主义领导人员完全被“五月起义”搞得猝不及防，所以他们决定谴责这场造反运动。

对毛主义者来说，事情在变好之前只会变得更糟糕。因为他们像真正的小派系一样无法确定他们该如何回应“五月暴动”，所以他们的领导人员开始被政治妄想症搞得疲惫不堪。他们正式的政治路线认为学生造反是一个戴高乐和法国政府策划的阴谋，意在诱捕和击溃法国无产阶级。他们担心，如果工人阶级与学生抗议者联合起来，那么政府就会以此为借口进行一场大规模的镇压：令人想起了 1848 年“六月起义”或巴黎公社的大屠杀，当时有两万工人惨遭国民自卫队（National Guard）杀害。

正当事情似乎不再变得更糟糕的时候，并随着“五月事件”达到顶峰，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领导人罗贝尔·兰哈尔却遭受着神经崩溃的痛苦。在“街垒之夜”（5 月 10 日—11 日）那两天里，当学生激进分子竭力封锁拉丁区以阻挡迫在眉睫的防暴警察的攻击时，兰哈尔突然造访了中国大使馆，描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只是大纲式的诱捕理论。中国外交官旁观局势，茫然不知所措。在时局的逼迫下，兰哈尔觉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惊慌不已，搭上了一辆开往外省的火车。他崩溃了，需要住院几个月，接受治疗。

到 5 月 13 日，这时工人阶级全力加入了学生抗议队伍，个别毛主义者开始参加大规模的、震撼法国本土的示威游行。但是，在造反

1 Manceaux, *Maos en France*, 188.

的第一周（5月3日—10日），毛主义者就开小差了（AWOL）。“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革命高潮发生了，结果毛主义者错失良机。虽然他们将毛主义的革命教义问答熟记心中，但是当这代人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时刻出现时，他们竟没有识别出这一政治时刻，即使这一时刻直接出现在他们在拉丁区中心的宿舍窗户下。

6月，内政部长雷蒙·马塞兰（Raymond Marcellin）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发出警告，“在各国……有毛主义政党和马列主义者……我们有理由说（我掌握的信息容许我这样说）主谋彼此相互认识。猜想毛主义和马列主义的主谋可能是谁是容易的。”¹当然，这个主谋不是别人！马塞兰暗示说毛主义者是秘密受雇于北京的第五纵队。²他进而排斥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认为它是一个搞阴谋的组织。

135

对于毛主义高师生来说，1968年夏天是一个灵魂探寻的最佳时机，并以极度亲华的方式成为一个集体自我批评的时期。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领导人员自责不已。在兰哈尔的领导下，他们遵循了狭隘的“工运中心主义的”（ouvriériste）政治路线，因此误解了学生造反的政治本质和意义。这样一种认识逐渐确定下来：尽管工人阶级问题仍然是重要的，但是其他政治斗争同样值得关注。法国社会在“五月风暴”期间爆发的危机意味着政治激进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马列主义正统学说的束缚。首先，毛主义者错误判断了1968年之前那些年里始终宣扬的“文化革命”的本质。正如一名悔改的毛主义者所

1 引自 Bourseiller, *Maoïstes*, 99。

2 参见 Marcellin 的回忆录, *L'importune vérité*。

承认的那样，“长久以来，一种派系意识形态控制了我们的队伍，对学生们不屑一顾，低估了他们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能力”¹。对毛主义者来说，这种认识变成“五月风暴”最重要的政治教训之一。后五月时代见证了泛滥的新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的涌现：女权运动、同性恋解放、犯人权利和环保主义。从此以后，断言这些斗争中任何一场斗争应获得唯一的优先权，是越来越困难了。

“五月事件”使激进分子蒂耶诺·格兰巴克（Tiennot Grumbach，前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的外甥）相信正是学生造反的**自由意志论者**的方面体现了这场运动的不朽贡献。他和少数南泰尔激进派创立了一个新团体——“革命万岁！”（Vive la révolution!），受情境主义理论的启发，这个团体聚焦于“文化政治”和“日常生活”。在 1969 年出版的创刊号上，格兰巴克与其“无政府毛主义者”同仁们认识到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卑躬屈节，这使他们完全误入歧途。他们试图在定义上抛弃他们曾经珍视的派系心态：

136

我们极其不同意这样一些人的意见，他们试图尽快翻过这一页，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这次我们不想匆忙地重组一个小派别 [即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 来浪费一个理解的机会，这个小派别一再使我们脱离主流运动，使我们不能回应问题，使我们对现实无动于衷……许多同志诅咒这个

1 参见详细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的自我批评“*Projet d'autocritique*,” in *Kessel's Mouvement maoïste*, 96-107。

组织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马列)] 禁止他们参加“五月风暴”的群众运动, 或者禁止他们助其发展……我们的同志的普遍意愿不是重组小派别, 而是避免运动的“小派别化”(groupusculation), 以便保持“五月运动”的统一性……5月前, 成为一名马列主义者是极其简单的: 每逢问题出现时, 人们可以引用毛主席语录来解决, 然后就平静地睡觉去了。5月后, 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引用毛主席语录不再给任何人留下深刻的印象。¹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马列) 分裂成两个派别。一是“取消主义者”(liquidationist), 他们总结说“五月造反”因为缺乏先锋政党的领导而失败了。正如《走向内战》(*Vers la guerre civile*) 的作者们所察觉到的那样, “5月 (甚至是今天), 群众运动缺乏中心, 这使这场运动丧失斗争和知识的工具。这种缺乏……也说明了运动趋势的衰弱。”²但是, 在仓促地创立另一个政党之前, 这一派需要专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 可以肯定的是政党有其特有的理论基础。因此, 所谓的“取消主义者”就前往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学习和读书。后五月时期, 据说列宁1902年撰写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宣言《怎么办?》(*What Is to*

1 *Vive La Révolution!* (July–August 1969): 74。革命学生联合会 (Federation des étudiants révolutionnaires, 简称 FER) 是朗伯-托洛茨基主义革命学生联络委员会 (Comité de liaison des étudiants révolutionnaires, 简称 CLER) 的一个支部, 建立于1968年4月28日。

2 Geismar, July, and Morane, *Vers la guerre civile*, 15.

Be Done?) 大受欢迎。这一派就这样在前教师工会主席阿兰·热斯马尔的领导下返回到其他的马列主义基础。

137

除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外,马塞兰还排斥其他一些左翼团体,包括与其竞争的毛派“法国共产党(马列)”(一个与北京正式联盟的法国共产党支派,简称 PCFML)和托派“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简称 LCR)。1968 年 6 月,他负责的内政部派遣防暴警察迅速镇压残余的工厂占领活动。那个月选举结束后,戴高乐主义者成功地重掌政权。这次选举和此前进行的镇压浪潮使毛主义者相信“法国法西斯主义”正要到来。他们认为法国正要变成另一个葡萄牙,戴高乐将军扮演着萨拉查(Salazar)的角色,萨拉查从 1932 年到 1968 年曾以铁腕手段统治葡萄牙。1969 年至 1970 年间,总计有 43 部电影被法国文化部长以“精神毒药”(mental toxicity)为由予以禁止。到 1970 年,法国当局把 100 多名积极分子投进监狱。

第二个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派别大约有四五十名激进分子,成立了“无产阶级左翼”。在皮埃尔·维克多的指挥下,它重申了这一团体早期的政治路线。激进分子如今比以往更需要融合城市和乡村的群众,因为这些群众体现了人类光辉灿烂的革命未来。在维克多的眼中,“五月事件”证明了他与其志趣相投的激进分子始终渴望的信念:发达的工业社会非常容易受到大规模革命剧变的影响。“五月起义”之后的“六月起义”不时地被整个巴黎地区的工厂中爆发的未经工会批准的罢工打断。工人阶级完全不会被“富裕社会”的甜言蜜语诱惑。毫无疑问,另一场革命高潮不久后即将到来,为这件可能发生的事情

做准备是革命激进分子的庄严任务。维克多将毛主义者在1968年6月挫败后的暂时撤退与中国共产党人1934年开始的长征相比较，当时毛泽东带领着军队长途跋涉，以逃避江西国民党军队的歼灭。红军出发时有10万部队，最后只有7000人幸存。

因此，从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的灰烬中诞生了“无产阶级左翼”，这是一个由维克多和其他一些同志于1968年9月建立的新团体。“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从五六月份工厂占领活动中学到的一个教训就关系到工人阶级分层的议题——不仅是非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以OS著称，即ouvriers spécialisés）之间的划分，而且是本土工人与据估计350万当时居住于法国的移民工人之间的重要差异。在后五月时期，“无产阶级左翼”越来越将注意力转向了后一个群体的困境，其物质条件多半是令人可怜的。

138

本着调查的精神，“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到巴黎郊区比扬库尔对庞大的雷诺汽车厂的移民工人的种族构成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总共8500名移民工人中间，有4500名摩洛哥人、2000名葡萄牙人和800名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有意义的种族与部族的差异），还有南斯拉夫人、西班牙人和突尼斯人。无论是在汽车工业还是在其他领域中，广泛的种族差异和文化差异使之很难动员流水线工人形成一个团体。

有两个例子足以说明毛主义者在后五月时期支持的“行动”类型，以催化这些截然不同的派系中间的工人阶级团结。1970年春，“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利用公交系统票价上涨的机会，将比扬库尔雷诺汽车厂的大批移民劳动力动员起来。工作日一结束，数百名工人在毛

主义者的教唆下占领了比扬库尔地铁站，抗议票价上涨，保护他们的工友，当时他们跳过了旋转式栅门以示抗议。当警察最后出现时，毛主义者动员了更多的工人。这些事件得到了广泛的新闻报道，有助于保持五六月造反期间激起的无产阶级战斗精神的火花。

139 一项在外省城市莫朗（Meulan）进行的类似调查揭露了一个相当大的贩卖外国工人工作许可证的黑市交易市场。毛主义者占领市政厅抗议这一丑闻，更广泛地引起了人们对法国移民劳动力悲惨困境的关注。莫朗事件很快被主流媒体报道了，这是一个造成蓬皮杜政府尴尬局面的重要根源。让·沙邦-德尔马（Jean Chaban-Delmas）总理到国家广播电视台发表演讲，发誓国家将在两年内清除贫民窟，这是一个从没兑现的诺言。尽管如此，莫朗行动成功地中止了工作许可证的非法交易，有助于将全国人的注意力聚焦移民社区的悲惨命运。

这个时期另一项受到垂青的毛主义策略就是对工厂管理者的隔离。在这些行动期间，工厂管理者被锁在办公室好几个小时，隔离被认为是工人被动性的解毒剂。用萨特的社会理论的术语来说，这类行为有意要反对无产阶级的无序状态，或者“序列化”。一个显然精通“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词汇的“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提供了下列丰富的、有关车间异化的现象学描述：

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以致工人们被剥夺了聪明才智。机器和老板都在那儿对工人说：住嘴，不要思考，这是多余的、无意义的。工人被束缚在装配线和机器上，他们被故意隔离了。作为一种与世隔绝的意识，他变成一台与其他人一

样的机器。他就这样丧失了一切自我意识。工厂造反发展成一种抵制这种异化状态的手段。生成自我意识是一种与这种隔离状态断绝关系的手段；这是一种发明集体自我表达方式来反对装配线、反对机器和反对老板的手段。¹

通过证明管理者是多余的、工人自己能够管理工厂，工厂扣押行动意在激励无产阶级的自力更生能力。这些策略试图重新激起工人自治精神，这是“五月造反”关键性的政治遗产之一。作为未经工会正式批准的行动，他们打算直接挑战法国工会的专制结构——首先是共产党主导的法国总工会（CGT）。

1970年春，法国当局逮捕了《人民事业报》编辑让-皮埃尔·勒·当泰克和米歇尔·勒·布里（Michel Le Bris），并没收了报纸。法国最后一次逮捕报纸编辑事件发生在1881年。几周后，“无产阶级左翼”发言人阿兰·热斯马尔也无故被监禁。政府认为，如若让“无产阶级左翼”领导层群龙无首，那么这个组织将会瓦解，不过他们的判断严重失误。由于马塞兰及其同僚们批准的鲁莽逮捕行动，“无产阶级左翼”的地位才从小撮不出名的激进分子转变为其境况被整个巴黎热情支持的著名事业。

波伏娃和作家米歇尔·莱利（Michel Leiris）立即组织一个声援团来支持被拘押的毛主义者，即《人民事业报》的朋友们。在波伏娃

1 参见 *Les Temps Modernes* 专号 *Nouveau fascisme, nouvelle démocratie*, 第42页。

当时的回忆录《清算完毕》(All Said and Done) 中，她呼应了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对毛主义者的态度，当时她评价道：

尽管有一些保留意见——尤其是不盲目地相信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但是我同情毛主义者。他们自认为是革命社会主义者，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和托洛茨基分子创造的新官僚主义；我愿意与他们一起抛弃这些道路。我不会轻易地去相信他们不久会引发革命，而且我觉得他们当中一些人表现出来的“必胜信念”(triumphalism)是幼稚的。但是，鉴于整个传统左派接受了这种做法，将自己定义为一种革新的力量或恭敬的反对派，毛主义者体现了一种真正激进的论战形式。在一个变得僵化的、懒散的和顺从的国度里，他们挑起事端，激起公众舆论。他们试图关注无产阶级中的“新生力量”(fresh forces)——青年人、妇女、外国人，还有那些外省小工厂中的工人们，这些工人比那些生活在大工业中心的工人们更少地受到工会的影响和控制。他们激励一种新型的行动——未经工会批准的罢工和扣押行动，有时他们从内部进行煽动……我不会后悔我为了帮他们而有可能去做任何事情。我宁可帮助青年人参加斗争，也不愿做绝望的被动目击者，这种绝望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走向了最可怕的自杀。¹

1 De Beauvoir, *Tout compte fait*, 419.

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歇斯底里唯物主义

在后五月时期，毛主义者纵情于力比多政治的恣恣之中，而这些恣恣弥漫于工人—学生造反之中。1970年秋，毛主义者加入“革命万岁！”团体，这个团体已与“无产阶级左翼”分道扬镳，创办了革命刊物《一切！》（*Tout!*）（“我们想要的是一切！”，“Ce que nous voulons: Tout!”），这是一份歌颂“五月运动”自由主义精神的双周刊。《一切！》背后的智囊团认识到“五月事件”非常有助于根据“文化政治的”路线来重新界定“革命”的意义。《一切！》的毛主义者接受了南泰尔激进派和巴黎情境主义者所提出的先锋革命模式的批评理论。“五月风暴”主导的政治定位被公开地宣布为反专制主义的。自立门户的毛主义者推论说，为什么专制政治的批评应该在政治左派的家门口停滞不前？

在前“无产阶级左翼”领导人蒂耶诺·格兰巴克的指导下，《一切！》的积极分子全盘接受后五月时期已经明确具体的、“非主流的”政治主题。与“五月造反”相一致的“占领运动”（占领工厂、办公室、学校和大学）在革命作为节日狂欢的观念中达到了巅峰。这种坚决的自由主义政治遗产正是《一切！》试图发展和保持的。

本着后五月文化革命多元主义的精神，《一切！》的编辑人员把版面开放给政治论战的新形式、新变种。《一切！》的编辑人员推论说，为什么“欲望的解放”仍被异性恋欲望的条件限制和界定呢？如何对待各领域被禁止的、边缘化的性征呢？同性恋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比

异性恋的欲望更缺乏正当性吗？为什么要挑战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方面，而不去挑战它的文化、道德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心理的形态呢？《一切！》编辑部在下列纲领性的原则中陈述了这些关注：

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殖民和利用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的生产力来获得最大好处。它也窃取我们的欲望与爱的能力。资本主义社会将它们驱逐到一个称之为“家庭”的强制性劳动集中营之中……当我正式同意去只爱一名异性且只爱单独的一个人以赞同公开宣扬的繁殖后代目标时……当我凭借父母权威生育合法的孩子，承受着恐惧、占有、顺从、竞争和等级制度的压力时，当我胆怯地将儿女们交付给学校、电视，由此交付给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时，那么我作为一名革命者的计划剩下了什么？谁受益了？使资产阶级社会或无阶级社会永存的机制是什么？……我们被告知的是，通过反对身体的压抑、性征的压抑和精神的压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延续下来；这种斗争只会让有特权的少数人受益、只能引向个人成功……但是，革命没有实现，除非它同时是一场欲望的、性征的、关于我们身体的革命，且假设反对经济剥削的斗争耗尽了我们所有的精力。¹

1 *Tout!* 12 (1970): xx.

在一系列致力于自我个性化之非主流模式问题的开创性议题中,《一切!》工作人员急切地探求这些非主流实践与主题的本质。这一评论性刊物特别乐于接受女权主义[以“妇女解放运动(Mouvement libération des femmes, 简称MLF)为代表]和同性恋权利[由“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Front homosexuel d' action révolutionnaire, 简称FHAR)所推动]。

对于法国女权主义者来说,1970年是元年。8月26日,即美国妇女选举权50周年纪念日,12名女权主义者提前通知媒体后就到凯旋门(Arc de Triomphe)集合,前往无名烈士墓(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举行示威游行。正如电视镜头滚动显示的那样,她们从当地地铁站出来后就打开横幅:“每两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是女人”、“比士兵更加默默无闻的人:他的妻子”。12个人立即被逮捕,并被带上了警车。积极分子加入了毛主义团体“革命万岁!”[一个前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积极分子和南泰尔激进分子组成的联合体],并从中获得了鼓舞。“妇女解放运动”团体就这样诞生了。这一看似次要的事件产生了轰动性的全国影响。尽管法国确实习惯了示威游行和抗议活动,但是它不习惯那些明确引起人们对妇女问题关注的女权主义者所发起的抗议活动。

那年秋天,时尚周刊《她》(Elle)设法组织了一场“妇女总体状况”专题研讨会,以便推动一场关于妇女议题的“文明的”、也就是非女权主义的讨论。为了安全起见,小组辩论的名单十分偏重男性发言者。会议组织者发放了一份不痛不痒的调查问卷,以便获得有关女性品味

与消费习惯的信息。不久，一群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叫来了一群女孩(Les petites marguerites) 来搅局。这群女孩分发了她们自己的“标新立异的”调查问卷，以这样的问题为特点：“你化妆打扮 (a) 出于自我厌恶的目的？(b) 看起来更少地像你自己而更多地像你期望的样子？”¹ 另一个问题是：“谁最适合决定你生孩子的数量？(a) 教皇，一个没有孩子的人；(b) 总统，一个很难有充足时间与自己的孩子相处的人；(c) 医生，一个重视胎儿的生命高于你自己生命的人；(d) 你的丈夫，一个每天下班后与孩子玩几分钟的人；(f) 你，一个怀孩子、生孩子和育孩子的人。”²

144 但是，最有利于提高女性议题意识的事件是经受非法堕胎的 343 名妇女的宣言，这篇题为“我们的子宫属于我们！”(Our Wombs Belong to Us!) 的宣言发表在 1971 年 4 月 5 日的《新观察家》上，其中签名者有波伏娃、卡特琳·德纳夫 (Catherine Deneuve)、玛格丽特·杜拉斯 (Marguerite Duras)、维奥莱特·勒迪克 (Violette Leduc) 和让娜·莫罗 (Jeanne Moreau)。

波伏娃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 是一部现代女性意识发展过程中里程碑式的著作。她言简意赅地驳斥了生物决定论，她在对存在主义主体性的明确肯定中宣布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观点：“一个人并非生而为女人，而是逐渐成为一个女人。”大约 1970 年“妇女解放运动”突然出现时，波伏娃主张人人平等的女权主义似乎是温顺的、过时的。

1 引自 Duchén, *Feminism in France*, 10。

2 引自 Picq, *Libération des femmes*, 22。

尽管她个人没有堕过胎，但是谣言含沙射影地说她有时会允许怀孕的女人去她的公寓堕胎。

343名妇女的宣言开篇写道：“法国每年有一百万妇女遭受堕胎之痛。由于她们不得不忍受偷偷摸摸的情况，所以她们在危险的情况下做堕胎手术，但是这一手术在医师的指导下是最简单的手术之一。人们忽略了这一百万沉默的妇女的命运。”¹当时堕胎在法国仍然是非法的，自“一战”以来法国始终被停滞不前的出生率困扰不已。根据法国的刑法，堕胎是一项被判以6个月到3年监禁的犯罪。避孕在1967年得到了法律上认可，因为这一年所谓的“新出生法案”（loi Neuwirth）通过了。直到那时，提供避孕知识的医疗人员常常会遭到起诉。

法国女权主义出现在一个令人陶醉而又令人困惑的时刻。法国此时正值左倾主义的高峰期。男性左派分子担心的是，女权主义者通过独立探究妇女议题会减损阶级斗争的更大利益。法国女权主义者自身就展示了多种多样的政治忠诚。许多人开始成为左翼积极分子，至于她们会怎样将其马克思主义的介入与其新近获得的女权主义信仰协调一致，她们是不确定的。其中一些人通过简单宣布男人是资产阶级、女人是无产阶级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很多男性激进分子对她们的动机和目标仍然不甚了解，更别说明显的不同情了，所以“妇女解放运动”积极分子不久就做出决定——不准男人参加她们的聚会。“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压迫者必须从他们的压迫者那里要求造反的许可呢？”她们

¹ *Le Nouvel Observateur*, April 5, 1971, 42.

以极具修辞色彩的语气温问道。¹

主流的女权主义者探究权利导向的议题——优良的儿童保健、男女同工同酬、堕胎权利，而“妇女解放运动”积极分子认为女权主义是一种重新审查有关女性身份的基本问题的方式，也就是说一把从质上改变她们整个女性气质和女性特质的钥匙。在笨拙地抛弃资产阶级平等主义的女权主义的过程中，她们的口号变成了“打倒妈咪的女权主义！”（Down with Mommy's feminism!）传统的女权主义试图让女人融入社会，而“妇女解放运动”在与时代精神一致的前提下试图“分解”社会及其占主导地位的实践、价值和习俗。

一位评论者描绘了这个时代的氛围，兹述如下：

在这些集会中，与其说是秩序与透明度占了优势，倒不如说是混乱与好心情占了上风……在“妇女解放运动”的集会上，没有人完全知道正在进行着什么。这种松散的安排，是一种对男性主导的政治集会的严格程序的反抗，遭到了毁誉参半的评价。一些女人觉得这种安排令人精神焕发，其他一些人则觉得令人懊恼不已。一个女人坦率地写道：“每次我参加会员大会，我想知道我正在那里做什么。”但是另一个女人写道：“这种聚会太好了，令人精神焕发。你不知道正在进行着什么，你确实什么也看不到……但是依然有我在

1 引自 Picq, *Libération des femmes*, 15。

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热闹、欢乐。”¹

“妇女解放运动”创造性地扰乱了一个原本古板的法国社会，因此根深蒂固的家长惯习和假设很快就失去了它们的自明性。传统习俗受到了一系列全新的女权主义术语和概念的挑战。“加油站”(Gazolines)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吵吵闹闹的易装癖者的小团体。另一个因媒体报道而名声鹊起的团体是“红色女同性恋”(Gouines rouges)，她们在1971年五一劳动节游行期间特别惹人注目。一本主导性的女权主义刊物被称为“怒火中烧!”(Le Torchon brûle!)，副标题是“一本月经杂志”(Un Journal Menstruel)，这个副标题是在玩弄“每月一次的”(mensuel)这一法语词。受民粹主义信条的启发，《怒火中烧!》成为“革命万岁!”团体的支派。一位成员解释说：“没有欲望去制作优美的报刊杂志，而是避免划分哪些是能够阅读的人和哪些是不能阅读的人，并激励女人们去写作，不管她们认为她们能够写作与否。”²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风靡一时，或者有关于母亲身份是对女人自主权的否定(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暗示的)，或者有关于女人最终的满足感(如女权主义很快就宣布的某些“差异”的张力)。

出于同样的原因，通过追求独立自主的议程，“妇女解放运动”在左倾主义的中心创造了一个无法修复的裂口，由此促进了左倾主义的死亡。在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的主张推向新的极端后，“妇女

1 Duchen, *Feminism in France*, 9.

2 Ibid., 10.

解放运动”经常玩弄一种病态的派系自恋。这场运动的主导性理论家克里斯蒂娜·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在《女人的时代》（*Le Temps des Femmes*）上断言：“我们没有欲望去为我们的邻居斗争，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激进分子过去曾花时间为工人或移民等群体的利益而斗争。而我们谈论我们自己。”¹不久，不仅“妇女解放运动”拒绝与男性同志合作，而且它也拒绝联合与其竞争的女权主义团体。这种发展只不过又一次表明，要保持左翼事业和政治派系的脆弱的后五月同盟将是多么的困难。

“妇女解放运动”的政治活动公然变成反知识的，一种“感觉的政治”（politics of feeling）（“以直觉的方式进行思考”）战胜了“理智的政治”（politics of the intellect）——如今贬称为“大男子主义的”（masculinist）和“菲勒斯中心的”（phallogocentric）政治。最终结果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焦点自相矛盾地呈现为一种明显的非政治特点。外部世界对她们来说不再有意义。在她们的讨论中，激进分子似乎不能超越他们自己的群体动力和个人感觉的界限。正如一位观察者所指出的那样，“政治贬值了，溶解在女性个体的相关问题的无限表达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溶解在‘妇女解放运动’特定成员的相关问题之中。”²这样“妇女解放运动”完成了从“历史的”唯物主义向“歇斯底里的”唯物主义的转变。

147

1 Delphy, "Je ne vois pas pourquoi un mouvement s'arrêtait de grandir," *Le Temps des Femmes* 12 (Summer 1981).

2 Le Goff, *Mai 68*, 310.

巴黎障碍重重

同性恋权利或同性恋解放运动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男同性恋者公开参加“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集会，分享他们的问题和关注，只是到后来他们才分道扬镳了。

处于同性恋者权利斗争的最前列的是毛主义机关刊物《一切！》，1971年4月出版了一期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一切！》，在其封面上特写了一个女人的臀部。在与不敬的时代精神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它正式宣布：“每个人都有很多屁股。”“妇女解放运动”和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既效仿超现实主义者，也效仿美国嬉皮士，它们都将蓄意挑衅的策略发挥到最大效果，以便引起人们对它们的事业的注意。居伊·奥康让是“开拓性宣言”《同性恋欲望》（*Homosexual Desire*）的作者，他的创作和行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1971年4月出版的《一切！》中，奥康让投的稿件《承认被阿拉伯人鸡奸的343名男同性恋者宣言》（*Manifesto of 343 Fags Who Admit to Having Been Buggered by Arabs*，不巧妙地影射了《新观察家》著名的“堕胎”专号）在全法国引起了回响。

以《一切！》作为宣传媒介，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的激进分子主动质疑了继承而来的资产阶级性常态的观念：“你视之为‘正常’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压迫的根源，一切常态困扰着我们——甚至革命常

态的理想。”¹ 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的积极分子进而将这一论证向前推进了一步，赞美“同性恋欲望”的优势。²

148

他们声称，异性恋者通过武断地限制他们的性选择和性实践的范围来使他们自己的、多形态的力比多潜能变质了。假如一个人作为一名政治激进主义者努力去彻底地挑战公认的行为常态的观念，那么为什么不同样去质疑异性恋？终归同性恋欲望没有创造性地破坏资产阶级的“家庭价值”（核心家庭、父权制、一夫一妻制、男子气概等等）的全副武装吗？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的积极分子争辩说，就其褻渎一系列资产阶级道德管理和禁忌而言，鸡奸是革命的。³ 或如奥康让以特有的虚张声势表达了这一思想，“我们的屁股是革命的！”⁴

《一切！》的同性恋解放专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观察者们指出法国同性恋者最后经历了他们自己的“五月风暴”。一些派生性刊物，包括杂志《社会灾难》（*Le Fléau Sociale*），挪用了一种通常针对同性恋实践的侮辱性态度。《一切！》的文章连同一些附录结集再版为一本通俗文集《反常态报告》（*Rapport Contre la Normalité*）。⁵ 蓬皮杜政府以污秽不堪为由没收了一万册《一切！》（第 12 期），大约占总印数的五分之一，这反而产生了更好的宣传效果。《一切！》名誉主编让 - 保

1 “Les pédés de la révolution,” *Tout!* 12 (April 23, 1971).

2 参见 Hocquenghem 的著名宣言 *Homosexual Desire*。我对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的解释受益于 Haas 在 *Death of the Angel* 中的阐述，对此不胜感激。

3 参见 *Les pédés de la révolution*。

4 引自 Martel, *The Pink and the Black*, 17。

5 *Rapport contre la normalité* (Paris: Editions Champs Libre, 1971).

罗·萨特因“对公共道德的亵渎”而遭到控告，但是指控后来被取消了。许多左派书店拒绝供应这期《一切!》，由此加大了位于左派共同体中心的裂痕，超越了“文化政治”的向心性和重要性。托派分子和共产党人都把一切关于性解放的事情贬低为倒退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此后全法国的同性恋者开始轻松地讨论他们的性向问题。好像在《一切!》专号之后，他们觉得如释重负，一种新的同性恋自信立即是可识别的。

在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接下来的聚会中，几百名同性恋激进分子出席了，与通常的几十人聚会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位著名的积极分子描述了一次在法国美术学院举行的、具有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特色的集会，兹述如下：

149

1971年，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在法国美术学院举行的大会变成直接的、性满足的场所。激进分子将革命付诸实践：他们创造了新的猎艳方式，不用再鬼鬼祟祟了，他们穿过了雕塑环绕的走廊，他们在楼顶上和阁楼里尝试了（夏尔·）傅立叶的36000种爱情形式……这次大会是为快速的、匿名的性而设计的密室的早期化身（这些密室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传遍法国），取代了杜伊勒里宫公园……用奥康让的话来说，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变成一团“激情的星云”。¹

1 Martel, *The Pink and the Black*, 26.

1972 年 1 月，同性恋解放史上另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出现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奥康让著名的“出柜”（coming out）论文《同性恋者的革命》发表在发行量极大的《新观察家》周刊上。20 世纪 60 年代，奥康让全面研究了激进的政治介入的整个领域，他起初是一名共产党员，随后加入托派组织，最终像许多左派分子一样与毛主义者和“革命万岁！”共命运。一位评论者恰当地把奥康让发表在《新观察家》的文章描述为“戴高乐将军 1940 年 6 月 18 日吁请的同性恋版本”¹。奥康让煞费苦心地将他的工作叙述为一个隐蔽的同性恋青年遭受着无法忍受的混乱和多种多样的羞辱，直到他获得了“解放”，这多亏了他在亨利四世中学遇到的哲学教授的同情和容忍。正如奥康让动情地反思的那样，“在我们生命的一个方面，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是支离破碎的，我们知道这个方面是必要的，我们称之为性欲或爱”。²

150

1972 年，到处可见其影响力的奥康让出版了《同性恋欲望》，这一宣言独力发起了同性恋研究运动，他于 1988 年死于艾滋病。

妇女运动和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都成为广泛蔓延的、以欲望解放而著称的后五月文化潮流的组成部分。由于积极分子听从了赫伯特·马尔库塞、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和反传统精神病学运动的理论劝告，所以对资产阶级常态发起了一次彻底的批判。他们努力指出性向的议题具有一种重要的政治的维度，这一维度超越了性取向的个体考虑。正如一本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分发的小册子所声称的那样，

1 Martel, *The Pink and the Black*, 13.

2 Hocquenghem, *Homosexual Desire*.

“我们同性恋者遭受了帝国主义统治的压迫。我们的解放如同所有受压迫者的解放一样是一场大规模的、反对任何统治形式（意识形态统治、对女人的统治、性和种族的统治）的组成部分。”¹

同性恋欲望比异性恋欲望更难以接受吗？至于核心家庭，弗洛伊德将之揭露为神经症的滋生地，女权主义者将其痛斥为父权制的温床，它是一种比各种非主流的生活安排更加令人满意的模式吗？一边是资产阶级文明要求的自我救赎，一边是对性格形成和人格结构具有一切否定后果的欲望压抑，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直接关系呢？通过提出这些问题，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的积极分子发起了一场针对“男权主义”（phallocracy）的广泛批判，将其斥责为异性恋常态的暴政。

最终，“妇女解放运动”和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都非常成功地获得了公众对他们的基本文化诉求的广泛认可。正如社会学家昂利·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所观察到的那样，一开始作为“同性恋者的造反运动导致了法国大多数人对同性恋的态度、因此对他者差异的态度的快速而彻底的转变”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妇女解放运动”和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成功地使与众不同的权利获得了广泛的文化认可，它们也就走向了溃败。

然而，焦点从“革命政治”向“文化政治”的转变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虽然女权主义、同性恋解放和各种另类运动的终极政治价值仍然无可厚非，但是《一切！》编辑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刊物有可能变成一

1 FHAR, Tract 1,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4 WZ 10828 (1972).

2 Mendras, *Français*, 122.

本“生活方式”(lifestyle)研究的杂志。随着五月运动淡出人们的视野，“运动政治”(movement politics)越来越冒着不知不觉滑向“生活方式政治”(lifestyle politics)的危险。这种对提高意识与群体认同的关注是必要的、合情合理的，与各种团体对社会认可的需求是一样。同样，当他们开始寻求各自的、常常不能协调的解放观念时，人们开始想知道：他们持有的共同价值究竟是什么？如果每个受压迫群体必须为自己且只为自己辩护，因为只有这个受压迫群体才能分析自己遭受的苦难并决定合适的行动步骤，那么是否有人敢为全部被压迫者辩护吗？

在女权主义者中间，一道令人不悦的裂痕很快在权利导向的女权主义、“差异”女权主义（强调女人的特征或特性）与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她们认为女人应该刻意避免与男人的一切接触）之间产生了。法国女权主义的内部分裂似乎是困扰后五月时期社会运动的普遍分裂的典型特点，似乎是强迫性集中聚居（ghettoization）伴随产生的危险的典型特色。政治内在性（inwardness）的诱惑（冥思苦想和集体决策的诱惑）最终会比活跃的社会论战的需求更重要吗？利害攸关的是一种微妙的、并在很多方面从没被令人满意解决的平衡。对五月运动遗产持较为乐观态度的阐释者反而认为这种公私之间的振动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张力。

“七年的幸福！”

在某种意义上，兴盛于后五月时期的新社会运动是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施加给政治制度的基层压力狡诈地强化

了法国政府的控制能力。这种从内在洞察的文化政治向立法和公民自由的外在定向聚焦的策略性转变是一种普遍趋势的组成部分。这一焦点的变化不仅对同性恋者来说是真实的，而且对许许多多其他群体（犹太人、移民和女权主义者）来说也是真实的。因此，“经历了（向心的、内向的和内省的）身份政治的一段时期之后，话语发生了演化，而且激进分子转而为工会主义的离心运动中的少数群体权利辩护。”¹

1975年，也就是自由主义中立派议员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当选总统后的那一年，所谓的“韦伊法案”[以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命名]获得通过，这一法案使大多数情况下的堕胎合法化，尽管有来自天主教会和国民议会右翼的激烈反对之声。一旦堕胎变成合法的，使避孕完全合法化的压力也随之而来。显然，避孕越自由，堕胎就越少。因此，作为韦伊法案的组成部分（反映了社会态度和习俗的广泛转变），避孕最终获得了普遍的应用。而且，费用全由国家医疗系统报销了。韦伊法案的通过被广泛地视为启蒙运动的价值理念战胜了反动势力：启蒙运动战胜传统、共和主义战胜君主政体、自由思想战胜天主教信仰。²总之，这是世俗价值的胜利。

在1981年总统选举的准备阶段，社会党竞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自称是一位坚强的同性恋权利的倡导者。在1981年4月与女权主义积极分子的圆桌讨论中，这位社会党领袖

1 Martel, *The Pink and the Black*, 127-128.

2 Picq, *Années-mouvement*, 171.

唐突地宣布：“同性恋一定不再是犯罪。每个人的选择必须得到尊重，如此而已，但是在男女关系、或男人关系、或女人关系的正常框架内……然而，由于人的道德本性，不该有任何歧视；对我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¹ 因此，密特朗及其社会党同仁表露出远远优于其左翼竞争对手、共产党人和托派分子的宽容态度。

153

那么同性恋者成群结队地支持密特朗阵营，也就不足为怪了。1981 年 4 月 4 日，1 万名同性恋者走上了拉丁区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支持密特朗竞选总统。毕竟，社会党公开接受了文化革命的口号“改变生活！”作为 1971 年埃皮奈计划（Epinay Program）的必要组成部分，这项计划成为再造社会党的原则性声明。一些观察者认为，在被证明是一场旗鼓相当的选举中，同性恋者的选票帮助社会党人扭转了局面。同性恋共同体热情地称呼密特朗的选举是一个近似于基督重临（the Second Coming）的事件。受大众欢迎的同性恋周刊《逍遥猎欢》（*Gai Pied*）的头条新闻热情洋溢地写道：“七年的幸福！”

社会党人一旦上台——他们在 1981 年 6 月的法定选举中获得大多数选票，他们就敢于坚持和实行自己的信念。在密特朗内阁的教唆下，社会党议员进而取消许多歧视性的法律和法规。内政部长加斯东·德费尔（Gaston Defferre）散布一份便函，命令警察取消同性恋酒吧和俱乐部周边地区的羞辱性身份检查。负责审查同性恋活动的刑警分队立即被解散了。那些因“同性恋罪”被逮捕的人也被赦免了。

1 Choisir, *Quel président pour les femmes?* (Paris: Gallimard, 1981), 98.

一项房东使用的反同性恋条款——规定房客必须是“有德行的、重视家庭的人”——也被取消了。

但是主要挑战在于颠覆维希法令，纵然这一法令准许异性恋的年龄是15岁，但是它将早于21岁之前的同性恋活动判为犯罪（20世纪60年代，年龄降低到18岁）。经过一系列长时间的激烈讨论，1982年7月，这项法令最终被取消了，这多亏司法部长罗贝尔·巴丹戴尔（Robert Badinter）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女权主义律师吉塞勒·阿米利（Gisèle Halimi）的法律才干，吉塞勒当时担任政府的首席法律顾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女权主义和同性恋的解放运动在政治上获得如此成功，以致它们作为运动最终使自身变成多余的。因此，随着这两个群体越来越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它们的基本法律议程和合乎宪法的议程被满足，它们也就被剥夺了它们原初的存在理由。在左派令人震惊的1981年选举胜利之后，热情如此高涨，以致许多积极分子为了政治放弃了社会，去担任新社会党政府的咨询顾问。因此，20世纪80年代竟出人意料地表现了法国社会运动的衰落。¹ 随着社会党上台，一系列曾在戴高乐主义者执政时期被取消的、常规的、熟悉的政治选择（支持公务、颁布法律、宪法改革），似乎又重新开启了。因此，随着社会党的胜利，左翼战斗性的时代精神，曾一度在自由论者—毛主义者的支持下兴盛于后五月时期，这种精神竟出乎意料地减弱了。

154

1 参见 Waters 在 *Social Movements in France* 一书中的精彩叙述。

附录：论阿兰·巴迪欧的宗派毛主义

如前所述,从长时段看,法国毛主义从1966年持续发展到1974年,相对来说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在大多数情形下,对“文化大革命”的揭露最终祛除了毛主义者及其“民主的”同情者的亲华倾向。他们转向中国的最初原因之一就是苏联进行的“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试验完全丧失信誉。毛主义仿佛是对“真实存在的民主制度”(really existing democracy)的混乱与失望进行乌托邦性替代的最后、最好的希望。但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魅力逐渐褪去。的确,政治失败的警告信号似乎是无所不在的。为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文化大革命”的中流砥柱之一)的统帅林彪1971年死于蒙古国上空一次神秘的飞机坠毁?如何看待西蒙·莱斯[Simon Leys,比利时汉学家皮埃尔·里克曼斯(Pierre Ryckmans)的笔名]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毛主席的新服饰》(*Chairman Mao's New Clothes*)中的揭露呢?又如何看待让·埃斯曼(Jean Esmein)《中国文化大革命》(*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一书中所包含的、同样令人震惊的材料呢？¹ 考虑到坚定的、亲苏的法国共产党及其同盟工会法国总工会比较强势，设想法国工人阶级将其政治忠诚转移到一个以促进“农民共产主义”而著称的东方国度，这会有多实际呢？法国亲华心态的善变本性越来越明显。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果被拆解后的一段时期内，许多前毛主义者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古拉格群岛》对苏联监狱劳改营制度史诗般叙述的刺激下变成了激烈的人权倡导者，这成为一种对他们以前的革命轻信进行赎罪和忏悔的方式。²

少数前毛主义者不仅执迷不悔，而且赞美“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令人瞩目的政治突破之一，其中一位前毛主义者就是阿兰·巴迪欧。像许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和“无产阶级左翼”的积极分子一样，巴迪欧是一名高师生、阿尔都塞的学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读书期间就与这两个团体保持着一定距离。“五月风暴”之后，巴迪欧反而加入了统一社会党（Unified Socialist Party，简称PSU），这个政党自1960年创立之始就试图从左翼攻击主流的社会党人——国际工人协会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 internationale ouvrière，简称SFIO），以期实现左翼转向。顽固的反殖民主义者统一社会党领

1 Leys, *Habits neufs de président Mao*; Esmein, *Révolution culturelle chinoise*; Esmein in English: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 W.J.F. Jenner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3).

2 关于对法国知识分子产生“索尔仁尼琴影响”（Solzhenitsyn effect）的精彩论述，参见 Grémion, Paris-Prague。

导层决不宽恕居伊·莫莱（Guy Mollet）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法国支部，因为：（1）SFIO 强烈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2）SFIO 默许戴高乐 1958 年“政变”。1965 年，弗朗索瓦·密特朗曾是统一社会党与法国共产党联合的总统候选人，以 10% 的选票输给戴高乐。从 1967 年到 1973 年，统一社会党由未来的社会党的坚定分子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领导。

1969 年，巴迪欧与两名前“无产阶级左翼”成员建立了与其竞争的毛主义组织——法国共产主义联盟（马列）（Union des communistes français marxistes-léninistes, 简称 UCF-ML）。根据巴迪欧后来的声明，他决定建立一个竞争的毛主义团体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被“无产阶级左翼”的“日常生活政治”转向欺骗了。在巴迪欧的眼中，“力比多政治”是一种低劣的、中产阶级的、对“真实的”政治的替代，而这种“真实的”政治的真正形态可能追溯到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的不可动摇的政治意志。他也反对“无产阶级左翼”表演性的革命姿态，在他看来，这一姿态导致了一种对当代政治形势不切实际的想法。正如巴迪欧在一篇后来的访谈中所冷嘲热讽的那样，“几乎由‘无产阶级左翼’宣传所制造的一切有一半是不真实的——本来是一只小猫，他们却描绘成一只孟加拉虎”¹。

巴迪欧因“无产阶级左翼”过度的革命唯意志论而将其视为“左倾主义者”（left deviationists），而他认为更加正统的法国共产党（马列）

1 Badiou, "Roads to Renegacy," 125-33.

是“右倾主义者”（right deviationists），这是一个由前法国共产党成员组成的团体，他们于20世纪60年代初与法国共产党决裂，并获得了北京方面的官方认可。法国共产党（马列）的毛主义者极力反对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修正主义”，他们叹惜说，苏联不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仍然是“不充分斯大林主义的”（有充分的理由说，在“五月风暴”的力比多造反的余波中，这一立场急剧贬值）。因此，巴迪欧及其同道的法国共产主义联盟激进分子试图在这两个竞争的“左翼”和“右翼”的毛主义派系或小集团之间创造一条中间道路。

对于巴迪欧来说，五月运动尚未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真正的革命领导。法国共产主义联盟严格的、新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取自于下列从其主要的理论刊物《马列主义者》（*Le Marxiste-Léniniste*）摘录的纲领性声明：“必须做的事情、并将自身当作一项革命者的任务，那就是建立一个政党：为了闹革命建立政党，确保客观情势不仅仅是暴风雨般的，而且我们也是激情澎湃的。政党意味着，正是我们变成了真正革命性的，而非客观情势。”¹

为了替他们的立场辩护，巴迪欧与其法国共产主义联盟的盟友们喜欢引用伟大舵手的格言“一分为二”（One divides into two），这曾是毛泽东用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之一。从1965年开始，“一分为二”充当了虔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认识党内保守的、资产阶级的倾向（“右倾”分子）并经常以一切必要手段根除这些倾向的战斗口

1 引自 Bourseiller, *Maoïstes*, 173。

号。相反，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假定的反动派反而坚持“合二为一”（Two fuse into one）的口号。因此，一场表面上看是有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真正本质（对立是基本的还是综合是基本的）的认识论争论将对中国的政治未来产生不祥的后果。¹不久，“一分为二”变成毛泽东用以界定和击垮政治对手的包罗万象的题目。对于至今仍以毛主义者自居的巴迪欧来说，毛泽东融合认识论主题与政治主题的非凡能力将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法国共产主义联盟（马列）是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五月风暴”后被政府勒令取缔之后出现的几个毛主义小派别之一。据各方面的说法，它的成员从没超过80人。就据说它在领导者（他们主要是像巴迪欧一样占主导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毕业生）与普通成员（他们来自工人阶级）之间保持相当严格的、新列宁主义的分离而言，与其竞争的毛主义团体诽谤它是精英性的、宗派性的。在法国共产主义联盟创立之初，巴迪欧连同数量众多的毛主义者同仁一起被米歇尔·福柯（他主持招聘委员会）招聘到新建的、坐落在巴黎郊区的、“试验的”文森大学的哲学系。法国共产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前委员、哲学系教授贝尔纳·西谢尔（Bernard Sichère）回忆说：“在法国共产主义联盟，一个人像一名知识分子一样受到礼遇……成为一名法国共产主义联盟成员是相当时髦的。”²

1 参见巴迪欧在《世纪》（*Century*）一书中对这场争论的评论，第58—67页。

2 引自 Bourseiller, *Maoïstes*, 162。与巴迪欧一同进入文森大学有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艾蒂安·巴里巴尔和雅克·朗西埃。

法国共产主义联盟领导层偏爱拉丁区。一场为了移民工人利益的会议是在豪华的鲁特西亚宾馆（Hotel Lutétia）的私人包间中举行的，这个宾馆就位于巴黎时髦的塞夫勒 - 巴比伦（Sèvres-Babylone）十字路口——这次会议地点的选择与该团体在其他方面激进的无产阶级理论路线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法国共产主义联盟试图在公开的“自发主义的”道路（支持无端挑衅和“直接行动”）与对工运中心主义（ouvriérisme）美德的教条性服从之间达成妥协。如若付诸实践，这就意味着法国共产主义联盟要经常与布满巴黎郊区棚户区的移民们一起工作，使自己“立足于”工厂车间（就像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普通成员先前在罗贝尔·兰哈尔领导下所做的那样），组织基层革命委员会（comités de base），为下一轮革命浪潮做准备。1927年，伟大舵手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份报告在很多方面为中国的“农民共产主义”奠定了基调。在与这种毛泽东理想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法国共产主义联盟对法国农民的生活条件展开了详细的调研。一份调查报告声明：“至关重要的一项是领导那些对贫困农民、尤其是法国中西部贫困农民的伟大反抗，进行富有战斗精神的调查。”¹ 在他们所做的其他特别努力中，其中一项努力是所谓的百货商店计划，其理念是破坏消费社会的正常节奏，允许购买者不付钱就可以离开巴黎“百货商店”（grands magasins）。不过，这些实践似乎在大多数情

159

1 Groupe pour la fondation de l'union des communistes français (marxiste-léniniste), *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 en France et comment construire le parti de l'époque de la pensée de Mao Tse-toung*(Paris: Maspero, 1970), 46; 引自 Bosteels, "Post-Maoism", 580。

况下演变为简单的抢劫。¹

在学生时代，1937 年出生的巴迪欧自称是萨特思想的追随者，他相信萨特的现象学主体性的观念有利于矫正各种占主导地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兼教条主义，尤其是斯大林主义的客观主义兼教条主义。同样，作为一名高师生，巴迪欧无论愿意与否都抵挡不住阿尔都塞的影响。阿尔都塞“理论主义”（theoreticism）的严谨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观念是作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具体表现了一系列严格的、无可反驳的、认识论—政治层面上的真理。因此，“理论”具有一种无可置疑的、现实热切渴望的但实际上从未获得的逻辑说服力——这种自明之理反映了基本的“是”（being）与“是者”（beings）之间的本体论区分，也就是本体论超越纯粹实体的范畴优先性。对于巴迪欧来说，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纯正性是一种避免资产阶级“思想偏离”之诱惑与风险的方式——一旦革命浪潮衰退，这些诱惑与风险是若干“前六八分子”抵挡不了的。

这两种不同的哲学立场（萨特的视角与阿尔都塞的视角）是一系列棘手的、间或矛盾的、须尽力去平衡的知识忠诚。不过，这两种影响对于认识巴迪欧在政治上自我理解成为一名执迷不悔的毛主义者都是至关重要的。萨特教导的结果是，巴迪欧逐渐尊崇政治主体性或政治意志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叙述仍太多地依赖于“历史决定论”

1 Bourseiller, *Maoïstes*, 149.

(historicism)，坚持认为人们必须耐心地容许历史辩证法遵循其预先注定的进程。在巴迪欧看来，列宁重申了“政治优先性”(primacy of politics)，这有效地终结了政治的观望态度(attendisme，一种“等着看”的态度)的各种妄想。不过，始终存在的风险是革命政党凝结为有点物化的、僵硬的某种东西——“实践—惰性”(practico-inert，萨特的术语)——正如在斯大林主义的支配下所出现的那样。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与“五月风暴”一起意味着一种真正的政治突破或“新事物”。这些事件合起来促使巴迪欧与阿尔都塞断绝关系，阿尔都塞曾公开地赞美“历史无主体”(history without a subject)和“科学无主体”(science without a subject)的价值。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Structuralist Marxism)公开责难政治主体性以及历史“事件”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激进主义使结构主义看起来在政治上是不合时宜的。通过尊崇结构是一种坚韧的本体论常量以及通过将主体性贬斥为本质上是结构的意识形态效果之一，阿尔都塞与他的支持者轻率地低估了群众的反抗能力。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共产党通过清除自身衰退的、反革命的要素，试图积极地重新恢复它原初的革命干劲(在毛泽东的政治词汇中，党内的倒退要素代表了“非对抗性矛盾”，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意味着“对抗性矛盾”)。作为一种政治策略、一种学说，毛主义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坚定不移地相信政治意志的力量。在巴迪欧看来，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真理”(truth)，另一方面是“实在”(the "Real")。拉康创造的术语“实在”意味着我们努力达到但由于“社会化”的调解力量而从未获得的本体论确定性的

牢固基础：象征界或语言。值得赞扬的是，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那些以胆怯的折中方法进行竞争的政治范式，它展示了一种无法遏制的本真性激情：“对实在的激情”¹。为了真理，这种激情必须被尊重。

无论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经验性失败，按照巴迪欧的估计，“文化大革命”与“五月风暴”生动证明了革命主体性具有一种摧毁那些阻挡其发展的障碍的独特能力。巴迪欧在其独具特点的、不甚优美的哲学散文中表达了这一观念：“主体化遵从信仰的话语，以便粉碎阻碍……以局部限制的破坏性分裂的方式信任自己，这概括了主体的过程。”²

巴迪欧在1982年出版的《主体理论》一书中使有关革命主体性本质的论题更加犀利。在他后来的哲学中，一个中心论题关乎“力量”

1 参见《世纪》第5部分“对实在界的激情和伪装的蒙太奇”，第48—57页。巴迪欧后来声称，在其忠诚于作为客观常量的历史中，马克思主义最终被引入歧途；由此它低估了主体化。巴迪欧的“后马克思主义”承认，像作为解放力量的“党一国”（Party-State）的观念一样，有关“阶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也过时了。或如他在《元政治学》（*Metapolitics*）中所断言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不存在……一旦马克思主义如其所必须是的那样被重新提及政治特异性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完全前后矛盾的集合的空无之名”（第58页）。

关于巴迪欧与政治的文献资料正在扩散。参见 *Positions* 13 (3) (2005) 专号，这期专号摘译了巴迪欧重要的政治著作《主体理论》（*Théorie du sujet*）有关毛主义的许多章节。Bruno Bosteels 翻译的英译本《主体理论》（*Theory of the Subject*）（New York: Continuum, 2009）最近出版了。亦参见“Politics and Philosophy: An Interview with Alain Badiou,” in *Ethics*, 95-144。另参见“Politics and Ontology,” in *Infinite Thought*。其中最具有启发意义的评论是 Philippe Raynaud, “Méta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in *L'extrême gauche plurielle*, 149-70; Bosteels, “Post-Maoism”。

2 Badiou, *Théorie du sujet*; English translation: “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éorie du suje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Positions* 13 (3) (2005): 651,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force)与“位置”(place)之间的辩证法或对立。“力量”是充满活力的、动态的,与“主体化”(subjectivization)¹结成联盟。“位置”是缺乏活动的、静态的,有时几乎是不动的。它必定要被“力量”摧毁。

巴迪欧的思想偏爱充满暴力的哲学意象,这种倾向与他以“进步的”政治事业的名义对流血冲突或恐怖行动所进行的辩护相一致;雅各宾派专政、俄国革命、斯大林清洗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是他经常援引的例子。他一度将他的政治方式描绘为“恐怖主义的虚无主义”(terroristic nihilism),也就是一种战斗的、受尼采哲学启发的无政府主义。²因此,巴迪欧喜欢引用毛泽东的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³,这几乎不令人感到惊讶。巴迪欧的哲学以及他对政治的反思充满了破坏的隐喻。他认为假如一个人渴望克服“位置”[巴迪欧特别将其嘲笑为“资本议会的”(capital-parliamentarian)位置]的障碍,那么破坏在哲学上是有正当理由的,在本体论上是必要的。巴迪欧欣然赞成尼采的“积极的虚无主义”(active nihilism)的观念,将其视为一种消除“伪饰”(欺骗和非本真性)和接近实在(the Real)的有效方法。尼采完全有理由“用锤子进行哲学思考”,他认为假如衰朽的东西正在倒下,那么人们应该助其一臂之力。假如虚无主义的力量能够被转

1 “主体化”是巴迪欧避免“主体”观念的方式。在他接受了阿尔都塞的观点后,他认为“主体”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产物或效果。参见巴迪欧在《元政治学》一书中的讨论,他在这本书中评论说,阿尔都塞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无主体的主体性”进行概念化的尝试(第66页)。

2 参见 Badiou, *Century*, 64。

3 *Ibid.*, 62。

向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及其随之而来的弊病，那就更好了。“这种（对实在的）激情只能通过破坏才能被实现，”巴迪欧说。¹

163 甚至对巴迪欧有好感的批评家也发现他的许多政治判断 [例如他接受红色高棉 (Khmer Rouge) 的政策] 是“令人毛骨悚然的”²。然而，巴迪欧仍然执迷不悔、绝不屈服。显然，他得意地区分了他对青年时期伟大的政治事业（“文化大革命”和“五月风暴”）的忠诚与他的毛主义者同仁的“背叛的”心态，这些毛主义者同仁“新哲学家” (New Philosophers)，匆忙地皈依了一种不严格的、感觉良好的“人权主义”。³

巴迪欧认为，19 世纪是一个挫败的时代（波旁王朝复辟、1848 年革命和巴黎公社），而以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来考量的 20 世纪则是一个胜利的时代——至少到新自由主义在共产主义不光彩的失败后赢得了令人不安的胜利为止是这样的。在他看来，20 世纪文化与政治的先锋人物杜尚与列宁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历史成就：他们促成了一个可以与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

1 参见 Badiou, *Century*, 56。“存在着一种之于群体归属感的、对实在的激情：抓住实在的同一性，揭露它的复本的真实面目，让那些伪饰变得声名狼藉。这是一种对本真之物的激情，而且本真性实际上是一个既属于海德格尔也属于萨特的范畴。这种激情只能当作破坏才能被实现。”（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参见法文原著 *Le Siècle*，第 87 页。——中译注）

2 参见 Jean Birnbaum, “L'épurateur du vingtième siècle,” in *Le Monde*, February 18, 2005。在《革命的元政治学》(Méta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中，Philippe Raynaud 评论巴迪欧“将其非凡的才华服务于一种人们将恰当地断定为残暴的政治学”（第 152 页）。Philippe Raynaud 在 150 页讨论了巴迪欧“为红色高棉进行的鲁莽辩护”。

3 参见 Badiou, “Roads to Renegacy”。

相媲美的公民繁盛时期。从政治的立场看，不需要放弃或者回避革命的血腥暴行，因为暴力是世界运行的本来方式，是人类从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罪恶中获得自由的必要代价。在巴迪欧看来，这两种社会形式密不可分，它们相互强化，因而是同样令人反感的。在2002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将民主描绘为“资本的全权代表”¹。巴迪欧参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如下评论：

164

但是经常极端的暴力呢？成千上万的死者？迫害，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人们谈论它们就如同直到今日在历史中标记出种种尝试的全部暴力一样，这些尝试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自由政治，意在彻底颠覆那使社会屈从于财富和有钱人、权力和掌权者、科学和科学家、资本与其仆人的永恒秩序，而且这些暴力认为……工人的集体智慧和任何与秩序不相容的思想（在此种秩序中无耻的利润法则得以永存）……是毫无价值的。总体解放的主题，目前在绝对在场的热情中被实践，它总是被置于善与恶之外……对实在的激

1 参见“Politics and Philosophy: An Interview with Alain Badiou,” in Badiou’s *Ethics*, 99。亦参见 Badiou, “Prefazione all’edizione italiana,” *Metapolitica*, trans. Marina Bruzzese (Naples: Cronopio, 2002), 9–15: “如今敌人不再称之为帝国或资本，而是被称为民主。通过这一术语，我们不仅指‘代议制度’的空洞形式，甚至还指平等的现代形象；在市场报价面前被化约为平等，以实际上是一个像任何其他一人一样的消费者身份为唯一基础来使每个个体与任何其他个体平等。”

情无须道德……道德是旧世界的残余。¹

不同于许多加入改组的社会党或变成人权积极分子的“六八分子”，凭借对毛主义信条的忠诚，巴迪欧似乎最后在政治上落入了一种相对孤单的境地。1984年法国共产主义联盟崩溃时，巴迪欧与其他人一起创办了另一个边缘的左翼政治小派别“政治组织”（L'organisation politique）。他蔑视当代政治哲学的各种变体——民主理论、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这些变体在他看来只是强化了资本的逻辑，这种蔑视似乎给他留下了为数不多的政治盟友，除了他年轻时就加入的毛主义者小圈子。²巴迪欧在接受阿尔都塞的理论后就认为被当作哲学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效果”，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产物或建构。因此，试图将政治附属于哲学是不正当的。巴迪欧试图发扬“元政治学”（metapolitics）来取代政治哲学：从“错失的革命”（révolutionmanqué）的立场对政治现状进行批评性反思。然而，通过抛弃先天的“资产阶级的解放逻辑”，巴迪欧冒着贬低公民自由、群体自治、文化认知和移民权利等领域（社会文化成就的宏伟阵势代表了后五月时代的政治遗产）的真正获益的危险。

人们可以将巴迪欧的政治进路描述为一种从毛主义向后毛主义的

1 Badiou, *Century*, 62–63;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参见法文原著 *Le Siècle*, 第95—96页。——中译注）

2 参见巴迪欧《元政治学》第一章“反对‘政治哲学’”（Against ‘Political Philosophy’）中论争性的评论，第10—25页。

演变——这一轨迹符合后共产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现实。¹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巴迪欧终于对革命先锋主义的罪恶性过激行为大失所望，他将其以后的道路描述为“无政党的政治”（politics without party）。但是坚持一种剥去了“政治集中制”（political centralism）特点的、雅各宾派的或列宁主义的政治构想到底有何种意义，这一点不是很清楚。巴迪欧迟迟才承认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的概念框架（例如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不再是切实可行的。列宁主义确信党一国能够赋予大众以新的活力，并激励他们采取行动。但是这种确信流产了，正如我们从僵化的斯大林主义政治遗产中所了解到的那样。尽管巴迪欧继续为“文化大革命”的太平盛世（据称是1966—1968年“具有英雄气概的”红卫兵阶段）辩护，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最终局势变得如此混乱，以致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得不介入来恢复秩序。此后，共产党觉得它不得不重申它的领导地位，致使“文化大革命”开启的“创造性时代”走向了令人失望的终结，正如巴迪欧所看到的那样，最终为华国锋和邓小平扫平了道路。

巴迪欧断言说，政治将会继续，他引用了俄国革命期间的苏维埃例子和毛泽东反对国民党20年斗争期间从敌人夹缝中艰苦谋生的“解放区”的例子加以证明。²随着法国共产主义联盟的失败，巴迪欧新的政治性团体“政治组织”开始从事各种有价值的事业：所谓“非法移民”（sans papiers）运动、1995年法国公共部门罢工与为巴勒斯坦人

1 参见 Bosteels, “Post-Maoism”。

2 巴迪欧在《元政治学》的结论中引用了这些案例，第152页。

166 谋求更大的公正而斗争。同样，巴迪欧始终是一位各种文化权利斗争或群体权利斗争（女权主义、同性恋自由和各种社群主义）的坚定反对者——只要这些斗争的特殊性被推定为是转移了解放的普遍真理内容。[巴迪欧喜欢把政治称为“普遍的真理—事件”（universal truth-event）。] 最终这些运动就其没有向资本提出客观的威胁而言，是没有资格被称之为政治的。¹

在《元政治学》中，巴迪欧激进地选择（在他看来）当代政治哲学压倒性的守旧倾向，他强调政治作为“事件”的、不能化约的特异性。“事件”是向政治现状提出富有意义的集体挑战的情境。就其本身而言，它们设法破坏政治常态的连续体，然而，在巴迪欧不妥协的理论激进主义（例如以他的著作《元政治学》为代表）与其对“进步的”政治事业（移民权、无家可归者运动和福利国家的收益等）所做的相对不会引起争议性的辩护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分离。一旦历史逻辑不再朝着与马克思主义所示的、巴迪欧自己承认的集体斗争进程，留给人们的就是“事件”作为逐渐消失的“复多的特异性”（multiple singularities）而消长。因此，尽管巴迪欧讨厌后现代主义及其蕴含的认识论相对主义，但是他最近的政治承诺表现出了一种有点随意的、机会主义的和折中主义的性质。既然革命的辩证法彻底破产，并以斯大林主义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过激行为告终（因此巴迪欧最终接受了“无政党的政治”），那么就巴迪欧而言，真理显然变成“后事件的”

1 参见巴迪欧在《政治与哲学》中的评论，第 107—109 页。

(post-evental)；它完全变成“主观的”、去语境化的，就其本身而言没有结果。因此，用一位同情他的评论者的话来说，巴迪欧关于“历史上不确定的独特情境的政治变得正类似于他试图抵制的、真正的后现代碎裂”¹。通过将资产阶级解放的逻辑贬低为一场诈骗，他的政治构架彻底忽略了民主化和法治既能各种团体（后五月时代的社会运动）又能全部政体（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所提供的改进，最终他的后毛主义烙印在政治上仍然是宗派主义的，亦不必将自己边缘化。

167

1 例如参见 Daniel Bensaid 的批评，“Alain Badiou and the Miracle of the Event,” in *Badiou*, 102。Daniel Bensaid 评论说：就巴迪欧而言，

真理在历史灾难的冲击下变得更加破碎、更加不连续，仿佛历史不再构成它的基本框架，而只是它的偶然条件。真理……变成一种后事件的结果。作为“完全主观的”并就“纯粹信念”来讲，真理从此之后属于既无先例又无结果的宣言领域……对巴迪欧而言，不可能存在先验真理，只有情境中的、关系中的真理，真理的情境与关系，朝向了非时间的永恒。（第 95 页）



图 1. 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他们公然反抗政府的禁令，于 1970 年春天非法地散发《人民事业报》。照片：Gilles Peress 来源：Magnum Photo

PROLETAIRES DE TOUS LES PAYS, NATIONS ET PEUPLES OPPRIMES, UNISSEZ-VOUS !

la cause du peuple



1F

Boite Postale 120, Paris-20^e
C.C.P. : N° 364891 - LA SOURCE

JOURNAL COMMUNISTE
REVOLUTIONNAIRE PROLETARIEN

2^e ANNEE N° 27
AOUT 1970

Alain Geismar est partout



Geismar avait dit : l'Élé avec nous.
— Mais pour cela que la bourgeoisie l'a
fait rechercher partout et qu'elle l'a
mis en prison, sans doute s'imaginait-
elle empêcher les révoltes.

Même en liberté, comme s'il est un
révolutionnaire. Geismar s'arrête tout
que proférer bien tout le monde des
mots : just de Paris, du salut, de
la terre entière ; connaître le régime,
— être, en un mot — et prépaie la
bourgeoisie le leur refusent, briser un
dictateur.

Alors l'Élé avec nous. Dans les
rues, il n'y a pas de terre ; la guerre
de classes continue ; à l'étranger, on
a sauté sur l'armée ; un soldat en
détail. Dans les rues, à la France Agri-
cole, un soldat est devenu pour s'être
révolté contre un général s'est vu
la tête qui s'arrête ; il est réintégré.

À Vitry, les travailleurs pénitent
dans le combat révoqué ses courtois
et y leur est le fait de la lutte des
classes. Partout, à la Haïti, à l'Égypte,
de la Chine à l'Inde, les masses trou-
blent les régimes des pays.
A l'Élé de l'Inde, un soldat des
colonnels va à l'Assemblée, à la

Claret, à l'Égypte, contre les accom-
pagnés qui veulent être pour au peuple
le droit de se battre, par eux-mêmes,
un combat les plus que les riches
voient tomber, et en les défont.

L'Élé est partout, et s'est l'é-
lé de tous. Contre cela, que peut
faire la bourgeoisie ? Qui peut l'é-
carter et ses gouvernements ?

Et quand à l'Élé voudra une re-
vue littéraire, que pourrions ?

RIEN, CAR ON NE DÉROUPE PAS
LE PEUPLE.

图 2. 毛主义日报《人民事业报》，它抗议当局逮捕发言人阿兰·热斯马尔。照片：
Gilles Peress 来源；Magnum Photo



André Glucksmann,
la cigarette aux lèvres,
sous la banderole
du Journal maoïste
La Cause du peuple
le 1^{er} mai 1968.

图3. 一场“五月风暴”期间的毛主义者集会，照片突出了待在右侧低角落处的安德烈·格鲁克斯曼。照片：Archives Rouges 来源：Magnum Photo



图 4. 让-吕克·戈达尔, 他于 1970 年春整理被禁的毛主义日报《人民事业报》。
照片: Bruno Barbrey 来源: Magnum Photo



5a.

图 5a 和 5b. 萨特与福柯，他们于 1971 年 11 月在巴黎 Goutte d'Or 街区抗议政府对阿拉伯移民的待遇。照片：Gérard Aimé 来源：Magnum Photo





图 6. 弗朗索瓦·华尔 (François Wahl)、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菲利普·索莱尔和马尔塞兰·普雷奈，他们于 1974 年与他们的中国翻译一道参观北京。
照片：Archives Philippe Sollers 来源：Editions de Minuit、Magnum Photo

TEL QUEL

Littérature | Philosophie | Science | Politique

EN CHINE

紅
衛
軍
東
風
三
年
月
首

Automne 1974

59

图7.《太凯尔》专号“中国之行”，1974年。来源：Editions de Minuit、Magnum Photo

第二部分

知识分子的时刻

“五月事件”让法国自吹自擂的知识分子领袖阶层感到很意外。如前所述，造反的理论灵感没有来自知识分子精英 [法国所谓的“主人思想家” (Master Thinker)]，而是来自边缘群体：像《论辩》团体、“情境主义国际”和“社会主义或野蛮”等左翼小派别。对于法国知识分子来说，“五月造反”给他们上了一堂谦逊课。令他们吃惊的是，也许是第一次，他们发现自己处于追随者而非领导者的奇怪位置上。就其本身而言，“五月风暴”敲响了先知知识分子的丧钟：这类思想家掌握着进入历史的特权，并由此承担着向愚昧大众解释历史进程的任务。

一些像萨特一样的知识分子比其他人更快地（且更好地）吸取了教训。他是“六八分子”公开接受的、唯一具有传统印记的知识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对萨特的反感不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而是由于他的存在主义著作，而战后学生们对这些著作铭记于心。他们试图摆脱令人感到不适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控制，因为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僵化没有满足他们的知识需求与文化需求。相反，存在主义因其对个体自由问题的深刻思考而具有一种开放性，即学生积极分子可以调整和重新塑造以便符合他们迫切的时代诉求。渐渐地，在法国“五月风暴”的影响下，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长期依恋退去了。当他 1979 年为了越南乘船外逃的难民公开而大张旗鼓地进行介入时，他虽像罗伯斯庇尔，但更像伏尔泰。

《太凯尔》的故事充当了萨特人生插曲的一个重要衬托，因为《太凯尔》一开始就像一台“战争机器” (machine de guerre) 一样对准了萨特的介入概念。就其本身而言，“太凯尔”派 (Telquelians) 试图

向这个民族重新引入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因为这个民族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后变得厌烦政治。但是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发展，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了一——政治不可能置之不理。《太凯尔》与毛主义的关系是极为特殊的。不同于萨特和福柯，“太凯尔”派没有接触“无产阶级左翼”充满活力的学生毛主义，他们反而直接从北京（尽管是想象的北京、“他们头脑中的”北京）获得了政治指示。就“太凯尔”派只是将其早期斯大林主义（1968—1971 年）的教条主义直接转向了对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的迷恋而言，其毛主义迷恋的传奇故事要比萨特或福柯的传奇故事令人觉得少一些振奋。出于同样的原因，“太凯尔”派在 1970 年末期也变成坚定的人权主义者，由此追逐苏联持不同政见的时尚浪潮，并崇拜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福柯错过了“五月风暴”，因为那段时间他正在突尼斯教书。但是毫无疑问，他是这样一位法国知识分子：他从后五月的毛主义介入行动中得出了思想最为深邃、影响最为深远的结论。“五月风暴”之前，福柯相对来说不问政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处境是他明显的优势，因为他比萨特或“太凯尔”派有更少的意识形态包袱要抛弃。正是通过他与那些围绕在监狱信息小组（GIP）周围的毛主义者的接触，福柯才发现了“微观政治学”（micropolitics）：权力在微观物理学、微粒子层次上运行于国家的方式。他与毛主义者一起既发现了“社会”的现实，又发现了“文化大革命”的狂热。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接近尾声，这些经历使他对人权的紧迫性很敏感。

在这一点上，福柯的思想（以及法国整个知识分子生活）可以说

是兜了个圈，又恢复了原状。随着“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暴行击中要害，法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发现他们最初的职责，也就是具有德雷福斯事件印记的普遍知识分子的职责：这类知识分子通过使权力面对永恒的道德真理而使权力遭受羞辱。这种从结构主义者信奉的“反人本主义”向“新人本主义”或“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哲学”的范式转换仍在进行中。

让 - 保罗 · 萨特的完美的毛主义时刻

20 世纪 60 年代，结构主义者宣布萨特及其所代表的存在主义现象学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的范式过时了。然而，“五月风暴”意味着对萨特的人类自由学说进行了一场响彻人心的辩护，因为“五月风暴”证明“事件”发生了，历史不仅仅是结构主义者所理解的、晦暗而凝结的风景。此后萨特与毛主义者的合作关系——他一度担任了至少三种毛主义出版物的名誉主编（《人民事业报》《我控诉》和《一切！》）——突然把他抛向法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舞台。自“五月造反”以来，左倾主义已经捕获了当代法国的政治想象。青年人是未来的发展潮流。萨特与“无产阶级左翼”的联盟清楚地表明法国青年人接受了萨特。

同样，萨特与毛主义者的合作不仅仅是政治便利的联盟。就其他法国知识分子来说，萨特的毛主义插曲是容许他摆脱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责难的中继站与必经阶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与毛主义者的联合允许他彻底想清楚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萦绕他心头好多年了。尽管萨特是 20 世纪法国造诣非凡的知识分子，但

是他总觉得这一角色令他感到极为不自在。一方面，知识分子声称是普世价值的倡导者；另一方面，他或她仍然无力去认识这些真实生活中的价值。这种分歧或裂痕影响了知识分子存在的核心，并解释了其特有的“自欺”（*mauvaise foi*）。萨特的毛主义介入促使他以全新的眼光考虑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从此时开始，知识分子将不再体现为一种外在于大众的绝对。相反，他或她反而可能是“人民的朋友”（*friend of the people*）。

“一个寻常人”

萨特是知识分子中间少有的天才，他几乎毫不费力地在每种文学体裁上都获得了成功：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哲学著作、随笔、政论、访谈和剧本。1963年，他出版了获得巨大好评的自传性作品《词语》（*Les mots*），叙述一个他如何在幼年丧父、挚爱的女人们陪伴其左右的条件下为获得文学成功而接受教育的动人故事。通过讲述自己的过去，自由的哲学家萨特逐渐意识到他的性格和人格是如何永不磨灭地由其家庭出身塑造的——这证明超越它们是多么地艰难。萨特的叙述是极为坦率的，是自我苛责的，有时近乎资产阶级的自我憎恨。正如波伏娃曾说的那样，他是黑格尔所定义的“苦恼意识”（*unhappy consciousness*）的完美体现。¹当萨特以挑剔的眼光回顾他早期的文学

1 De Beauvoir, *Adieux*, 4.

突破性作品《恶心》(*Nausea*)时,他深刻地嘲弄自己的成就:“我就是洛根丁……圣灵的选民、地狱的编年史作者和一架正对着我自己的原生质汁液的微型钢玻璃摄影机。后来我又快乐地阐述人是不可能的道理……我被彻底地蒙蔽和欺骗了,我在快活地描写我们不幸的生活条件……我除了不怀疑我是怀疑的选民,其余的一切我都怀疑……我把焦虑不安看作是我的安全保证:我是幸福的。”¹

萨特青年时期认为写作是一项高尚的——并使之高尚的——使命。后来他失望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克服阶级出身的污点和局限几乎是不可能的。1947年大张旗鼓地倡导的整个“介入文学”(littérature engagée)计划似乎失败了。想象(作家的领地)肆无忌惮地使现实无动于衷、无法改变。在医治一个天真的孩子的痛苦方面,文学是无能为力的,萨特叹息说。²假如萨特继续写作——例如他对福楼拜的宏大研究,那么萨特会主张写作比任何其他事情更容易脱离习惯的力量。尽管如此,《词语》以一条谦虚的自我肯定的评论予以总结,萨特描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由一切人所构成,又顶得上一切人,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与他相提并论”³。

181

第二年,萨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随之就拒绝了。他的拒绝

1 Sartre, *Words*, 87。(译文参见萨特:《词语》,潘培庆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80—181页。——中译注)

2 Sartre, interview with Jacqueline Piatier, *Le Monde*, April 18, 1964.

3 Sartre, *Words*, 255。(译文参见萨特:《词语》,潘培庆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83页。——中译注)

在国际上引起一片哗然，并证明取代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文学嘉奖的唯一方式就是拒绝接受它。毕竟有很多人获得诺贝尔奖。只有在另一种情形下，某个被授予诺贝尔奖的人才会拒绝它。¹

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在瑞典评委会宣布萨特获奖的那一刻，他不可抗拒的力量基本上搁浅了。自从“二战”结束以来，萨特始终处于当时重大政治斗争的最前沿：冷战、斯大林主义、苏联入侵匈牙利和阿尔及利亚战争。存在主义的倡导者萨特重新界定了“介入知识分子”（committed intellectual）的理想——这个概念具有一个值得尊敬的法国谱系，可以追溯到像伏尔泰、维克多·雨果、埃米尔·左拉和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这样的人。

萨特生涯中作为介入知识分子（intellectuel engagé）的顶峰无疑是他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原则性立场，当时法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频繁地实施残酷暴行。1961年，萨特公然签名《121宣言》（*Manifesto of the 121*），这一宣言公开要求法国军队撤离阿尔及利亚，政府由此认为这份宣言公开煽动叛国。因其积极的反战努力，萨特位于左岸中心波拿巴路（rue Bonaparte）上的公寓曾两度遭到轰炸。面对可能爆发的国内战争（1961年，不满的军官成立了“秘密军事组织”，公开挑战戴高乐的政策，在法国领土上实施恐怖行动），政府扬言要逮捕许多签名者。戴高乐面对萨特的公开挑衅时，据说他以一句著名的珠玑妙语发表了评论：“我们不能逮捕伏尔泰！”法国总统本不可能给

1 黎德寿（Le Duc Tho），巴黎和平谈判的越南谈判者，他与亨利·基辛格于1973年共获诺贝尔奖。

萨特更高的赞扬，但是戴高乐给了。

然而，随着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中苏关系破裂永久地分裂了“反帝国主义”阵营。流行的、关于“趋同”（convergence）的地缘政治学讨论意味着无论美国和苏联如何宣称意识形态的差异，但是它们的政治制度越来越相似，这种讨论有效地阻止了知识分子介入行动的富有意义的出路。此外，法国正处于准温和的11年总统独裁政治的困难时期，戴高乐“帝王式的总统制”（1958—1969年）接着会被他精心挑选的继任者乔治·蓬皮杜的五年任期规则所效仿，内部政治变革的前途似乎凝滞了。

阿尔及利亚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萨特出版了第二部重要的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这本著作是他在安非他命诱发的昏迷状态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创作完成的。（萨特对苯丙胺类药物上瘾了，当时这种药物可以直接在柜台上销售。不久这种药瘾对他的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¹《辩证理性批判》是萨特对斯大林主义的暴行与罪恶的回应。在这本书中，他思考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限度和本体论限度。在他重新开始《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的概念构架时，萨特思考了群体惰性的必然性，一种他称为“序列化”的现象。在萨特

1 在《形势所迫》（*Force of Circumstance*）中，波伏娃这样描述萨特疯狂的做法：“这不是他平常有的写作情形，停下来思考、修改，撕碎一页，重新开始；他几个小时内不休息，一口气写了一页又一页，没有重新去读一遍，仿佛他被思想吸引了，他的笔甚至以那种速度也追不上思想；为了保持这种速度，我能听见他咀嚼苯丙胺胶囊的声音，他试图一天吃完一管胶囊。”（第385页）

看来，人类群体中间存在着一种浪费最初的革命高潮之活力的准人类学趋势。萨特试图以历史例子来支持他的结论：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热月政变（Thermidor），当时罗伯斯庇尔的追随者自己被推向了断头台；斯大林在 1936—1937 年莫斯科摆样子公审（Moscow show trials）期间对老布尔什维克人的残酷清洗运动等等。假如萨特的政治思考是正确的，那么革命斗争的未来可能是非常暗淡的，否则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¹

因此，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时候，存在主义的革命冲劲似乎耗尽了。一位评论者评价说：“在其整个文学生涯中，他从不与其他知识分子、他的同代人有更多的接触。在巴黎、在拉丁区，他有点像过一个时的人。”²

存在主义消亡的一个信号就是萨特与路易·阿尔都塞于 1960 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法共哲学家的自家地盘）发生的一次富有传奇色彩的对抗。阿尔都塞的门徒连珠炮似地质问萨特，人是否能够基于存在主义现象学的自我中心的框架来理解历史。像马克思主义这种历史导向的范式难道没有必要弄清楚社会群体的行动吗？萨特似乎一反常态，结结巴巴。按照大多数目击者的说法，阿尔都塞不费吹灰之力

1 参见 Aronson, *Jean-Paul Sartre*, 257：“萨特设定了一种形式条件，以《存在与虚无》的方式，这种形式条件几乎超出了我们的把握，注定要付出所有的努力去超越它。因为这种形式条件，他人无论如何都威胁着我们。在给予马克思主义和‘终极的’事实的偶然性以应有的尊重后，萨特转而求助于他昔日的‘幽灵’。在对匮乏的分析中，我们再一次遭遇了‘地狱就是他人’的哲学家。”

2 Cohen-Solal, *Sartre*, 449.

就赢得了这场争论。¹

历史无主体

萨特费了前10年的时间来尽力融合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一种关于存在的哲学就其本身而言不能胜任历史目标 and 政治目标。当时一种竞争性的知识范式出现了，填充了存在主义之后留下的虚空：结构主义严格而非个人化的格栅（grid）。作为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结构主义公开嘲笑笛卡儿哲学中的“我思”的自信，而“我思”曾是法国哲学的起点和必要条件。在援引了更高的“科学”权威后，结构主义竭力表明“我思”是根深蒂固的、源远流长的历史常量（所谓的“深层结构”）的附带性表现。正如弗洛伊德借助无意识来表明自我不再是其自身住所的主人一样，正如马克思论证文化、政治和法律最终是潜在的经济决定因素的表达一样，结构主义者调动“科学的”论证来对抗由意识、思维和精神所表现出来的自律幻想。由此，社会科学的代表们联合攻击了哲学在法国知识分子生活中自吹自擂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自“二战”结束以来就与萨特的名字密不可分。

184

20世纪50年代是结构主义的酝酿期。不过，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来临，萨特的结构主义对手们开始直接攻击他。在《野性思维》（*The Savage Mind*）中，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 关于这场争论的叙述，参见 *Ibid.*, 450-451。

结构主义最令人敬佩的倡导者 [他于1955年出版的自传性研究《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就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发表了一篇言词猛烈、毫无保留的批评性文章。列维-斯特劳斯从流行的、后殖民的人类学相对主义的立场进行了论证。他认为，从殖民主义的烧杀掠夺和残酷暴行来看，更别说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最新罪恶了，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进行辩护简直就是鼠目寸光，毫无远虑。在萨特将马克思主义描述为“我们时代无法超越的视线”的著名论述中，列维-斯特劳斯论证说萨特的确不再抵抗这个陷阱。列维-斯特劳斯声称，萨特对“自为”(Pour-Soi)的痴狂，与野性思维自由自在的自恋具有亲缘关系。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在人们对华沙条约组织掠夺性入侵布达佩斯事件记忆犹新的情况下)，萨特所支持的马克思主义只是西方文化统治的另一种貌似有理的理性化。这位比利时出生的人类学家公然偏爱前现代的非西方社会的相对安宁。这些原始群体与周围的环境相处比较融洽，造成更少的全球性破坏。也许列维-斯特劳斯批评性文章最精彩的部分是他颇不相称地将萨特与美拉尼西亚野蛮人进行比较的那些部分——值得称赞的是美拉尼西亚野蛮人仍未受失控的、妄想自大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影响，而这种“权力意志”令萨特等西方知识分子苦恼不已。

不久后，迈克尔·福柯，结构主义日渐重要的杰出人物之一，他在《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一书中对衰老的“主人”实施了毫不掩饰的攻击。福柯机智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强忍着不去指名道姓，但是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就可以辨别出其论辩怒火所针对的真实目标。

福柯的著作本着结构主义的精神对“人”、“主体性”和“人道主义”（也就说对萨特的存在主义所珍视的所有概念）的幻觉构成了正面攻击。在该书最著名的、充满抒情的章节里，福柯推测人的范式倒会像海边的沙堡一样被冲走。此后，将再一次存在着一个有可能进行思考的空间。¹

对一群“二战”期间成年并忍受政治失望的法国青年思想家来说，萨特获得了一代人的“超我”的地位。他是必须被谋杀的原始父亲，以便“儿子们”兴旺昌盛。当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和《保卫马克思》中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贬低为“意识形态的”、“前科学的”的时候，他的真正目标是极负盛名的、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福柯、阿尔都塞和雅克·拉康等人道主义批评者不断强化的共识就是萨特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范式已经失败了。到了范式改变的重要时刻了，一种结构主义者试图促成的“认识论断裂”[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时刻到来了。

萨特的传记作家安妮·科恩-索拉尔恰当地总结了这些新发展，兹述如下：

1 Foucault, *Order of Things*, 342: “时至今日，我们只有在人消失后所留下的虚空中才有可能进行思考。因为这一虚空……恰恰敞开了一个其最终有可能进行重新思考的空间。”（此处译文参照法文原著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 Gallimard, 1966, 353] 译出。另参见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446 页。——中译注）

萨特曾有好几年是相当边缘的。结构主义、拉康主义、阿尔都塞主义：这些新趋势没有一个不是从他那里引申出任何回应、认识、批评。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支持他的新同行——路易·阿尔都塞、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拉丁区的新明星们……他只是不在那儿了。他接受他们、与他们共存，任其自然发展。但是他仍然保持沉默。当阿尔都塞故意遗忘青年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时，他不吱一声。当拉康就语言发动大争论时，他不吱一声。当福柯出版两部关于疯癫和监狱的杰作时，他也只是寥寥数语而已。他是缺席的，仿佛同代知识分子的关注跟他毫无关系。¹

1964 年，这两种敌对范式的倡导者之间发生了一场值得纪念的遭遇。萨特反对结构主义阵营中的两名重要代表——《太凯尔》派的让·里卡多（Jean Ricardou）和让-皮埃尔·费耶（Jean-Pierre Faye）。这个特殊的时机就是一场万众期待的、在大型公共会议厅“互助会议厅”（Mutualité）举行的研讨会，会议主题是“文学何为？”。《太凯尔》自从 1960 年创刊以来就故意与萨特作对，恳切地信奉以阿兰·罗布-格里耶的晦涩深奥的新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形式主义。对于萨特来说，他仍然是“介入文学”的捍卫者。由此，论坛的进程已经设置好了。萨

1 Cohen-Solal, *Sartre*, 469-470.

特直接发起攻击，批评新小说是唯美主义者的自鸣得意而已。在一个充满社会不公的世界里，文学的放纵是人类难以承受的奢侈。但是“太凯尔”派更加坚定地持有自己的观点。里卡多恰当地反驳说，通过意义生产的能力，文学从一种沉默的匿名性中救赎了人的存在。值得赞扬的是，文学记录了其他方式忽略不计的人类痛苦的例子。就其自身而言，不管它愿意与否，它都是一种增强自我意识的练习。¹ 萨特似乎遇到了对手。

结构主义的伏击令萨特毫无提防。1965年，他已过60岁了。除了列维-斯特劳斯外，或许还除了福柯，萨特似乎从未仔细地阅读过结构主义者的批评。² 尽管如此，萨特至少曾试图给予前后一致的回应。1966年，法国杂志《弓》(*L'Arc*)发表了一篇对左岸存在主义老前辈萨特的访谈。萨特在反驳中坚持认为结构主义的真正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他们对历史的抛弃，”他继续说，“最终从总体上抑制进步的历史变革的观念。”随着对结构主义批评的到来，历史变成了一道凝滞的、僵化的风景，像一幅伊夫·唐居伊(Yves Tanguy)的画作：

187

1 关于这一事件的讨论，参见 Forest, *Histoire de Tel Quel*, 210-211。

2 这一解释参见 Cohen-Solal, *Sartre*, 449；

听到萨特或其亲密好友陈词滥调般地极力贬低米歇尔·福柯（“一名绝望的实证主义者”）的重要性，或者以历史的名义拒绝民族志、语言学和精神分析，这是令人失望的。即使法国当时因列维-斯特劳斯、巴特、拉康、阿尔都塞和福柯而激动不已，但是萨特无论如何都拒绝正视他们的丰富的研究方法，更别说在这样一场对抗中本可以是相当有益的开放心态了。

地形缺少方向、目的或意义。萨特说：“历史背后，当然是马克思主义遭遇了攻击。任务是想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再次建立起来的最新障碍，用以反对马克思……在语言系统中，有一些东西是惰性（即结构）不能单独给予我们的：实践的标志。只有在结构被其他结构制造的范围内，结构才会强加给我们。因此，为了理解一个结构是如何被制造的，有必要引入实践作为累加过程的方式。”¹

尽管萨特避免详尽地参与其结构主义对手的论辩，但是很难否认的是他对结构主义决定论的批评——这在萨特看来意味着确认而不是竭力超越“实践—惰性”——显示了他的先见之明。因为结构主义的时日也是屈指可数的。

一年后，弗朗索瓦·弗雷（Francois Furet）对萨特的诊断提供了一种不公平的证实。在弗雷努力给结构主义的兴起提供一种历史解释时，他指出结构主义大受欢迎，与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同时发生。因为法国左派对进步的历史变革的信心被苏联社会主义正在进行的官僚主义愚笨逐渐消耗掉了，所以它往往陷入一种历史的政治宿命论。结构主义以一种对富有意义的人类改善的前途持自我消除的犬儒主义为特点，它在一个极端的政治幻灭的时代里变成风靡一时的范式。²

188

1 “Replies to Structuralism: An Interview with Jean-Paul Sartre,” *Telos* 9 (Fall 1971): 110-111.

2 Furet, “French Intellectuals: From Marxism to Structuralism,” in *In the Workshop of History*.

“萨特的报复”

在一年内，“五月风暴”大概证明了“事件”仍然是有可能发生的。整整一个月，结构主义的陈词滥调天天在拉丁区的大街上、阶梯教室里遭受批驳。哲学家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贴切地总结了“五月风暴”的知识“教训”，他的评论众所周知：“结构不上街闹革命。”换言之，历史不是“凝滞的”。主体性和“事件”重申了它们的特权。也只是在结构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明确地把萨特看作是一个“废物”后的几年光景，他也在谋求着政治上的东山再起。

在很多方面，“五月事件”成为萨特思想的强劲有力的证据，尤其是他完全相信，尽管客观条件不利，但是男人和女人有能力通过独立自主的意志行动来积极地影响历史事件的进程。南泰尔大学心理学家迪迪埃·安齐厄（Didier Anzieu）提及萨特的革命“融合群体”（group-in-fusion）学说时说：“五月学生造反试验了它自己的、有关萨特的原则‘群体是人类的开端’的版本。”¹那么，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在其结构主义运动的权威性历史著作中将关于五月风暴的那一章取名为“让-保罗·萨特的报复”²，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1 Epistémone, *Ces idées qui ont ébranlé*, 83;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2 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2:112。[参见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中译注]

在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与政治积极分子的能力方面，萨特从一开始就卷入“五月起义”之中了。

5月10日（声名远播的街垒之夜），萨特联合签名了一份宣言，这一宣言发表在强烈支持学生诉求的《世界报》上。这份材料因其显示出关于学生造反的社会学基础和存在主义基础的深刻见解而闻名：法国青年人不愿意被消费社会的甜言蜜语与廉价玩意收买、诱惑。学生的不满情绪不再由零星的改革予以补偿。萨特早就像其他一些人一样认识到，学生造反接受了一种“整体拒绝”（total refusal）的伦理观。正如他与其共同签字人所倡导的那样：

我们此时向世界上所有学生运动所承诺的团结——这些运动突然颠覆了所谓的在法国如此完美体现的休闲社会——首先是对一切谎言的答复，通过这些谎言，所有机构和政治组织……和所有出版机关和其他媒体……目前几个月来一直致力于改变上述运动，通过嘲弄它们而将它们引上邪路。¹

不久以后，萨特开始利用卢森堡广播电台，试图左右学生们所赞成的公众舆论。他所发表的结论显示了萨特最典型的特征：敢于冒险、激情澎湃、多才多艺和旗帜鲜明。

1 M. Legris, "M. Jean-Paul Sartre à la Sorbonne: Pour l'association du socialisme et de la liberté," *Le Monde*, May 22, 1968.

这些青年人不想在一系列我们耳熟能详的主题内去分享他们父辈们的未来，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未来……也就是说这一未来已经清楚地显示了我们的怯懦、我们的厌倦、我们的惰性和奴性以及我们对封闭系统的完全屈从……不管政体如何，暴力是留给学生的唯一东西，这些学生还没有进入他们父辈们的系统，他们也不想进入其中……目前，我们松懈的西方国家中唯一的反政府力量是以学生为代表，但是我希望这种力量很快将传遍我们所有的青年人。¹

190

萨特的深刻见解立即被学生们复制，并以传单形式散发到整个拉丁区。

接下来，萨特开始占据《新观察家》的版面。自从他1964年东京演讲以来，他曾试图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萨特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使命被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张力撕碎了。一方面，知识分子声称从“普世”立场或从普遍有效的知识的立场来发表意见。然而，他们的行动实际上总是为特殊的社会利益服务。在这一点上，萨特吐露了他在自己的工作中日益察觉到的张力，这一张力构成《词语》的自我批评主旨之一。萨特不断地努力定位他为了解放的目的与目标而进行的活动，但是他觉得阶级社会的制度性约束不停地阻挠他的努力。不管他怎么努力，事实证明是几乎不可能超越特

1 *Les écrits de Sartre*, ed. Michel Contat and Michel Rybalka (Paris: Gallimard, 1970), 463-464.

权的污点。随着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萨特清楚地认识到列宁主义的“先锋”模式过时了。那么人们该如何根据这种认识来采取行动而不至于堕落为另一种过时的知识分子理想——文人理想或资产阶级唯美主义者的理想？

在五月骚乱期间，萨特拜访了丹尼尔·科恩-邦迪，因为他有理由将公众关注的中心让给这位3月22日运动极具魅力的领导人。萨特的谦恭行为同时是一种政治行为，这种行为预示了哲学的和个人的谦逊的新意义，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谦虚理解，就是知识分子是某类深谙进退时机的人。

191 萨特意识到，借由“五月起义”，革命主义的编年史进入了未知的领域。他持一种开放心态，并渴望向他的学生对话者学习。萨特敏锐地意识到戴高乐的总统独裁政治是多么地具有压抑性。出于这些原因，他越来越欣赏一种能够证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变革之先兆与刺激因素的造反运动。在这一点上，萨特向法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倡导者表露出他的优越性，而这些意识形态倡导者将“五月风暴”贬低为一场宏大的革命表演：一群被宠坏的“爸爸的儿子”进行的造反。

对科恩-邦迪进行的访谈有点儿滑稽可笑，有时像一场对牛弹琴式的对话。萨特反复想把学生造反比作一种拘谨的组织心态，这种心态不同于学生造反无拘无束的自发精神。因此，他一再劝说科恩-邦迪谈论学生们的长期“规划”与“目标”。而科恩-邦迪（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个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厌恶的左翼共产主义传统有关的无政府主义者）反而断然否认有任何“规划”和“目标”，这令萨特沮丧不已。萨特相信反动势力阻止了一场成功的革命夺权后只会被增强。

就其自身来说，科恩-邦迪没有这种担心，对布尔什维克模式的厌恶使他怀疑那摧毁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念是否是一个可取的目标。他意识到，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社会变革必定是演化的、渐进的。他已经感觉到“体制内长征”[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 引自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领导者鲁迪·杜切克]的必要性。一旦一个人放弃了列宁主义——而且这仍然是3月22日运动一方与托派分子、毛主义者一方(尽管这三方“小派别”显然都讨厌法国共产党)之间决定性的意识形态分裂路线，确实没有其他的选择。科迪-邦迪相信，无论成功与否，学生造反在二战后法国政治体制生活中开启了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刻开始，不再有回头路。在这些方面，科恩-邦迪表明自己比萨特更现实，在政治上比萨特更精明。

从这次访谈看，显然科恩-邦迪极为厌恶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所犯下的政治罪行清单：布尔什维克党人对1921年喀琅施塔得起义的镇压、斯大林1936—1937年摆样子公审、华沙条约组织1956年入侵布达佩斯。假想的战略目标的极端观念令他讨厌不已。因此，学生造反的主要优势之一——强烈地厌恶僵化的、传统的组织结构——也是它的主要弱点之一。

随着“五月事件”达到极点，萨特发现自己陷入两种竞争性的、矛盾对立的政治激进主义观念之间。他的马克思主义训练暗示了——正如法国共产党和毛主义者都反复强调的那样——无产阶级仍然是唯一真正的革命动力。从此，萨特如大多数正统的左派分子一样相信，为了即将发生的革命，法国工人阶级必须完成学生们已经开启的事业。因此，作为一名政治思想家，尽管萨特对学生的关注持有值

得赞扬的宽阔胸怀，但是他不能克服其残存的工运中心主义。

同样，在 1968 年 6 月发表在《新观察家》上的《“五月风暴”的新思想》（“*L'idée neuve de Mai 1968*”）一文中，萨特展示了一种对“何谓‘五月风暴’真正的利害关系”的敏锐意识。他认识到学生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的“催化剂”。它同时预兆了一种全新的、没有限制的自由观念，后者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狭隘的意识形态束缚。正如萨特所说的那样，“我斥责那些辱骂学生的人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看到学生吐露了一种内在的诉求：对主权的诉求。”¹凭着这种洞察力，萨特承认“五月风暴”的意义与夺取政权的布朗基派列宁主义的幻想无关，也与使生产方式社会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目标无关，它反而关系到“自律”与“自决”的自由主义理想。废除严格的等级制度、既定利益和未经授权的社会权威对学生革命分子的意愿来说是最重要的议题。他们不是去摧毁资产阶级社会，而是试图践行其原初的、激进的民主潜能与解放潜能。这是“五月风暴”的余波中激增的多样性斗争的意义，这些斗争使车间和大学走向民主化。新的“日常生活政治”积极地使日常的存在变成人类成就感的储存库，而不是使日常的存在作为“闲暇时间”变成消费社会的具体化扩展。

193

“五月造反”结束后不久，科恩-邦迪致以萨特最高的赞颂，认为他的著作和学说对学生革命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当中没有人读过马尔库塞的著作。当然有些人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也许读过巴

1 Sartre, “*Idée neuve de mai 1968*,” 21.

枯宁的著作，在当代思想家中，他们读过阿尔都塞、毛泽东、格瓦拉和（昂利·）列斐伏尔的著作。但是3月22日运动的政治激进分子都读过萨特的著作。”¹

学生革命分子对萨特致以敬意的一个突出证据是，在索邦大学5月20日声势浩大的集会上，萨特是唯一的、被允许在拥挤的会场发表演讲的知识分子“保守派”成员。²因此，尽管学生们心中有怒火中烧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冲动，但是他们渴望寻到萨特的认可。大约有7000名学生挤满了演讲厅和旁边的庭院，只是为了听萨特的演讲。

阿尔都塞、福柯、列维-斯特劳斯和拉康的确不能激起他们的兴趣。作为一名法国共产党的坚定分子，阿尔都塞通常与学生激进主义的政治保持一种安全而舒适的距离，因为一个令学生抗议者联盟团结起来的因素是他们无限地憎恶法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在自传性作品《来日方长》(*L'avenir dure longtemps*)一书中，阿尔都塞给予“五月风暴”的叙述寥寥数语，只有15个词。³作为回报的是，随着“五月事件”的发展，学生革命分子通过一个机敏的双关语向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与思想贫乏进行报复，嘲笑阿尔都塞的追随者是“毫无价值的阿尔都塞”(Althusser-à-riens)。福柯缺席“五月风暴”，

1 Cohn-Bendit et al., *French Student Revolt*, 58.

2 参见 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2:112-113: “没犯任何错误。让-保罗·萨特是唯一获准在位于造反中心索邦大学的主演讲厅发表演讲的重要知识分子。”[译文参见《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大潮》(下)，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译文有所改动。——中译注]

3 Althusser, *L'avenir dure longtemps*, 389-390.

当时他在突尼斯教书。他从同性恋伴侣丹尼尔·德菲尔那里定期收到有关骚乱的最新消息。列维-斯特劳斯主要关注的是学生无政府状态将使结构主义事业倒退 20 年。他惊慌地逃离了法兰西学院，对学生的骚乱视若无睹、充耳不闻，长达 8 天之久。最令人沮丧的也许是拉克对学生们高人一等的姿态。“你们将找到一个新主人！”他在造反的高峰期众所周知地宣布道。由此以最典型的结构主义方式暗示了一切政治变革都是妄想，人们最多也只能成功地实现领导权的变革。

学生们对结构主义的厌恶是彻底的、根深蒂固的。对于他们来说，结构主义意味着目空一切的知识分子精英（新“主人思想家”）神秘深奥的话语。他们感觉到结构主义对“科学性”的诉求是一种他们竭力瓦解的管理心态的意识形态表达。毕竟，结构主义者公开宣布历史和事件本质上不再存在。学生们借由言语行动，凭其可以支配的各种方式努力去证明结构主义者是错误的。

学生革命分子反而向《恶心》《存在与虚无》和《词语》的作者致以救世主一样的敬意。“这位蔑视大学殊荣的哲学家，这位目前不流行的、15 个月前被埋葬的‘人道主义’代表、作品曾被结构主义作坊磨成纸浆的哲学家，曾被阿尔都塞派的高压势力搞得非常沮丧，而现在萨特东山再起了。”¹正如埃尔韦·阿蒙（Herve Hamon）和帕特里克·罗特曼（Patrick Rotman）曾恰当地评论的那样，索邦大学的激进分子在 5 月 20 日找到他们的苏格拉底（Socrates）。²在“五月事件”

1 Hamon and Rotman, *Génération 1*:523.

2 *Ibid.*, 525

的余波中，列维-斯特劳不得不让步：“在法国……结构主义不再流行。自‘五月风暴’以来，一切客观性都被否定了。青年人的立场更符合萨特的立场。”¹

在《一切事毕》中，波伏娃描述了学生占领索邦大学时期的混乱场景，兹述如下：

在我刻苦学习的青年时期，甚至在1968年初，我都不可能想象这样一种集会。红旗飘扬在小教堂和伟人雕像之上，墙上挂满了几周前南泰尔校园创造的绝妙口号。每天都有新的献词出现在走廊里，出现在新宣传册、海报和图画上。簇拥的人群激情澎湃地在楼梯上或站在院子里进行辩论……青年人、中学生拥挤在阶梯教室的长椅上；任何想发言的人都可以陈述他的情况，解释他的想法，要不就提出任务或口令，同时听众会给予回复、支持或批评。新闻处设在演讲厅和幼儿园的阁楼里。许多学生在那里用睡袋过夜。支持者带来了果汁、三明治和热饭。²

195

在“五月事件”的骚乱中，索邦大学的学生们向萨特接二连三地询问下列有关哲学、政治和人生等方面的迫切问题：

1 John Hess, "French Anthropologist at Onset of 70's Deplores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1, 1969, 4.

2 De Beauvoir, *All Said and Done*, 425.

问题：您说“地狱就是他人”时，您想表达什么意思？

萨特：假如我们现在讨论那个问题的话，我们会浪费太多的时间。

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吗？

萨特：直到现在，无产阶级专政通常是指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问题：您可能是一个好艺术家，不过您是一个讨厌的政客。

萨特：我不是作为政客到这里来的，我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到这里来的。¹

在萨特向学生听众演讲的过程中，他对“五月事件”提出了下列政治上敏锐的诊断：

科恩-邦迪已经确保这场运动仍然沿着适合于它的论战道路前进。显然当前的（工厂中的）罢工运动起源于学生造反。法国总工会的立场是一种延迟加入的立场 [尾巴主义 (suivisme)]，它发现有必要与罢工运动保持一致，以便镇压这场运动。它想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你们创造的、颠覆一

196

1 参见 Legris 的叙述，Legris, "M. Jean-Paul Sartre à la Sorbonne"; "Sartre à la Sorbonne en mai 68," *Le Nouvel Observateur*, May 27-June 2, 1988, 125。亦参见 Drake, "Sartre and May '68," 43-65。

切机构的基层民主。因为法国总工会本身就是一个机构。相反，此时正在形成的的是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的新构想、一个社会主义与自由之间的联盟，因为社会主义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¹

萨特承认工人与学生团结一致是“五月运动”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他意识到，对于其全部的优点而言，青年时期是人生的过渡阶段，它可以充当一种推进政治变革的催化剂。然而，假如任由自行决定，它的范围与抱负是有限的。大学改革只有作为更广阔基础的社会改造的一部分才可能是有意义的。

萨特提醒学生们小心别有用心、共产党主导的法国总工会。一般来说，共产党人害怕无政府状态，并且他们出于自己的官僚主义目的努力接受了这场造反。事后看来，萨特的猜疑完全得到了证实。6月，共产党和戴高乐达成一项要求“五月事件”戛然而止的临时协定。

直到5月，萨特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列宁主义的政治模式，后者强调职业革命先锋队的首要角色。他曾在《情境》中评论道：“列宁的40卷著作体现了一种对大众的压迫：我们认为，因为大众如今没有时间也没有方法去处理这种知识，它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知识。”²这种理论的经典性表达就是列宁1902年发表的《怎么办？》。然而，布尔什维克主义曾是在适合于沙皇警察国家的政治情况下构想出来的，

1 Legris, "M. Jean-Paul Sartre à la Sorbonne."

2 Sartre, *Situations*, vol. 8, *Autour de '68*, 71.

因此布尔什维克强调一支训练有素的精英队伍的秘密行动。这种模式对其他欧洲国家的适用性是不确定的，尤其在民主社会主义自 19 世纪以来就享有一系列卓越成果的地方，但这一点又难以成功地加以论证。当布尔什维克党人 1917 年 10 月夺取权力时，尽管在一个政治发展被沙皇严重阻碍的国家中（农奴身份迟迟到 1861 年才在俄国被废除），但是列宁主义模式在 1914 年溃败后混乱的国际左派中间获得一种巨大的声望。

萨特加入“毛派”

后五月时期萨特卷入左倾主义的传奇故事以他参与“无产阶级左翼”的行动为中心，“无产阶级左翼”是后五月时期各种小派别中间最激进的一个小派别。

如前所述，“无产阶级左翼”的先驱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从根本上不满于法国共产党。在他们看来，法国共产党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它是极度斯大林主义的，而在于它充满了“修正主义的”倾向，因此是“不充分斯大林主义的”。在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看来，1966 年法国共产党在阿让特伊（Argenteuil）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法国共产党公开信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青年马克思、格奥尔格·卢卡奇和罗杰·加洛蒂）的训诫，这些训诫在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毛主义者来说，他们诽谤“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滑向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毛主义高师生们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纯粹性。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

教条主义被作为一种预防资产阶级政治道德和政治习惯“旧病复发”危险的措施。阿尔都塞学说以及在法国日益著名的毛泽东思想的优势就是这两种思想潮流为了忠于列宁主义正统观念而坚决抵制修正主义的诱惑。阿尔都塞默默地反对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的建立，由此展现了一种意味深长的、主人/导师与他的学生们之间的分裂。在他看来，法国共产党是法国唯一可靠的革命机关，脱离了它，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政治变革。

当“五月风暴”学生抗议爆发时，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的激进分子仍旧漠然处之。就学生造反缺乏真正的无产阶级品质而言，它的确不值得重视，它只是一个“被期望但未实现的事件”（nonevent）而已。他们死板的意识形态眼罩已使他们不能去理解这种被释放的激进抗议的新形态。他们反而仍固守革命先锋主义的信条。总之，当“二战”后最重要的革命巨变爆发时，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的积极分子就开小差了，是一帮“爽约者”（no-shows）。

198

那年夏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以其典型的毛主义方式着手组织了持续很长时间的自我批评会，努力搞清楚他们政治上的错误判断。由于法国政府于6月取缔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所以毛主义者在那一年晚些时候改组为“无产阶级左翼”。他们大幅双面报纸《人民事业报》的报头一侧饰以毛泽东的头像，下侧是锤子和镰刀的图案——坚定不移的意识形态纯正性的象征。然而，他们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有时被“五月风暴”的解放精神抵消了。

1970年春，这一团体做了一项惊人之举，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突然劫掠了“右岸”时尚美食精品店馥颂（Fauchon）。当天下午1点30分，20名

“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带着大塑料袋破门而入，“解放了”大量的精美食品：鱼子酱、鹅肝酱、香槟酒、奶酪等。期间，50 名高中生支持者守候在外边，保证“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畅通无阻地撤向当地地铁站。然后积极分子转入罗宾汉模式，在贫穷的非洲人居住的伊夫里（Ivry）分发他们的战利品。根据一位目击者的说法，当地人在伊夫里可以直接比较俄国鱼子酱与伊朗鱼子酱的相关优点。“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事先提醒了新闻记者注意即将发生的机密行动，由此吸引大量媒体来关注他们的事业。在标新立异的新闻报道中，他们被封为英雄，甚至连主流媒体都禁不住称许毛主义者的无私精神，他们的行动有助于突出发达工业社会中奢侈与贫困之间令人震惊的差距。

在劫掠的过程中，一名“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弗雷德里克·德朗热（Frédérique Delange）被持刀的馥颂员工们抓住了。随着她被逮捕的消息传播开来，一场争取将她释放的抗议运动随后发生了。公众人物与娱乐界名人因她的逮捕而开始鼓动抗议行动。滚石乐队的主唱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一度发表声明支持她，但没有什么效果，法国法院下达了一份严厉的判决书，判决弗雷德里克·德朗热 13 个月监禁。

尽管如此，由于馥颂劫掠行动，兼因政府过度紧张的回应，仅由几十人组成的“无产阶级左翼”突然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法国舆论发生了惊人的转变，转而支持毛主义者。按传统的逆转方式看，法律与秩序的力量被视为压迫者，“无产阶级左翼”罗宾汉式的革命分子被视为被压迫者。像弗雷德里克·德朗热这样的“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毕竟是法国中产阶级的儿女们。从这一点来看，“五月事件”

所释放的无政府恐惧已经过去了。资产阶级的法国对这一点极为愤慨：内政部长雷蒙·马塞兰及其同僚们故意监禁了他们的“孩子”，随后在匆忙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这一事件欢欣鼓舞。记者弗朗索瓦·吉鲁（Françoise Giroud）在《快报》（*L'Express*）上说：“谁正将我们的民主置于危险之中？无纪律的孩子们（他们梦想着一个公正的世界，对他们在课堂上或教义问答书中被教导的行为来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做得很过分）吗？抑或是那些给社会秩序以这种可憎的面目的人（以便他们最终鼓动只是孩子的人来反对这种社会秩序）吗？”¹

随后更多的人被逮捕了。1970年3月，马塞兰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控告了“无产阶级左翼”领导人员。在没有警告的条件下，所有的《人民事业报》都被警察肆意没收了。3月22日，《人民事业报》编辑让-皮埃尔·勒·当泰克在警察的袭击行动中被逮捕，并被送到桑迪监狱（La Santé Prison）。“无产阶级左翼”再次制造了头条新闻，并赢得一大批支持者。当时弗朗索瓦·密特朗公开谴责这一系列合法而可疑的逮捕和查封：“如若当局没有预先判断发表在《人民事业报》上文章的内容，那么我既不赞成使用对作者不利的司法程序，也不赞成对勒·当泰克和（米歇尔·）勒·比利采取预防性逮捕行动，更不赞成对他们使用习惯法的概念。”²

马塞兰和总理蓬皮杜表现得很愚蠢，使一触即发的局势继续恶化。4月30日，政府提出了一项泛泛的、考虑不周的“反暴乱”法，国

1 引自 *Génération*, by Hamon and Rotman, 2:172。

2 参见 Bourseiller 在《毛主义者》一书中的叙述，第 128 页。

民会议审议通过了这项法律。这项法律将其成员参与公共骚乱的组织判定为犯罪，由此牵连没有参与的人遭受控告。当天，继任勒·当泰克的《人民事业报》编辑米歇尔·勒·比利也被逮捕了。¹ 尽管“无产阶级左翼”没有犯可以确认的罪行，但是它已经成为政府大规模而全面镇压的目标。对“无产阶级左翼”领导人员进行仓促的监禁判决只是装腔作势而已：勒·当泰克被处以一年监禁；勒·比利遭受八个月监禁。最终，在一场相当于公开宣战的事件中，马塞兰于 5 月 27 日宣布“无产阶级左翼”彻底被取缔，但是他动用国家权力来强有力地镇压一小撮学生激进分子的企图竟然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

“无产阶级左翼”领导人员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他们立即决定找萨特商量对策，看他是否愿意当《人民事业报》的名誉主编。毕竟萨特长期以来支持被迫害者、被践踏者。自从“五月造反”以来，他始终支持学生事业。他们最好采取任命萨特做主编的策略，这样他们才会有可能戳穿政府的幌子。未事先通知就逮捕一些 20 岁左右的高师生是一个普通事件，而逮捕一位世界著名的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另当别论了。

萨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挑衅马塞兰逮捕他。他立即通过卢森堡广播电台发布了他的消息。他指出，作为《人民事业报》的新主管，他要与其前任勒·当泰克、勒·比利一样肩负起许多责任。他的意图就是想使内政部长及其同谋们表现为伪君子、懦夫，由此使政府的名

1 参见 Bourseiller 在《毛主义者》一书中的叙述，第 124 页。

声一败涂地。说到逮捕学生的时候，他们大胆妄为，一旦触及文学名人萨特的时代却失去了斗志。

对自己该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无产阶级左翼”的意识形态计划，萨特是持矛盾态度的。他最初发布一条新闻，声称通过担任主编职位，“我肯定与（‘无产阶级左翼’）所有的行动休戚与共……这些行动将表现当前真实存在于大众中间的暴力，以便加强它的革命品质。”¹ 不过，几天后这位哲学家决定不再做出明确的表态。他不是给毛主义者的“行动”提供全盘支持，而是更加谨慎地确认他与他们发表的政治文章休戚相关。

在“无产阶级左翼”领导人员被逮捕后，萨特立即冒着更大的风险在“互助会议厅”召开了一次声援他们的会议。他与波伏娃、米歇尔·莱利（Michel Leiris）组成了《人民事业报》支持者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La Cause du Peuple*）。更为不利的是，一个模糊的“无产阶级左翼”“军事派”开始出现了：自封的“新人民抵抗运动”（*Nouvelleresistance populaire*）。这个名字对毛主义者的信念产生了一定影响，即法国社会处于“占领”政府控制之下；毛主义者相信他们体现了一种新型的“抵抗”运动。接着，萨特和波伏娃在勒·当泰克6月被定罪宣判后谋划了一次极具宣传效果的行动：他们极为高调地在巴黎大街上公开分发被禁的报纸。马塞兰迟疑不决，未敢贸然采取行动。这一年秋季，另一名“无产阶级左翼”坚定分子

201

1 Hamon and Rotman, *Génération* 2:169.

阿兰·热斯马尔被逮捕后，萨特又担任了另一份毛主义报纸《一切！》的名誉主编，这份报纸在“五月风暴”中的口号是：“我们想要的一切！”此时，萨特的公众关注度开始与他 10 年前阿尔及利亚战争抗议期间的形象相媲美。

毛主义者公众名声的转折点发生在 1970 年秋，刚好发生在阿兰·热斯马尔的审讯与判决之前。9 月 24 日，滚石乐队定于在凡尔赛门(Porte de Versailles) 附近的大型露天体育馆巴黎体育馆举行演出。当天下午，一个共同的朋友促成了米克·贾格尔与“无产阶级左翼”领导者塞尔日·朱利（日后成为法国日报《解放报》出版商）在滚石乐队下榻的、位于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 外侧的巴黎克里昂大酒店(Hotel Crillon) 的会晤。当天晚上，当演唱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滚石乐队突然中断了他们的演出，并邀请朱利直接向观众演讲。他跨步走到麦克风前，代表全法国的政治犯发表了一场令人感动的抗辩演讲，这些政治犯当中既有毛主义者，同样也有非毛主义者，他们遭受了马塞兰施加的不公正监禁。朱利赢得了观众持久的热烈掌声。当天晚上演唱会结束时，“无产阶级左翼”增加了另一个改变他们的事业的称呼：滚石乐队的领唱。¹

常去听音乐会的青年人进而把这件事变成左倾主义的庆祝会。随着米克·贾格尔引吭高歌这个团体独具特点的圣歌《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 ——《世界报》将其描绘为“黑弥撒”(Black

1 参见 *Le combat des détenus politiques*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1970) 一书中的描述。

Mass), 100名激进分子设法冲破警察的警戒线,高喊着“青年人的音乐属于青年人!”“自由的演唱会!”等口号。根据法国有案可查的报纸的说法,娱乐业找到了其理所当然的左派分子。¹

尽管萨特及其朋友们对“资产阶级司法”的压抑性本质持完全怀疑态度,但是左派分子受益于一次著名的司法成功:在勒·当泰克的审判中,法官断然拒绝立即查封《人民事业报》。此后,内政部长继续笨手笨脚地竭力没收那些已经印刷和发行的报纸。

因此,萨特的传奇生涯掀开了一名介入知识分子的崭新篇章,他的传记作者贴切地总结了这些发展:“整整两年来,萨特分享了他的毛主义新同志的激进生活,完全过着一种新的、使他的政治活动激进化的生活,写文章、示威游行、提供证据、占领工厂。”²不可否认,毛主义者利用萨特作为“庇护伞”,使镇压暴力陷入绝境。就其自身来说,哲学家萨特从他们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热情中复活了他暮年时期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积极分子的光辉形象。³

随着萨特的卷入,“无产阶级左翼”的公众关注度急剧飙升。正如一位评论者所察觉到的那样,随着萨特执掌《人民事业报》,“毛主

1 *Le Monde*, September 24, 1970, 10.

2 Cohen-Solal, *Sartre*, 475.

3 关于萨特支持“无产阶级左翼”的动机,可以参见这个团体的辩护律师 Henri Leclerc 的证据:“确实(萨特)卷入了‘无产阶级左翼’,因为人们感到他想‘处于百忙之中’(in the thick of things)——这是他始终担心重复他在德国占领时期表现的政治被动性的结果。革命到来了,他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引自 Leclerc, *Combat pour la justice*, 154.

义者没有一天不是报纸、广播……甚至电视的焦点”¹。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整个巴黎知识界都陶醉并沉迷于毛主义之中。在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中间，毛主义变成了激进的时尚——风靡一时的政治时尚。

政治动机

1967 年，也就是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年后，萨特和波伏娃开始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旅行，直接调查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转变。他们失望地离开中国。波伏娃解释说：“防止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级，赋予人民群众真正的权力，使每个人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完人，我只能支持这些表达形式所描述的计划。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能给予中国像苏联在许多人心中所激起的盲目信任。”²

萨特远非是投机取巧，他介入“无产阶级左翼”是受革命信念所激发。起初，他显然不同意毛主义者为纯粹的公民自由主义基础所进行的辩护。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从没接受毛主义的整个世界观。萨特觉得“无产阶级左翼”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令人十分反感——恰恰令人想起了他以前觉得难以忍受的共产主义的那些方面。在毛主义者向他谎称发生在圣心大教堂（Sacré Coeur Basilica）的抗议活动失败，

1 Bourseiller, *Maoïstes*, 127.

2 De Beauvoir, *All Said and Done*, 415。参见波伏娃早期的、对中国持保留性热情的著作，*La longue marche: Essai sur la Chine* (Paris: Gallimard, 1957)。

由此把这位年老的哲学家置于危险之中后，他突然辞职了，不久后又返回到毛主义者的包围之中。他甚至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批评《人民事业报》歪曲性的报道，甚至声称资产阶级媒体尽管谎言连篇，但是比“无产阶级左翼”的日报包含了更多的“真实”。¹

204

那么是什么吸引萨特注意毛主义者身上的左倾主义？归根到底还是萨特钦佩毛主义者的革命狂热。在一个欧洲工人阶级依然满足、懒散的时代中，“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能够把握好一股可能消失的造反冲劲。当然这股造反冲劲在法国共产党人中间肯定找不到了，他们的官僚主义僵化作风与议会守旧态度的结合已经在学生与知识分子等以前的同盟者中间产生普遍的失望情绪。

在萨特的后期政治著作中，他对“序列性”（seriality）的分析强调需要一种外部的催化剂来激励梦游般的、原子化的大众。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通过等车者离散积聚的例子来描绘“序列化的”或者具有惰性倾向的群体的困境：

譬如说圣日耳曼广场上，人们聚集在教堂前的车站上等候公共汽车……这些人——他们的年龄、性别、阶级和社会环境都有很大的差别——在日常的平凡中实现孤独……是大

1 参见 Jean-Edern Hallier 的访谈，“L'ami du peuple,” in *L'Idiot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1970); English translation in “A Friend of the People,” by Sartre, in *Between Existentialism and Marxism*, 287。关于圣心大教堂事件，参见 de Beauvoir, *Cérémonie des adieux*, 27-28。

城市的居民的特点……事实上，首先必须指出，这里涉及的是孤独的多元性：这些人彼此间漠不关心，互不说话。一般说来人不互相观察……孤独的强度作为一个暂时的和偶然的集合中成员之间的外在性关系，表达了社会整体的大众化程度。¹

205

对于萨特来说，“序列性”变成了法国当代社会反对力量和反对分子中间缺乏社会凝聚力的一个隐喻。在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贫瘠的政治风景中间，萨特反而认为“无产阶级左翼”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激进论战的宝库。

“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将他们自己理解为民粹主义者，而非先锋队队员——这是萨特所欣赏的另一个品质，由此他们试图融合卢梭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像值得敬佩的让-雅克（·卢梭）一样，毛主义者相信人民本质上是“好的”。因此，《人民事业报》的编辑策略是“工人自治主义的”（autogestionniste）：除了偶尔来自“无产阶级左翼”领导人员的意识形态社论文章外，大多数文章是由工人自己写的，并且是为了他们自己写的。正是按照这种精神，萨特才在 1972 年的一篇访谈中公开声明，他被毛主义者吸引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他们的“直接民主”的设想有关。² 萨特逐渐明白了革命斗争的历史是一部领

1 Sartr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256–257. [译文参见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 1 卷），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07—408 页。——中译注]

2 Sartre, P. Gavi, and P. Victor,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Paris: Gallimard, 1974)：“正是你们的直接民主的设想在我看来才是连接你们与我的纽带。”

导者背叛人民大众的历史。他相信，通过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传统知识分子”能够克服这样一种使命的自我矛盾——这种使命使知识（观念上是“普世的”）服务于统治精英的目的。

在一些场合中，萨特不再相当详细地阐明他介入毛主义事业的知识分子原则。他仍然相信社会主义不能通过增量变化被实现 [这一立场是他在1973年的文章《选举：傻瓜的陷阱》（“Elections: A Trap for Fools”）所着重重申的]，而他将这种增量变化与“修正主义”联系起来。萨特钦佩毛主义者们的坚贞不屈地现身于革命斗争。¹“治安武装力量”毫不犹豫地动用镇压手段来保护他们的利益，正如蓬皮杜政府相当粗暴地关闭《人民事业报》的诸多努力所充分表明的那样。萨特借阿兰·热斯马尔1970年被逮捕与被审判的时机发表评论：“《人民事业报》的任务是想指出，暴力以所谓的经济规则的名义强加于人民，（工人们）在工厂里承受着难以捉摸的却浑然一体的暴力……这一切实际上是一种奴役形式。没有合法的手段或改革的余地来对抗这种暴力。只有一种方法：大众暴力。”²在萨特的眼中，革命暴力是一个正当防卫（*défense légitime*）的案例。

206

但是，像20世纪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萨特满怀激情地献身于社会正义，这使他低估了革命主义的弊病。殖民主义的各种不公以及萨特对苏联模式的灰心失望决定了他会异常地支持第三世界主义——古巴、刚果、越南等国家。在他眼中，“全世界受苦的人”

1 Sartre, “Elections: A Trap for Fools,” in *Life/Situations*, 198–210.

2 引自 Bourseiller, *Maoïstes*, 158–159;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Wretched of the Earth) (法农) 表现为马列主义的合法继承人——在萨特看来，苏联已经公开背叛了这一革命传统。“无产阶级左翼”“过激的”亲华定位由此与萨特 20 世纪 60 年代特有的激进政治倾向相吻合。值得赞扬的是，“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通过他们的教唆与象征性行动总是努力使五月精神保持活力。

在萨特看来，毛主义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其鲜明的“道德”品质。正如他在 1972 年出版的一本毛主义文集的序言中所声称的那样，“对于毛主义者来说……凡是革命暴力在大众中间产生的地方，它直接是极度‘道德的’。这是因为工人们直到那时始终是资本主义专制主义的对象，他们变成他们自己历史的主体，哪怕是片刻也好。”¹ 相似的是，“五月风暴”期间，萨特辩解学生的战斗精神是“以暴制暴” (counterviolence) 的样本，“不仅仅是偶然的以暴制暴来反抗惹怒他们的警察，而且反对压迫他们的整个社会”²。由此，萨特重新开始了一种相当可疑的 (必须承认道德上是难以理解的) 立场，他起初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各种文本中阐述这一立场，以支持第三世界主义。萨特论辩道，鉴于资产阶级暴力是压制性的，被压迫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暴力构成一种自我肯定的有利行动。³ 当萨特利用他曾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所阐述的理论框架时，他认为下层阶级的暴力给“序列性”

207

1 Sartre, "The Maoists in France," in *Life/Situations*, 169.

2 Sartre, "Les Bastilles de Raymond Aron," *Le Nouvel Observateur*, June 19, 1968, 26.

3 参见收于 Sartre 《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 (*Colonialism and Neocolonialism*) 一书的论文。

或无产阶级的原子化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平衡力。正是在这样一些宏伟壮丽的革命高潮的时刻，工人阶级才达到了近乎“阶级意识”的友爱水平。这样，萨特论辩道，无产阶级不再是压迫的对象，而且第一次成为它自己的历史的主体。

罗伯斯庇尔的幽灵

萨特的暴力与道德的等式——他相信暴力是再生性的，就其本身而言是人性再生的先决条件——突出了一些与他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以及更普遍的法国革命传统有关的基本问题。此前，萨特尝试着去连接暴力和道德，这种最不含糊也是最令人不安的努力就是他为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全世界受苦的人》所撰写的煽动性序言。

萨特在阿尔及利亚冲突的高峰期撰写了这篇序言，当时法农自己处于创作的高峰期，却悲惨地死于白血病。萨特运用其全部的、惊人的修辞天赋来辩解民族解放阵线（FLN）的暴力是一项反殖民主义的自我肯定的关键性行动。在那些令人联想到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pirit*）中所提出的“主奴辩证法”的术语中，萨特提议，对于被殖民者来说，通向自我实现的唯一道路就寄托在一场反抗他们的压迫者的血腥起义上。在充当了殖民地暴力的对象或目标之后，当地人在萨特看来别无选择，除了以类似的方式报复压迫者。萨特主张，只有通过消灭殖民者的方式，被殖民者才能实现两个有价值的目的：使自己从单调乏味的压迫心理中解放出来（这种心理仅仅有益于被动地接受殖民环境或者“合作”），并促使他通往一种完整的

208 人的状态。对萨特来说，被压迫者身上表现出来的暴力就其例证了“以暴制暴”而言是合理的：其目标是摆脱压迫或控制的暴力。既然暴力自有历史以来就有了，那么对被压迫者来说，坚决抛弃这种手段将是伪善的，萨特辩论道，尽管这些手段是令人讨厌的。他断言这事实上是他们唯一的、可供他们支配的手段。

出于这些原因，在萨特看来（事后看来似乎是一样成问题的），暴力和再生是密不可分的。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法农赞颂了暴力是一种“净化的力量”（cleansing force）。法农主张，暴力将当地人从“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中解放出来，并由此将他从只会导致“绝望与懒散”的麻痹心态中解放出来。¹为了回应法农，萨特在其有争议的序言中宣称：“击败欧洲人是为了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消灭压迫者，同时消灭他压迫的人：只剩下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²

几乎在同一时期，萨特赞颂古巴革命是一个“经由暴力获得幸福”的范例。按照波伏娃的说法，萨特在 1960 年古巴旅行期间意识到法农主张的真实性——“只有在暴力中，被压迫者才能意识到他们的作为人的状态”。³萨特所赞同的“以暴制暴”可能变形为一种新的暴政

1 Fanon, *Wretched of the Earth*, 73.

2 Sartre, preface to Fanon's *Wretched of the Earth*. 在 1973 年的一篇访谈中，萨特重申了他对革命暴力必要性的信念，他说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雅各宾派拒绝绝杀足够多的人。

3 De Beauvoir, *Force of Circumstance*, 503, 606.

形式或压迫形式，这是这位哲学家莫名其妙地拒绝深思的前景。

不可思议的是，萨特对法农论点的赞同完全剥离了阿尔及利亚造反的政治特殊性。他对暴力的迷恋排除了这样一种前景——也许对冲突的协商解决可能更有助于促成一个和平的、民主的阿尔及利亚未来。而萨特似乎以一种与早期哲学的存在主义伦理观相一致的方式做出了先天的道德决定和承诺。他的主张具有康德“先验演绎”(transcendental deduction)的性质。好像他正努力使一种全新的绝对律令合法化，这种绝对律令适应了一个反殖民主义集体斗争的时代——正如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所论述过的那样，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持枪的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 with revolver in hand)¹。在萨特看来，协商与妥协是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令人不悦的返祖现象。萨特喜欢遵循第三世界革命主义令人兴奋的逻辑，并将其贯彻到底。

209

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种下了政治激进主义的种子，他将阶级社会与社会不公的问题归因于匮乏现象。不过，除了这种历史思考外，萨特认为还出现了群体动力学所特有的不利条件，也就是退化为“序列性”的群体的本体论倾向，它往往浪费革命冲劲，凝结为具体的、惰性的某种东西——一个物。

萨特仍如此执着于革命主义的逻辑，这显然是来自历史事例的研究，他曾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运用这些事例去说明有关群体的惰性

1 Bloch, *Geist der Utopie*, 242.

消耗或序列性的主张。他从现代革命时代的开端——攻占巴士底狱(the storming of the Bastille)开始着手分析。在萨特看来,这种向共同敌人发起的暴力革命起义统一了此前离散的群体,反而将其变成了一个“融合群体”(fused group/group-in-fusion)。对于萨特来说,攻占巴士底狱例证了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在《希望》(*Man's Hope*)一书中描绘为世纪末日的景象:“序列解体为融合群体”。萨特引用一个来自《国王的朋友》(*L'Ami du Roi*)的目击者的描述进行了解释:“将近傍晚的时候,巴黎成了一个新的城市。不时射出的炮弹提醒居民保持警惕。炮弹的爆炸声和不断发出警报的钟声汇成一片。聚集居民的60所教堂里挤满了人。每个人都在里面演讲。”¹

210

萨特对融合群体的溢美之词与其持续的革命浪漫主义是一致的。与序列化群体相比,融合群体是介入的、充满活力的,并且是勇敢的。不过,问题在于融合群体在萨特的社会本体论中如若没有可能的话就极难保持它超越这一造反热情之初始时刻的革命激情。在存在主义意义上和在现象学意义上,群体命中注定要再度陷入序列性——不严谨的分裂群体的原子论。

为了保持革命计划,群体必须以某种方式被重新激发活力。在这一点上,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差一点就危险地信奉恐怖是一种解决匮乏问题和序列化群体问题的意识形态平衡力。萨特在紧要关头

1 Sartr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357-358. [译文参见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2卷),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19-520页。——中译注]

将恐怖坚定地定义为“打破必然性的共同自由”¹。在这一点上，“必然性”承担了匮乏和“实践—惰性”的替身角色——这种“实践—惰性”是不可更改的自在或物的熵拉力。在萨特看来，恐怖意味着“反对实践—惰性的正义暴力”²。“整体化的这种新地位是恐怖，”萨特断言说，“而恐怖是司法权：每个人都以众人为中介而对其他每个人表示同意，让每个自由的永久基础成为对必然性暴力的否定，也就是说，让在每个人中作为共同结构的自由成为对异化的个人自由的永久暴力。”³当人们读到这些句子的时候，人们不得不赞成雷蒙·阿隆的判断，即萨特冒着将人类解放的哲学同暴力哲学合并的危险。⁴

为了抵消群体消耗的诱惑和危险，萨特赞颂了革命“誓言”的好处。誓言迫使个体成员受制于群体及其目标——如若违者则以死论处。正如萨特所解释的那样，誓言是“在群体中建立一种对成员

211

1 Sartr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430. [译文参见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2卷), 第598页。——中译注] 关于这一问题在萨特著作中的精彩讨论, 参见 Santoni, *Sartre on Violence*。

2 Ibid., 432. [译文参见中译本《辩证理性批判》(第2卷), 第600页。——中译注]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3 Ibid., 441. [译文参见《辩证理性批判》(第2卷), 第610页。——中译注]

4 Raymond Aron, *History and the Dialectic of Violence*, trans. Barry Coop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 160。在“五月起义”(阿隆众所周知地将其贬低为一场“心理剧”)后, 萨特向《新观察家》(1968年6月19日)投了一篇文章《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狱》(Les Bastilles de Raymond Aron), 这篇文章刻薄地提议阿隆应该被剥夺教职, 因为他在课堂上只是回收利用了自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使用的陈旧讲课笔记。关于萨特与阿隆敌对描述, 参见 Drake,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135。

们施行绝对暴力统治的（为了每一个人而被众人接受的）一系列真实手段……发誓就是作为共同的个体来话说；如果我搞分裂，你就将我杀死。”¹ 在这一点上，萨特对法国抵抗运动姗姗来迟的效仿（他自己为了抵抗运动而开展的活动是不热心的、平凡的）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几乎能够想象这位哲学家钦佩地凝视着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那幅歌颂共和国美德的著名画作《贺拉斯兄弟之誓》（*The Oath of the Horatii*）的场景，该画作就在卢浮宫，很便于萨特欣赏。似乎对于萨特而言，几乎任何有助于对抗匮乏、战胜压迫之目标的行为似乎可以说是“道德的”，因此其令人不安的结论是“恐怖”（Terror）产生了“博爱”。博爱，萨特写道，是“暴力……通过肯定的相互性表现为内在性联系”²。

政治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开始之际，众所周知，罗伯斯庇尔命令道，在革命条件下，“恐怖”是“美德”的表现。罗伯斯庇尔相信，融合这两者的能力是革命政府的本质。“恐怖，”罗伯斯庇尔宣布道，“就是正义、迅捷、严肃而坚定不移；因此它是美德显现出的气质。”³ 雅各宾派

1 Sartr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430–431. [译文参见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 2 卷），第 598—599 页。——中译注]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2 Ibid., 43. [译文参见中译本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 2 卷），第 607 页。——中译注]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萨特继续评论道：恐怖“是共性个体之间的相互的半透明关系……任何‘环境’都比不上一个不断受到外部威胁的专制党派更温暖”。[译文参见《辩证理性批判》（第 2 卷），第 609 页。——中译注]

3 Robespierre, “Sur les principes de morale politique qui doivent guider la Convention,” in *Œuvres*, 300.

领导人的副手路易·安东尼-圣茹斯特 (Louis Antoine Saint-Just) 公开颂扬了“美德”与“犯罪”之间的类似联系。¹正是这种被保持的联系，革命才能产生激动人心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这正是革命注定造成的历史场面。只有到那时，它们才能在后代的脑海里留下持久而鲜明的影响。

萨特极其认同这种雅各宾派谱系，并竭力改造其后期的政治哲学来适应这一谱系。在许多方面，他只是将早期哲学夸大的唯意志论——《存在与虚无》中对自为或“意识”的赞美——转变为《辩证理性批判》中革命阶级或群体的集体立场。²在1973年的一篇访谈中，正值他支持“无产阶级左翼”活动的高峰期，他对雅各宾派血腥的政治遗产提出了毫无畏惧的赞同之词，兹述如下：

212

在一个革命的国度里，当资产阶级被剥夺了权力时，那些煽动造反或密谋的人应该被处以死刑。并不是我对他们有丝毫愤怒。反动派自然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但是革命政权必须清除某些威胁到它存在的个体；我看除了处死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人们总是逃避监狱。1793年的革命分子可能杀得不够多，由此无意之间有利于恢复秩序，然后回到王政复辟时代。³

1 Saint-Just, *Œuvres complètes*, 969: “没什么比伟大的犯罪更像美德。”

2 关于对萨特认识论的与政治的唯意志论的全面批评，参见 Merleau-Ponty, “Sartre and Ultra-Bolshevism,” in *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95–202。

3 Sartre, “On Maoism: An Interview,” trans. Robert D’Amico, *Telos* 16 (Fall 1973): 98.

假如萨特后期的哲学激进主义因序列化群体的问题搁置了，那么这一失败的认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存在与虚无》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实质上，萨特的哲学框架不能使团结或人类主体间性概念化。在萨特看来，他人 (the Other) 取代的是一种博爱精神，直接在人的自由之上设定了界限。在萨特的眼中，主体间性取代的是一个相互认识的过程，在内在本质上是对抗性的。因此，萨特玩世不恭地按照科耶夫的方式（或按照科耶夫的黑格尔的方式）将主体间性视为一场永不松懈的殊死斗争。¹类似的是，对于萨特来说，他人是一种具有敌对倾向的意识（对我的存在的潜在的否定），这种意识使“我”遭遇“生成非人的永久可能性”²。援引常常被提到的《禁闭》(No Exit) 的结论就是：“他人就是地狱。”此处的问题是萨特的社会本体论缺乏人类互联性的积极意义或设想。所以，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关于人类群体的观点因序列性问题或群体内爆而失败，也就无足为奇了。他对主体间性所做出的好斗性理解实际上没给他留下什么选择的余地。

213

“枪杆子里出政权”

萨特赞赏的是，那些崇拜伟大舵手毛主席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

1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7: “谈及自我意识的起源，就不得不谈及为承认所进行的殊死搏斗。”

2 Sartr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697.

权”的毛主义者通过他们的行动试图使革命主义激情保持活力。¹他说：“因他们的反专制实践，（毛主义）激进分子似乎成为能够适应‘组织化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时期阶级斗争新形式的唯一群体。”²萨特也沉思自问说，从自传的立场看，毛主义者的态度令他想起了他早期哲学的伦理唯意志论。他懊悔他在亲莫斯科的同路人阶段为了“政治现实主义”（political realism）而危及了他青年时期信奉的道德准则。（这个时期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初持续到1968年苏联入侵布拉格。在《斯大林的幽灵》（*The Ghost of Stalin*）中，萨特对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提出了有所保留的批评，这一事件为未来的政治联盟留下了空间。）通过与“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同甘共苦，他觉得他重新体验了其前共产主义时期“自由哲学”的特征。³

毛主义者似乎给萨特提供了他多年来始终斗争期间的困境的一种解决方法：知识分子在一个政治转型的时代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在他的眼中，列宁主义者的先锋队的政治模式完全不可信。20世纪的历史

214

1 毛泽东的主张首先是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中全会上提出来的，参见 *Selected Works* 2:272。[该处注释不是很准确，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观点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参见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毛泽东明确提炼为“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中全会上：“每个共产党人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参见《战争和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中译注]

2 Sartre, “Maoists in France,” 171.

3 参见萨特等人在《造反有理》一书中的讨论，第68页。

史充斥着领导阶层背叛工人阶级革命的政治抱负的事例：最新的是法国共产党签署了格勒纳勒协议，这一协议令“五月事件”戛然而止，接下来是这年晚些时候苏联残暴镇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¹

“无产阶级左翼”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民粹主义思潮：红卫兵“自发地”站出来清洗已经对大众需要反应迟钝的中共保守派领导层。在萨特看来，知识分子比人民大众更好地理解历史进程的主张常常是不可信的。在萨特与“无产阶级左翼”联盟的过程中，他逐渐相信“真理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这不再是一个给大众提供思想的问题，而是一个遵循他们的运动、找到他们的源头，并更清楚地表达他们的问题（假如他们赞同这一点的话）。例如，在《解放报》（萨特与其他人共同创办的独立日报）上，我能够阐述一种既是群体的又是我的思想。但是我并不幻想去写一本从头到尾将决定一切的书。”²

萨特在 1970 年的一篇访谈中详细阐述了这些观念，他在这篇访谈中解释说“五月事件”改变了他对知识分子角色的判断。他得出的政治结论之一是“五月造反”使知识分子（从伏尔泰到左拉，到朱利安·邦达）作为普世价值的守护者的传统观念过时了。“五月起义”显示了学生和工人完全有能力表达他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诉求。

1 关于萨特对苏联入侵布拉格事件的分析，参见“Czechoslovakia: The Socialism That Came in From the Cold,” in *Between Existentialism and Marxism*, 84–117。亦参见 Grémion, *Paris-Prague*。

2 Sartre, “On Maoism,” 100.

此外，知识分子领袖在“五月风暴”期间不是作为先锋而是作为后卫来发挥作用。正如萨特所说的那样：

五月风暴发生时……我了解到青年人正质疑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等，而且也是我们这些假装反对一切的人。大家可以说我从1940年到1968年是个左翼知识分子 [a left-wing intellectual (un intellectuel de gauche)]，从1968年开始，我变成了左派知识分子 [a leftist intellectual (un intellectuel gauchiste)]。差异就在于行动。左派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类人，他们意识到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可以使他免除虚无。他放弃了特权，或者尝试将其付诸行动。¹

215

在《知识分子请愿书》（“*A Plea for Intellectuals*”，1966年）——所谓的“东京演讲”——中，萨特强调了知识分子使命的矛盾本质。一方面，知识分子以虔诚的德雷福斯护卫者的方式试图与美德、正义和真理的普世价值结盟。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阶级社会的畸变又系统地阻止知识分子去实现这些价值。

大约在1970年，萨特因参与毛主义活动而促使他再次重新评价知识分子的使命。他总结说左翼知识分子从没解决他们的普世抱负与

1 Sartre, “Sartre Accuses the Intellectuals of Bad Faith,” interview with John Gerassi,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17, 1971, 118.

职业排他主义之间的矛盾，这种排他主义迫使他们安于现状。因此，在后五月的岁月里，他认为知识分子是黑格尔“苦恼意识”的典型体现。否则说“自欺”——另一个典型的萨特术语——是他们的基本命运。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分子从没克服或解决那充满其存在之本质的本体论矛盾。因此，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是“不可能的”——正如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宣布“人”是“不可能的”、是一种“无用的激情”。在那一点上，萨特将“人的真实性”（human reality）粗略地定义为“这个存在是其所不是，又不是其所是”。他以一种虚无主义的华丽辞藻进行了总结，说“沉迷于孤独或驾驭人民到头来都是一样”¹。萨特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对他来说是一种逃避他早期存在主义立场具有倾向性的犬儒主义的方式。在萨特看来，只要知识分子的普遍自负与阶级负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意味着他们持续地留在“自欺”之中，知识分子就是“不可能的”。

萨特很有可能是资产阶级自我憎恨的急性发作。据他自己承认，他出生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环境中。在其政治激进主义的巅峰时期，他意识到他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这样一种情感在他的亲华时期重新浮现出来，因为萨特概要地总结说知识分子作为普遍真理承载者的传统使命已经过时了。在萨特看来，成为一名“左派知识分子”——与左翼知识分子相对的左派知识分子——意味着告别传统知识分子及其不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萨特亲华情愫的高峰期，萨特出版了

1 Sartre, *Being and Nothingness*, 797. [译文参见萨特：《存在与虚无》（修订本），陈宣良等译，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756 页。——中译注]

最“超然的”(disengaged)、最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家庭白痴》(*The Family Idiot*): 一项关于福楼拜的、卷帙浩繁的三卷本传记式研究。在研究福楼拜的过程中, 萨特提出的问题是, 我们能在何种程度上认识一个人? 他运用了以前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曾使用过的“向前的-回溯的”(progressive-regressive) 方法, 以便评价福楼拜性格的社会决定因素与心理决定因素。萨特解释说: “我想要我的读者能够感觉、理解和懂得福楼拜的性格既是他所处的时代的完整个体, 又是他所处时代的完整代表。”¹ 名义上, 萨特主张, 在福楼拜文学秉性的审美观念与他自己的“介入”观念截然相反的范围之内, 他选择福楼拜作为他的研究主题。然而, 法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花了近20年时间(萨特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构思福楼拜的研究) 全身心地研究法国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 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显而易见的是, 对自我认同的深刻评价在萨特选择福楼拜作为研究主题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在萨特努力破译福楼拜发展轨迹的关键要素的过程中, 他同时努力地去洞察自己的人生历程。

“造反有理”

217

作为一种政治时尚, 毛主义以各种方式来表达自身。为了充分利用对左倾主义的普遍陶醉, 著名的伽里玛出版社(Gallimard) 委托萨

1 Sartre, *Situations*, vol. 9, *Mélanges*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72), 114.

特编辑一套新系列丛书“野蛮的法国”(La Francesauvage), 该出版社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始终是萨特著作的出版商。萨特欣然接受了这一委托。这套系列丛书以《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为开端,《造反有理》是一本萨特、皮埃尔·维克多与《解放报》记者菲利普·卡维(Philippe Gavi)之间的政治谈话录。¹ 萨特先总结了自己的政治历程:从他20世纪30年代故意的“去政治思想”(apoliticism),到德国占领时期转瞬即逝的抵抗行动,再到20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同路人的身份,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逐渐失望。萨特承认他总觉得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僵化令人厌恶。这与他自己的自由哲学很不适应。他们的“风格”死气沉沉、冷酷无情,散发着压抑的臭气,这足以说明了一切。然而,正如萨特事后所说的那样(由此表明了他自己的政治幼稚性),只要他将法国共产党视为法国工人阶级唯一合法的代表,他就总是认为他的同路人身份是合理的。² 这个假定后来证明是多么不正确。

与共产党人共命运提供了某些政治优势。世界恰好被划分为善良的势力与和邪恶的势力:一方是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另一方是资产阶

1 “造反有理”这个提法出自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撰写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的英译本载于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ed. Stuart Schra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260-261。

Mao, “A Letter to the Red Guard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Middle School,” in *Mao's Selected Works*, xx.

2 参见 Sartre et al.,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32: “假如你当时与法国最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建立联系……这是因为你想与工人阶级进行接触。”

级。不过，在“五月事件”的余波中，因为左倾主义抓住了法国的政治想象，左派命中注定的想法似乎一落千丈。造反的狄奥尼索斯方面——作为政治斗争和狂欢节日的革命——暗示了社会主义的意义被彻底改变了。它不再等同于“使生产方式社会化”——一种根据历史经验来判断只会屈从于新型压迫形式的秘方。造反的要旨和征兆随着一系列新的激进“文化”诉求的出现而彻底改变了。女权主义者、同性恋权利积极分子、囚犯和移民都试图找到宣传的焦点，以便促使他们的诉求获得认可。1970年，“无产阶级左翼”的一个支部分离出来，组建了“革命万岁！”，放弃了毛主义者的工运中心主义的方向，去全身心地追逐力比多政治的需求。

尽管萨特年事已高，但是他拒绝回避这些新的造反形式。他是《解放报》报社（一个非正统的新闻社）背后的领导灵魂。这个名字暗指了左派分子的信念——德国占领期间（1940—1944年）与戴高乐貌似温和的11年总统独裁政治之间存在着令人信服的政治相似性。这个报社的创始者们试图让这份日报仿效抵抗运动于1941年创办的、名字相同的报纸。创办初期，《解放报》（为狂热爱好者所熟知）极不正规。一个评论者这样描述它：“报纸的专栏和标题印得乱七八糟，教皇来法国时充满了奉承之词，版权声明漏掉了照片，伪造选举结果（毛：0.3%），允许报纸因声名狼藉的‘排字工人的记录’（Notes from the Compositor）而出现移行，以致重排版面。”¹左派分子对抵抗

1 Martel, *The Pink and the Black*, 88.

运动明显的（当然有点困惑的）认同几乎伴随着他们所有的活动。因此“无产阶级左翼”所谓的“军事派”在奥利维耶·罗兰（Olivier Rolin）的领导下取名为“新人民抵抗运动”（the Nouvelle résistance populaire）。¹ 萨特与其同道的左派分子觉得人们不能信任主流媒体去报道后五月时代出现的大量社会新斗争的“真相”。² 他们认为这类信息有必要传递给大众。为了启动财务方案，萨特将伽里玛出版社预付给《造反有理》的全部稿酬（大约 3 万法郎）慷慨捐出。在“无产阶级左翼”前激进分子塞尔日·朱利的领导下，《解放报》逐渐发展成为法国重要的、发行量极大的左翼日报。

从毛到摩西

萨特参与“无产阶级左翼”最奇异的陪衬情节之一就涉及他与皮埃尔·维克多的关系。维克多是班尼·莱维的化名；埃及出生的犹太人、政治煽动者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他在“五月风暴”的余波中成为“无产阶级左翼”的实际领导人。在他的同仁中间，维克多被认为是圣茹斯特转世：朝气蓬勃、口齿伶俐、精力充沛，具有一种残酷

1 参见 Rolin 新近出版的、关于这段岁月的小说式叙述《纸老虎》（*Paper Tiger*）。

2 波伏娃解释说：“我……意识到被当权者迫害的左翼媒体是多么有必要存在：没有其他人会费心对工人阶级的状况、他们的日常生活与他们的斗争做出真实而详细的报道。左派报纸努力告诉工人阶级有关他们自己阶级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个资产阶级媒体忽略或歪曲的主题。” *All Said and Done*, 443。亦参见 Lallement, *Libé*; Ian Birchall, “Sartre and Gauchism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19 (1) (1989): 21–53。

无情的政治意志。根据其左派分子同仁的证据，维克多屡次想把“无产阶级左翼”推向其他派别唯恐踏入的方向。在这一点上，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之一就是因为维克多没有法国国籍，所以他只好参与他所构想策划的、为数不多的政治“行动”。一旦被逮捕，就意味着他将被驱逐离境。

一般来说，萨特喜欢女性朋友，而不喜欢男性朋友，这一点众所周知。就这一点来说，他与维克多的关系是个例外。萨特既被维克多的战斗精神又被其非凡的政治魅力所吸引。¹ 萨特在1977年的一篇访谈中反思了他们的友谊之后，他评论了维克多的政治智慧，他说维克多的政治智慧尤其胜过他认识的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而且，维克多表现了一种置他的政治地位于风险之中的非凡意愿——没有教条主义，这一点让萨特耳目一新。不像萨特其他的男性朋友，维克多在谈话中似乎也准备并乐意明确地偏离政治主题，一个萨特称之为维克多“女性”方面的特点。² 在许多方面，萨特视维克多为他不曾拥有的儿子。

220

促成左倾主义溃败的关键性事件之一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简称 PLO) 对1972年奥运会的攻击 (这一攻击被世界各地的观众“实时”观看了)，致使11名以

1 参见 Badiou 的证据, "Roads to Renegacy," 125-133: "(维克多)是'无产阶级左翼'极具魅力的领导者, 另外他也是由萨特选定的。他对知识分子具有超强的诱惑力, 也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各种能力的组合使他在诱惑萨特之前就迷惑了许多积极分子。"

2 "Pouvoir et liberté: Actualité de Sartre," *Libération*, January 6, 1977, 11; 亦参见 de Beauvoir, *Cérémonie des adieux*, 54。

色列运动员身亡。这一事件使萨特陷于尴尬境地。一方面，他长期以来是以色列的拥护者。对青年一代的法国犹太人，他于1946年撰写的讨论犹太人问题的著作[《反思犹太人问题》(*Ré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juive*)，英译本名为《反犹分子与犹太人》(*Anti-Semite and Jew*)]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成为犹太人自我意识的大胆号召。¹同样，在以往的一些时刻，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时候，萨特试图为被压迫者实施的恐怖主义提供哲学上的辩护。因此，萨特完全有资格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实施的攻击进行辩护：

那些肯定以色列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人认为巴勒斯坦人有权利捍卫国家主权，巴勒斯坦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必须认识到以色列（政治）当局的政治策略是极其愚蠢的，故意拒绝一切可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在政治上有理由说战争状态存在于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在这场战争中，巴勒斯坦人唯一可以利用的选择就是恐怖主义。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但是贫穷而受压迫的人们没有其他可资利用的方法；那些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用以反对法国人的恐怖主义的法国男女接着不得不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行动。这个被遗弃的、被出卖的和被放逐的民族只有组织致命的攻击才能表明

221

1 参见 Jean-Paul Sartre, *Ré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juive* (Paris: Morigien, 1946)。亦参见 Judaken, *Sartre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它的勇气和仇恨力量。¹

萨特将他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立基于这样一种（结果是错误的）假设：在德国安保部队执行考虑不周的营救行动的过程中，以色列运动员丧生于一阵冰雹般的枪炮声之中。他由此假定他们是被德国人的子弹杀死的。然而，后来的证据清楚地表明一些运动员是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激进分子实施袭击时惨遭杀害。但是，除了与以色列运动员死亡有关的特殊情境外，萨特一再忽视战斗者与非战斗者之间存在的、关键性的道德和法律差异。因此，即使有人为了论证而假定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存在着“战争状态”（一种假设，一旦做出这种假设，实际上就排除了协商解决的可能性），这种既非道德上的、也不受国际法约束的声明，将会同意对无辜的平民实施攻击。

这一次萨特从左翼包抄了“无产阶级左翼”同志。“无产阶级左翼”在更加谨慎地前进的同时，寻求一种双管齐下的方法。一方面，它不断地批评以色列不公平地占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另一方面，所谓的武装派别“新人民抵抗运动”发表了一项声明，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左翼”与慕尼黑谋杀案无关。“无产阶级左翼”的声明尤其主张武装斗争的伦理观是禁止攻击无辜的平民。[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是人们只攻击人民的直接敌人……（因此），人们必须要辨别一般以色

1 Sartre, "A propos de Munich," *La Cause du Peuple/J'Accuse* 29, October 15, 1972。亦参见 Auron, *Les juifs de l'extrême gauche*, 236。

列人与军队、警察或以色列占领机构。] ¹ 萨特反而在他的理论著作中探讨过暴力伦理学，他觉得认可民族解放阵线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所采取的暴力行动而否认巴勒斯坦人所采取的同样方法，这是前后不一致的。

222

当1973年左右毛主义运动令人出乎意料地分崩离析的时候，萨特任命维克多为他的私人秘书。在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的动机既是理智的又是注重实际的。一方面，萨特尊重维克多是政治上机敏的对话者。另一方面，由于维克多的学生签证过期了，所以萨特给他的这个职位可以让他不必返回出生地埃及。1976年，随着维克多的侨居身份越来越不安全，萨特直接给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写信，要求他插手解决这个问题。刚刚失明的萨特恳求说，如果没有维克多的帮助，他就不能完成他的著作。吉斯卡尔满足了萨特的请求，同时声称尽管他鄙视维克多先前的左翼政治情愫，但是萨特完成全集的重要性胜过所有的其他考虑。

维克多对萨特日渐增强的影响开始在萨特“家族”其他成员中间引起嫉妒，尤其是《现代》的工作人员和波伏娃。在其感人的、关于萨特最后岁月的著作《告别仪式》中，波伏娃甚至控诉维克多“腐化老人”，就是说运用他对萨特的过度影响来利用年老的哲学家，以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令人质疑的目的涉及维克多对正统犹太教日益强烈的兴趣。而萨特的养女阿莱特·埃尔坎-萨特（Arlette Elkaim-

1 Sartre, *La Cause du Peuple*, September 14, 1972.

Sartre) 感到她不得不发表一封公开信来证明萨特对有关犹太人弥赛亚主义主题姗姗来迟的兴趣的真挚感情; 这封信就发表在萨特与其他人共同创办的法国日报《解放报》上。¹

“无产阶级左翼”内部分裂后, 维克多全身心地研究《塔木德》(Talmud), 由此维克多因其原名班尼·莱维而放弃了化名, 完成了一次奇异的、“从毛到摩西”(from Mao to Moses) 的知识分子之旅。² “五月运动”的四名领导者当中, 有三名是犹太人: 丹尼尔·科恩-邦迪、阿兰·热斯马尔和阿兰·克礼文(Alain Krivine)。³ 对于一些前左派分子来说, 一旦左翼革命热情的浪潮衰退, 重新接合他们长期遭受压

223

1 “Polémique: ‘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 open letter to Simone de Beauvoir from Arlette Elkaim-Sartre,” *Libération*, December 3, 1981, 26;

当萨特与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我尽可能做他的眼睛。正如我在同一时期其他访谈中所做的样, 我因而给他读而且重读他们的(萨特与莱维的)谈话, 一个字一个字地重读了很多遍, 也多次重读整个文本, 甚至到了激怒他的程度, 这才意识到他的某些句子是令人惊讶的。萨特如其所愿地进行增补修改。他想在他们将来出版的书中更深刻地解释自己。我承认我的重读并没有获得一个人阅读自己的文本时所拥有的亲切感, 但那该如何得到帮助呢?

2 参见 Auron, *Les juifs d'extrême gauche*。亦参见 Friedlander, *Vilna on the Seine*。关于他的人生目标, 莱维写过一本令人着迷的书——文体上一部分是回忆录, 一部分是政治著作——论述了政治与宗教的关系; 参见 Benny Lévy, *Le meurtre du pasteur: Critique de la vision politique du monde* (Paris: Grasset/Verdier, 2002)。有关讨论, 参见 Alexis Lacroix, “Comment passe-t-on de la radicalité politique à l’engagement prophétique: Benny Lévy, de Mao à Moïse,” *Le Figaro*, February 14, 2002。亦参见 Judaken, “‘To Be or Not to Be French,’” 3–21。

3 一个例外就是雅克·索瓦热奥, 法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者。

抑的犹太人血统就变成了一种提供意义和定位的方法。鉴于他们的家人在维希掌权期间遭受的迫害，以前的左派分子觉得他们有权利获得认可，不仅仅作为公民而且也作为犹太人获得应有的认可。这样，一些著名的前左派分子从“犹太激进分子”（Jewish radicals）变形为“激进的犹太人”（radical Jews）。

在左翼知识分子中间，犹太人精神复活的关键性文本之一就是萨特的《反犹分子与犹太人》：哲学家萨特的请求，是在纳粹大屠杀投下的长长阴影下做出的，支持犹太人的自我主张。萨特主张，面对反犹主义时，犹太人必须避免使其假冒的迫害者的恶毒嘲弄与侮辱内在化。反而他们必须更加强调和突出犹太人身份。在《想象的犹太人》（*The Imaginary Jew*）中，哲学家阿兰·芬基尔克劳（Alain Finkielkraut）回想起萨特 1946 年撰写的文章如何给他提供了一种范式，经由这一范式他可以彻底想清楚犹太人的本真性的问题——一个法国共和国知识分子传统不能对此沉默的问题。芬基尔克劳回忆道，“因为我是萨特的崇拜者……以什么样的超级愉悦，我利用了萨特赋予我的存在的词汇……通过无可怀疑的严密性，他跟我说我是一名本真状态下的犹太人，我假设我的条件、勇气、甚至英雄气概也是必需的……萨特散文的魅力弥漫着我想象我自己的样子与我当前体验的存在之间的隔阂。”¹

1 Finkielkraut, *Imaginary Jew*, 9。亦参见 Judaken, *Sartre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一旦维克多放弃左翼政治策略，他的哲学忠诚也就改变了。他对萨特思想的兴趣减弱了，从此以后他变成故意嘲弄的、反萨特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信徒。列维纳斯思想的核心概念是“他人”（l'autrui），我无限受惠于“他人”（运用列维纳斯的术语），而“他人”在萨特的哲学中对“自为”的自律性构成了持久威胁。维克多证明说：

在我的人生中，我曾有过两个伟大的哲学时刻：第一次是遇到了萨特，然后是我1973—1975年抛弃左翼立场后遇到了列维纳斯……在一系列漫长而徒劳无功的尝试（以便清楚地表达我的政治经历所提出的疑问）后，包括与萨特一起重读他的所有著作——归根到底，幸亏我邂逅了列维纳斯的著作，我开始怀疑的是，关于我作为一名犹太人的存在主义构造，存在着某种决定性的东西、某种必不可少的东西。¹

列维纳斯对维克多产生了深刻影响，只要“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要经常谈论‘他人’；‘大众’，也许，对，那就是一切。”²回顾以往，维克多觉得他与革命分子同仁因屈从于一种政治弥赛亚主义而误入歧途——一种认识此时此刻天国的、误入歧途的努力。相反，万能上帝的尊严恰恰存在于与被造生命的乏味焦虑相对的相异性性或超验性之

1 Lévy, "From Maoism to Talmud," 48-53.

2 Ibid.

中。因此，对维克多来说，列维纳斯的学说极大地矫正了左倾主义的政治过激行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列维纳斯作为无限超验性的“他人”的观念是对法国人的“博爱”（fraternité）观念在神学上进行的重塑。¹

如今的希望

1980 年哲学家萨特去世的时候，关于维克多对萨特影响的争论被重新激发了。几周后，维克多 / 莱维出版了一本访谈集《如今的希望》（*Hope Now*），毕生信奉无神论的萨特在这本访谈集中反常地承认他与犹太教的亲缘关系——这显然是维克多影响的结果。在《如今的希望》一书中，萨特观察到他押在“介入”伦理的最后赌注泡汤了，他与“无产阶级左翼”的亲密关系破裂了。最终，曾是后五月政治文化之恒久特征的示威游行、罢工罢课和工厂占领运动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永久性的变革。自法国解放以来，统治法国的政治精英一直泰然自若，未受侵扰。在萨特的最后访谈中，他在犹太民族身上察觉到某些他曾归属于工人阶级的、乌托邦式的伦理美德。正如他所评论的那样，“犹太人过着自己的生活；他有自己的命运。每个犹太人走向的结局就是重新联合全人类……这个目标只有犹太民族（才知道）……这是人类

1 重要的限定性条件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在列维纳斯的哲学中是一种非对称的关系，而不是对称的或平等的关系。一个人从没正确地处理他人的相异性问题。参见 Moyn, *Origins of the Other*。

彼此存在的开端”¹。在维克多的指导下，萨特似乎要重新评估他思想中的一些关键观念——例如政治优先性，根据列维纳斯的看法，他几乎就成了一名“伦理学家”。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萨特的眼睛失明了，他与外部世界的全部联系由维克多/莱维负责协调。两个人计划一起写一本基于萨特对博爱概念的新兴趣的伦理学著作。但是如前所述，萨特在集中而连续的工作中滥用安非他明药片，他于这项计划可能实现之前的1980年4月就去世了。5万名送葬队伍跟随他的灵车来到了蒙帕纳斯公墓（Montparnasse Cemetery）。萨特临终前总结说，博爱不能再被“政治”生产出来。从罗伯斯庇尔到列宁到毛泽东，左派的政治梦想全都流产了，它的新担保者就是伦理学。这是一次向加缪的立场进

1 Sartre-Lévy, *Hope Now*, 52. 这些访谈的真实性曾是萨特“家族成员”中间激烈争论的主题。波伏娃和《现代》工作人员渐渐认为维克多对萨特的影响是邪恶的——“腐化老人”，波伏娃曾用这样的措辞指责道。关于这场争论的公正解释，参见 Ronald Aronson 为《如今的希望》这本访谈集撰写的清楚明了的导论。另一场关于他们在萨特文集中位置的有益讨论，参见 Jean-Philippe Mathy, “Stumbling toward the Truth,” a review of Sartre and Lévy’s *Hope Now*, *Cross Currents* 47 (4) (1997): 544–547. Mathy 说，《如今的希望》“为以下大量的变化保留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证据：一是70年代中期在法国思想中出现的诸多变化，二是曾是最受尊重的战后反抗知识分子化身的伟大人物处理批判性的左派意识形态与政治衰落的方式”。关于《如今的希望》访谈与萨特早期著作《反思犹太人问题》关系的讨论，参见 Judaken, *Sartre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chapter 7, “Sartre’s Final Reflections: Intellectual Politics and the Jewish Question”。亦参见关于《如今的希望》的一组专题论文集，*Sartre Studies International* 4 (2) (1998)。

行引人注目的回返——同样这一立场也表明了维克多 / 莱维的“列维纳斯主义”的迹象。

自“五月风暴”以来，萨特就与左倾主义同甘共苦。但是 1973 年“无产阶级左翼”分裂后，他失去了一个继续前进的政治方案。此后，“无产阶级左翼”领导层开始估量它所犯的错误。“五月事件”后，“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大大促进了去除政治先锋主义（列宁主义及其幽灵们）罪孽的神秘性。但是他们还不得不系统地探查整个革命主义的过激行为和违法行为。姗姗来迟的是，“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意识到以左翼事业的名义实施的政治谋杀几乎等同于以右翼事业的名义实施的政治谋杀。这是慕尼黑奥运会谋杀案让人们彻底明白的观点之一。突然之间，流行的毛主义口号“枪杆子里出政权”具有了全新的、不祥的意义。

227

“无产阶级左翼”的内部争论重新考虑了萨特与加缪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暴风雨般邂逅的友谊。萨特确信共产主义的承诺，并试图使个体道德屈从于这一目标，而加缪拒绝接受一种为了不确定的乌托邦政治未来而牺牲基本伦理戒律的视角。不过，到了 70 年代中期，实际上不存在“萨特思想的”左派。几乎每个人都成为加缪思想的追随者，支持伦理学优先于政治学。¹ 在法国，“反极权主义时刻”的钟声敲响了，

1 关于萨特与加缪争论的精彩论述，参见 Aronson, *Camus and Sartre*。Aronson 说，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新哲学家们’登上历史舞台；前学生左派分子正在寻找其过去错误和这个世纪革命溃败的根基，他们自觉地追随加缪的脚步。随着东欧以及随后苏联共产主义被它们自己的公民推翻……加缪的结论如今在政治光谱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第 117—118 页）。亦参见 Christofferson, *French Intellectuals against the Left*。

恰好是由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1975 年 4 月现身流行的文学脱口秀《猛浪谭》(Apostrophes) 预示的。此时索尔仁尼琴的突破性著作《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 刚刚被翻译成法语。在法国知识分子中间, 这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被广泛致敬为“我们时代的但丁”。¹

萨特也追逐着反极权主义的浪潮, 与雷蒙·阿隆一起参加了爱丽舍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试图唤起人们对越南乘船外逃难民的绝望处境的关注, 这些难民正逃离最近胜利的共产主义政府所施加的迫害。1980 年 1 月, 他去世前的几个月, 他利用欧洲广播电台一台支持苏联正遭受国内放逐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 (Andrei Sakharov) 的事业。在同一个节目中, 萨特开始呼吁抵制当年计划在莫斯科召开的夏季奥运会。

在许多观察者的眼中, 萨特—阿隆的积极行动象征着法国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意识形态的诉求已经丧失了优先性。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建构法国政治的左右分裂似乎已经丧失了它的至高权威。反而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情感占据了主导地位, 以贝尔纳·库什内 (Bernard Kouchner) 的“无国界医生组织” (Medecins sans frontieres) 及其类似团体为象征。²

228

在许多方面, 萨特在其生命的终点重新开启了普遍知识分子的

1 参见 Bernard-Henri Lévy, *Barbarie à un visage humain* (Paris: Editions Grasset, 1977), 179。关于索尔仁尼琴电视现身及其含义的精彩讨论, 参见 Chaplin, *Turning on the Mind*, 150-178。

2 参见 the interview with Bernard Kouchner in *Le Nouvel Observateur*, November 11, 1979。

使命。在他放弃了政治激进分子或“人民的朋友”[让-保罗·马拉 (Jean-Paul Marat)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版的报纸的题目]的姿态之后，他最终的政治介入方向更像伏尔泰或左拉。一旦革命主义的暴行和妄想被揭露出来，法国社会就重新评价了普遍知识分子的功绩和价值。自此以后，普遍知识分子的道德领导权具体表现为一个反极权主义斗争的必要组成部分。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法国重新改造了民主知识分子的形象。萨特虽然双目失明、身体羸弱，但是他勇敢地参与了重新改造的这一时刻。

就萨特与莱维停顿下来评价其体现在“无产阶级左翼”之中的左倾主义的政治意义而言，他们在《如今的希望》中所进行的广泛谈话是重要的。其中主题之一关系到“无产阶级左翼”对革命暴力的迷恋，还牵涉到这种迷恋自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曾在萨特个人著作中所发挥的准系统性作用。如前所述，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忠于政治雅各宾主义，他认为革命暴力具有某种再生性的、救苦救难的能力。不过，到 1970 年晚期，这种观点在道德和历史上是不足信的。

也许对第三世界主义和整个革命主义的致命一击就是关于柬埔寨“杀人场”的恐怖报告。从 1975 年到 1979 年，波尔布特及其党羽大约杀害了 170 万同胞。加之柬埔寨共产党精英——乔森潘 (Khieu Samphan)、英萨利 (Ieng Sary)，还有波尔布特本人——在他们 20 世纪 50 年代初交换留学期间曾在巴黎最好的大学学过马克思主义教义问答。作为波尔布特最忠诚的副手，民主柬埔寨 (Democratic Kampuchea) 国家主席乔森潘对法国记者解释说：“总理波尔布特和

我深受法国思想精神的影响：启蒙时代、卢梭和孟德斯鸠。”¹像哲学家一样，红色高棉领导人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将古代政体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进程加以概念化。英萨利最亲密的助手之一宋希坤（Soang Sikoeun），曾这样讲述了罗伯斯庇尔对红色高棉精英所产生的、令人激动不已的影响：“罗伯斯庇尔的人格魅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激进主义对我影响很大。他是一个不受腐蚀的、不会妥协的人……如若你做事情，那么你必须做好它，坚持到底。你不能做出任何妥协。那是我的个人哲学、我的个人意识形态。你总该站在‘绝对’（the Absolute）一边——没有中间道路、没有任何妥协。凡事都不该半途而废。”²

红色高棉追随“文化大革命”的模式，残酷地把城市居民下放到农村，以达到“政治再教育”（political reeducation）的目的。他们有组织地招募贫穷而没有受过教育的追随者——用伟大舵手的话来说，就是一“穷”二“白”。（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³）波尔布特的传记作者勾勒出两场革命运动之间多方面的意识形态相似之处，兹述如下：

1 Interview with Khieu Samphan, *Le Monde*, December 31, 1998.

2 引自 Eric Weitz, *Century of Genocide: Utopias of Race and N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147。亦参见 Samantha Power, *Problem from Hell*, 93。

3 Starr and Dyer, *Post-liberation Works of Mao Tse-tung*, 173。引自 *A Problem from Hell: America and the Age of Genocide*, by Samantha Power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2), 93。

人优先于机器；吹捧人的意志（中国）与“革命意识”（柬埔寨）；意识形态优于知识（要“红”而不是“专”）；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与消除城乡差异的需要；对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的关注；修正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的形式自发地产生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观点。¹

借由红色高棉开展的“农民共产主义”实验，结果显然是令人震惊的。

在讨论这些话题时，莱维以一名老练诉讼人的极大热情竭力引诱着萨特。某种意义上说，衰弱无力的哲学家萨特貌似不能承受更多的打击，温顺地投降了。在许多方面上，与萨特进行的对话对莱维来说是一场持久的自我批评练习——一种面对他自己感到困惑的政治经历的方式，当然，这也是一种减缓他自己内疚的方式。当萨特开始思考我们的普遍人性的伦理基础时，莱维突然提醒他注意他以前赋予革命暴力的救赎角色。萨特悔改了，只是说：“我不再有那种观点了。”²当提及殖民主义的困境时，他解释说，暴力的行为或许破坏奴役的状态，而它们缺乏再生性的特性或能力。而且他继续说道，他对暴力的赞许

1 Short, *Pol Pot*, 300。亦参见 Ponchaud 的证据, *Cambodia*, 139。“在许多方面，（柬埔寨）领导人追随着中国的模式，例如，他们返回乡村社会、他们自给自足的愿望、他们使用传统医药、严格平等的社会、对外政策问题上立场一致等等。”

2 Sartre and Lévy, *Hope Now*, 92；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曾是“情境的”(situational)：它基本上关系到阿尔及利亚冲突的残酷僵局。鉴于难以处理的殖民主义困境，萨特可能意识到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莱维继续逼问。假如博爱是由共同敌人的纽带创造出来的，正如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所论证的那样，那么敌人被杀戮后会发生什么事？革命者不可避免地相互残杀吗？他们必须不知疲倦地寻找一个新敌人吗？

主导着这些讨论的莱维进行了总结，暗示说他与萨特赞同的“造反暴力”(insurrectionary violence)实际上只是一种“群众暴力”(mob violence)；犹太人经常是这种暴力的受害者，所以具有一种作为“目击者”的独特身份。因而莱维声称，假如有人想消除革命主义的罪恶，那么犹太人的证据是必不可少的。萨特只是战战兢兢地附和说：“我认为你想得没错。”¹

231

莱维对革命主义的厌恶深受国际左派本能的反犹太复国主义(anti-Zionism)的影响，这种反犹太复国主义出现在新近发生的阿以战争[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Six-Day War, 又称“六日战争”)]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Yom Kippur War, 又称“赎罪日战争”)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备受争议的、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的联合国决议(后来被撤消了)自1975年生效。考虑到莱维刚刚幡然醒悟为一名正统的犹太人，那么与日益强烈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国际

1 Sartre and Lévy, *Hope Now*, 100.

左派团结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然《如今的希望》的抄本无疑是可靠的，但是毫无疑问，莱维引导着整个谈话，虚弱而失明的萨特盲从他的引导。他们总结性的交流关系到一个急剧衰退的政治期待的时代中变化无常的希望问题。在萨特看来，左翼政党（无论是共产党还是社会党）只要为了选举成功牺牲了它们的信念，那么它们就不值得信任。就这点来说，左倾主义也崩溃了。30年来，萨特在政治上确信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可行性替代。但是，如今这些希望已经永久地破灭了。既然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定义的、世俗的历史哲学的承诺失败了，那么萨特承认他钦佩犹太民族，因为太平盛世“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而非“在历史意义上”存在。萨特解释说：

（在犹太教中）新奇的地方是这一上帝与人缔结的关系。这是犹太人与他们曾称之为“大写的名”（the Name，也就是上帝）之间所拥有的直接关系。上帝对犹太人讲话，犹太人聆听他的话语，从所有这一切涌现出来的真实就是犹太人与上帝之间的第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联系。我认为，那是古代犹太人的最初定义，人的整个生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他与上帝的关系决定的、控制的。而且犹太人的整个历史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原初的关系之中。¹

1 Sartre and Lévy, *Hope Now*, 104.

萨特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人莱维和阿莱特·埃尔坎-萨特（他的养女）都是犹太人，他们影响萨特不得不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最后，正是萨特的“孩子们”对他来说才变成了“希望”的宝库。

第6章

穿梭于文化政治地狱的《太凯尔》

哦，我对左岸进行了调研。我曾在大学里与那些腋下夹着《太凯尔》杂志到处游荡的人交朋友。我太熟悉那种垃圾杂志，你甚至难以卒读。

——菲利普·罗斯，《反人生》

233

20世纪60年代，《太凯尔》在文学造诣极高的主办者菲利普·索莱尔斯的领导下声名狼藉地追逐着几乎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知识潮流：新小说、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一点也不不足为怪的是，该杂志的政治忠诚同样是反复无常的。在培育了一种谨慎的“非政治主义”（apoliticism）后，它突然跌跌撞撞地从最僵化的斯大林正统观念冲出来，转而同样狂热地去接受“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一个革命浪漫主义例子，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在一次著名的1974年北京旅行中达到顶点。作为共产党的忠诚分子，《太凯尔》派与“五月风暴”“失之交臂”。在一个如今传奇的事件中，索莱尔斯——顺便提一句，他的父亲是波

尔多重要的工业家——极力谴责学生运动缺乏无产阶级品质。不同于萨特和福柯，《太凯尔》派回避了毛主义学生团体，在后五月的岁月中，这些团体正试图改造法国的政治风景，通过将“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特质转译为法国固有的习语——“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术语。而作为文学知识分子，他们容易被毛泽东这一人物形象所诱惑，这一形象既像一个空谈的哲学家——好像一个现时代的哲学王——又像一个诗人。因此，《太凯尔》群体发誓直接效忠于北京。大字报开始装饰位于时尚的雅阁街（rue Jacob）的《太凯尔》办公室。

《太凯尔》故事的必要组成部分关系到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突然从一个一文不名的保加利亚奖学金学生一举成为左岸备受推崇的人。不同于索莱尔斯，他的著作几乎没有找到大西洋彼岸的回声，而有关美国人接受法国理论的史话，如果不详细叙述克里斯蒂娃的关键性作用就不可能被书写。像其他法国知识分子一样，她赌注中国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主义时代中可以在其他道路均已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最后，《太凯尔》派当然像法国其他左派分子一样遭到了应有的谴责，而且幻想破灭。他们采取极端措施，破釜沉舟，埋葬了他们自己的文化革命过去，解散了《太凯尔》，并创办了一份新的、替代它的纯文学刊物《无限》（*L'Infini*）。作为一种对其先前的政治失策（与效仿许多前左派分子）的赎罪行为，他们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吵吵闹闹地支持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的事业。

的确，恰恰这一极为奇特的故事，要想完全理解它，就必须完整地加以讲述。

只为了艺术

1960 年 3 月，一本新的文学评论杂志出现在巴黎街头，杂志封面上公然炫耀着尼采的格言：“我想拥有这个世界，我想按照它本来的样子（*tel quel*）拥有它，我一再想拥有它，永远拥有它；我贪得无厌地大喊道：再来一次！——不仅仅为了我自己，而且为了整出戏剧和整个表演；也不仅仅为了表演，而且基本上为了我，既然我需要表演——因为它需要我——而且因为我使之成为必要的。”¹ 这份评论杂志是 23 岁的波尔多青年菲利普·索莱尔斯（本姓 Joyaux）的创意，大家常说他命中注定是为了辉煌的文学事业而生的。索莱尔斯 20 岁时，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挑战》（*Le Défi*）就获得了费内龙奖（Fénéon Prize）。一年后，他的小说《一种奇特的孤独》（*Une solitude curieuse*）赢得了天主教小说家弗朗索瓦·莫利亚克（François Mauriac）和超现实主义神童后转变为斯大林主义者的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的高度评价——这当然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组合，令人生疑的是这两位来自政治光谱对立端的文学巨匠除了认可索莱尔斯的杰出才华之外到底能否就其他事情达成一致意见。对于索莱尔斯来说，他早年就聚焦于文学赞誉的荣耀，因而他做事谨慎，不留漏洞。在他意识到才华与成功在巴黎知识分子政治的超政治化氛围中只

235

1 *Tel Quel* 1 (1960): 1;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有在一定条件下才具有关联性后，他就有条不紊地培育那些可以将他置于文化快速通道的社会关系。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太凯尔》的主编——这是由进步的天主教出版社瑟伊出版社（Seuil）所表现出来的高度信任。巴黎出版商不断地寻找下一个文学轰动性人物——下一个纪德，下一个萨特，鉴于索莱尔斯令人赞叹的成就，瑟伊出版社把赌注压在他身上似乎是很好的决定。

刊在杂志封面上的尼采格言被视为一种挑衅，因为《太凯尔》的事业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层面上直接反对统治法国的思想主人萨特。虽然他在1964年出版《词语》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他快60岁了，但是萨特的“星运”毫无疑问开始走下坡路，决定其继承人的连续争斗显然已经开始了。他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也就是忠诚的亲莫斯科时期，当然有过令人尴尬的政治失策。此外，他在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所倡导的存在主义突然不流行了，不久就被据称是更加严密的结构主义方法所取代。不过，通过1948年有影响力的小册子《什么是文学？》——在这本小册子中，萨特经历“二战”和占领时期的阵痛之后唱出了“介入文学”的赞歌（“假如文学并不是一切，那么它就一文不值。这就是我所说的‘介入’”）¹——哲学家萨特为那种已变得不可能忽视的文学努力树立了标杆。因此，正是在反对文学行动主义信徒萨特的意义上，索莱尔斯及其同仁们才在《太凯尔》的创刊号上瞄准了目标。像萨特一样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痴

1 Sartre, "The Purposes of Writing," in *Between Existentialism and Marxism*, 13-14.

迷于“改变世界”的律令，而索莱尔斯在尼采“爱命运”（Amor fati）思想的启发下试图返回到上一代人颓废的唯美主义——普鲁斯特、瓦莱里和纪德那代人。正如杂志编辑人员在创刊号上所宣布的那样（以斜视萨特及其同仁们的方式），“空想理论家长久地统治着表达……现在该是分道扬镳的时候了；容许我们去关注表达本身、表达的必然性及其特殊法则。”¹

索莱尔斯按照本来样子“回归文学”的号召可能被认为有一点儿争议，这只有结合困扰法国政治文化的“维希综合症”（Vichy syndrome）才能被理解。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法国在很多方面还不得不在心理上从 1940 年的“奇异的溃败”中恢复过来，根据这一点，共和主义——这个国家所熟悉的唯一民主传统——的成就不可挽回地被玷污了。“二战”后政治再生的希望在一场冷战的地缘政治规则与惯常的议会事务的可耻回归中破灭了。正当法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似乎正要恢复政治基础时，殖民主义——第三共和国另一项引起歧义的遗产——开始猛烈地反噬。1954 年，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北部一个隐蔽的前哨基地奠边府遭到了耻辱性的战败。同一年，阿尔及利亚爆发了一场重大的殖民起义，突然引发了法国本土的内战危机与第四共和国终结。法国 1940 年面对进攻的德国军队发生了突如其来的、令人费解的溃败，事后对这一事件的主导性解释之一就是“文化堕落”（cultural decadence）：因其忠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法国变成

1 “Déclaration,” *Tel Quel* 1 (Spring 1960): 3.

了一个超世脱俗的唯美主义的国度，不能应对20世纪现实政治的挑战。这样的辩解无疑是太言过其实了。即便如此，他们仍享受着一种由法国多方面的战后外交政策惨败助长的、可怕的固执。（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在这张惨败清单上加上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对于萨特这一代人来说，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挫败期间（诗人奥登说：“卑下的、虚伪的十年”）——阿比西尼亚战争、西班牙内战、慕尼黑阴谋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走向成年，回归美丽时代的唯美主义似乎是一种恣意妄为的退化。而索莱尔斯及其同龄人在20世纪50年代富裕社会的玫瑰色光辉下长大成人，对于他们来说，《现代》（*Temps modernes*）的左派分子的政治约束似乎是令人窒息的、压迫的——一种远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暴行的步伐。

因此，《太凯尔》创刊宣言被视为一篇反萨特的宣言，这具有某种合理性。当然，这种宣言形式是欧洲先锋派的显著特点之一。然而，先锋派[达达主义（Dadaism）、未来主义（futurism）和超现实主义]为了改造生活而采用宣言形式[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一文中众所周知地宣布：“人必须练习诗歌”]，而索莱尔斯为了分离人生与文学的明确目的才使用了宣言形式。他在创刊号上声称：

237

每当思想从属于道德与政治的律令，思想就不再是我们中所期待的：我们在场的基础，其清晰而又晦涩的艺术表达；每次思想以这种方式被贬低……布道，它足以满足爱的需要，而文学有时遭受鄙视，但仍然凯旋而归，问心有愧地

被辩护……如今谈及“文学品质”或“文学激情”可能正好是所需的。¹

瑟伊出版社编辑弗朗索瓦·华尔于 1974 年陪同“太凯尔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一次考虑不周的考察，他将这个群体的计划与 100 年前“为艺术而艺术”运动的开端进行比较时提供了一种恰当的历史类比：“我们正进入第二帝国时期，将要出现一个新帕尔纳斯派（Parnassus）。这个新帕尔纳斯派必须表达自己……这个新帕尔纳斯派将是《太凯尔》。”² 华尔的描述方法暗示了路易·波拿巴的专制统治 [他通过 1851 年政变残暴地终止了“四八志士”（forty-eighters）的共和希望] 与法国统治的专制者戴高乐的专制统治之间的相似之处。萨特从“介入”角度为写作进行辩护，而索莱尔斯，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反其道而行者，似乎赞美一种“非介入”（disengagement）的美学。

索莱尔斯的唯美主义甚至反映在他精心设计的笔名上，Sollers 这个笔名来自于拉丁词 *sollus* 与 *ars* 的结合，意思是“只为了艺术”（*solely art*）。他假定的典范是法国 20 世纪最有声望的文学杂志《新法兰西评论》（*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简称 NRF）。在三十年的鼎盛时期（1910—1940 年），《新法兰西评论》曾是普鲁斯特、纪德和马尔罗以及青年萨特等作家的根据地。不过，法国沦陷后，在德国侵略者的命

1 “Déclaration,” *Tel Quel* 1 (Spring 1960): 3-4.

2 Wahl 语，引自 Faye, *Commencement d'une figure*, 68。

令下，法西斯主义作家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担任主编，而且《新法兰西评论》逐渐被视为一种懦弱合作的典型。就其本身而言，这是一个引发歧义的先例。《太凯尔》早期的赞助人、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以下列措辞恰当地描述了《太凯尔》的使命：“一份杂志——比如你们的杂志——道路狭窄，似乎就在于把世界看成了像是通过一种文学意识所形成的那种样子，就在于周期性地把现时性看做一种秘密作品的素材，就在于将您自己安排在了以一种非常脆弱和相当不明确时刻——而在这种时刻里，某一个真实事件的关系将被文学意义所抓住。”¹

索莱尔斯为文学形式主义所做出的不妥协辩护当时看起来是多么地有争议，两个同代人的反应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初期，共事的编辑让-勒内·于格南（Jean-Rene Huguenin）开始脱离杂志，他担心索莱尔斯如此这般地向语言问题让步，索莱尔斯就会冒肤浅的危险，因为当文学从自我指涉的层面上被审视时，文学就排除了表达更高目标或诉求的可能性。按照于格南的看法，索莱尔斯狭隘的唯美主义缺乏“悲剧感、冒险的趣味、野性的放纵、悲观的绝望”²。这本杂志如此费尽心思地去追逐这一生死攸关的冒险，以致它有可能变成纯文学的杂志。作家、哲学家让-皮埃尔·费耶（Jean-Pierre Faye）参加了编委会，参与时间短暂，即便是不定期的，但他对当时难以承受的政治

1 Barthes, "Literature Today," 157。（译文参见《当今文学》，见罗兰·巴特：《文艺批评文集》，怀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页。——中译注）

2 Huguenin, *Journal*, 77.

命令表达了看法，当提及到这个群体的创刊宣言时，他说：“在摆脱‘政治和道德的指令’束缚的‘表达’决定自理的时刻，法国军队就忙着占领阿尔及利亚、杀人一百万，并严刑拷打数千人。”¹从这一角度看，《太凯尔》的事业在否定的意义上是显然“不合时宜的”（untimely）。

239

假如《新法兰西评论》代表了索莱尔斯的文学标准，那么他的社会角色模型似乎应该是司汤达笔下的于连·索雷尔（Julien Sorel）：一个想方设法想挤入上流社会的人，他冷酷无情地爬到了上层社会，而在这一过程中却丧失了灵魂。假如有人仔细地描绘《太凯尔》蜿蜒曲折的知识轨道，那么似乎可以公正地说索莱尔斯长久以来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迎难而上。纵观杂志 22 年暴风雨般的历史——1982 年停刊，只是为了在更具声望的《新法兰西评论》出版商伽里玛出版社的管辖下改名为《无限》，似乎唯一没变的是：索莱尔斯极其渴望成为知识分子焦点人物。

从新小说到结构主义

《太凯尔》将它的声誉压在了文学现代主义的复兴上，援引了福楼拜、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普鲁斯特、卡夫卡和乔伊斯等著名前辈作为“斗争的同伴”（compagnons de lutte）。但是除非该杂志能够涵盖合乎现代主义标准的当代代表，否则它就会招致一种古玩

1 Faye 语，引自 Knapp, *French Novelists Speak Out*, 84。

癖的危险，这种古玩癖对于一本试图继承20世纪先锋派衣钵的杂志来说是一种无法接受的态度。通过培育对新小说“大佬”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忠诚态度，索莱尔斯及其同仁们解决了这个问题。20世纪50年代，《窥视》和《橡皮》等作品[也许最好描述成为了对象或物的“意识小说”(novels of consciousness)]获得了大量好评。罗伯-格里耶的创新性技巧(在这一技巧中，19世纪小说情节和人物等创作惯例已无足轻重)天衣无缝地与《太凯尔》的形式主义诉求及其对现实主义的厌恶啮合在一起。他对形式革新的偏爱符合《太凯尔》所强调的重点，《太凯尔》以马拉美的方式强调了文学语言非交流性的、自律性的特征。

罗兰·巴特成为新小说最重要的批评健将，他在一部标志性的随笔《写作：一个不及物动词》(To Write: An Intransitive Verb)¹中整理了这些规则。他主张[如他先前在另一部作品《写作的零度》(Writing Degree Zero)中所做的那样]语言的再现或实用的功能次于语言的诗学功能——《太凯尔》派在他们的创刊宣言中所赞颂的“表达”的自律维度。对立于“介入文学”的主张，罗兰·巴特主张，作者不再“根据他的角色或价值，而应通过某种话语意识(awareness of language)来定义”²。也不难识别罗伯-格里耶的文学技巧——著名的“戏中戏”技巧(mise en abime)，或者有意识的意义悬置，他对排斥心理要素的非个人化写作方式的信奉——完全反对萨特感情外露的、有时单调

240

1 Roland Barthes, "To Write: An Intransitive Verb," in *Language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s of Man*, ed. Macksey and Donato.

2 Barthes, *Criticism and Truth*, 64.

乏味的“主题小说”(romans à thèse)。在《太凯尔》一代人反对《现代》正统观念的代际斗争中，罗伯-格里耶及其新小说家同仁们是理想的同盟者。一位批评家恰当地指出：“通过借助语言来摆脱政治的方法，《太凯尔》拒绝历史本身，历史不是由他们而是由他们的长辈——萨特和阿拉贡那代人——创造的，而且他们只是被猛然推入历史之中而已。”¹

1961 年，福柯出版了《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事后回想起来，索莱尔斯将该书的出版视为这十年中最重要的出版事件之一。² 在该书的结尾，福柯赞颂了四位“被诅咒的诗人”(poètes maudits)的“大拒绝”(Great Refusal)：荷尔德林、奈瓦尔(Nerval)、尼采和阿尔托(Artaud)。这四位诗人都以疯癫结束了生命。他们的写作表达了福柯的看法——福柯赞美了“非理性不受干扰的工作……”，

241

1 Marx-Scouras, *Cultural Politics of Tel Quel*, 39-4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后罗伯-格里耶自己挑战了像巴特和《太凯尔》派这样的人所提出的、对新小说的形式主义解释。他坚持认为他在《在迷宫里》(*In the Labyrinth*)与其他作品中发展的“客观现实主义”(objective realism)表现了他与前十年历史创伤达成妥协的特有方式：战争、政治溃败、占领与叛国通敌。然而，到了他详尽解释这些免责声明时(1984年)，新小说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 20 年，几乎没有批评家注意到这些解释。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雅克·莱纳尔(Jacques Leenhardt)和卢西安·戈德曼对罗伯-格里耶的新小说提出了极具影响力的、创造性的政治解释。在《文学社会学》(*Toward a Sociology of Literature*)中，戈德曼认为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物优先于人)讨论了社会物化的问题。在后来的一部作品中，罗伯-格里耶自己质疑了对其作品的“去政治的”解释；参见 Alain Robbe-Grillet, *Le miroir qui vient*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84)。

2 Philippe Sollers, “De Tel Quel à L’Infini”, *Autrement* 69 (April 1985): 8.

通过现代精神病学的强制方法“永远不可化约为那些可被治愈的精神错乱异化”¹。在这个被诅咒诗人的先贤祠中，福柯很快又加上了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和他最新的崇拜者若尔日·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的名字。

在福柯的影响下，《太凯尔》派突然开始疏远“为艺术而艺术”的轻盈飘渺的欢愉（罗兰·巴特称之为“文之悦”），反而关注生命体验的种种问题。他们不再把文本性本身视作目标，并开始讨论文学想象在颠覆衰弱而熟悉的日常生活惯例中所发挥的作用。

使这种对“僭越”动力学（强制执行令人联想到超现实主义的文化反抗行为）的新关注与《太凯尔》早期的文学纯粹性保持一致，这证明是很难的，要不就是不可能的。“僭越”希望具有一种改造性效果，而唯美主义非常高兴按照“本来的样子”（*tel quel*）来抛弃这个世界。这种情境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与新小说家断绝关系的理由，而这些新小说家们的成就鞭策索莱尔斯和其他人成为知识分子名流。

20世纪60年代初，一种革命性的理论范式结构主义开始攻克巴黎知识分子的舞台。随之而来的是其他哲学方法——最突出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似乎是乏味的、过时的。结构主义的源头

1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278; 加粗部分本书作者所加。[译文参见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257页。另参见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709页。参见法文原著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72), 530。此处译文参照中译本、法文原著。——中译注]

追溯到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该书第一版于 1916 年出版。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由二元对立决定的，符号或词语基本上是任意的；索绪尔主张它们存在主要与其他词语有关，而不是存在于与它们所命名的事物的必然关系之中。通过区分语言 (*langue*) 与言语 (*parole*) ——相对于其变量的语言的结构常量与个体言语行为的偶然体现，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似乎给真正科学的语言研究提供了基础。

242

出于同样的原因，他的方法遮蔽了语言同等重要的历时的或历史的维度。最终，对历时性或历史的忽视——结构主义的说法是“事件”领域——结果证明是结构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 (*Achilles' heel*)，因为结构主义钟爱的常量如果像这种范式所主张的那样是全然决定性的，那么解释新事物的来临则会变成不可能的。根据结构主义的教义问答，一个言语行为、一首诗歌和一场革命本质上是预定的结构常量的例证。“事件”的特殊性几乎仍然是不可及的。

“二战”后，索绪尔的范式捕获了新一代人文学者的想象。在《亲缘的基本结构》(*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中，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借助这本著作指出亲属体系也被不可改变的二元对立所控制。叛逆的弗洛伊德信徒雅克·拉康也追随索绪尔的指引，众所周知地宣布“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被结构的”。他对人格的“想象的”维度与“象征的”维度之间所做的独具特点的区别也同样受惠于索绪尔极具影响力的构想。在《阅读〈资本论〉》中，路易·阿尔都塞依靠结构主义概念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主张，以便使敌对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范式陷入困境。

不过，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最著名的实践者是《太凯尔》阵营与偶尔投稿的撰稿者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中，福柯试图描绘具有地质特征的常量或“知识图式”(epistemes)，后者构成了人类思想短暂的、不寻常表现的基础。在这些著作中，他声称正在寻找与人类科学的表层实践对向的、结构性的同源性或同构性。这样福柯以经典的结构主义方式找到了“实证的知识无意识：这个层面虽然规避了科学家的意识，但还是科学话语的组成部分”，因为不为他们所知的，“博物学家、经济学家和语法学家将同样的规则应用到适合于他们自己研究的对象，来形成概念，并创建他们的理论”¹。在《太凯尔》创刊最初的几年中，结构主义实际上已经渗透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每个学科之中。

243

索莱尔斯意识到结构主义方法是未来的潮流，他突然中断了与新小说家们的联系。到1964年秋，罗伯-格里耶及其文学同行们的名字永远从《太凯尔》杂志上消失了。索莱尔斯说：“所有这些(新小说派)作品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极为常规的、心理的、实证性的或技术专家的。尤其是它有助于隐藏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之间出现的、真正的理论的革命。”²通过把自己的命运与结构主义的巨大力量连在一起，索莱尔斯以及同仁们成功地跟上了时代的发展潮流，当时新小说

1 Foucault, *Order of Things*, xi.

2 Philippe Sollers, "Réponses," *Tel Quel* 43 (Fall 1970): 71-76;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的“星运”开始衰退，“理论”时尚毫无异议地统治着左岸知识分子。¹

借助这一策略上重新定位的狡诈行为，索莱尔斯能够立刻实现一些目的。他设法使《太凯尔》杂志脱离“文学贫民窟”（literary ghetto），这一策略根据十年来迫在眉睫的政治地震来看似乎是特别富有洞察力的。在与时代思潮变化的进程保持一致的情况下，索莱尔斯以及同仁们当时严厉谴责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达。文学仍局限于“‘美文’（belles lettres）概念的化约论的范围之中，而‘美文’概念则是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产物”²。

在追寻这一进程的时候，他忠实地遵从结构主义的指引。拉康通过象征阶段把主体性构成描绘为是对想象界（the imaginary）或原初自恋（primary narcissism）的背离。想象界先于婴儿 6—8 月时出现的镜像阶段而发生。此时孩子从模糊不清的、未充分发展的自我感中脱颖而出（拉康称这种自我感是“破碎的身体” [the body in pieces]），

244

1 关于索莱尔斯命令编辑部改组的叙述，参见 Huguenin, *Journal*。亦参见 Forest, *Histoire de Tel Quel*, 174–176。

2 Felman, *Writing and Madness*, 15。《太凯尔》信任阿尔都塞和结构主义的描述参见 French, *Time of Theory*：

在《太凯尔》中，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很快就开始暴露了基本缺陷……经由一种更具活力的、能量基础的理论，这可以被视作一种结构主义批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一种质问或强加于主体的结构工具……主体性、过程和语言的构想不予考虑。20 世纪 70 年代初……克里斯蒂娃和（路易-让·）包德利……发展了意识形态概念，并将这一概念铭刻到意指实践和主体性建构性发展之中。（第 115 页）

以便接受一个更加统一的自我。¹对于拉康来说,通过那经由语言进行的社会化,原始自我借助预先存在的象征的网络实现了重构,这些象征以几乎是永久不变的方式塑造它的命运。一位评论者说:“沉湎于象征界,主体在其中只是被表征,不得不通过话语的中介来转译自己,主体将变成迷失的、被引诱的,远离了自身,并且根据他人的样子来塑造自己。对各种典范的认同与使施加于自身的话语合理化具有很多形式,在这些形式中,主体变成稳定的,并背叛了他自己。”²类似的是,阿尔都塞将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科学正确性的资产阶级思想描述为一种类似于拉康想象界的话语神秘化:一种“症状形成”(弗洛伊德的术语),表现了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无意识真理的意识形态扭曲。借助同样的结构主义方法和程序,索莱尔斯相信文学如今可以被分析为一种手段,凭借这一手段,资产阶级自我在意识形态上被综合了、被塑成了。

此后索莱尔斯将文学的建制视为一种学科机制,类似于福柯 20 世

1 这一讨论参见 Roudinesco, *Jacques Lacan*, 111: “所谓的镜像磨难是一种婴儿 6—8 月之间发生的必经阶段。它允许婴儿在空间上辨识自己、统一自我。因此,这种体验象征着从镜像界向想象界过渡,然后从想象界向象征界过渡……在拉康的意义上,镜像阶段是一个预示着自我进化到想象界的矩阵。”

2 有关拉康这一点的解释,参见 Lemaire, *Jacques Lacan*, 178。Lemaire 继续写道:“象征界……是人类异化的起因……异化是放弃自我一部分给另一个自我。异化的人生活在他自己的外围,能指的囚徒,其自我形象的囚徒或理想形象的囚徒。他依靠他人投注到他身上的目光生存,此时他竟没察觉到这一点。误认与想象的生活体验是平行的。”(第 176 页,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纪 70 年代分析的全景监狱实践。索莱尔斯主张文学充当了“一种手段，用以建立一系列远胜过独特的图书市场的长期训练。小说是这个社会与自身进行交流的方式，是个体必须自立以便在那里可以被接受的方式”¹。此外，通过追逐结构主义潮流，《太凯尔》派能够获得与才华横溢的、日渐重要的一代“理论家”的合作：罗兰·巴特、福柯、雅克·德里达、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和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² 因此，索莱尔斯及其同仁们在联络一批极具影响力和创造力的新支持者方面是成功的：求知欲极强的拉丁区学生，他们的购买力很快就创造了《太凯尔》最好的销售记录。³

《太凯尔》受结构主义启发的“理论”时尚将该杂志的形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德里达的引领下，此时的流行语变成“书写”（écriture）。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曾声称要解开那种显示人类文化超历史真实的“编码”一样，《太凯尔》派相信“文本性”或“书写”是理解历史现在时的钥匙。索莱尔斯及其同仁们推论说，如若没有客观化写作或外在化文本性的实例，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

批评家认为《太凯尔》派已经屈从于一种特殊的（也就是典型法国特色的）语言理想主义：相信“文本”优先于“现实”。根据索绪

1 Sollers, "The Novel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mits," in *Writing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mits*, 186-187.

2 托多洛夫和热奈特大约 1968 年与《太凯尔》断绝关系，因为杂志开始了“理论恐怖主义”阶段（与法国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开始了注定失败的联盟），以便建立更具学术意义的诗学。

3 关于《太凯尔》轰动性的出版成功的详细解释，参见 Kauppi, *Tel Quel*。

尔的语言构想,词语首先与其他词语有关,而不是与“物”有关。而且,能指与所指(它所指示的概念或观念)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所以,“现实”就其本身而言永远是遥不可及的。因而,在《小说与极限体验》(*The Novel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mits*)一文中,索莱尔斯主张现实“并不显现在任何其他地方,而是显现在语言中……一个社会的语言和神话是决定人们视作现实的东西”¹。同样,在《文集》(*Ecrits*, 1966年)中,拉康在融合了索绪尔和弗洛伊德之后就宣布:“正是词的世界创造了物的世界。”²在《写作:一个不及物动词》一书中,罗兰·巴特颂扬新的认识论正统理论,他公开声明:“是语言讲授了人的定义,相反则不然。”³索莱尔斯及其同仁们没有意识到文本性的新宗教与其说显示了现实自身的本质,倒不如说它可能显示了左岸知识分子的文学惯习与禀性。

246

《太凯尔》改头换面,转变成一份极端结构主义的刊物,这并没有赢得一致好评。在1963年一次题为“新文学”的研讨会上(在这样的场合中,与新小说断绝关系是精明的),一位《世界报》记者打断了索莱尔斯《小说的逻辑》(*The Logic of Fiction*)的演讲,尖锐地质问索莱尔斯是否拥有某种专业的哲学训练。⁴渐渐地这份杂志无

1 Sollers, "The Novel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mits," 194.

2 Lacan, *Ecrits*, 65;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3 Barthes, "To Write: An Intransitive Verb," in *Language of Criticism*, 135;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4 Forest, *Histoire de Tel Quel*, 207.

缘无故地被视为不可及的、难以阅读的，它的支持者将这一点解释为一种区分标志。诋毁者公开地谴责索莱尔斯及其他人践行了“理论恐怖主义”：高举“理论”，或由此使《太凯尔》的版本达到了固守教条的层次上，进而驱逐或谴责那些接受不同立场或方法的手们。甚至像福柯这样的坚定同盟者一度被迫表达了其极端怀疑的态度：“我们 20 世纪 60 年代所见识到的、完全无情的书写理论化无疑只是一场告别演出。经由它，作者正在为维护他的政治特权而斗争。”¹ 福柯强烈地感觉到，一个人通过把文本性提升到毫无争议的认识论至高无上的位置，他丧失了对现实或“事件”加以概念化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权力的运作几乎不可能化约为“文本性”或话语的效果，它仍然是无法辨认的。在批评者的眼中，《太凯尔》派及其同盟者屈从于一种自恋的妄想：他们只是将他们先前的知识训练的方法（法国特色的文本解释学说）投射到整个世界。对文本性和意指的种种问题的过度关注毫无疑问是《太凯尔》没有认真地参与政治活动及其粗鲁地退出“五月造反”背后的关键性原因之一。正如一个持同情态度的观察者所指出的那样，对《太凯尔》派来说，革命与其说与大街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关，倒不如说与意指实践的发展有关。²

1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in *Power/Knowledge*, 127. 关于《太凯尔》“理论恐怖主义”的讨论，参见 Forest, *L'Histoire de Tel Quel*, 299-303 ("Le théoricisme terroriste de *Tel Quel*").

2 参见 Ffrench, *Time of Theory*, 119: “《太凯尔》在 1968 年的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该杂志在这个阶段的革命是理论的、文本的，而不是发生在大街上。”

“茱莉亚来到巴黎”

弗朗索瓦·多斯权威性的两卷本著作《结构主义史》第35章的题目是“1966年：奇异之年——茱莉亚来到巴黎”。上述的“茱莉亚”当然是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正如多斯这样的题目所暗示的那样，在法国的知识分子传说中，克里斯蒂娃从她的故国保加利亚来到巴黎获得了一种类似于基督重临时的光晕。她是戴高乐“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大欧洲”（Europe stretching from the Atlantic to the Urals）概念的受益者，于1965年获得法国奖学金，并以此完成了关于新小说的论文。她怀揣着5美元，在平安夜到达巴黎。因为奖学金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持两个月，她不得不依靠聪明才智与谚语所说的“陌生人的仁慈”（kindness of strangers）来养活自己。正如她对一个采访者所解释的那样：“我将给你略去故事情节的种种波折。”¹

克里斯蒂娃计划在文学社会学家吕西安·戈德曼的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但是她很快意识到巴黎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彻底转变了。结构主义时尚意味着社会学——被《太凯尔》派长期嘲笑为“唯社会学论”（sociologism），是“落伍的”（out），而“文本性”是“时髦的”（in）。克里斯蒂娃转而效忠罗兰·巴特，而罗兰·巴特有时似乎从她那里学到的东西与她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一样多。此后她加入列维-斯特

1 Kristeva, *Interviews*, 49.

劳斯著名的人类学研究室，并参加了具有传奇色彩的拉康“研讨班”，这个“研讨班”近来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转到索邦大学。（好像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克里斯蒂娃也接受过拉康的分析。）事已至此，无法改变。

她到来的时机本来是不可能比较顺利的。恰恰在结构主义加强了对巴黎知识分子理论控制的那一刻，它的局限性也被强烈地感觉到了：一种偏爱体系、精确、逻辑和栅格的阿波罗精神；对戏谑、多价和矫揉造作的相关忽视——标新立异的法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例如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青年学生一代将以此种方式来反对形形色色的“主人思想家”。

克里斯蒂娃到了巴黎，及时参加了知识分子盛大竞赛的新一轮重要范式的改变：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她的东欧知识背景足以让她年仅 24 岁时就成为主要参与者。她说一口流利的俄语，熟悉俄国形式主义的传统，她还精通俄国文学批评家米克哈伊·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理论。在对拉伯雷（Rabelais）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开创性研究中，巴赫金发现了迄今仍被忽视的文学文本的对话维度：伟大的文学文本在往往相互矛盾的众多声音中进行言说的方式。巴赫金证明了《巨人传》（*Gargantua and Pantagruel*）和《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等小说如何具有一种不可化约的话语复调性的特点，由此证明了具有传统思想的文学批评家热衷的作者凝聚力和叙述统一性是站不住脚的。（例如，有人想起《卡拉马佐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教廷大法官的情节，其中伊万和阿廖沙难忘地争论一种堕落人类如何对基督重临做出反应的僵局。）巴

赫金也表明他们处于与以前文学作品和文学传统的对话关系之中。(例如有人会想起塞万提斯在《堂吉珂德》中对骑士小说的不朽戏仿。)因此,他能给文学研究增加一种历时的和历史的维度,弥补了一个形式主义的最大缺陷。对立于西方基于封闭、总体性、有限性和结构不变量的压抑性戒律的科学话语,巴赫金阐明了文学文本如何在内在本质上是多价的、去中心的和狂欢的。

在苏联的语境中,巴赫金的著作产生了“持不同政见的”、暗中削弱共产党单义真理主张的功能,而共产党以单义真理的名义继续实施毫不妥协的独裁统治。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情况与之相反,尽管巴赫金著作的政治意义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认识论的意义是巨大的。他的文学对话方法可以看作是为颠覆结构主义严肃的、反狄奥尼索斯的刻板风格提供了理想的概念手段。克里斯蒂娃创造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来传达巴赫金的观念——文本“被建构为一种引用语的马赛克;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改造”¹。

因此,克里斯蒂娃吹响了后结构主义的号角,反对传统语言学的分类与排斥,她断言传统语言学只适于加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编码”(socialcodes)。随后,后结构主义者对“西方形而上学”的闭塞性和局限性——与结构主义一起被视为那种范式的最新化身——发起的猛然攻击将与福柯揭露“权力”的话语根源与认识论根源的尝试融合在一起。在《诗学语言的革命》(*Revolution in Poetic*

1 Kristeva, *Kristeva Reader*, 37.

Language, 1974年)一书中,克里斯蒂娃嘲笑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刻板性是“档案员、考古学家和恋尸癖”的毫无生机的逻辑构思。“这些静态的思想,”她继续写道,“悠闲沉思的产物远离了历史混乱,坚持寻找语言的真实,使悬于半空的表达形式化……聆听着一具沉睡身体的叙述:安睡的身体,离开了它的社会历史的交叠,远离了直接体验。”¹通过摧毁结构主义对整个统一体和形式局限性的迷恋,文本性(文本之间的对话性相互作用)将暴露语言学于无限游戏的陶醉之中。

250 面对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问题可以重新表述如下:就所有智力活动的“逻各斯中心的”(logocentric)偏见对享乐(jouissance)、他性(otherness)和差异实施了系统性的压抑来说,是否有可能构想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公正地对待这些迄今为止边缘化的、被排斥的要素的新理论范式呢?克里斯蒂娃的解决办法是一种她将其命名为“符号分析”(semanalysis)的语言方法。作为一种融索绪尔、拉康、弗洛伊德、马拉美、“女性中心的女权主义”(gynocentric feminism)和“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为一体的混合物,符号分析是克里斯蒂娃的特有贡献,有助于她对继承而来的理论范式和话语政制实施一度流行的拆解行动。

也许符号分析的缺陷是它不加批评地接受拉康的欲力理论。根据拉康的理论,从想象界向象征界的转变意味着从原初自恋转向潜在守旧的“文明”价值的内在化。在这一点上,拉康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在《图

1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13.

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 中对原始部落屈从于种种方式的叙述的摒弃有相似之处,而这些摒弃是由“父法”(law of the father)强加的。在弗洛伊德的寓言中,兄弟谋杀原始父亲之后被内在化的罪恶与社会超我的构成相一致——文明对基本的本能性限制所施加的向内投射。然而,在拉康把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结论嫁接到这种极具影响力的弗洛伊德神话之后,他从儿童臣服“父之名”(le “nom” du père)的角度——所谓的菲勒斯法则(law of the phallus)(阉割的威胁)以及相伴的惩罚与压抑——描述了从原初自恋向象征界进行的个体发生方面的转变。弗洛伊德坚定地支持理性自我的发育,这个理性自我游弋于欲力的倒退性诱惑与社会整合的诱惑之间,而内在于拉康关于个体发生的叙述之中的是对作为原初自恋仓库的想象界进行一种完全非弗洛伊德式的描述。拉康的心理拓扑学理论将想象界描述为一个我们在通向象征界的误读的道路上所抛弃的(尽管从没完整的)、自由快乐的前语言学领域。最终,对于拉康来说,象征界有可能凝结为一种未缓和的社会整合的维度。通过语言和社会化形成的自我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习俗的观念。¹

拉康的方法似乎也排除了有意义的政治变革的全部可能性。他把

251

1 关于弗洛伊德欲力理论与拉康欲力理论之间的一些差异,参见 Joel Whitebook, *Per-
version and Utopia: Studies in Psychoanalysis and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对拉康理论一种富有洞察力的(更具支持态度的)解读,参见 Carolyn
Dean, *The Self and Its Pleasure: Bataille, Laca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Decentered Subje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关于拉康在法国“二战”后知识分子文化中
作用的概括性评价,参见 Jay, *Downcast Eyes*。

语言、自我和社会贬低为在个体发生上以误认逻辑为基础的不同领域。按照拉康的观点，只要自我是由严格“父之名”所决定的语言塑造的，它就只是一种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编码的虚幻效果。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完全与占支配地位的结构主义信条协调一致。只要被利用的语言方法“总是已经”被语言的指令、限制和除名所玷污，任何超越“编码”的努力就被认为在本体论上是徒劳的。拉康谦逊地教导“六八分子”（其中许多人是他的学生）：“作为革命分子，你们渴求的是主人。你们将会拥有他。”¹ 通过这一训谕，他想说他们彻底变革现存社会秩序的尝试只能以创造同样压抑的社会秩序为结局。² 根据他关于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关系的构想，其他结果不再有可能发生了。人们一屈服于“菲勒斯法则”以及这些屈服行为必须伴有的、自我的象征/父权制之构造，结局就已经注定了。这样拉康就排除了社会权威可能遭受理性挑战的预期。

既然拉康及其追随者摒弃了挑战社会权威的“理性的”方法，那么争夺统治权的、唯一剩下的可能性就必然来自无意识和力比多的源头。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分析恰好符合拉康的这种图式。在《诗学语言的革命》和其他著作中，她的主要的观念革新是符号界与象征界之间的区分——一种基于拉康的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的对立的变体。

尽管符号界像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一样是“前理性的”，但是它并不缺乏意义或意指。克里斯蒂娃正是依仗她对母亲与婴儿之间的非言

1 参见 Lacan, *Television*, 引自 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2:150。

2 关于这一点，参见 Starr, *Logics of Failed Revolt*。

语交流的对象关系心理学的深刻洞察，她才提出符号界意味着一种前俄狄浦斯情结的“身体语言”。它不再使用“词语”或“符号”，而是通过节奏、声音和欲力来默默无语地进行交流。克里斯蒂娃试图为符号界提供一个高贵的哲学谱系，她将其源头追溯到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aeus)创造的词汇——“空间”(chora)，柏拉图简要地将其描述为“不可见的无形式的存在，承受一切事物，并以神奇的方式有了理性。它的存在是最难理解的”¹。在克里斯蒂娃看来，符号界的chora的首要优点之一就是，作为一种前语言现象，它能够避开象征界的压抑与扭曲。

在《诗学语言的革命》中，克里斯蒂娃描述了“空间”(chora)的作用，兹述如下：

既非模型也非复本，“空间”先于形象化，并引起了形象化，进而导致了镜像化（拉康的想象界），而且空间仅仅相似于声音的节奏或运动的节奏……由无意识理论所提出的主体理论将容许我们在这种没有扬音节和元音位置的节奏空间中解读意义被构造的过程。柏拉图本人将我们引向了这样一种过程，当时他称这一容器或“空间”是富有营养的、母性般的，

1 Timaeus, in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 ed. Edith Hamilton and Huntington Cair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76. [译文参见《蒂迈欧篇》，谢文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另参见《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2-303页。——中译注]

尚未统一为一个有序的整体，因为神性是缺席于这一空间的。尽管被剥夺了统一性、同一性或神性，但是“空间”仍附属于一种调节过程，这一过程不同于**象征法则**的过程，但是它仍然实现了暂时连接它们并反复重新开始的非连续性。¹

253 克里斯蒂娃突出了前俄狄浦斯情结的符号界与弗洛伊德“死亡欲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当时她说：“因此母亲的身体是调解这种组织社会关系的**象征法则**的媒介，变成了符号空间的秩序原则，这一符号空间处于**毁坏、攻击性和死亡**的道路上。”²似乎通过避免象征界成为一个“语言”、“菲勒斯中心主义”和“文明”的形象，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公然冒着个体发生退化（“精神错乱”，甚至死亡）的危险，但是这是克里斯蒂娃及其门徒们显然乐意冒的风险。³

在与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趋势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克里斯蒂娃试图赋予符号空间一种显著的“解构的”（deconstructive）维度。空间的首要优点之一就是它依然敌视以各种压抑形态存在的先验主体的综合趋向。空间是“没有主体的意指”、西方形而上学的公敌和不可救药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偏见的随从。它有可能以一种新的、非线性的、“母

1 Kristeva, *Kristeva Reader*, 94.

2 *Ibid.*, 95;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3 在这一点上，克里斯蒂娃的方法堪比赫伯特·马尔库塞和诺曼·O. 布朗著作中关于死亡本能的类似观点。参见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 Brown, *Life against Death: The Psychoanalytic Meaning of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9)。

性般的”时间性的名义去炸毁作为“进步”的历史的线性时间。根据克里斯蒂娃的观点，空间再现了一系列“断裂和啮合（节奏），它们先于痕迹、逼真性、空间性和时间性”，也就是象征界的累赘之物。

然而，此时一种表述行为的矛盾困扰着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分析事业，因为不管她如何以拉康式的谩骂来反对象征界的缺陷，除了使用语言本身，她仍没有可资利用的方法来传达她的批评，而这种方法恰恰是由她在《诗学语言的革命》及其他著作中大肆辱骂的同一个象征界所提供的。克里斯蒂娃不再容许“欲力、节奏和声音”缄默的、母性般的意指去自由地增殖，她将它们铭刻到话语之中，由此违背了她自己的拉康式处方（尽管克里斯蒂娃在其他著作中诉求于一种改变了的、以性别为基础的语言方法，后者的目标是超越拉康的象征界的限制）。

符号分析的另一个独特性关系到克里斯蒂娃所做的这样一些努力：她试图将20世纪先锋派与政治革命的目标相联结，更具体地说是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相联结。她主张，像母性般的“身体语言”（空间）的符号瓦解一样，经典现代主义的组合激进主义蕴藏着粉碎意指的能力，由此瓦解象征界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限制：马拉美同志遭遇了列宁同志。马拉美、乔伊斯、阿尔托和塞利纳的著作欣然接受了自律性意指（autonomous signification）：能指开始从真实世界的指涉中分离出来，意指的自由运作比文学较为传统的叙述能力与再现能力更为重要。在《诗学语言的革命》中，克里斯蒂娃认为，不管资本主义条件下意指实践的压抑性本质如何，某些有特权的先锋文学文本（例如乔伊斯、马拉美）能够进入符号空间的应许之地。借此他们能够实施“爆破……于社会领域内部”，但是这些爆破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和它们可

能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效果仍然是模糊的。这样一些文本体现了“不可阻挡的突破”的原则。最终结果，克里斯蒂娃总结说，是“意指过程加入了社会革命”¹。

善意的批评家运用克里斯蒂娃的方法辨别出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似乎她对文学史的理解依赖于一种不堪一击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二分法：她过度赞扬了现代主义，而她认为现实主义是倒退的。这种对照最终将大量的文学史篇章（古典戏剧、书信体小说、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当成了美学的和政治的枝节问题。此外，文学现代主义在形式方面的革新也被交流障碍抵消了。极端现代主义文本越来越对一群界限分明的、志趣相投的作家和批评家有吸引力——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二战”后对极端现代主义的普遍失望。结果证明现代主义并不比符合现实主义标准的文本对学术“熏香”（embalment）——也就是说对成为“研讨班文学”有价值的材料的危险——更具免疫力。²

1 Kristeva, *Kristeva Reader*, 122 and 112, and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104.

2 在某些方面，克里斯蒂娃对现代主义的立场与西奥多·阿多诺在《审美理论》以及其他著作中的立场相似。但是，在《走向成熟的新音乐》（*The Aging of New Music*）和《论电影的透明性》（*Transparencies on Film*）等后期著作中，阿多诺表达了对极端现代主义内在的批判本质的另外思考。他觉得极端现代主义也暴露了因循守旧的趋势。他似乎也意识到公众不只是由“文化傀儡”组成，而确实比他想象的更有能力做出批判性判断和进行独立思考。参见 Adorno, “Transparencies on Film,” in *Culture Industry*, 178–187。关于《走向成熟的新音乐》，参见 *Essays on Music*, ed. Richard Lepper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181–203。

克里斯蒂娃试图描绘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似之处，一方面是与乔伊斯、马拉美名字相连的“意指实践”中的革命，另一方面是与列宁和毛泽东相连的政治革命活力，这种相似之处似乎是错位的、幼稚的。起初这种相似之处依赖关于诗学语言与政治语言之不同功能的范畴错误。诗学功能使日常生活陌生化，以激发了新的观看方式，由此它加强了生活经验的多样化与丰富性。就其本身而言，诗学功能的优点之一就是它不再考虑日常生活中占优势的“常识”(common sense)。相反，政治语言，即使当它是“革命的”时候，也依赖于可概括的交流的优点。政治语言试图通过提出这样一些论据或立场来令人信服：这些论据或立场提供了一种对政治现实似乎更有道理的解释。到了现代时期，政治语言必须遵从与正义或公平的叙述相关的语言游戏规则(règles de jeu)。甚至列宁主义，克里斯蒂娃的革命主义优点的检验标准，也向这些规则致以敬意。以诗学语言为例，坚持这些现实世界的规则和限制是灾难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究竟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话语最终如何协力来产生克里斯蒂娃渴望的革命巨变，她从没解释过这一问题。

此外，在历史上，现代主义恰恰在那些民主政体的条件下蓬勃发展，而克里斯蒂娃这个革命主义信徒宁愿看到这些民主政体被扔进历史垃圾箱。不像将艺术束缚在各种外在的宗教目的和政治目的的以往社会，民主政体为艺术提供了探索全面形式革新与形式革新能力的回旋余地。相反，在革命政制的条件下，文学现代主义的实践者或者遭受打击、沉默无语，或者被送到集中营。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克里斯蒂娃直接参与辩论，反对容许她所重视的激进美学学说走向繁荣

的社会条件。

克里斯蒂娃诗学革命理论的最后一个方面经受了各种批评：她主张，不为文学现代主义的代表们所知的是他们肩负着符号空间使者的重任——冲动（pulsion）、节奏和声音的前语言阶段的、母性般的领域。因其牵涉到女权主义，她的符号界的对象关系派生理论充当了一座 20 世纪 70 年代兴盛于法国和美国的妇女运动的桥梁。然而，常常是那些试图运用她的理论以达到女权主义目的的人被这样一个事实深深困扰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那些充分例证“符号的”交流的优秀的诗人和作家都是男人。吊诡的是，尽管这本来可以拿像克里斯蒂娃这样的女人来解释语言被压抑的、母性般的维度，但是女人在她的图式中天生不太适合成为革命诗人。因此，符号界是一个母性价值的领域，而象征界或语言几乎是男人独占的保护区。

从这种观点看，女权主义政治似乎提前被抛弃了——并且它如何又不被抛弃呢？一旦女人进入象征界，她们就会变成拉康“父之名”的人质。她们与再现、意义和理性的“男权主义”价值达成一种命中注定的妥协。克里斯蒂娃的学说给女同仁们提供了一种不可能的选择。她们可能进入话语领域——菲勒斯中心的“社会编码”的领地——要以她们的“女人味”（femininity）为代价，或者她们以屈从于歇斯底里或自杀为代价来抛弃这种妥协。克里斯蒂娃说：“假如没有父亲的‘合法性’一起来抑制这种无穷无尽的非象征化的冲动，那么（女人）就会崩溃，进入精神错乱状态或者自杀……她一说共同体的话语，女人

就变成了一个‘菲勒斯’(Phallus)。”¹

克里斯蒂娃与女权主义的关系一直令人困惑不解。与露西·伊利加蕾(Luce Irigaray)和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一起,她通常被视为法国女权理论家“三位一体”(Holy Trinity)的人物。“二战”后第一代女权主义者,以波伏娃的经典著作《第二性》为最好代表,她们想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而第二代“以女性为中心的”女权主义者热情地赞颂女人的“差异”。在抛弃了女性社会平等的改良目标后,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视“女人味”(母性、养育和情感性)的价值为其自身的目标。

“第二波”法国女权主义者的深刻特点是德里达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解构主义批评,这种观点认为西方思想已经不可挽回地被“理性主义的”和“男性的”偏见扭曲了——同一性优先于差异、统一性,优先于多样性、“在场”,优先于“缺席”、“男子气”(masculinity)的属性,优先于“女人味”的属性。不过,正如许多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解构主义式的女权主义的理论成果是自相矛盾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通过天真地赞美令“第一波”女权主义者感到羞愧的“女人味”,一场本来受“差异”的战斗口号所激发的运动变成一种新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此外,通过傲慢地避开第一波女权主义者较为浮华的、平等主义的议程,学院派女权主义者似乎对其较为不幸的同道中人的困境表现出来的、高人一等的冷漠态度感到内疚。

1 Kristeva, *About Chinese Women*, 41; Julia Kristeva, "Sujet dans le langage et pratique politique," in *Psychanalyse et politique* (Paris: Verdiglion, 1974), 6.

克里斯蒂娃以典型的左派分子的蔑视公然抛弃了平等主义的女权主义的种种目标：“女权主义也许仅仅建构了一种对最具活力的资本主义合理化的需求。”¹ 因此，用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的话来说，因缺乏姐妹般的团结，“解构的、精神分析的法国女权主义者的写作，以其技巧上的特点和不熟悉的词汇，具有……（替代）一种专业合法化的话语”²。

258 克里斯蒂娃的女权主义很难被定位。尽管她似乎接受了“以女性为中心的”女权主义的认识论术语，这种女权主义在一系列引发争议的、公开出版的评论中强调女人的“差异”的特权，但是她特意在几乎所有的女权主义的当代政治化身中疏远了女权主义。

克里斯蒂娃核心的女权主义见解之一关系到“母亲的功能”（maternal function）。先锋派诗人通过他们的艺术逐渐破坏了象征界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规则，而女人似乎通过生孩子来达到了同样的目的。“真正的女性革新……只有当母性、女性创造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被更好地理解时才会产生，”克里斯蒂娃说。³ “通过生孩子，女人开始与她的母亲联系起来；她变成了母亲，她是她自己的母亲；她们具有分化自身的同一连续性。由此她实现了母亲身份的同性恋方面，经由这一母亲身份，女人同时更接近她的本能记忆，更大程度上向自己的

1 Kristeva, *Interviews*, 101.

2 Nancy Fraser, introduction to *Revaluing French Feminism*, ed. Nancy Fraser and Sandra Bartk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2.

3 Kristeva, *Kristeva Reader*, 298.

精神错乱敞开，结果在更大程度上否定了社会的、象征的联系。”¹

在《女人的时间》（这篇论文写于1975年，当时克里斯蒂娃已经怀孕了）中，她断言母性预示着一种“新伦理”、一种“她伦理”（herétique），“在专心、温和与忘我中进行着迟缓的、艰难的与令人愉悦的学徒生涯……一种在强烈的语感中的创造”²。

但是，正如女权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因其勉强地将女权主义的目标与母性联系起来，克里斯蒂娃冒险使妇女运动倒退几十年。事实上，她的“母性的”框架有可能将女人抛掷到父权制觉得最舒适的屈从场所。一位女权主义批评者贴切地说：“克里斯蒂娃仍然相信男人创造了权力和再现的世界；女人创造了孩子。”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波伏娃等第一波女权主义者认为母亲身份是女人自律的敌人，而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者逐渐把母亲身份视为女人成就感的顶点。

克里斯蒂娃20世纪70年代所接受的母性修辞是一种讨论女人味的永恒真理的本质主义话语。就其本身而言，这种话语与她先前接受的、用以反击结构主义语言学之物化的解构主义认识论立场不一致。为了矫正这一矛盾——而且为了回应我们稍后将研究的、一系列灾难性的左翼政治参与，克里斯蒂娃很快就开始协调一致地疏远形形色色

259

1 Kristeva, *Portable Kristeva*, 303.

2 Kristeva, *Kristeva Reader*, 206.

3 Ann Rosalind Jones, “Julia Kristeva on Femininity: The Limits of a Semiotic Politics,” *Feminist Review* 18 (November 1984): 63.

的女权主义政治活动。由此，法国女权主义“三位一体”阵营的其他代表伊利加蕾和西苏运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主义批评以便给“女人味”下一个肯定的、“以女性为中心的”定义（强调女同性恋的特权、女性写作、女性身体等等，所有这些方面据说呈现出一种与“西方理性霸权”不一致的“异质性的”形态），而克里斯蒂娃相信界定女人的任何的尝试冒着屈从于象征界的逻各斯中心暴政的危险。因此，她表示支持拉康挑衅性的格言“没有所谓的女人”¹，进而解释了拉康这样的妙语：“的确，（女人）不以大写的‘W’（某种神秘统一性的持有者——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存在。”²

因此，在克里斯蒂娃看来，女权主义政治只能是彻底否定的。它必须“抛弃有限的、明确的、结构的，并在社会的现存状态中承载意义的一切东西。这样一种态度把女人置于社会编码的爆破一边：支持革命的时刻。”³但是，在女人“非存在”（nonexistence）与其“神秘的、至高的统一性”这两个孪生端之间不能有中间立场，这一观点给我们一种错误选择。只要克里斯蒂娃的解构主义式的女权主义拒绝全部在女人的自我定义方面的尝试，并将之作为在认识论上是退化的，它就冒险将女人在政治上置于一种永久边缘性的境况之中。

1 Jacques Lacan, "Dieu et la jouissance de la femme," in *Encor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5), 68;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2 Kristeva, *Kristeva Reader*, 205.

3 Julia Kristeva, "Oscillation between Power and Denial," in *New French Feminisms*, ed. Elaine Marks and Isabelle de Courtivro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0), 166.

在1974年引发争议的、题为“女人，从未是‘那一个’”(*La femme, ce n'est jamais "ça"*)的访谈中，克里斯蒂娃宣告：

女人从未“是”(be)，因为女人恰恰是避开“是”(being)的那一个。因此女人的实践只能是否定性的；它仍然与存在的东西不一致。它能说的一切是，“那一个不是它”和“那一个仍不是它”。在我看来，女人是不能被再现或被描述的某种东西；女人仍处于分类与意识形态的范围之外……使我的作品成为女人的作品的就是我密切地关注这种**根除身份**（包括性别身份）的先锋实践的要素。¹

根据克里斯蒂娃的观点，身份的全部肯定的构想招致一种凝固成“极权主义”的危险。但是，这种结论依仗着一种介于“先锋实践”与特有的、作为“非同一性”(nonidentity)的女性身份的解构主义观念之间脆弱的、不可证明的联系。女权主义积极分子断然反驳道，像克里斯蒂娃这样的认识论方法直接了当地回绝了女性身份问题，这种方法损害了真正的“中介”(agency)观念，以致到了这场运动积极分子的日常斗争几乎变得没有意义的地步。

1 Kristeva, Interviews, 98;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与共产主义的错姻缘

《太凯尔》派为了“理论”的严谨性而鄙视“文之悦”，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他们就察觉到了法国的政治风向将要发生转变。1965 年，戴高乐以较高票数再次当选总统，成功实现连任，这意味着有意义的内部政治变革的前景是暗淡的。那一年发生了美国第一次大规模轰炸北越事件。随之发生的军队集结和军力增加激起了全世界学生的示威游行。1966 年 12 月，20 万法国学生在巴士底狱广场参加了一场这样一种的抗议活动。更激烈的大规模冲突将一触即发。此外，如前所述，法国大学的办学条件没有与快速的大学扩招保持同步，没有满足学生高涨的职业期待。教室人满为患，教授无法进入，通道在某种意义上布满了毫无必要的官僚主义壁垒。过时的、苛刻的宿舍管理规定对减轻学生的挫折感的作用几乎微乎其微。在许多方面，拉丁区就是一颗等待爆炸的政治力比多定时炸弹。

尽管《太凯尔》起初界定自己的立场是反对存在主义的“介入”号召，但是它如今不得不因当时的政治骚乱而冒着被遗弃的危险。索莱尔斯再次仓促地决定进行一次激进的编辑策略大转变，否则以先锋立场而自豪的《太凯尔》将冒着自身永远处于“后卫”的风险。

一个有关杂志新动向的迹象出现在 1966 年《太凯尔》编辑部秘书马尔塞林·普雷奈（Marcelin Pleynet）写给索莱尔斯的一封信中，普雷奈在信中清楚地表达了杂志需要新的政治“路线”：

《太凯尔》的政治化必须公开、别含糊，它必须以这样

的方式被宣布：一切所谓的“去政治的”文化倾向——也就是来自右派的各种倾向——将不会出现在杂志上，不再祈求杂志成为一个联盟……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不确定与中国的联盟是否就够了。在法国的语境中，（共产主义）政党总是更灵验的。¹

在这种情况下，索莱尔斯的选择极为笨拙，他将自己的命运与处于僵化末期的法国共产党连在了一起。远非是一场天堂里进行的比赛，这无疑是一场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姻，双方准备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在一系列灾难性的政治决定后（包括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早期支持），法国共产党的好运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骤然下跌。尤其是共产党没有能力去吸引像纪德、马尔罗和萨特这样著名的同路人，这些名人曾给共产党提供了共产党本不可能从“社会中坚”（salt-of-the-earth）的老百姓当中获取到的文化声望与智慧之光。²因此，在一场1966年3月阿让特伊召开的、起关键性作用的全体会议上，法国共产党干部决定，为了提高声望，共产党将不得不削弱新日丹诺夫主义的（neo-Zhdanovite）文化定位，这种文化定位数年来授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特权。这一“文化开幕”的成果之一就是与《太凯尔》的奇异联盟。对索莱尔斯来说，他欣然接受了这次机会，他宣布说：“写作与革命

262

1 Forest, *Histoire de Tel Quel*, 275;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2 关于这一点，参见 David Caute, *The Fellow Travelers: Intellectual Friends of Communis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手挽手地前进，它们时时相互激励，像武器一样发展出一种新神话。”¹

索莱尔斯在 1968 年《此时此地的革命》(Revolution, Here and Now) 的宣言中详尽地论述了这一群体的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信条，这篇宣言以如下的表述开篇：

任何意识形态事业，如今不再以高深的理论形式来表述，反而为了把个体的、不完全政治化的活动置于折中或煽情的标题之下，这样一种事业在我们看来是反革命的，因为它没有认识到不得不在客观上被继续进行并被再次激活的阶级斗争过程……马列主义理论（是）我们时代唯一的革命理论。²

263 这一联盟被视为一种极为不寻常的奇观：西欧最卑躬屈节的、亲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与众所周知的“难以阅读的”后现代文学理论杂志勾结在一起。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强迫联姻持续了 5 年之久，直到 1971 年。对于《太凯尔》派来说，与法国共产党的协定在一个异常的社会政治骚乱的时代中提供了一种受欢迎的、免受“去政治主义”控诉的保护屏障。但是，它也为这本杂志及其作者们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去超越左岸知识分子生活的巨大界限，并去接触全新的国际读者。共产党可以支配大量宣传机构，包括发行量将近 20 万的巴黎

1 Sollers, ed., *Théorie d'ensemble*, 70.

2 Sollers et al., “Révolution ici maintenant,” *Tel Quel* 34 (Summer 1968): 4;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重要日报《人道报》，还有一系列著名的文化季刊和周刊：《新法兰西》（*France Nouvelle*）、《新文学》（*Les Lettres Nouvelles*）、《新批评》（*La Nouvelle Critique*）和《法兰西文学》（*Les Lettres Françaises*，该杂志由前超现实主义者路易·阿拉贡主编）。从完全实用的角度看，与法国共产党联姻后《太凯尔》的销量和宣传效果有可能是相当可观的。一位观察者指出：

假如有人像安德烈·斯蒂耶（*André Stil*，小说家），一个阿拉贡宠儿那样接近共产党路线，那么他将有可能获得斯大林小说奖，成为世界上翻译成其他语言最多的法国作家，会在《人道报》上以头号大标题被致敬，是全法日常会议的讨论对象、礼物接连不断……共产主义世界如此完善，有日报和周报、文化政治杂志、社会事务与社会集会、全国会议与国际会议……以至于人们可以认为共产主义世界就是整个世界。¹

共产党反而希望通过与《太凯尔》联姻获得新一代学生的忠心，因为这一代学生迷恋结构主义、文学和左翼政治。

在《武士》（*The Samurai*）中，克里斯蒂娃以小说的形式对《太凯尔》的文学和政治的鼎盛时期进行了叙述，她描绘了这本杂志突然政治化

1 Lottman, *Left Bank*, 251.

背后的逻辑依据，兹述如下：

264 埃尔韦（索莱尔斯）没有放弃他的理念：象牙塔里不再有文学实验，因此不得不与大众进行联系。如今（《太凯尔》）已不足以胜任了；它不得不从索邦大学挣脱出来。知识分子始终是胆怯的激进社会主义者；他们与文学毫无关系。一名雪铁龙汽车公司的工人比一位教授更浪漫。毕竟贫穷是一种爆炸力，并且影响巨大。因此为什么**现在**不去弗兰（一个法国雷诺汽车厂）？文化不了解阶级——世界充满了没有文化的贵族和愚蠢的资产阶级。但是，重要的是，埃尔韦具有运作媒体的天赋。而在 1968 年，这种联盟在短期内比电视更具影响力。¹

索莱尔斯通过援引俄国形式主义诗人赫列勃尼科夫（Velimir Khlebnikov）和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超现实主义 者路易·阿拉贡和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等历史先例，他试图证明《太凯尔》新的、亲莫斯科的“文化革命的”路线是正确的。他显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政治参与所引发的灾难，既有现实的灾难又有文化的灾难。[根据最新的档案发现，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很像苏联内卫军（克格勃的前身）的处决。] 尽管索尔仁尼琴叙

1 Kristeva, *Samurai*, 89.

述古拉格群岛的开创性著作直到1973年才出版，但是维克多·克拉夫琴科（Victor Kravchenko）和大卫·卢塞（David Rousset）可靠的战后报道已经记录了集中营的肮脏生活。¹ 未被吓到的《太凯尔》聪明的符号学家通过声称他们擅长“能指的唯物主义”（materialism of the signifier），试图使他们的哲学共产主义合理化，而这种“能指的唯物主义”大概描绘了阶级斗争向策略上重要的“符号论平面”（semiological plane，各国符号学家联合起来！）蔓延。“如若同时没有在另一个层次上发生一场符号革命，就不可能产生一场经济与社会的变革。”² 索莱尔斯自负地说。

索莱尔斯一度向无产阶级读者介绍其独具特点的、“难以阅读的”一本小说——《H》，这本小说的情节由一个单独的判决组成。他断言工人被他的成就完全征服了。³ 根据克里斯蒂娃在《我的记忆双曲线》（*My Memory's Hyperbole*）中的叙述，《太凯尔》派以“打入内部”的精神努力从“压迫的（法国共产党）机构的官僚主义畸形”内部进行暗中破坏，通过暗地里引入他们自己的、折中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混合物，她将其视为“一种被卢克莱修（Lucretius）、马拉美和弗洛伊

1 参见 Victor Kravchenko, *I Chose Freedom: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Life of a Soviet Official* (New York: Scribner's, 1946); David Rousset, *L'univers concentrationnaire* (Paris: Editions du Pavois, 1946)。

2 Sollers, "Réponses," 76;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3 引自 *Cultural Politics of Tel Quel*, by Marx-Scouras, 183。

德推翻的黑格尔主义”¹。索莱尔斯后来也断言他与共事的编辑们正在玩一种“双面打法”（double game）：他们试图进入“（法国共产党）内部密室，以便放进去一颗可以炸毁一切的炸弹！”²然而，即使持赞成态度的传记作家 [《〈太凯尔〉史》的作者菲利普·佛海斯（Philippe Forest）] 也禁不住说：“有人怀疑索莱尔斯……为了免除他这些年妥协的‘同路人行动’（fellow traveling）的罪责，后天地重构这个时期的历史。”³

索莱尔斯可能是一个政治白痴。但是正如马克斯·韦伯曾说的那样，那些玩弄历史车轮的人会被碾碎的。在克里斯蒂娃的事例中，幼稚的借口没有被洗去。毕竟她来自一个东欧最受压迫的斯大林主义国度，曾直接体验过“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铁蹄。在《太凯尔》内部小圈子中间，也许只有她才有可能增加政治现实主义的决定性分量。多年以后，当她试图为她当时的行为进行辩护时，她唤起了这样一种期望：也许，“在法国，它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终究，“阿尔都塞有没有……采取最严格的（对我来说，最‘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以便为法国共产党和整个法国社会注入新希望，成为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源泉的预兆？”⁴

1 Julia Kristeva, "Mémoire," *L'Infini* 1 (1983): 50; English translation: "My Memory's Hyperbole," in *Portable Kristeva*, 16.

2 Forest, *Histoire de Tel Quel*, 296–297.

3 *Ibid.*, 297.

4 Kristeva, "My Memory's Hyperbole," 13–14.

在《我的记忆双曲线》中，克里斯蒂娃说：“法国共产党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法国唯一具有文化政治策略的政党。作为一个‘国中之国’，因为法国共产党具有巨大的传播与宣传的力量，这种传播与宣传的力量又与充满较为常规作品的传统程序不同，所以它是实验的文学作品或理论作品的最佳代言人。”¹换言之，只要共产党官员发表了奉承的评论、随笔、文章和访谈，有助于支持《太凯尔》的文学声望，那么人们就能安然地忽视其压抑的内部结构，以及以共产主义“理念”的名义犯下的恐怖罪行。另一位《太凯尔》的支持者试图证明这种邪恶的文化政治联盟是合理的，他断言：“共产党是左派唯一真正有组织的力量，是唯一能够号召自身进行革命的政党，也是唯一对文化问题绝不冷漠的政党。因此，1967年的法国，假如一场政治争论想使作家团结起来，那么它也只有（通过共产党）才能成功。”²

266

但是，即使有人在1968年之后为了逻辑论证而接受克里斯蒂娃及其同仁们的支持共产党的辩解文章，但是这样一种空洞的自我辩解丧失了一切可信性，因为正是这一年，共产主义的独裁核心再度可怕地出现。在这一点上，人们可能对法国共产党的可耻角色感到吃惊，它助纣为虐，帮助当局压制“五月风暴”的工人—学生抗议活动。法国共产党掌控着法国最大的工会——法国总工会，察觉到了一个提高他们作为主流政党的名望的机会，因而法国共产党取消了与戴高乐政府最后时刻的讨价还价，由此结束了大规模的民众大罢工。假如人们

1 Kristeva, "My Memory's Hyperbole," 16.

2 Forest, *Histoire de Tel Quel*, 295.

总是需要法国共产党基本上保守的、“反革命的”本质的生动证据，那么这正是值得所有人注意的事件了。

事实上，假如有人真对提高法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感兴趣，那么法国共产党是其最不可能求助的机构。在莫斯科的命令下，欧洲各共产党经常为了它们自己的官僚晋升与政治进步而出卖普通成员的短期利益。格勒纳勒协定只不过是这种历史上证据充分的现象的一个极端案例而已。¹

267 此时此刻，一场口角应该可以补充说明《太凯尔》在“五月风暴”期间的特殊角色。原则上，“五月造反”给《太凯尔》派提供了一个表达其文化革命信心之勇气的绝好机会。然而，他们恰巧发现自己站到了街垒的错误一边，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法国共产党的头目若尔日·马歇（Georges Marchais）连在了一起。正是这个马歇在“五月反抗”的鼎盛时期诽谤3月22日运动领导者科恩-邦迪只是一个“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其中隐含的意义是清楚明了的：科恩-邦迪，出生在法国，但后来选择了德国国籍，他是一个外国捣乱分子。作为一名德国人、一名犹太人，他在双重意义上都是“非法国人”（un-French）。而当时重要的知识分子和文学名人——萨特、波伏娃、让·热内、娜塔莉·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和玛格丽特·杜拉斯——都满腔热情地支持学生事业。一个他们与学生积极分子团结一致的具体表现就是他们于5月18日聚到了一起，宣告成立一个新的作家联盟——学

1 关于两位主要参与者撰写的出色分析，参见 Cohn-Bendit, *Obsolete Communism*。

生—作家行动委员会 (the Comite d'action étudiants-écrivains, 简称 CAEE)。此时大约有八百万到九百万市民参加了学生们这个月早些时候在巴黎两所大学发动的罢工。

《太凯尔》派坚定不移地忠诚于莫斯科，他们因缺席“五月风暴”而引人注目。当时索莱尔斯及其同仁们喜欢人云亦云，以可以预料到的奴颜婢膝方式重复着党的路线。如前所述，法国共产党领导层不信任他们不能完全掌控的任何群众行动，声称五月示威游行是一个资产阶级给法国工人阶级设置的陷阱，并试图阻止工人阶级参与五月示威游行。《太凯尔》派鲁莽地贬低学生造反是“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他们坚称：真正的革命，只能由共产党来领导。在一次新作家联盟的关键性会议上，索莱尔斯公然重申了他对法国共产党、法国总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永恒忠诚，虔诚地宣布，“一切革命只能是马列主义的”¹。几天后，当新作家联盟将进行一场至关重要的投票时，《太凯尔》的代表们竟然退席以示抗议。因此，在“五月起义”的精彩斗争中，《太凯尔》派舒适地做起了旁观者。

那个夏季早些时候，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入侵（前）捷克斯洛伐克，残酷地镇压捷克进行的“具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苏联占领（前）捷克斯洛伐克在共产主义史上象征着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那些对从内部改革共产主义政体的前景所抱有的幻觉都永远破灭了。主导性的法国知识分子，包括以措辞激烈的形式发表声明的 CAEE 成员（索

268

1 这一描述来自哲学家、《太凯尔》的至交让-约瑟夫·茹 (Jean-Joseph Goux)。引自 Forest, *Histoire de Tel Quel*, 329。

莱尔斯及其同仁们曾在 5 月所鄙视的、他们退出的新作家联盟），联合起来谴责苏联入侵。对《太凯尔》派来说，他们觉得谴责华沙公约组织的行动可能是“在政治上不合时宜的”（politically inopportune）。任何此类批评都直接对资产阶级有利。

在诋毁者眼中，《太凯尔》拒绝采取坚定的立场来反对苏联入侵行动，这令《太凯尔》声称所代表的一切不再适合。德里达曾回忆了一次值得纪念的晚餐，这次晚餐是在作家兼传记作者保尔·戴维南（Paule Thevenin）家中举行的，主人滔滔不绝地谴责了苏联对有勇气但毫无防备的捷克人的野蛮暴行。根据德里达的回忆，《太凯尔》派只是静静地闲坐着，深沉地凝视着他们的餐盘。¹

1968 年 9 月，索莱尔斯在写给《太凯尔》同事雅克·昂里克（Jacques Henric）的信中总结了杂志在那个时期的正式立场：“告诉你不该指望我去解除红军（更别说保加利亚的坦克，我甚至对此负有一种罪恶感）的武装，哪怕是一秒钟，这是毫无意义的。我感到了卑鄙自私的人道主义臭气（也就是苏联入侵的批评者）正到处令人气恼地兜圈子呢。”² 在《太凯尔》与法国共产党决裂的三年后，索莱尔斯证明《太凯尔》支持华沙公约组织入侵是正确的，他声称谴责苏联入侵可能直接有利于政治右派。³

1 Tel Quel, 333.

2 Ibid.

3 Sollers, “Positions du mouvement de juin 71,” 136.

中国迷

在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的眼中，法国共产党 1968 年的错误——谴责“五月运动”，三个月后令人难以置信地声称苏联入侵（前）捷克斯洛伐克是必要的，以便消灭处于萌芽状态的“反革命”——使官方共产主义基本上丧失了信誉。然而，《太凯尔》派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浪漫事迹一直持续到 1971 年，当时他们察觉到政治的时代思潮中的另一场转变：来自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

269

尽管《太凯尔》派认为他们自己是一支文化革命的先锋队，但是就毛主义而言，他们也该勇往直前，不走回头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当索莱尔斯及其同仁们追逐亲华浪潮时，学生左派在很大程度上终止了其教条的意识形态阶段。反而“前六八分子”集中精力去关注一系列更具有生产性的、以“日常生活问题”为中心的社会诉求。¹受索尔仁尼琴的启发，一群前毛主义者在新哲学家克里斯蒂安·让贝和安德烈·格鲁克斯曼的领导下正构想着对共产党暴政进行开创性的批判。在几年之内，前学生革命分子已经将自身改造成慷慨激昂的人权倡导者。

《太凯尔》派并不是如此。尽管他们拼命地游弋于政治浪潮之中，但是他们发现自己被无可奈何地冲向了下游。他们对中国的热情被意

1 关于这一转变的文献资料，参见 Hamon and Rotman, *Génération*。

大利共产党员玛丽娅·安托尼耶塔·马齐奥奇的游记《革命中国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激发了。对于随后就加入《太凯尔》编辑部的马齐奥奇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令人震惊的政治实验室”，一个道德充满了政治、“政治意味着牺牲、勇敢、利他主义、谦逊和节俭”的地方。在中国，“一个民族正迈着轻盈的步伐奔向未来。这个民族或许是世界新文明的化身。中国史无前例地跃入了历史。”¹ 马齐奥奇的游记变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succès de scandale)，法国共产党在 1971 年试图拙劣地禁止这本传记举行年度庆祝活动。这一策略在记者和知识分子中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由此将这本书的接受变成了一次针对法国共产党审查制度的全民公投。

索莱尔斯及其同仁们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为他们这样的符号学家量身订制的，最终他们推断出这是一场将文化主题置于前沿和中心的革命。林彪在“文化大革命”的鼎盛时期说：“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² 根据《太凯尔》的观点，早期革命强调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优先性，而中国的情况显然是不同的，争论的焦点是一场真正的“意指革命实践中的革命”。一名持赞同态度的批评者解释说：

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比法国共产党）更具吸引力，

1 Maria-Antonietta Macciocchi, *Daily Lif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07, 466.

2 引自 Franz and Chang, *Taiiping Rebellion* 3:767。

因为它是更加“文化的”。毛泽东将极其重要的意义赋予“文化的”革命，《太凯尔》将其等同于自己的“文本的”革命，等同于能指形式的作品。此外……毛泽东似乎强调意识形态先于政治，由此给《太凯尔》派的印象是——在中国，作家和艺术家发挥着主导作用。¹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太凯尔》派沉湎于他们的“文化委员”(cultural commissar)的幻想，这胜过了法国共产党更加古板的、传统的文化政治，在这一点上文化基本上仍被视为与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的原则相一致：相对于物质基础是次要的、派生的。

《太凯尔》派被伟大舵手本人的文学雄心欺骗了、诱惑了。事实上，毛泽东在他们眼中几分像一个抓住物质不放的诗人、哲学家。人们怎么没有去认同一场由志趣相同的唯美主义者同仁正在塑造的革命呢？《太凯尔》1971年的秋季号大胆地宣布杂志新的政治路线：“打倒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打倒腐朽的资产阶级！打倒肮脏的修正主义！打倒超级大国的二元对立！革命中国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²在《论矛盾》一文中，索莱斯特特有的纲领性论述，也就是杂志主编对毛泽东的《毛泽东的四篇哲学论文》(Four Essays on Philosophy)的高度赞扬，断言“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

271

1 Marx-Scouras, *Cultural Politics of Tel Quel*, 172.

2 “Déclaration sur l'hégémonie idéologique bourgeoise révisionnisme,” *Tel Quel* 47 (Fall 1971): 135.

列宁的著作，（这些文本）在唯物辩证法上构成了一次不可忽视的、完全独创的‘飞跃’”¹。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历史事件”²。

作为杂志新的意识形态定位的证据，索莱尔斯及其同仁们布置了《太凯尔》位于巴黎时尚的圣日耳曼地区雅各街上的办公室，从地面到天花板都贴满了大字报。大字体的表意文字（中国的图画文字）荣登杂志的封面。根据索莱尔斯好友们的观点，索莱尔斯试图完全将《太凯尔》编辑部变成一个微型的天安门广场。作为他新近捕捉到的亲华信念的深刻证明，索莱尔斯开始穿毛主义者的服装。一个观察者指出：

新的“激进话语”的整个表演通过服装行头的变化表现了。对于索莱尔斯来说，自封的英雄代表毛泽东已经被革命神圣化了，问题的关键是向其他人表明他自己屈从了这种意识形态，以便能够征服其他人……革命派的资格必须被不断地证明，或者通过服装风格……或者通过参考中国人的文本。索莱尔斯是一个根据形势改变知识分子服装的“变色龙”。³

此时索莱尔斯的许多编辑同仁因他理论的变幻莫测和政治的转变而变得灰心丧气，难以言表。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知识分子

1 Sollers, "Sur la contradiction," *Tel Quel* 45 (1971): 4.

2 Sollers, "Positions du mouvement de juin 71," 134.

3 Kauppi, *Making of an Avant-Garde*, 332.

名声与《太凯尔》的声誉如此难解难分，以致于与这份杂志断绝关系相当于文学自杀。瑟伊出版社董事们也开始认为他们的文学浪子是一个难以驾驭的危险人物。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份杂志的亲华立场的转向促使销售量急剧上升，由此使他们丧失了用以控制反复多变的杂志主编索莱尔斯的财政影响力。在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的、支持法国共产党的时期，这份杂志的最好销量也没有超过12000份，而1972年出版的两期中国专号超过了25000份。因其抛弃法国共产党转而向中国表达意识形态的效忠之后，这份杂志精明地以与后五月时代令人激动的亲华政治思潮相一致的方式重新改造自己。在“五月造反”期间，这份杂志的政治路线蔑视学生造反是一起小资产阶级事件，此事件只会有助于转移无产阶级事业的活力与注意力，而在《太凯尔》1972年秋季专号中，索莱尔斯与编辑同仁们宣布：“学生及其斗争的组织发端于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位置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特殊条件，（而且）作为人民大众斗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远远超出青年或知识分子范围的热点问题，只会将他们卷入法国所有的意识形态斗争与政治斗争。”¹由此这本杂志的学生读者人数大幅地增长。毫无疑问，这种宣传效果产生于一种有关马齐奥奇事件的附带结果，这种结果证明是极为珍贵的。

《太凯尔》的编辑们重估了中国历史相对于西方的整个进程及其缺陷，提出了一些令人赞叹的发现。索莱尔斯在一篇文章中得出这样

1 “Le mouvement étudiant,” *Tel Quel* 50 (Fall 1972): 124.

的结论——辩证法是由中国古代哲学创造的。¹ 此时这份杂志对托洛茨基主义（这一主义的法国代表总的来说非常支持“五月造反”）的政治厌恶感强化了。托洛茨基在其著作中一般会轻视中国共产主义的前景。既然中国的工业化仍处于萌芽状态，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尚未成熟，托洛茨基如此断言道。因此，这位苏联红军的前领导人极力抵制毛泽东的论点，即在中国，长期受压迫的农民充当了革命的载体。索莱尔斯及其同仁们鄙视这一立场（主张一个群体从来不会超越其被赋予的社会功能），认为这是托洛茨基的“唯社会学论”。

在《论矛盾》（1971 年）中，索莱尔斯试图说明毛泽东“不均衡发展”（unequal development）的概念如何更新了继承而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辩证法的庸俗构想颁布了历史总是按照一个必然而无情的顺序而前进的律令（例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毛泽东的矛盾概念说明了基础和上层建筑为何仍是经常分离的，由此允许在阶级斗争的逻辑上有新的、独创性的排列组合。在一些历史的关键时刻，经济尽管是关键，但是它可能会将优先性让渡给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这种描述方法似乎准确地描绘了“五月风暴”期间的学生造反，这场造反赋予“日常生活”和“文化革命”的思考以最醒目的位置。由此，从《太凯尔》的优势看，毛主义具有鲜明的政治优势，因为通过强调意识形态的向心性，它似乎向“意指实践中的革命”打开了场域，而这种“意指实践中的革命”毕竟是《太凯尔》派的强项。据他们估

1 Sollers, "Sur la contradiction," 10.

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成就之一就是为文化先锋派的激进革新打开了方便之门。正如索莱尔斯1971年所断言的那样，“没有一个先锋作家不密切关注着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问题是“一场实践的、全新的和当代的语言革命”¹。

为了澄清《太凯尔》新的理论和政治的路线，索莱尔斯写了一篇纲领性文章，发表在《太凯尔》1972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问题合刊（第48—49期）——《革命中国的哲学斗争》（*The Philosophical Struggle in Revolutionary China*）。这篇文章的主旨之一就是批评苏联的口号“合二为一”（Two fuse into one），这一口号是在中苏决裂时被创造出来的，直接反对毛泽东著名的表述“一分为二”（One divides itself into two）（载于《矛盾论》）。索莱尔斯认为苏联的强硬陈词本质上是否定辩证法和无限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要点是社会通过矛盾而前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反驳矛盾的概念就相当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阐释。苏联立场唯一可以想到的结果是“修正主义”：抛弃世界革命，支持“和平共处”。索莱尔斯甚至暗示“合二为一”意味着一种模糊的、对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新超级大国联盟的哲学辩解。索莱尔斯及其同仁们开始向亲华汉学家征集大量文章。编辑方针要求只有描绘当代中国正面形象的文章才能被接受发表。而编辑们立即不屑于任何批评中国的“种族主义的”观点或见解；索莱尔斯等人声称“欧

274

1 Sollers, "Positions du mouvement de juin 71," 140.

洲中心论的偏见”（Eurocentric biases）阻止怀疑者和反对者去欣赏中国发展的内在革命性。¹ 在《中国妇女》一书中，克里斯蒂娃提倡一种不妥协的文化相对主义，她坚持认为中国人的“灵魂”和欧洲人的“灵魂”是按照不同方式建构的，同时断言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来评判中国形势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既然索莱尔斯和克里斯蒂娃对中文都是略知一二，那么《太凯尔》派就把他们自己彻底改造为“中国专家”。但是，他们的专业知识早就开始露怯了。在《中国妇女》一书中，克里斯蒂娃仍主张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母系的”，尽管缺乏经验证据来支持这一主张。令她的读者大为震惊的是，她提出缠足的封建实践证明了妇女的秘密权力。她断言，这只不过是类似于西方男性割礼实践的中国实践而已。据其陈述，这两种实践象征了一种禁令，这一禁令秘密地赋予了“有优越感的政治与象征的知识”²。但是一名对克里斯蒂娃持最支持态度的美国解释者也对这一观察感到震惊，她说：“既然女孩因‘阉割’而痛苦多年、跛足一生，那么克里斯蒂娃怎么会认为割礼类似于缠足？”³ 最后，在克里斯蒂娃把自己描述为这样一个人——“我在那些红卫兵那里，看到了自己在少年先锋队和共青团时期度过的少年时光，也唤醒了我对自已亚裔先人的记忆”后，克里斯蒂娃断言她的人生经历所承

1 参见 van der Poel, *Révolution de la pensée*, 86。

2 Kristeva, *About Chinese Women*, 86。

3 Oliver, *Reading Kristeva*, 110。

继的传统让她感到很荣幸地去洞察当代中国人的生活。¹

《太凯尔》的另一篇文章讨论了中国缺乏专业的精神病学，提供了下述伪科学的解释。精神病学的实践是对社会异化的反应。然而，由于消除了私有财产和竞争，中国成功地消除了异化。因此，精神病学在社会上变得多余了。²它只有在过度异化的西方世界才会繁荣昌盛。作者的结论渴望得到玛利亚·马齐奥奇的支持，因为马齐奥奇曾在《革命中国的日常生活》一书中满怀信心地宣布：“中国没有异化的迹象，没有神经病人的迹象，也没有个体精神崩溃的迹象，这种精神崩溃只会存在于消费主义主导的世界。”³

从他的拉丁区作战基地开始，索莱尔斯决定发动一场属于他自己的文化革命。索莱尔斯以虔诚的雅各宾派方式总结说《太凯尔》编辑部的某些分子在政治上是靠不住的，接着开始清洗可疑的“修正主义分子”。从这时开始，编委会成员很少碰头了。在偶尔召集的几次聚会上，也只是颁布主编的（也就是索莱尔斯的）命令。按照毛主义“一分为二”的格言，《太凯尔》派同时开始出版挑起论战的大开本报纸《一九七一年六月运动公报》[*Bulletin du Mouvement de Juin 71*，他们与法国共产党决裂的、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日子，而且提及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为了纪念1953年对蒙卡达兵营（Moncada Barracks）突

276

1 Kristeva, *About Chinese Women*, 12. (译文参见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赵靓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中译注)

2 Giovanni Gervis, "Notes sur la psychiatrie en Chine," *Tel Quel* 50 (Summer 1972): 96.

3 Macciocchi, *Daily Lif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372.

袭失败而将他的革命组织命名为“七·二六运动”]，基本上是为了解决政治宿怨的目的。

在稍后的几年中，《太凯尔》派提出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理论解释，以便为其亲华的荒唐行为进行辩护。他们一度宣布，作为一种政治激进主义的形式，他们的毛主义设法使 1968 年的旗帜继续高高飘扬。然而，“五月造反”的精神尽管难以概括，但却是自由主义的、狄奥尼索斯式的和反专制主义的，简而言之，正是中国这些兼具标语口号战的政治教条的鲜明对立吸引了索莱尔斯及其同仁们。¹《太凯尔》派也坚持认为，他们当时对中国的兴趣主要是文学和文化层面的，而非“政治层面的”。但是，这个时期核心的编辑宣言——例如《一九七一年六月运动公报》和《毛泽东反对孔子》（*Mao contra Confucius*）——表明了几乎在每个转折点，这个群体忠实地紧跟北京规定的、共产党的路线。随后索莱尔斯宣布毛主义是一个在通往重新发现人权政治的旅途中的必经阶段。就其本身而言，这是一个反对法国共产党顽固的斯大林主义斗争中的重要中继站。尽管这一论点听起来有点儿奇怪，就新哲学家来说可能站得住脚，但是《太凯尔》派的意识形态愤怒似乎将他们置于一个截然不同的阵营之中。20 世纪 70 年代初，索莱尔斯及同仁们也只是将一系列极权主义的政治忠诚（也就是斯大林主义）折换成另一种政治忠诚（也

1 这一解释由 van der Poel 在《思想革命》（*Révolution de la pensée*）一书中的论述给予了证实：“《太凯尔》的毛主义问题……最终与‘无产阶级左翼’的战斗精神或瑟伊出版社的第三世界主义少有共同之处。”

就是毛主义)。

《太凯尔》派应该清楚真相吧？对这场混乱充足的批评性信息当时可以用来对中国的发展做出更加细微的评价吗？或者说《太凯尔》派像其他同时代的亲华人士一样仅仅是一场表演精致的、精心策划的中国假情报运动的受害者？

277

尽管有关中国时局的可靠信息有点儿难以获得，但是一项有关当代文献的调查研究指出批评性报道实际上是容易获得的。事实上到1971年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五年，同一年《太凯尔》满腔热情地追逐亲华浪潮——足够多的批评性文献已经涌现了，这在许多法国左派分子中间引起了对中国事态的深刻质疑。

实际上，那一年发生了两个事件，这两个事件合在一起，的确减少了法国左派毛主义者的政治支持。在1971年末，中国发布了一份有关林彪死亡的公告，而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统帅曾被汉学家视为毛泽东最有可能的政治接班人。中国当局宣布林彪死于蒙古国上空的飞机失事，但是最有可能的推测是林彪政变失败后企图外逃，结果遇难身亡。总之，林彪之死以及笼罩在这一事件之上的神秘形势在很多人看来已经使“文化大革命”永久地失去了光彩。

第二个事件是比利时汉学家西蒙·莱斯 (Simon Leys) 的开创性著作《毛主席的新服饰》(*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的出版。莱斯的研究第一次详尽地叙述了“文化大革命”中臭名昭著的政治暴行：红卫兵攻击共产党官员、作家、教授，还更广泛地攻击任何被怀疑有“资产阶级”或“反革命”想法的人。“文化大革命”堕落为一种解决政治宿怨的工具，还堕落为一种革命青年的政治自我提高的手

278

段。到 1967 年，当中国的政治混乱即将完全失控、出现全面混乱时，毛泽东不得不召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平息红卫兵的革命激情。¹

莱斯的著作遭到了法国媒体的全面诋毁，尤其是法国有案可查的报纸《世界报》。² 莱斯是一位信使，带来了法国左派从不想听的消息，因为按照当时反常的政治逻辑，批评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意味着是亲美派，由此含蓄地认可帝国主义、核冒险政策（nuclear brinkmanship）和越南战争。在少数支持莱斯批评红卫兵狂热行为的杂志中间，有一份杂志是左派天主教杂志《精神》。《精神》也发表了法国汉学家保罗·巴迪（Paul Bady）的批评性文章，巴迪毫不含糊地判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屠杀”（hecatomb）。³ 因此，关于中国发展的、可靠的批评观点对于任何想找到这些观点的人来说还是很容易获得的。

1974 年，莱斯出版了第二部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阴影》（*Chinese Shadows*）。在这个时候，法国左派才长久地放弃其毫不鉴别的亲华立场。渐渐地法国媒体也开始接受莱斯等人提出的、持异议的观点。到此时只剩下《太凯尔》派还高举着亲华的意识形态纯粹性的旗帜。他们欢欣地履行他们作为意识形态盲从者的角色，开始了一次广泛宣传的公款旅游——一个“革命旅游”（revolutionary tourism）的经

279

1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精彩概括，参见 *ibid.*, 565–586。

2 有关精彩论述，参见 van der Poel, *Révolution de la pensée*。

3 Paul Bady, “La révolution dans l’enseignement en Chine,” *L’Esprit* 399 (January 1971): 73–88 and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en Chine (II), le degré zéro de la culture bourgeoise,” *L’Esprit* 401 (March 1971): 505–523.

典案例。¹

这次参观从早到晚都是由中国精心安排的。《太凯尔》派被带到了模范学校、模范工厂和模范出版社——历史悠久的“波特金村庄”路线。在中国方面的严格控制下，他们绝对不能与持不同政见者谈话。他们曾参观一家北京的出版社，这家出版社悬挂了一条写有《太凯尔》名字的横幅。索莱尔斯竟天真地将其解释为一种征兆——《太凯尔》的名声已经传播到几千里外的中央王国的首都。他几乎没有怀疑这条横幅与几乎旅程中的其他一切一样都是政府事先策划好的。《太凯尔》接受皇室般待遇的交换条件是这样一种默契：他们回到巴黎后，革命旅行者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普莱内、罗兰·巴特和弗朗索瓦·华尔会保留一切政治怀疑，并绝对秘密地进行重新思考。索莱尔斯及其同仁们严格坚守协定，继续发表支持性文章和旅行回忆录，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主席的神圣指导下所取得的社会成就。罗兰·巴特发表在《世界报》上的文章这样写道：

毛泽东的书法，到处可见（工厂大厅、公园、桥梁），以一种抒情的、优雅的形式（*jetéok*）标记着中国空间：令人赞叹的艺术无所不在，对我们来说要比那来自远方的圣徒

1 关于“革命旅游”一个重要的（即使是攻击性的）研究，参见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虽然 Hollander 包含了一个有关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的简要讨论，但是他除此以外竟莫名其妙地忽略了《太凯尔》的亲华阶段。亦可见 Hourmant, *Au pays de l'avenir radieuse*。

传记更具说服力……人们（在25年时间里已经建设了一个令人赞叹的国家）旅行、劳动、喝茶或独自锻炼：没有剧院、没有噪音、没有装模作样——总之，没有歇斯底里。¹

280

回国后，《太凯尔》派表露了对林彪1971年外逃失事后“批林批孔”（anti-Confucius, anti-Lin Biao）运动的特殊感情。在克里斯蒂娃看来，这场运动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化”（deepening），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一步。²据她估计，中国共产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它不仅为颠覆现有的生产方式而努力，而且最终为改变两性关系而努力。正如她在《中国女人》中所解释的那样，为了理解当代中国，人们必须自我定位于一神论资本主义崩溃的位置上。但是，确切地讲，这个位置在哪里呢？自“五月风暴”以来，各种新的意识形态位置出现了，但是许多位置表现出旧教条主义或“左”或“右”的不足和缺陷。我们只剩下克里斯蒂娃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时称为“底层”（the Underground）的东西：一种纯粹的、不可同化的他性或差异性的位置。“底层居民”，正如克里斯蒂娃所描述的那样，是“这些仍然没有被组织起来的人们，他们只是以其不可能的、乌托邦式的、‘达达主义的’

1 Barthes, "Alors, la Chine," *Le Monde*, May 24, 1974; 巴特以一种更具怀疑的语气对不可思议的中国实践和中国习俗（中国文化符号学上的不可穿透性）感到失望，他推断解释的失败意味着“解释学的死亡”。这一有益讨论参见 Eric Hayot, *Chinese Dreams: Pound, Brecht*, Tel Quel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131-133.

2 Kristeva, "Les chinoises à 'contre-courant,'" *Tel Quel* 59 (Fall 1974): 29.

政治方式惹来阵阵嘲笑而已”。在她看来，中国就是一个具有这种他性的形象。中国是一个象征，意味着“一神教的资本主义为了建构和巩固自身、为了抵抗所有的危机而去压制的一切东西所呈现出来”的象征。¹

这样中国的吸引力在常规意义上不再是“政治的”，渐渐地中国共产主义不再在现实的平面上存在或具有意义。反而克里斯蒂娃等人将其用作文本问题（“他性”“差异”“多义性”）的投影屏幕，而这些文本问题推动了他们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理论事业。

对于《太凯尔》派来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优势之一就在于它给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履行他们在历史上被规定的革命先锋的角色。不过，一位批评家贴切地说道：

在我们的时代里，几乎没有社会……令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遭受了更加残酷的虐待、羞辱，并被更加残酷地剥夺了自主权，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以后的岁月里……各种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沉默不语，遭受囚禁、拷打，被迫完成卑贱的劳动。允许出版作品的作家不得不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质朴形式的约束。书差不多都毁了……许多文物和艺术品也遭受了此种命运。如若没有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和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等人的著作，那么

281

1 Kristeva, *About Chinese Women*, 13-14. (译文参见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 赵靓译, 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6页。译文有所改动。——中译注)

书店就空了，没什么可买的；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有关 20 世纪文学著作和历史著作的一切记载只要不符合毛泽东的正统观点就会销声匿迹。¹

在《中国阴影》一书中，莱斯称“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知识分子生命的死刑执行令”²。令人痛心的是，这是一道由被他们称之为同路人的西方知识分子共同签署的死刑执行令。

尽管绝大多数巴黎知识分子早已抛弃了他们对毛主义持赞同态度的迷恋，但是《太凯尔》的忠诚分子始终坚持到底。只有到了伟大舵手 1976 年逝世以及随后发生的粉碎“四人帮”运动，他们才最终抛弃了亲华倾向的“白日梦”（pipe dreams）。

此后，索莱尔斯及其同仁们快速追逐反极权主义的浪潮。《太凯尔》将其版面开放给新哲学家们，亲密的知识分子合作在索莱尔斯与贝尔纳-昂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之间出现了。³索莱尔斯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具有人情味的野蛮主义》（*Barbarism with a Human Face*）的恭维性评论，赞美了莱维融哲学与文学为一体的才

1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331.

2 Leys, *Chinese Shadows*, 129.

3 参见 Bernard-Henri Lévy, “La preuve du pudding,” *Tel Quel* 77 (Fall 1978): 25–35; and Bernard-Henri Lévy, “C’est la guerre,” interview with Philippe Sollers, *Tel Quel* 82 (Winter 1979): 19–28.

能，并赞颂自“五月风暴”以来第一次再度出现“伟大的浪漫主义文风”¹。索莱尔斯以类似的语气吹捧新哲学家安德烈·格鲁克斯曼是“法国当代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²。不过，正如批评家们所指出的那样，莱维和索莱尔斯两人都不可能为一种将极权主义作为政治统治形式进行深入彻底的经验主义分析而感到苦恼。相反，通过赞美政见不同，两位作家都满足于一种泛泛而谈的、媒体友善的英雄崇拜形式，人们禁不住感受到，在赞美持不同政见的文学界人士及其不合传统的创作的过程中，《太凯尔》群体同时也赞美了自己。

《太凯尔》的追随者因杂志明确无误地转向右翼而觉得自己被出卖了。这种政治大变卦于1977年应验了，这一年《太凯尔》派出版了一期讨论美国的三人组专号，其中包括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作品。在他们与共产主义罪恶令人失望的遭遇后，《太凯尔》派将他们对“异质性”和“他性”的乌托邦式渴望投射到新世界。（10年前，克里斯蒂娃以一种有原则性的反帝国主义姿态断然拒绝了美国大学的演讲邀请。）³ 克里斯蒂娃在《凭什么是美国？》（*Why the United States?*）一文中评论说：“在美国，我认为反对束缚是……多价的，以此种方式逐渐削弱了法律而没有正面攻击法律。”⁴ 在《太凯尔》看来，

1 Sollers, review of *La barbarie à visage humain*, *Le Monde*, May 5, 1977.

2 Sollers, “La révolution impossible,” *Le Monde*, May 13, 1977.

3 Forest, *Histoire de Tel Quel*, 271.

4 Kristeva, “Why the United States?” in *Kristeva Reader*, 274.

美国人擅长“非言语艺术”：现代舞蹈、泼洒画（action painting）和即兴表演。克里斯蒂娃（带着点儿高卢人的高傲）评论说：“他们没有口头的，也就是说有意识的、分析的……联系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除了少数具有英国来源的个别作品外，至今还没有出现伟大的美国文学作品。”¹提及弗洛伊德时，她评价说美国是“‘它我’（ça）无法言说”的大陆。“它我”——“无意识”的形象——需要欧洲知识分子代之发言。

到万众期待的 1978 年法国国民议会选举再度开始时（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共同阵线沉着冷静地迎接选举胜利，直到共产党最后一刻放弃了联盟），《太凯尔》的政治路线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索莱尔斯公开宣布他支持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法国民主联盟（Union for French Democracy），他宣布：“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像吉斯卡尔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比法国共产党）更具有左翼的作风。”²

克里斯蒂娃的一篇纲领性论文《新型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A New Type of Intellectual: The Dissident*）正式宣布《太凯尔》与中欧持不同政见的社会思潮新近恢复的友好关系。³因为受选择性记忆的困扰，《太凯尔》派声称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路线和遗产的证明。克里斯蒂娃及其同仁们认为，既然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都是文学名人，那么这暗示了他们显然会喜欢《太凯尔》

1 Kristeva, "Why the United States?" in *Kristeva Reader*, 275, 276.

2 Sollers, "Gauche, droite . . .," in *La droite aujourd'hui*, ed. J-P Apparou (Paris: Michel Albin, 1979), 339.

3 Kristeva, "A New Type of Intellectual: The Dissident," in *Kristeva Reader*, 293.

的最初计划——保护文学免受萨特“介入”思想的危害。实际上,10年来,《太凯尔》派已经抛弃了纯文学,与两个为艺术而艺术进行辩护就相当于犯了叛国罪的国家建立了联盟。

革命以后

20世纪70年代末,克里斯蒂娃变成一位身体力行的分析师。此后她莫名其妙地断绝了与女权主义同道中人的关系。当她不得不界定她与妇女运动的关系时,她轻率地拒绝了性别的概念:“我不会强调性别的概念,而是强调‘奇异性’(singularity)的概念……我们必须……在个体的平面上工作……尽力使奇异性增强至最大限度。”¹ 当她被早期的政治挫折弄得不知所措时,她放弃了作为极权主义领域的绝对政治,这一极权主义领域为了集体超我的压抑而残酷地牺牲个体。“我们不必努力去提出政治的全球模式”,她解释说,“已经太多了。”² 她建议,不要去争取政治的解决方法,而是每一个有承担能力的人参加精神分析。

284

克里斯蒂娃受她的精神分析实践激发而写成了《灵魂的新疾病》(*New Maladies of the Soul*),在这本书中,她哀悼了现代自我的自恋型空虚。一旦神话和宗教丰富的、古老的意象消失,留下来取代它的是肤浅的、单维度的、来自大众文化领域的图像:电视、电

1 Kristeva, *Interviews*, 42, 43;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2 *Ibid.*, 42.

影和赛博空间 (cyberspace)。她断言说，我们全都变成了“外星人” (extraterrestrials)，绝望地疏远了我们的欲力和感受。我们通过使用麻醉剂和酒精来努力缓解这种失落感，但是这种补救方法证明是暂时的、虚假的。爱与艺术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只有精神分析才能给我们提供一种自我复原的方法。只要它教我们接受我们自己内部的“他性”，它也就为伦理和政治提供了唯一基础。

然而，在她反思了后结构主义对“意义”的特有怀疑后，她的精神分析的构想证明是一个完全否定性的构想：“这项任务不是以真理体系的名义去做出一篇解释性的综合论文……这项任务反而是记录现代解释体系的危机……去证实这一危机是内在于符号功能本身，并视一切构造是‘症状’，包括那些试图否定这一危机的总体化解释。”¹

在《恐怖的权力》(Powers of Horror) 一书中，因赞美子宫和“母性本能” (maternal instinct) 的优点而曾受到第二波女权主义钟爱的克里斯蒂娃开始了另一次令人惊讶的逆转。她宣布，正是父权制 (patriarchy) 而非母性应该是形成高级文化成就的原因：“我认为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建立在父权制之上，并在伟大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中得到了表达……已经深刻地产生了人类是符号存在的真实幻觉……因此，假如人们谈及那产生一切的父权制，就会说父权制万岁。”²

在论述女性忧郁的《黑太阳》(Black Sun) 一书中，她认为女人特别容易得忧郁症。对于男人来说，认同父亲是天生的，这会使男人

1 Kristeva, *Kristeva Reader*, 319.

2 Kristeva, *Powers of Horror*, 143-144;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放弃原初自恋而成功地解决俄狄浦斯情结的冲突。而女人却要面对一种令其不悦的“双重束缚”(double-bind)。她们可以认同父亲,由此进入象征界(语言领域和“父权制”),但要以放弃母亲纽带为代价,而这是一个她们自己作为女人身份的必要组成部分。如其不然,女人能够拒绝父系的象征界,避免个体化,由此招致精神病或自杀。当她面对着她的理论为女人所描述的、显然是毫无吸引力的选择时,她回复说,“女人就困在那里,并不能为此做太多”¹。有时克里斯蒂娃公然卖弄解构性的第二种选择:“我认为女人的角色是一种警惕性、一种特异性,一种总是警惕、论争的存在。实际上,这是一个歇斯底里患者的角色。”²

在如今的法国,知识潮流断然反对后结构主义式的认识论的犬儒主义,后者相信身份、真理或意义的具体表达是退化的、神学上的返祖现象,相信避免对“感觉”与“一致性”之妄想的唯一方式仍然忠实于克里斯蒂娃称之为“否定性的”或“非认同的”人生方式与思考方式。而一种新型的、共和政体的知识分子共识与政治共识围绕着人权规则出现了——一种法国人的创造,终究源自于著名的、现代自然法的“逻各斯中心的”传统。³一种冷静的、节制的人文主义方式取

1 Kristeva, *About Chinese Women*, 37.

2 Kristeva, *Interviews*, 46.

3 关于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我的著作《重访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 Revisit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第10章“法国共和政体的复兴:反思法国的奇异性”(The French Republican Revival: Reflections on French Singularity)。

代了后结构主义潜在的虚无主义的否定解释学——“缺席”的解释学，而非“在场”的解释学。曾被后结构主义阵营全面清除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加缪和雷蒙·阿隆——获得了更新的政治意义。渐渐地，限于小圈子的、“难以理解的”理论方法曾是后结构主义的标志，如今散发出不合时宜的恶臭。哲学巨人中间弥漫着深奥难解的、理论上的吹毛求疵风气，曾一度主导着 20 世纪 60 年代巴黎知识分子的生活，如今让步于一种更加谨慎的、实用主义的气质。¹

在《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畅所欲言》（“Julia Kristeva Speaks Out”）一文中，这名前《太凯尔》成员为后结构主义的历史遗产提供了热情洋溢的辩护。那些批评后结构主义之“神秘主义”（esotericism）的人没有意识到它在反对“始终威胁（文明）的同一性趋势”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²她断言说，她的诋毁者只为“社团主义的特权”（corporatist privileges）辩护，是“可理解的理性主义”（accessible rationalism）衰弱的表现。当克里斯蒂娃回忆起《太凯尔》的知识鼎盛时期，她就会对这段时光充满了一种浓郁的怀旧情调：这是一个“平静而热情的时代，当时我相信我们正与收藏着最佳的当代知识的档案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决裂，正发展着一种激情的炼金术、一种意指的放射线照相术。一些人认为相信……毫无根据的神秘主义只是术语

1 Mark Lilla, ed., *New French Though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2 Kristeva, *Interviews*, 259。在这一点上，通过“同一性趋势”，克里斯蒂娃大概是指那些有损于或敌对于“差异”的趋势。

上……忠于我们在个体、社会或文本中所发现的临界状态。”¹

人们禁不住被克里斯蒂娃借助一般性来证明其观点的做法弄糊涂了。她的自我辩护在安全地排除了具体的制度问题、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后才能有效，只有根据这些问题才能判断其主张的花言巧语的特点。相反，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介于《太凯尔》派特有的“批判的”立场（他们的虚假革命的“意指的放射线照相术”）与对那种以其他所有写作和思考的人为特点的“档案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忠诚之间。鉴于《太凯尔》的理论失策和政治失策，人们想知道除了一小撮顽固分子外，是否还有健在者支持这类易于识破的辩护呢。

自从“主人思想家”罗兰·巴特、福柯、拉康和萨特于1980年前后去世，哀叹法国知识分子的衰落变成了一种时尚。批评家经常援引法国教育制度——是民主化的，不再是特权精英的训练场地——的结构性改变以及大众传媒的兴起。不过，还有一个事实是在法国，287由于与“权力”的政治错姻缘，知识分子的使命不可挽回地被玷污了，这是朱利安·邦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一书中就曾预言警告过的现象。《太凯尔》经历的最大讽刺之一就是，尽管这份杂志起初作为一台战争机器（*machine de guerre*）来反对萨特，但是这个群体最终重复了萨特所犯的全部政治错误——在他们各自继续创造某些全新的政治错误之前。

1 Kristeva, *Interviews*, 261. 在这一点上，通过“同一性趋势”，克里斯蒂娃大概是指那些有损于或敌对于“差异”的趋势。

福柯与毛主义者：生命政治与介入行动

《规训与惩罚》极好地回应了一代人的心态，这代人想“把警察赶出自己的脑袋”，也就是“把小官僚赶出自己的脑袋”，他们到处都看到了权力的显现，以至于福柯的思想迅速形成，甚至超出了作者的意愿，这些思想对于那些与不同形式的社会控制进行斗争的人来说，简直就成了金科玉律……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家如此认真地回应六八一代人的理想与不适。

——弗朗索瓦·多斯，《结构主义史》

不是因为自己的过失，米歇尔·福柯才错失了“五月风暴”。当“五月风暴”爆发时，他远在几百英里外的突尼斯大学教授哲学。虽然如

1 译文参见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下卷），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8页。译文有较大改动。亦参见 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2:253-254。——中译注

此，但是“五月事件”已经对福柯的知识轨迹与政治轨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福柯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说“五月风暴”是未曾意料的“政治开端”，给了他调查那运行于西方社会的权力机制的勇气，并“沿着刑罚理论、监狱和规训的方向从事（他的）研究”。¹

1968年之前，福柯的名字仍基本上与他1966年出乎意料的畅销书《词与物》联系在一起：晦涩难懂的哲学专著，震耳发聩地宣布了“人之死”。尽管福柯自己拒绝这样的称呼，但他仍被广泛地视之为“结构主义的超级巨星”，这种结构主义哲学众所周知地排斥理性权力与人的力量，以便更好地改造社会。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福柯反而变成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化身。在这一时期，曾经胆怯、矜持的哲学家福柯变成一位全新的公众人物；他开始剃光头，戴牛角框眼镜，穿一件知名品牌的白色高翻领衬衫，因此创造了至今令人难忘的标志性形象。

289

不过这一转变不只是表面的。“五月风暴”之后，福柯在激进的斗争精神中所进行的冒险——尤其是他与那些成为监狱信息小组成员的毛主义者之间的不彻底的日常交往——为他20世纪70年代极具影响力的权力研究奠定了基础。通过与“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并肩工作，福柯“亲自卷入了他的理论研究对象”²。因此，对“日常生活实践”毛主义式的关注从这个时期开始逐渐地决定了他两本最著名的著作《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和《性经验

1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in *Power/Knowledge*, 111.

2 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2:249;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史》(*History of Sexuality*) 的方法论。正如让-克洛德·莫诺 (Jean-Claude Monod) 曾在《福柯与品行治理》(*Foucault, la police des conduites*) 一书中所评论的那样,“就监狱而言,论争的实践对福柯来说先于(《规训与惩罚》中所进行的)历史理论化”¹。与其共事的监狱信息小组积极分子米歇尔·佩罗 [Michelle Perrot, 《不可能的监狱》(*L'impossible prison*) 的编辑] 同样也断言福柯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的监狱信息小组的介入行动决定了他以后岁月里所阐发的权力概念。² 正如吉尔·德勒兹曾在一篇关于福柯监狱著作的开创性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或许在 1971 年到 1973 年间,由福柯与德菲尔大力推动运作的监狱信息小组,深知如何避免蹈此覆辙,并保持一种监狱斗争与其他斗争间的创新关系。因此,当福柯在 1975 年重返理论著述时,他似乎是第一位发明这种在过去不知如何发现与描述的崭新权力概念的人……总之,这似乎是自马克思之后首次出现的全新事物……另一种理论、另一种斗争

1 Monod, *Foucault et la police*, 75.

2 Michelle Perrot, “La leçon des ténèbres: Michel Foucault et la prison,” *Actes* 54 (Summer 1986); 正如 Perrot 关于监狱信息小组所评论的那样,“《规训与惩罚》要比福柯的其他著作更扎根于他深陷其中的历史现在时”(第 75 页)。另参见 *L'impossible prison: Recherches sur le système pénitentiaire au XIXe siècle*, ed. Michelle Perrot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0)。

实践、另一种策略性组织才是福柯著作中的真正赌注。¹

福柯自己暗示了这一知识谱系，当时他在《规训与惩罚》的前言中曾说他的结论与其说基于历史，倒不如说基于当代政治。因此，这位《疯癫与文明》的作者这些年勤勤恳恳地融哲学激情与政治行动主义于一体，实质上他引导着一种坚定的激进分子的生活。尽管福柯这一时期以他的声誉支持各种事业，但是他作为一名哲学家—积极分子仅仅致力于“无产阶级左翼”的事业，由此将巨大的声望给了这个声名狼藉的、遭到禁止的毛主义组织。福柯仍逗留在毛主义轨道上，直到“无产阶级左翼”1973年左右突然崩溃。他曾说监狱信息小组是“无产阶级左翼”加上“知识分子”。

为了突出福柯思想与立场的原创性，许多批评家曾将他20世纪70年代的知识发展阶段视为一次对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完全创新性的背离。不过，对福柯作为一名激进分子的轨迹进行一次较为详尽的考查揭示了他引人注目地亲近左倾主义——政治方法是“左派的”，然而反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的教条主张。一位评论者曾恰当地指出：“以左派分子的正统观念为他的出发点——更具体地说，

1 Gilles Deleuze, "Ecrivain non: Un nouveau cartographe," *Critique* 343 (December 1975): 1208, 1212. (译文参见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杨凯麟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6、31—32页。译文有所改动。另参见法文原著 *Foucault* [Paris: Minuit, 1986]，第32、38页。此处引文与法文原著和中译本出入较大，译者以法文原著为基础、参照中译本译出。——中译注)

291 政治口号借自毛主义者那伙人——福柯创造了一种他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将之系统化的新视角、一种新语言，而且这种新视角、新语言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注定会在那些对政治感兴趣的外行人中间变成一种新的正统观念。”¹

如前所述，法国知识分子在“五月事件”期间只是扮演着一种次要角色。当他们以恐惧与陶醉的复杂心情观察正在上演的革命戏剧时，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被青年一代的学生积极分子抢了镜头。一些人试图从旁观者的角度发表意见，希望得到关注，结果是徒劳无功的。让雷蒙·阿隆惊讶的是，所有的主角似乎都在扮演着角色：“我扮演着托克维尔的角色，当然这一角色有点儿愚蠢，但是其他人扮演着圣茹斯特、罗伯斯庇尔或列宁的角色，总的来看这种角色更加荒谬可笑。”²

思考的关键问题是，如若福柯当时在巴黎的话，他将会扮演着什么角色。一方面，尽管福柯当时既不是左派分子，也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肯定会支持那些与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的僵化机制进行斗争的学生激进分子。即使他没有发表任何公开的支持声明，但是至少他私底下表示他欣赏学生激进分子公然反抗戴高乐主义政治制度的勇气。³

1 Gerard Mauger, “Un nouveau militantisme,” *Sociétés et Représentations* (November 1996): 55.

2 Raymond Aron, *La révolution introuvable: Réflexions sur les événements de mai* (Paris: Fayard, 1968), 33.

3 Macey, *Lives of Michel Foucault*, 206–207.

在5月后半段时间里，福柯终于能回到巴黎呆上几天。他目睹了一场发生在夏莱蒂体育场足有5万人的学生—工人集会。后来他对《新观察家》编辑让·达尼埃尔（Jean Daniel）说：“他们（学生们）不是在闹革命；他们就是革命。”¹

另一方面，福柯似乎曾以一种适合他那代人的合理蔑视审视学生。福柯出生于1926年，他不是一名“六八分子”。作为一名20世纪40年代的青年，对他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国人占领法国，而不是冷战和非殖民化。尽管他的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卷入德国占领时期的政治活动及其后果，尽管福柯自己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勤奋学习，准备参加考试，但是他的日常生活像每个法国公民一样不可避免地被战争结构了。例如，当福柯准备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时，他一度被迫返回家乡普瓦捷（Poitiers），以避免盟军的轰炸行动；他的家乡在突袭期间遭到了破坏，但没有被毁掉。²

福柯与学生激进分子存在着代沟，令福柯无法与他们完全打成一片，也许还有比代沟更重要的东西。像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领导者们（他们构成了“无产阶级左翼”的政治核心）一样，福柯是法国最著名的精英机构的毕业生，他几乎不了解“学生生活的贫困”——借用穆斯塔法·卡亚蒂极具影响的情境主义国际小册子的题目，这本小册子激化了1968年的学生造反。实际上，几乎整个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福柯基本上不在法国。许多学术同龄人占领后

1 引自 Eribon, *Michel Foucault*, 192。

2 Macey, *Lives of Michel Foucault*, 15。

来以其政治激进主义闻名的校园阵地，如南泰尔校园和斯特拉斯堡大学，而福柯在 1953 年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后，就逃离了法国，大部分时间在国外教书，先是德国、瑞典、波兰，最后到了突尼斯。

流亡在天堂：福柯的突尼斯风云

福柯直到 1968 年才第一次体验了学生政治。不过，不是法国的狂热分子而是突尼斯的学生激进分子吸引他关注政治行动主义。当他 1967 年、1968 年在突尼斯讲哲学时，福柯开始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学生反对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专制政府的抗议活动。作为一位受法国雅各宾派传统影响的、充满热情的现代化推动者，布尔吉巴试图将突尼斯统一到一个单一的政党之下。影响布尔吉巴世俗眼光的关键性要素之一就是一种以西欧模式建立的、全新的大学制度。福柯获得了突尼斯一流大学的教职，吊诡的是他的学生们正慢慢地被灌输全新的反西方观念。1967 年阿以战争期间，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示威游行反对布尔吉巴政府，这个政府被普遍认为是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西方世界的一个傀儡。这次冲突在 1968 年春天达到顶点，时值美国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访问突尼斯。在随之而来的镇压浪潮中，福柯的许多学生遭受毒打、监禁。

令福柯惊愕的是，这些学生示威游行有时会堕落为反对犹太人的暴徒行动，他们烧毁、抢劫犹太人的住宅、商店和犹太教堂。作为一名终其一生的“亲犹分子”，福柯没有隐藏其对这场造反的反犹暗流的厌恶之情；他也没有否定学生反抗国家压迫的合法性。福柯也提防

着突尼斯学生不加批判地接受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口号。他于1952年退出了法国共产党（他在共产党内从未特别积极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枯燥乏味的马克思主义争论与他在马克思主义者专政的波兰生活过的特殊经历，已经“给我留下了极坏印象”，福柯回忆说。尽管有这些保留意见，福柯仍发现他自己从内心里对突尼斯学生的事业感兴趣。

在这些动荡时期，我深深地被这些青年男女打动了，而且大为惊奇，为了写传单或分发传单的这种简单事情，或者为了煽动其他人举行罢工，他们冒着非同小可的危险。这类行动足以使个人生命、个人自由和个人身体处于危险之中。并且这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我来说，**这是真正的政治体验。**¹

福柯帮着隐藏学生，避免警察搜捕；他甚至允许学生使用他的住宅印刷传单。这样做时，他知道他正在比其回法国的同事冒更大的危险。一天晚上，当福柯让一个学生搭车时，他被警察要求把车停在路边，并被野蛮地毒打。他确信他正遭受秘密警察的监视，私人电话已被窃听。²

294

假如冒着“个人生命、个人自由、个人身体”的危险是“真正的

1 Foucault, *Remarks on Marx*, 134;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2 关于福柯在突尼斯学生造反期间的经历，参见 Macey, *Lives of Michel Foucault*, 183–208。

政治体验”的测度，那么福柯对巴黎发生的“五月风暴”感到失望也就不必惊讶了。正如许多评论家所特别指出的那样，“五月风暴”与其说是革命，倒不如说是街头剧。街垒战双方的参与者正自觉地扮演着角色。幸运的是，他们不愿意把即将发生的政治冲突升级。拉丁区五月第二周的街垒工事显然是向 1871 年的巴黎公社致敬。但是没有人会相信街垒能抵挡住可能发生的军队干预，没有当权者——可能除了当时的戴高乐——会严肃地计划这件事。如若这场运动的积极分子有志于按照 1848 年“六月起义”、1871 年巴黎公社或 1917 年“十月革命”的模式夺取权力，那么学生们有可能会去包围爱丽舍宫或国民议会。他们反而象征性地选择去占领奥德翁剧院 (Odéon Theater)。皮埃尔·戈德曼 (Pierre Goldmann) ——一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1968 年之前曾在委内瑞拉 (Venezuela) 游击战中接受过训练——他描述了 1968 年左派中坚分子的观点：

学生们源源不断地涌入街道和索邦大学，像一股蜿蜒盘旋的、歇斯底里的湍流。他们以一种戏谑的、自慰的行为满足了他们对历史的欲望。我很震惊他们总是兴高采烈地畅所欲言。他们以动词取代了行动。我很震惊他们要求想象力的赋权。他们夺取政权只是一件想象的事情而已。¹

1 引自 Régis Debray 献给 Pierre Goldmann 的颂词，*Les rendez-vous manqués (pour Pierre Goldmann)*(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5), 124。关于 Pierre Goldmann 的生平，参见 Dollé, *L'insoumis*。

福柯在1968年一篇意大利记者对他进行的访谈中表达了他对“五月造反”的相关失望：

当我1968年11、12月间返回法国时，我感到很震惊、很惊讶——而且相当失望——当我把法国形势与我在突尼斯所见的一切相进行比较时。这场斗争尽管以暴力和集中的参与为特点，但是它并未让他们付出同样的代价、同样的牺牲。拉丁区的街垒战和突尼斯蹲十五年监狱的冒险之间没有可比性。¹

295

福柯恰当地坚持区别戴高乐政体（尽管它似乎有可能是独裁主义的）与突尼斯压迫的布尔吉巴专政，这是一种左派分子标准的“反法西斯主义”话语通常忽略掉的区别。福柯在阐明这种引发他对突尼斯学生运动“存在主义的”偏爱的逻辑论证后，他补充说：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究竟是什么能够激发个体之内的欲望、能力和完全献身的可能性，而我们又未能识别出或质疑最微不足道的对权力和利益的野心或欲望呢？这正是我在突尼斯所见到的。斗争的必要性在那儿是清楚明了的，因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造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某些

1 Foucault, *Remarks on Marx*, 138.

条件。在这种斗争中，直接的、存在主义的问题，我该说献身的问题肯定是不言而喻的。¹

296 尽管福柯讨厌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不计较突尼斯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教义问答的效忠，认同他们斗争的生死攸关的、存在主义的本质。因此，马克思主义很久以前就在法国就变成纯学术性的、枯燥乏味的理论，而“在突尼斯，情况截然相反，每个人都卷入了马克思主义，支持激进暴力和激进强度，并支持令人震惊的强有力的攻势。对于那些青年人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分析现实的方法，它也是一种道德力量，一场令人目瞪口呆的、存在主义的行动”²。

在法国，至少还有一些激进的小圈子在 1968 年夏天非常严肃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有些团体徒劳无功地从内部指导学生运动。托派革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the Trotskyist Jeuness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一个曾在组织索邦大学抗议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学生团体，组建行动委员会来协调拉丁区学生控制区域的活动。如前所述，毛主义者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仅仅抵制资产阶级为他们设下的“陷阱”，直到后来，当工人罢工开始时，他们才重新评估他们的立场。³

1 Foucault, *Remarks on Marx*, 136-137.

2 Ibid., 135.

3 参见 Christophe Bourseiller, “De mai à décembre 1968: Le rendez-vous manqué,” in *Les Maos*, 89-103。

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充当了整个学生运动的通用语，而不仅仅是政治激进分子的。尽管学生们有时不太情愿使用这种语言，但他们恰恰使用这种语言表达其自由主义的诉求，并清楚地表达他们对一个可供选择的社会的乌托邦幻想。然而，正如阿兰·图海纳在其论述“五月造反”的著作《五月运动，或乌托邦共产主义》（*Le mouvement de mai, ou Le communisme utopique*）一书中所论证的那样，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修辞与其造反的真正本质之间存在着一种关键性的分裂。在图海纳看来，“五月暴动”与其说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造反，倒不如说是一场反对政治上的专家治国论的起义。争论的关键问题与其说是经济的问题，不如说是谁有权力做决定的问题。学生们反对法国经济管理人員和政治管理人員〔许多人被称为“后备干部”（*Enarques*），或者国家行政学校的毕业生〕的专家治国论的乌托邦幻想——这种乌托邦幻想把一切社会问题简化为现代化、适应与整合的问题，学生们在“五月风暴”期间发明了一种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乌托邦共产主义”（*utopiancommunism*）。正如图海纳贴恰当所观察的那样，“那些控制社会的专家治国论者的主旨思想是‘使你自已适应’（*adapt yourself*），‘五月运动’反对这一点，提出了‘表达你自己’（*express yourself*）。”¹正如19世纪的工业革命标志着“工作”进入了公共领域

1 Alain Touraine, *Le mouvement de mai, ou Le communisme utopiqu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2), 11. 亦参见 Michel de Certeau 很有影响的著作,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teven Rende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297 一样，“五月风暴”则标志着“日常生活”的闪亮登场。¹突然之间，等级制度、消费主义、城市规划、性别与性征以及人类亲密关系的本质变成了公共讨论和政治斗争的合法性话题。对日常生活殖民化的抵制变成了一项迫切的政治要求。作为一种隐喻和辞格，文化革命的理念与其最初的毛主义系泊区脱离开来，变成了一场彻底的、基层的社会变革计划的战斗口号。

最初，“五月造反”的文化特点并没有给福柯留下深刻印象。他没有直接目睹声名远播的索邦大学学生公社，而这种学生公社被音乐、诗歌、毒品、涂鸦和激进民主赋予了勃勃生机。他没见到学生占领活动与行动委员会，也没见到自发的宣讲会 and 静坐抗议，这些活动几乎传遍了法国的各个乡镇。即使他目睹了“五月造反”的这一面，但是并不清楚的是他是否会以与他的同行克劳德·勒福尔、科尼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蒂斯和昂利·列斐伏尔一样的热情来看待学生乌托邦，这些同仁众所周知地在大学纪律法庭上为他们的变成积极分子的学生进行辩护，并谦卑地让自己变成学生们的追随者。1968年前，福柯在法国做过两份教职，不过，据大家所说，他不是那种与学生并肩作战的教授。在克莱蒙-费朗大学任职的六年时间里，他从没在那里住过，而是喜欢坐六个小时的通勤火车回巴黎。

邻近5月末，戴高乐精心策划了不太可能的重新执政。他虽度过

1 与Alain Touraine的商榷意见，参见“Itinéraires intellectuels des années 1970,”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es Idées Politiques* 2 (1995): 392-400。

危机，但希望微乎其微。法国政体的明显弱点在“五月风暴”的余波中进一步激化了法国青年。6月1日，在巴黎所有街道上，成千上万的学生高唱：“‘五月风暴’只是开端。我们必须继续斗争！”¹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学生运动忘记了“学生生活的贫困”，反而将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下一个“五月”。《五月手册》是后五月时期出现的首批新学生刊物之一，编辑们总结了占主导地位的学生态度，兹述如下：

298

我们现在仅仅该感到悲痛与欺骗吗？一个焕然一新的时代在法国和广大的欧洲地区刚刚宣告来临。如今我们能够看到一场发生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换言之，也就是马克思所期望的条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革命将在世界上改变社会主义的面孔。在“五月事件”期间，法国的革命动荡产生了令人惊讶的、前所未有的结果。我们必须从容地认识、研究和理解这些结果。它们蕴藏着法国国内外工人阶级运动的知识 and 资源。（“五月风暴”）是一笔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的“战争基金”（war chest）。²

“日常生活的革命”从未完全被压制。它继续在具有激进学生背景的一些分子之中幸存下来，并继续蓬勃发展。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1 BDIC, *Mai 68: Matériaux pour l'histoire de notre temps* (Paris: Bibliothèque de documentation internationale contemporaine, 1988), 299.

2 “Ce qu'on cherche à nous faire oublier,” *Cahiers de Mai* 1 (June 15, 1968): 3.

随着政治革命的梦想逐渐消褪，它的活力和理念重新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新社会运动中再度出现。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福柯还是错过了这场“革命”，即使这场“革命”就发生在他身边。

流亡者归来

“五月风暴”后，福柯渴望返回法国。因为他被独裁国家的生活压力和焦虑弄得灰心失望，而且他对法国新一轮的论战很感兴趣，所以他放弃了在突尼斯购买海景房的计划，接受了到文森新创建的“实验性的”大学主管哲学系的提议。这是法国教育部给“六八分子”的大学改革要求的直接回应，文森大学是一场反独裁主义教育的激进实验。教授由他们同辈人遴选、由学生们评价，而不再是教务长或行政人员负责聘任与管理。课程设置完全是跨学科的。或许最激进的一点是，大学招生向各种社会背景的申请者开放，不仅仅向那些完成中学毕业会考的学生开放。何内·谢黑（Rene Scherer）是哲学系所选的第一批教授之一，他解释说：“文森大学是进入大学的‘外部’，同时是向外部开放的大学。”¹

果不出所料，与法国教育部迁移最不愿妥协的政治积极分子远离巴黎市中心的计划相一致，文森大学立即吸引了法国左派最激进的派

1 René Schérer, *Hospitalités* (Paris: Anthropos, 2004), 95-96. 关于文森大学的更详细介绍，参见 Charles Soulié, “Le destin d’une institution d’avant-garde: Histoire du département de philosophie de Paris VIII,” *Histoire de l’Éducation* 77 (January 1998): 47-69.

系。在这一过程中，福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为哲学系招募了形形色色的左派分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福柯负责新哲学系是一个政治上没有任何争议的选择。自从福柯1966年出版《词与物》获得巨大成功以来，他的名声平稳上升。因此，他的哲学资历从没被怀疑过。对于他的任命起更重要作用的一点是，“五月事件”发生时，福柯恰好不在国内。他也从没公开地谈论他在政治上参与了突尼斯学生运动。然而，他缺席“五月风暴”，这一点尽管可以让他安然地选择做文森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但是这也意味着他不得不在同事和学生中间证明他的革命诚意。

福柯没浪费多少时间就做到了这一点。1969年1月，在第一次校园斗争期间，他在巷战中上了第一节课。他与一小群教师一起，包括他的伴侣丹尼尔·德菲尔，帮助学生们爬上文森大学一座主楼，并占领了这座主楼。当防暴警察带着警棍和催泪弹来驱赶抗议者时，福柯是他们当中最后一个离去的。他毫无畏惧地从楼梯上撤离，并在身后胡乱扔了些东西，设置了障碍。丹尼尔·德菲尔后来回忆道，福柯那天晚上很开心，“（福柯）毫无疑问正体验着一种肯定是尼采意义上的‘破坏中的快乐’（joy in destruction）。”¹

300

那些导致这一冲突的事件仍然是错综复杂的，令人费解的。这一占领大学楼房的决定是为了回应对索邦大学几十名积极分子的逮捕事

1 引自 Macey, *Lives of Michel Foucault*, 226。

件，而这些积极分子正抗议政府对大学严重不足的财政支持。

不过，对于福柯和那些正在参加抗议的学生来说，特殊的原因只不过是一个托辞而已。他们打算扰乱不久前开张的新大学。在这次开场的斗争后，政府确定了警察常驻校园的政策，然而秩序从未被真正地恢复过。日常的抗议和暴乱经常中断课堂，扰乱大学的行政功能。书从图书馆消失了，建筑设施也被大肆破坏了。

尽管遭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党派之争的困扰，“无产阶级左翼”最终设法控制了哲学系，并在文森大学校园里享有一定的声誉。“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不是自由主义者、文化革命分子。1968年秋，他们在新创建的《人民事业报》上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最终目标：“革命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武装斗争夺权……马列主义的这一革命纲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中国如此，在其他国家亦是如此。”¹

尽管“无产阶级左翼”领导者们在5月错失了良机，但是他们到1968年秋天就开始正确地理解了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早在“五月风暴”之前，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认为学生激进分子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建立革命学生—工人先锋队，他们当时认为学生激进分子们的任务不再是领导工人或联合工人，而是使他们自己沉浸（immerse）于他们的斗争之中。随着“五月起义”的到来，“无产阶级左翼”工运中心主义的主旨思想及其革命纪律的模式引起了青年积极分子的共鸣，后者不再对社会公认的、因“五月造反”失败而感到

1 “De nouveau le combat!” *La Cause du Peuple* 1 (November 1968): 2.

沮丧的左派抱有幻想，然而他们仍旧陶醉于政治战斗性的诱惑之中。他们的地位迅速提高，法国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增加了他们的支持，由此毛主义的声望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境地。

“无产阶级左翼”成员给福柯留下了深刻影响，他们似乎具体表现了福柯所钦佩的、曾在他的突尼斯学生身上所体现的同样“极端的”品质。¹在一封福柯于“文化大革命”发动几个月后写给丹尼尔·德菲尔的信中，他承认他“被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搞得激动不已”（“我被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搞得激动不已”）²，他尤其被毛主义者独特的战斗性吸引了。尽管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迟迟才参加“五月运动”，但它是整个6月、7月继续煽动斗争的、为数不多的学生团体之一——仿佛5月从未结束过。在毛主义者放弃了拉丁区以后，他们开始关注巴黎郊外那些政治上反复无常的工厂，那里的工人拒绝接受蓬皮杜总理提出的调解条款。即使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解散后，它的“工作台”仍保留在巴黎及其周围的汽车厂，像自主的“基层团体”（groupes de bases）一样发挥功能。随着学生行动主义“从阶梯教室向工厂”（引自一本论“工作台”的经典著作的题目）移动，这些毛主义的基层组织似乎在去中心的局部反抗方面体现了新的可能性。³

毛主义者的革命行动模式很快以“自发性”（spontanéisme）闻名，

1 Miller,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177.

2 引自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1:59。

3 Dressen, *De l'amphi à l'établi*.

“自发性”最初是一个马列主义批评家用以批评“无产阶级左翼”的术语。“五月风暴”之后，托派等马列主义团体试图建立新的革命政党，而毛主义者赞同“直接行动”。受“文化大革命”的激发，他们试图抹掉下列社会差别的一切痕迹：“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差别，还有学生与工人之间的差别。“自发性”转化成一种哲学实用主义，其支持者先天地拒绝理论化。而理论应该存在于一种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之中。在观念上，它可能产生于与人民斗争的接触之中；在其他方面，它仍然是次要的、暂时的。毛主义者相信人民具有继续使他们的斗争适应于新形势的能力。

“无产阶级左翼”逐渐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的蓝图，而是证明了没有这样的蓝图存在。慢慢地“真实的”中国不再重要。按照毛主义者的说法，重要的是“我们头脑中的中国”（la Chine dans nos têtes）。他们声称从毛泽东的实例中学到的关键性教训就是每个民族本质上是不同的；因此每个国家需要孜孜以求地探索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毛泽东断绝了与苏联的关系以促使中国探索自己的道路一样，法兰西民族不得不缔造他们自己的奔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非中国社会主义本身的模式是毛主义者试图效仿的模式，他们反而渴望像毛泽东一样运用他的思考方法——“毛泽东思想”。¹

1 这一术语借自 1969 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这个术语被创造出来用以替代“毛主义”，以便进一步区分中国共产党革命哲学与毛泽东这个人。参见 Pierre Masset, *L'empereur Mao: Essai sur le maoïsme* (Paris: Éditions Lethielleux, 1979), 287。

此前福柯与难以对付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圈子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而他在“自发性”中发现了一种进入激进政治的竞技场的方法与一种他能够容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及毛主义者，但是福柯在1970年庆应义塾大学（Keio University）的演讲中向日本听众表达了他对“自发性”的赞赏之情。尽管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新形式已被学生和知识分子阐述过了，但是它在福柯看来是“反理论的”（anti-theoretical）。他将新型的政治运动描述为“与其说接近列宁，倒不如说接近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它们更依靠群众的自发性，而不是依靠理论分析”。¹

如前所述，政治战斗性最终使许多毛主义者进了法国监狱。1970年5月，内政部长雷蒙·马塞兰草率地取缔了“无产阶级左翼”。政府逮捕了一些高层的“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在新一轮的防暴行动中让政治组织的领导者们对其普通成员所犯的任何违法行为负法律责任。其他毛主义者也被逮捕了，据说是因为他们试图“重新组建一个被取缔的组织”。他们的罪行是什么？因为他们继续出版和散发《人民事业报》。在狱中，“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分子与其他学生激进分子联络，抓紧时间“调查”——也就是说着手调查——他们的新环境。

1970年，30名左翼囚犯，其中大多是“无产阶级左翼”成员，他们开始绝食抗议，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是“政治犯”，这是一种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给予民族解放阵线某些成员的称号。按照这一先例，

1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1:1140.

这种身份将承认他们的某些权利和特权：以团体形式进行集会的权利、与外面的“无产阶级左翼”同仁通信以及与媒体接触的权利。然而，左派分子很快意识到他们主张他们优于一同关押的被拘留者的“政治的”地位是不公正的——一种轻视后五月时期平等精神的精英心态。普通罪犯本质上次于毛主义的政治贵族吗？难道所有的犯人的命运不都是同样公正的吗？左派分子很快认识到，通过认可一种使政治犯与普通罪犯相对立的心态，他们就毫无保留地接受一系列意识形态上变质的、资产阶级的观念二元论：道德与不道德、好与坏、罪恶与美德。很快左派分子的政治目标就转变为哄骗所有狱友参加他们的绝食行动，因为在“法西斯主义的”司法制度中，所有的犯人都是政治犯。¹

最初的绝食抗议持续了一个月，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1971 年 1 月，毛主义者又尝试了一次。不过，这一次只要他们说服其他狱外积极分子加入他们的绝食抗议，他们就成功了。最引人瞩目的是绝食抗议者聚集到旅客拥挤的蒙帕纳斯火车站和邻近的圣贝尔纳小教堂（Saint-Bernard Chapel）。这个时候许多有影响力的文化名流、知识分子名流注意到了这件事。电影演员伊夫·蒙当（Yves Montand）和西蒙娜·西涅莱（Simone Signoret）、哲学家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和记者莫里斯·克拉维尔（Maurice Clavel）顺道拜访了他们，并公开地与抗议者团结一致。在国民议会上，未来的总统弗

304

1 参见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1:1140: “文化革命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意味着，至少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中，你不必区分习惯法罪犯与政治犯。习惯法就是政治，毕竟是资产阶级出于政治理由并基于政治权力来界定为所谓的习惯法。”

朗索瓦·密特朗代表绝食者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振振有词地控诉司法部长勒内·普列文（René Pleven）逮捕毛主义者只是向他们算政治旧账。密特朗的行动也引起受欢迎的公众注意，让他们去关注极差的、左派分子被迫不公地去忍受的监狱条件。¹

斗争领域的蔓延：福柯与监狱信息小组

福柯渴望分享毛主义者的行动主义，不过他想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做。他注意到“无产阶级左翼”在《人民事业报》编辑被捕后如何卑鄙地利用萨特当它的傀儡和代言人。因此，他不情愿只成为另一个装饰门面的知识分子人物，装成另一个所谓的民主人士。当时塞尔日·朱利和皮埃尔·维克多——使用有点可笑的、亲华倾向的笔名让·泽东（Jean Tse-toung）——成立了政治犯组织（Organisation des prisonniers politiques，简称OPP），这是一个支持被囚禁的、曾策划绝食抗议的毛主义者的团体。“无产阶级左翼”派朱迪思·米勒和雅克-阿兰·米勒（拉康的女儿和女婿）——他们是毛主义积极分子，是福柯在文森大学哲学系的研究助手——去说服这位哲学家为了政治介入行动而放弃他僧侣般的工作习惯。

但是，正是丹尼尔·德菲尔，福柯的伴侣、一名“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提议建立一个类似于萨特曾在朗斯建立的人民法庭，去调

1 有关 Mitterrand 的干涉，参见 Grégory Salle, “Mai 68: A-t-il changé la prison française?” *Critique Internationale* 16 (2002): 183-195。

查监狱条件。而福柯将其称之为信息小组。他关心的是，假如一个正式的调查委员会成立后，其焦点和干劲是否将会针对法国政府和司法制度。由此它直接会陷入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和司法的权力观念。一个信息小组反而会较少地受到约定俗成的政治成见的阻碍。这个信息小组会具有明显的优势来处理更加微妙的、毛细血管般的“生命权力”（biopower）形态，正如福柯新近构想它们的那样。常规的刑法方式经常会绕开了“惩罚的物质性”：日常的暴力与凌辱、法官的麻木不仁、律师的冷漠无情、监狱看守联盟（这个群体实际上管理着日常的监禁制度）所使用的蓄意阻挠策略以及家人的无助和羞愧。正是惩罚的这一“物质的”方面，正如《监狱信息小组令人难以忍受的调查》（GIP's Enquête-Intolérable）系列丛书所详尽记载的那样，才激起法国公众舆论的强烈反感，才很快变成一个激烈政治争论的目标。

福柯比其他任何人更敏锐地意识到信息在何种程度上有可能成为一种政治武器。同样，他对无定形的权力（amorphousness of power）的新洞悉导致了对法国传统的作家使命神圣化的相关怀疑态度。因此，福柯不再希望被描绘为作家、知识分子，而是希望被描绘为“政治工具的贩子”（un marchand d'instruments politiques）。¹

1 参见 Daniel Defert, “L'émergence d'un nouveau front: Les prisons,” 载 *Le 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Archives d'une lutte, 1970-1972*, by Philip Artières et al. (Paris: Editions de L'IMEC, 2003), 323; 亦参见 Gérard Mauger, “Un nouveau militantisme,” *Sociétés et Représentations* (November 1996): 60, 和 Mauger, “Un marchand d'instruments politiques: A propos de Michel Foucault,” 载 *Lire les sciences sociales*, by Gérard Mauger and Louis Pinto, vol. 3, 1994-1996 (Paris: Hermes Science Publications, 2000), 123-146.

这样监狱信息小组就被构想出来了。

起初，福柯认为监狱信息小组只是更全面对抗当代社会以“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机制来规训个体之能力的一个方面而已。因此，在小组最初的新闻稿中，除了监狱外，福柯还列举了医院、精神病治疗机构、大学、出版机构及其他信息机关作为类似的地点，在这些地点，专家鉴定和政治迫害享有一种有害于身心健康的、共生的温馨氛围。但是，对监狱的关注不久就获得一种独特的自治和动力。

1971年2月8日，这位《疯癫与文明》的作者就在绝食抗议仅仅几周前开始的圣贝尔纳小教堂前举行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立监狱信息小组。按照分发给媒体的宣言，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收集信息：“揭露监狱是什么：谁进了监狱，如何进监狱、为什么进监狱，监狱里发生了什么事，囚犯的生活像什么样子，建筑、食物与卫生像什么样子，监狱、医疗设备与车间如何内在地发挥功能；一个犯人怎么表现才能离开监狱，进过监狱的人在我们社会中意味着什么。”¹

福柯和监狱信息小组由此发起了“令人难以忍受的调查”。这个非正式的名字暗示了法国监狱条件令人难以忍受的本质。法国的情况与美国有所不同，法律禁止外边的人踏入监狱。因此，对外面的世界来说，监狱的真正本质是神秘莫测的。监狱信息小组的积极分子通过采访以前的犯人、监狱工作人员、看守和被拘留者的亲属，设法避开

1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2:1043.

了进入现场的禁令。既然家人拥有探视权，那么他们从内部看到过监狱的条件。福柯与其同道的激进分子筛选了好几百份问卷，分析了犯人的冤情、亲人的控诉以及监狱看守的抱怨。

他们更加令人关注的调查结果之一关系到法国监狱生活的阶级偏见。一项调查发现，80% 的资产阶级囚犯受益于休假制度，而只有 32% 的工人阶级囚犯享有这样的特权。同样，90% 的资产阶级囚犯获得假释或提前释放，相比之下，只有 33% 的工人阶级才会享有这样的权利。¹ 法国工人阶级忍受着三重危险：（1）他们的违法行为受到了更为密切的监视；（2）他们更乐意被囚禁；（3）一旦他们入狱，他们就难以离开监狱。

307

调查结果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出版成一系列广泛散发的小册子。在这段时间里，福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监狱信息小组的工作。他在沃日拉尔路（rue de Vaugirard）285 号的公寓变成了这一组织的实际指挥部。福柯全身心地参加小组的每项活动，从新闻稿的发布到信封的书写、打电话。

尽管监狱信息小组的适度目标据称是揭露法国监狱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但是福柯的调查就像毛主义者的调查一样最终具有更加

1 参见 Christophe Soulié, "Années 70: Contestation de la prison; Information est une arme," *Raison Présente* 130 (1999): 25; Grégory Salle, "Mettre la prison à l'épreuve: Le GIP en guerre contre l'Intolérable," *Cultures et Conflits* 55 (2004): 71-96; 亦参见 Philippe Artières, Pierre Lascoumes, and Grégory Salle, "Prison et résistances politiques: Le grondement de la bataille," *Cultures et Conflits* 55 (2004): 5-14。

激进的政治目标。关键不是改革刑法制度，而是质疑其真正的基础。当福柯在1971年2月新闻发布会上将监狱信息小组介绍给法国公众时，他解释说反对刑法制度的斗争不仅牵涉到了犯人，而且还牵涉到当代法国社会的每个成员。正如他表达的那样，“我们当中没有人可以肯定我们能避开监狱。今天这一点比其以往更符合实际情况……他们告诉我们监狱太拥挤了。如若太多的人进监狱，那又会是什么情况呢？”¹ 监狱信息小组不是像联盟和政党传统上所做的那样正式“组织”犯人和监狱工人，而是本着毛主义者的民粹主义的精神去增强他们的力量和信心，以便他们能够组织他们特有的对刑法制度的抵制。

308

当福柯承担监狱信息小组领导者的角色时，他谨慎地将自己与萨特所体现的普遍知识分子的模式区分开来。普遍知识分子信奉一系列

1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2:1042。在“The Red Guards of Paris: French Student Maoism of the 1960s,”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4 (31) (2005): 472–490] 一文中，Julian Bourg 说明了监狱信息小组如何自相矛盾地为复活法国公民社会铺平了道路：

法国毛主义者运用的调查策略无意之中（有助于）鼓舞公民社会的实践。“无产阶级左翼”发现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卓越的、动员起来的工人阶级，而是无数的社会群体：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解放论者、高中生、士兵、移民、早期的生态学家等等……毛主义者的调查方法撞上了这样一个不利的事实——新左派是由根本不同的兴趣群体组成的，其解放目标大体相当，有时相互抵触。毛主义者调查所引导的最值得注意的样本是监狱信息小组，这个小组于1971年2月在米歇尔·福柯有感召力的推动下成立了。尽管这个小组在“无产阶级左翼”的外围组织而成，但是它使调查指向了新方向，向法国普通民众发布调查问卷，公开了有关法国监狱“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的信息……调查获得了信息，信息本身就是一种策略上用以斗争的武器……监狱信息小组有助于法国1970年文化政治从毛主义向后毛主义的彻底转变。

不受时间限制的、超验的人类价值，而福柯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介入模式：“特殊知识分子”¹。特殊知识分子拒绝站在弥漫于现代社会的权力之网外面，他反而努力地、有策略地在权力之网的内部工作。像毛主义者的工作台一样，特殊知识分子通过导入那些与权力有直接联系的人们的“局部知识”（local knowledge）来与权力展开斗争。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大众不需要他（知识分子）去获得知识：他们心知肚明，没有幻觉；他们远远比知识分子更明白事理，他们当然能够表达自己”²。在福柯看来，那些自我标榜为高级理论真理的学识渊博之人，自诩是大众的代言人或代表，他们其实就是规训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样的规训社会在依赖或束缚的条件下养活他们。他们实质上是权力体系的中介者。知识分子的角色“不再是使自己‘稍微往前、靠边’，以便表达被窒息的集体真理；相反，这一角色将与权力形式做斗争，而这些权力形式却把他转化为它在‘知识’‘真理’‘意识’与‘话语’领域中的对象和工具。”³

309

福柯关于介入的新观念是他思想轨迹总体转变的一部分；人们可能恰当地将其描绘为“认识论的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变化是由“五月风暴”的种种事件促成的。然而，在更大的程度上，这应归功于后五月时期活跃的左翼环境。

1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in *Power/Knowledge*, 109-133.

2 Michel Foucault and Gilles Deleuze, "Intellectuals and Power," in *Foucault Live: Collected Interviews, 1961-1984*, ed. Sylvère Lotringer (New York: Semiotexte, 1994), 75.

3 Ibid.

当《词与物》出版时，主流媒体利用福柯关于“人之死”的著名格言来说明他引起关注的重要原因。福柯在1966年的一次访谈中将其稍作修改，重申了这一论点，他大胆宣称道：“我们的任务就是最终从人文主义中解放自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的著作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所有政体，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是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供应他们的假冒商品。”¹ 政治积极分子从福柯的声明中得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所有政治变革的尝试被事先谴责是徒劳无益的行动。假如主体的范式实际上是过时的，那么依靠什么样的力量来实现政治变革呢？

在写给《费加罗报》的文章中，小说家弗朗索瓦·莫利亚克——萨特的长期存在的反对者之一——断言福柯的结构主义的反人道主义已成功地使萨特的方法得到更多的赞同。² 萨特自己的刊物《现代》尾随其后，发表了一篇题为“米歇尔·福柯的文化相对主义”（*The Cultural Relativism of Michel Foucault*）的评论性文章。³ 但是，对于福柯来说，也许最大的侮辱来自于让-吕克·戈达尔深受喜爱的政治电影《中国女人》当中一个十分著名的场景。一度“亲华的”女主角韦罗妮可（安娜·维亚泽姆斯基扮演）使劲向《词与物》这本书扔了一连串的烂番茄，因为福柯坚定不移的结构主义似乎否定了革命政治

1 Foucault, interview with Madeleine Chapsal,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 16 (5) (May 1966): 15.

2 François Mauriac, “Bloc-Notes,” *Le Figaro*, September 15, 1966.

3 Michel Amiot, “Le relativisme culturel de Michel Foucault,” *Les Temps Modernes* (January 1967).

变革的前景。

出于同样的原因，记者莫里斯·克拉维尔叙述了他在五月学生造反的无序和混乱中到达巴黎，他反思道，福柯有争议的格言毕竟证明是正确的。难道《词与物》没有预言“我们的人文主义文化的地质学上的坍塌，就像它在‘五月风暴’期间发生的那样”？¹

20 世纪 70 年代初，福柯最终抛弃了“考古学的”方法，尽管他作为思想家的名声曾以这种方法为基础。在《词与物》中，他视人类科学的话语是自律的领域——知识图式——它们可以专门根据它们的内在逻辑来加以研究：据此规定可言说与不可言说之界限的种种规则。考古学的方法因其过度地关注语言和话语而缺少一种必要的批判性要素去把福柯的理论和左派分子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洞察权力在日常生活“微粒子的”层面上的实际运行。事后看来，福柯大概会把《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贬为“形式上的练习”，后者在他的著作中间占据了一个“边缘的”位置。他后悔这两个文本没有论述那些更新的、更明确的、与他有关的政治主题，这些主题涉及权力和反抗的问题。²

福柯对毛主义者的民粹主义的认同凸显了他形象中的某些反知识分子倾向。他承认，他将他为了监狱信息小组而进行的政治介入行动视之为一种“从我正在体验的、有关文学追求的无精打采中获得真正

1 Maurice Clavel, *Ce que je crois* (Paris: Editions Grasset, 1975), 140.

2 参见 Eribon, *Insult and the Making of the Gay Self*, 259–260.

解脱的实践”¹。坚持毛主义的“群众路线”需要赞美人民淳朴的、未受腐蚀的良知，知识分子反被贬低为一伙陌生人。卢梭在他的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认为“强词夺理”要冒着腐化人民健康常识的危险。出于相似的理由，福柯开始想知道，除了普遍知识分子的落伍之外，“写作”本身是否不该作为一种论战形式而被超越。究竟毛主义者在他们忘了动词的调解功能时就不该说明这一时代为了斗争直接以革命行动的方式来表达自身吗？如若具有古典特征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阻挠政治意识的获得，那么人们就不能谈论相同的“文本性”（知识分子偏爱的表达方式）吗？福柯一度坦诚地声明他更喜欢为了监狱信息小组而做的实践工作，而“不喜欢大学里的戏谑与乱写的著作”。²

311

在与监狱信息小组一起工作的过程中，福柯试图回到在他第一部重要著作《疯癫与文明》中所提出的问题，这本书彻底挑战了承继而来的、关于社会常态的观点。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权力与反抗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事后看来，福柯或许会责怪自己在所谓的考古学阶段过度关注语言领域或话语性的领域，这是一种具有整个结构主义特色的偏见。同样，据他自己承认，他低估了权力的实践效果：权力在日常生活的平面上展开了有限的、具体的与分

1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1:51.

2 “Le grand enfermement,” in *Dits et écrits* 1:301; 亦参见 “Folie, littérature, et société,” in *Dits et écrits* 2:115.

子式的运作。¹ 在《疯癫与文明》中，这组主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尽管是拐弯抹角地——通过福柯考察那些被社会区分为“正常”与“病态”的形态来评估社会的尝试：谁被包括在内与谁被排除在外、中心与边缘等等。在这种背景下，福柯不得不激活、复兴他称之为“非理性不受干扰的工作”（sovereign enterprise of unreason），自从启蒙运动以来，“非理性”就被隔离、囚禁并因此缄默了。多年以后，他被这本书于后五月时期在新一代激进分子中间获得极感兴趣的接收效果而激动不已。例如，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本着“反精神病学”的精神写成，注定要成为后五月时期批评技术专家技能的压抑本质的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它完全受惠于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运用的思想方法。在德勒兹的一再要求下，福柯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

312

回顾其早期的思考时，福柯回想起占主导地位的权力方法的概念困境和政治困境。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权力仍主要从经济方面被理解：作为一种阶级地位的功能或生产方式的所有权。的确，阿尔都塞1970年撰写的论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最初发表在法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思想》（*La Pensée*），迟迟才赞同了政治与文化的半自主性影响。² 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间，

1 参见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114: “我认为我不是提出（权力）问题的第一人。相反，我被我在系统阐述权力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迷住了。当我现在回想起来时，我问自己在《疯癫与文明》或《临床医学的诞生》中除了权力外还讨论了什么？然而我完全意识到我几乎从不使用这个词，也从未有这样一个任我支配的分析领域。”

2 Althusser, “*Idéologie et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 (notes pour une recherche)*,” *La Pensée* 151 (1970): 3–38.

权力通常根据现代自然法或司法模式来考虑：作为一种权利和宪法的功能。然而这两种方法都在理论抽象化的平面上展开，这种理论抽象化经常掩饰和模糊了权力具体的、现象学的、日常的效力。这两种立场都将权力视为某种否定之物——约束或限制的体现——而不是一种生产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制造出那些最终揭示权力的真正社会本质的驯服身体与顺从自我。

在稍后的一篇访谈中，福柯这样描述了对《疯癫与文明》这种缄默不语的接受情况：“我自己在这个领域努力所做的事情却在法国知识分子左派中间招致了巨大的沉默。”这只是因为“五月事件”所创造的政治开端，福柯继续写道，“尽管有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法国共产党，但是所有的这些问题都逐渐呈现出它们的政治意义，以一种我从没想象过的敏锐说明了我的那些早期著作仍然是如此地提心吊胆、吞吞吐吐。”¹

因此，20世纪70年代初，在法国知识分子中间，医院、监狱、收容所和精神病治疗机构开始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内涵和政治意义。在左派分子中间，政治论战的观念被重新构想出来，并被重新阐述。阶级不再是政治斗争的全部。相反，作为监狱信息小组经历的副产物，民粹主义观念认为政治的真正目标是为那些被剥夺了发言权的人（被排斥者）代言。政治行动主义的新目标是为那些被系统地边缘化和被

313

1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111. 福柯后来评论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五月风暴’，我决不可能做关于监狱、不法行为、性征的研究。在以前的氛围中，这是不可能的。”“Conversation avec Michel Foucault,” in *Dits et écrits* 4:81.

排斥发言的人创造一个空间，并且当他们的捍卫者是政党、联盟和那些假定为他们代言的“先知知识分子”时就要以一种证明是不可能的方式来创造这一空间。

在这一时期，据说福柯有一天曾对德勒兹说：“我们不得不从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德勒兹回复说：“当然，我要对付弗洛伊德，你要对付马克思。”¹

“政治”四处蔓延，活跃于后五月时期“无产阶级左翼”等左派团体中间，这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惊慌失措，对他们来说，无产阶级是享有特权的、排他性的阶级意识承载者。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左派分子为之努力的不可宽恕的异端学说将会平等地思考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教义问答的原则不能接受本来的政治意识。

正如福柯当时所指出的那样：“‘五月风暴’之后，当（政府）压制与司法起诉的问题日益变得严重时，这让我震撼不已，重新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这意味着）我们正返回到 17 世纪就已经存在的普遍监禁：警察机关拥有毫无节制的、任意处理的权力……如今……人们正返回到一种普遍的、没有差别的监禁。”²

在福柯看来，一种全新的历史分析方法是必要的，这种方法允许人们经由人文学科对主体性的“微观影响”（microeffects）来分析人文科学的演化。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Nietzsche,*

1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1:55.

2 Foucault, “Grand enfermement,” *ibid.* 2:308.

Genealogy, History) 一文中概述了他的新方法。在福柯从尼采的《道德的谱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中判明自己的方向后, 他界定谱系学家的任务是一种阐明人文主义理想及其相关的制度表现的批判事业, 通过使人文主义理想及其相关的制度表现回溯到“强力意志”(will to power) 的特殊历史主张来实现这一阐明。这种方法不是在启蒙哲学家的崇高规划中而是在历史实践的日常变迁之中找出了这些理想的“起源”。这样谱系学的方法就驳斥了他们所自我描述的普遍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立场。特殊知识分子的技能反而“需要耐心与一种细节的知识……取决于原始资料的大量积累……(它) 要求冷酷无情的渊博学识”¹。

314

这种描述方法忠实地描绘了福柯设想他与监狱信息小组一起工作的方法。在一篇发表在反文化杂志《目前》(*Actuel*) 的圆桌座谈中, 福柯解释了尼采意义上的、构成监狱信息小组实践斗争与实践目标之基础的动力。正如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实现了对“高贵的”与“卑贱的”的基督教理想的重新评估一样——在基督教之前, “高贵的”意味着权力与地位的不受约束的练习; 反而随着基督教的兴起, 温顺与谦恭被认为是高贵的, 强力在道德上被认为是“卑贱的”——福柯认为一种重估之中的类似练习对于“有罪”与“无罪”的主导方法而言是必要的。

1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Pantheon, 1984), 140.

它的（监狱信息小组的）介入的最终目标不是将犯人探视权延长到 30 分钟，也不是为牢房争取抽水马桶，而是质疑“无罪者”与“有罪者”之间的社会差别与道德差别……面对这种刑法制度，人道主义者大概会说：“有罪者是有罪的，无罪者是无罪的。然而，犯人与其他人一样，社会必须尊重他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因此，安上抽水马桶！”相反我们的行动不去关注隐藏在犯人背后的灵魂或人，而是努力去消灭处于无罪与有罪之间的深层区分。¹

315

也就是在圣贝尔纳小教堂新闻发布会后不到 5 个月的时间里，监狱信息小组就出版了第一本小册子《20 所监狱的调查》（*Enquête dans vingt prisons*）。尽管这份调查没有包含统计信息，但是它含有两份完整的调查问卷，并选录了有代表性的答案。²在福柯为这本 48 页小册子撰写的序言中，他重申了调查并不是有意去改善或削弱一种显然是压抑的体制，也不是有意使不可接受的东西变成受欢迎的东西。相反，监狱信息小组的调查旨在揭露“监狱社会”（*carceral society*）的欺骗。它会遭遇一种处于那些交界处的社会，而这种社会在那些交界处以“效率”“权利”和“规范”的名义发挥作用。在详述了毛主义者的“民粹主义”路线后，福柯继续写道：

1 Foucault, “Revolutionary Action: ‘Until Now,’”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ed. Donald F. Bouchar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227.

2 Artières et al., *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80–81.

这些调查不是由一群狱外工作的专家完成的；调查者（也就是犯人）是那些正在被调查的人。该由他们开口说话、击垮壁垒、表达什么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并不再去忍受它。该由他们去负责那种防止压迫被施加的斗争。¹

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福柯和监狱信息小组又出版了3本小册子。他们的调查包括各种各样的议题，从审查犯人邮件的单调程序到上升的犯人自杀数的悲惨描述（仅在1973年就记录了43名自杀者）。

1971年2月，正当福柯宣布监狱信息小组成立的时候，前面提及的绝食抗议正开始向蓬皮杜政府施加巨大的、令人厌烦的压力。为了结束第一波抗议，当局准许了许多犯人的新特权：更加自由的探视权、不受限制地读报纸、听广播（这两项是以前禁止的）等等。为了防止即将来临的罢工浪潮，政府又同意了额外的特许权：单独监禁的最长时间从90天降至45天；审查犯人邮件的规定被废除了；调整休假的规定也放宽了限制。²一项新的政府授权被确定下来，以保证惩罚在法国的每个监狱里被公正公平地执行。以前，监狱曾是法外监视的地点；监督几乎是不存在的。

316

通过监狱信息小组的调查，人们才知道图尔地区负责人曾明确指示医务人员不要去治疗生病或受伤的犯人。根据监狱精神病学家埃迪

1 Artières et al., *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80-81.

2 参见 Salle, "Mai 68," 9-10.

特·萝丝 (Edith Rose) 博士的观察，对待犯人的习惯做法就是捆绑着他们的手脚，每次让他们一动不动地呆上几天。犯人们经常被虐待。他们被任意地拒绝给予哪怕是最微乎其微的消遣和快乐：服刑期间不能踢足球；每天限量给五六根烟。萝丝博士谈到了犯人结束多达一年的单独监禁后会得严重的精神错乱。她对监狱制度令人颤栗的控诉发表在毛主义者机关报《人民事业报》的特刊上 (1971 年 12 月 18 日)。她抄写摘要发给了蓬皮杜总统和司法部长勒内·普列文。当政府当局试图削弱她的可信性时，福柯在《解放报》发表文章，铿锵有力地站出来支持她的辩护。¹ 对他来说，萝丝博士是新型“特殊知识分子”的原型：具体信息和棘手事实的提供者，而不是空洞无物的、徒劳无益的理想的提供者。

监狱信息小组 1971 年对监狱自杀者的调查产生了一种特别深远而又广泛的影响。由于监狱信息小组的努力，法国监狱生活不人道的、有辱人格的条件在几个月内成为头版新闻。²

317

在随后的 18 个月里，暴动和绝食抗议席卷了法国监狱系统。大规模的骚乱出现在里昂、波瓦希 (Poissy)、格勒诺贝尔、德拉古尼昂 (Draguignan)、南希和尼姆 (Nîmes)。总共有 35 个监狱经历了大动荡。

1 参见 Foucault, "Le discours de Toul," in *Agence de Presse Libération*, bulletin no. 12, January 9, 1972 (reprinted in *Dits et écrits* 1:1104-1106)。

2 参见 GIP, *Suicides de prison* (Paris: Editions Champs Libre, 1972)。Daniel Defert 叙述了监狱信息小组对法国监狱未经报道的自杀者调查后，新闻报道就发表在《法兰西晚报》第 1 版，出版日期不详；Defert, "Emergence d'un nouveau front," 324。

考虑到犯人的与世隔绝、羞辱性的规训程序和他們经常遭受的监视技术，以及任意的文化剥夺行动，彻底的造反很可能是解救犯人唯一的办法。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动乱可以间接地追溯到监狱信息小组的努力，它努力激起犯人的政治意识，并提高他们自我组织的能力。

“任血流淌”：国际监狱暴动之年

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局势有利于重新考察监狱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20世纪60年代中期，瑞典监狱改革组织“全国监狱生活人性化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Humanization of Prison Life，简称KRUM）倡导绝食抗议和停工斗争的策略，以激起有关监狱条件的公众舆论。他们的方法在获得瑞典政府的特许权方面是成功的，包括不受限制的通信自由和定期的配偶探视权。

但是，对监狱信息小组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意大利左翼团体“持续斗争组织”（Lotta Continua），其中该团体的许多激进分子和支持者曾在20世纪60年代末因其政治行动主义而入狱。当“持续斗争组织”发现大多数监狱犯人由失业青年、小罪犯和下层人员构成时，它发展了一种将下层的或流氓的无产阶级作为补充的、附加的革命力量的理论。因此，这一团体开始将组织策略从工厂转向了所谓的大城市的大众社区或贫民区。“持续斗争组织”与意大利非共产主义左派的其他代表一起发展了社会工厂的概念——这一观念与法国《论辩》、“社会主义或野蛮”和“情境主义国际”等极左团体的理论具有许多相似性。根据这一观念，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统治不仅仅局限于车间。

相反，统治已经蔓延开来，涵盖了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闲暇时间、消费模式、城市规划和高等教育。这些发展意味着政治论战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唯一特权。它同样关涉到其他社会边缘团体——下层无产阶级或全世界受苦的人，他们在理论上已经成为工业无产阶级的天然联盟。一份重要的“持续斗争组织”小册子总结道：监狱斗争“将产生涵盖全世界的总体政治规划，从资产阶级对违法行为的操控中解放出来，以便‘违法者’也可以与无产阶级一道找到他们的革命道路”¹。

所有这些观念将对监狱信息小组的论战与政治战斗精神的扩展性构想产生显著的影响。1971 年，监狱信息小组激进分子丹尼尔·德菲尔和雅克·邓泽劳（Jacques Donzelot）去意大利旅行，与“持续斗争组织”积极分子就犯人权运动、组织策略和相关议题进行了磋商。²1969 至 1972 年间，意大利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监狱暴动；都灵（Turin）、蒙扎（Monza）、特雷维索（Treviso）、热那亚（Genoa）、圣维托雷（San Vittore）和的里亚斯特（Trieste）全都发生了大规模的造反叛乱。

但是，美国的黑豹党运动无疑对监狱信息小组理解监禁的政治本质产生了最有意义的影响。从 1968 年开始，福柯勤奋地阅读黑豹党

1 Lotta Continua, *Liberare tutti i dannati della terra* (Rome: Edizioni di Lotta Continua, 1972), 14–17.

2 几年后，Donzelot 出版了一本在方法论上受他与监狱信息小组一起工作的启发而完成的重要著作《家庭的治理》[*The Policing of Families*,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1979)]。

人的政治著作。他称赞他们“发展了一种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的战略分析”¹。20世纪6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初，政治镇压——实际上是一系列政治谋杀——大大削弱了黑豹党的领导层。1969年，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和弗雷德·汉普顿（Fred Hampton），黑豹党伊利诺斯州支部创始人，在一场黎明前血腥的警察袭击中被杀死在床上。在冲突开始的时候，据报道警察连续射杀了大约90轮，但没有回应。一位告密者向警察提供了黑豹党人住处的建筑平面图。公民权利积极分子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和前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Ramsey Clark）负责的一项独立调查得出了如下结论：克拉克和汉普顿无缘无故地被谋杀了，公民权利被过分地侵犯了。²

319

1971年8月，一般认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昆丁监狱（San Quentin Prison）一次的越狱逃跑中，黑豹党领导人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被枪杀了。杰克逊曾于12年前因一起加油站抢劫案入狱，他矢口否认自己做过这起抢劫案，只有70美元在这起抢劫案中被抢走。他起初被判蹲监狱一年。但是，因为他是一名不屈不挠的、具有感召力的和政治上具有悟性的非裔美国人，所以他每年的假释请求都被例行公事地否决了。一年前，杰克逊17岁的弟弟乔纳森被杀害了，

1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1:44.

2 参见 Roy Wilkins and Ramsey Clark, *Search and Destroy: A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Black Panthers and the Police* (New York: Metropolitan Applied Research Center, 1973)。

他是马林郡法院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中四名被害人之一。

监狱信息小组改由伽里玛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献给杰克逊事件的小册子《乔治·杰克逊谋杀案》(*L'assassinat de George Jackson*)，作家、黑豹党支持者让·热内(Jean Genet)为这本小册子撰写了一篇令人感动的序言。(监狱信息小组最初的出版商、无政府主义导向的 Champ libre 出版社意识到一旦监狱信息小组由毛主义者担当工作人员、负责管理，就与监狱信息小组断绝了一切瓜葛。)热内，《小偷日记》(*A Thief's Journal*, 1949 年)的作者，曾在法国监狱里蹲过很多年，因而是监狱信息小组的天然同盟者。当他与监狱信息小组一起工作时，他向福柯讲述了他在监狱里遭受的凌辱，当时一名共产主义犯人拒绝给他带镣铐，因为热内是一名普通罪犯，而不是像他自己一样的“政治犯”。热内公开承认自己是一名同性恋者。20 世纪 50 年代初，他的一部电影《爱之歌》(*Un chant d'amour*)曾在美国被禁映，因为这部电影公开描绘同性恋主题。¹热内认为黑豹党人是具有超凡魅力的激进分子，他们有勇气起来反抗、保护遭受压迫的非裔美国人，而且他还认为黑豹党是这样一个团体：其领导者具有非凡的、简洁明白的散文写作能力与使用恰当词汇的技巧。热内对埃尔德里奇·克里弗(Eldridge Cleaver)情感炽热的自传《冰上的灵魂》(*Soul on Ice*)印象尤为深刻，这是一本 1969 年翻译成法语出版的畅销书。

1970 年，热内到美国旅行，公开为黑豹党人的事业筹集钱款。考

1 参见 Edward de Grazia, "An Interview with Jean Genet," *Cardozo Studies in Law and Literature* 2 (5) (Autumn 1993): 307-324。

考虑到黑豹党的意识形态接近马克思主义，热内评论说美国人几乎不能忍受“黑皮肤中的红色意识形态”（red ideology in a Black skin）¹。他总共在15所大学进行了演讲。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就住在黑豹党的安全藏身之处。在纽黑文市，在热内为监禁的黑豹党共同创始人鲍比·希尔（Bobby Seale）进行演讲声援时，他吸引了2.5万民众前来听他的演讲。第二年，他为乔治·杰克逊的监狱书信集《索莱达兄弟》（*Soledad Brother*）撰写了导言，这本书是发自内心的、满怀激情的“心灵呐喊”（cri de coeur）。当热内评论他视之为政治谋杀的杰克逊死亡事件时，他说：“白人用到黑人之上的‘犯人’一词是缺乏意义的。对于白人来说，所有的黑人都是犯人，因为他们是黑色的，换一种说法，在一个白人主导的社会中，没有黑人不可能是罪犯。”²在热内看来，借助法律和刑罚通常的法律词典去解释非裔美国人的犯罪行为——本质上是国家认可的种族歧视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装饰门面而已——令人遗憾的是，这仍然是目光短浅的。相反，只有解决问题（这一问题包括对弥漫于美国人生活的体制化种族主义的深层理解）的政治的方法才有希望理解尚有争议的两难困境的真正本质。

引人瞩目的是，黑豹党人充满了黑人的男子汉气概，鄙视白人的支持，但他们竟然接受热内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尽管热内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尽管他一度爱上了黑豹党具有超凡魅力的全国参谋长大卫·希利亚德（David Hilliard）。黑豹党与热内的亲密关系使他们

1 引自 Edmund White, *Jean Genet: A Biography* (New York: Vintage, 1994), 522。

2 Jean Genet, preface to *L'assassinat de George Jackson* (Paris: Gallimard, 1971)。

重新评价他们早期惧怕同性恋的态度和倾向。

321 在与热内接触之前，“男同性恋者”（faggot）一词曾是该团体嘲笑的标准术语之一。而在热内返回法国后不久，黑豹党共同创始人休伊·牛顿（Huey Newton），当时因即将被解除的谋杀指控而入狱，他发表了一篇立场鲜明的文章《妇女解放和男同性恋解放运动》（*The Woman's Liberation and Gay Liberation Movements*）。牛顿提醒读者注意同性恋者也是被压迫的少数者——也许是“最受压迫的人”。牛顿继续写道，从原则上讲，所有人都该有以其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来自由地使用他们的身体的权利。这位黑豹党国防部长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在即将到来的解放斗争中，男同性恋和妇女双方可能是有价值的同盟者，他总结说：“当我们举行革命会议、联盟和示威游行时，应该有男同性恋解放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全面参与。”¹

牛顿支持同性恋者的宣言在大西洋彼岸产生了显著的连锁效应。在他关于男同性恋解放和女权主义的立场鲜明的文章开始流传后不久，与毛主义者的机关刊物《一切！》有关系的法国左派分子开始迫切地探讨那些对性征和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的政治问题。起初，许多左派分子怀疑这些主题是否具有像他们的运动一样的适切诉求，而他们的运动可是极有革命政治抱负的。在很多法国积极分子看来，牛顿对同性恋解放的支持基本上解决了有争议的问题。《一切！》的姊妹刊物《革命万岁！》，由罗兰·卡斯特罗主编，翻译发表了牛顿宣言的

1 参见 Huey Newton, “The Woman's Liberation and Gay Liberation Movements: August 15, 1970,” in *To Die for the People: The Writings of Huey P. Newt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153。

全文。¹这便是黑豹党领导者享有的国际好评度，尤其是在法国。

1971年9月，杰克逊去世后仅一个月，纽约州声名狼藉的阿提卡监狱(Attica Prison)发生了暴动。40多名犯人和看守丧生，当时1000名州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士兵猛攻监狱。2000年，那些被杀害者的亲属才获得了800万美元的庭外和解费。在其出版的作品中，监狱信息小组努力宣传所有这些与监狱相关事件的国际动态问题。

法国最严重的骚乱于1971年12月在东部城市图尔发生了，因为普列文部长决定禁止通常玩的圣诞节传包裹游戏，以应对邻近的克莱尔沃监狱(Clairvaux Prison)发生的越狱逃跑事件。年长的犯人们直接把自己反锁在监狱车间中，开始捣毁设备。年轻的犯人们放火烧了图书馆。犯人们从监狱的窗户猛抛家具、寝具和餐具。这个监狱有四个牢房区，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完全控制了其中的一个牢房区。一名年轻的犯人在牢房的墙上乱写道：“我们尊敬那些善待我们的人。”不过，在这次骚乱中，犯人们决不去抓人质。在接下来的谈判过程中，犯人们要求改进牙齿护理、增加热水浴以及全面改善监狱条件。但他们希望更换监狱长的基本要求没有被满足。²

图尔和其他监狱机构发生的前所未有的骚乱受到了大众媒体的关注。他们令法国动荡不安，鞭策政府去全面修改刑法制度。在这次无疑是监狱信息小组的最大胜利中，改革的要求通过了，以便改善那些

1 Hamon and Rotman, *Génération 2*:231.

2 Ibid., 379.

使犯人蒙受道德耻辱的监狱生活。与普遍的“异常行为”观念一样，犯人性格有点“畸形的”观念必须予以抛弃。¹1972 年 4 月，来自监狱信息小组的压力促使一项法案顺利通过，这项法案宣告了主要基于被告犯罪记录和警察卷宗的判决是无效的。福柯认为这些卷宗是“权力—知识”潜在操纵的表达。²自此以后，惩罚将关注的是罪行，而不是犯人。1974 年吉斯卡尔·德斯坦当选总统后，一个负责监督监狱条件的内阁部长职位设立了。

1972 年 4 月，福柯到纽约州北部地区旅行，参观了阿提卡监狱。一年后，他发表了一篇详细描述他的参观印象的访谈。因为法国监狱是“封闭的地点”，阿提卡之行是福柯第一次监狱内部的体验。首先，他被监狱“工业的”形象和布局迷住了。他将这一设施描述为一台“巨大的机器”（immense machine）、一个巨人似的胃，负责粉碎和清除社会上“不合口味的”成分，显然是它特别熟练地进行处理的某种东西。监狱当局声称他们已经准许他全面参观监狱的四个牢房区。直到后来福柯才知道他们向他隐瞒了第五个牢房区的存在：监狱的精神病区。³

起来，你们这些全世界受苦的人：全世界流氓无产者联合起来！

尽管福柯使用了谦卑的修辞手法，并反对所谓的普遍知识分子，

1 参见 Monod, *Foucault et la police des conduites*, 90-91。

2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1:57.

3 Ibid., 1395.

但是他从两年来有关法国刑罚制度本质的调查中发现了许多基本的“毛主义真理”。福柯自信地宣称改革不是人民所希望的。他在一篇与吉尔·德勒兹的谈话中解释说：“这不仅仅是更好的、更平等的司法形式的观念，这种观念逐渐减轻了人们对司法制度、法官、法庭和监狱的憎恨，而是——除了这一点之外，并且极为重要的——权力总是以人民为代价被实施的独特知觉。”¹

但是，假如人们仍然对改革刑罚体制漠不关心，那么人们如何才能准确地描述他们的要求呢？在他与毛主义领导者皮埃尔·维克多关于大众司法展开的争论中，福柯给予了最清楚明了的回复。维克多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之后就提倡创立人民法庭来执行即决裁判，而福柯反驳说人民法庭是倒退的资产阶级法制的表现。他坚持认为真正的法庭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建构，资产阶级的功能就是“通过将大众司法重新铭刻到以国家机器为特点的各种机构之中去诱捕它、控制它和窒息它”²。最终，这样的法庭表达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心态，这种心态有助于平息和驯服人民健康的、先天的革命本能。福柯解释说：

324

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人民法庭……具有非常明确的社会基础：它代表了一个居于掌权的资产阶级和巴黎普通民众之间的社会群体。这是一个由小业主、商人和手工业者构成的小资产阶级。这个群体占据着一个调解人的位置，组织一个像

1 Foucault and Deleuze, "Intellectuals and Power," 77.

2 Foucault, "On Popular Justice," 1.

调解人一样发挥作用的法庭……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它重新占据了司法体制的位置，正如它在旧体制下运转得一样。哪里有要求惩罚其敌人的群众，哪里就有当时被取代了法庭的运作及其大量意识形态的活动。¹

反对维克多支持的、“文化大革命”的人民法庭模式，福柯暗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选择：1792 年的“九月大屠杀”，当时革命分子处决了几百名无助的犯人，只是因为担心他们会变成反革命分子。

那一年末，在福柯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面对荷兰观众进行电视辩论的过程中，他阐述了一种尼采意义上的、揭露司法真相的观点，他将司法斥之为“一种被捏造的观念，在不同的社会中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的手段被付诸实践”。“显然，”福柯继续说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独裁的阶级政体下，生活在强暴地施加于自身的阶级权力之下，即使当时这种暴力的手段是制度的、合乎宪法的。”这位哲学家继续总结说，当无产阶级胜利时，“它将对其所取代的阶级实施一种暴力的、独裁的、甚至是流血的权力”。他有点天真地补充说：“我不知道人们对这一点持什么样的反对意见。”²

325 在福柯看来，人民想要——并且值得去——流血！福柯基本上同意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提出的见解：文明进程的标志是残暴行径的不断升华。但是，资产阶级赞美这种发展，证明其价值和道德是合理

1 Foucault, "On Popular Justice," 3-4.

2 Foucault, "De la nature humaine: Justice contre pouvoir," in *Dits et écrits* 1:1363,1371.

的——作为“文明”和“进步”的证据——尼采和福柯则批评它是“正常化”的机制。它剥夺了个体的本能生命力，将他们变为卑躬屈膝的、墨守成规的生物——资产阶级道德和法规的温顺实施者。

福柯捍卫“九月大屠杀”，将其视为一种人民司法的模式，这不只是一种“离题之举”（*passing aside*）。而在一个无产阶级似乎完全沉迷于点滴的经济成果和安逸的向上社会流动的时代中，这种司法模式是人们将其描述为一种保持革命主义理念的无望努力的一部分。面对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许多革命斗争的倡导者，像萨特、雷吉·德布雷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等人，已经摆弄出第三世界主义。如若工人阶级在发达工业社会似乎对革命漠不关心，那么在一个非殖民化的时代中，也许“全世界受苦的人”会发动起来，促使全球资本主义垮台。

福柯反而将赌注押在了晚期资本主义的“人类垃圾”上：流氓无产阶级或下层阶级。他选择这条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若尔日·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被诅咒的部分”（*la part maudite*）理论的影响。在巴塔耶看来，所有社会都从事各种形式的牺牲或耗费，以便使其除掉不需要的要素或成分。同样，这种实践为这些被诅咒的阶层或群体增添了一种反向的高贵性。凭借着他们被排斥者的地位，他们设法抵制资产阶级社会化的正常化冲动。在《耗费的观念》（“*The Notion of Expenditure*”）中，巴塔耶——以一种类似于福柯赞美“九月大屠杀”的方式——赞美了社会中坚分子起义造反而杀害或打倒他们痛斥的压迫者时所发生的大规模流血冲突。根据巴塔耶的观点，“主人和剥削者”要肩负起责任，去创造“排除人性的蔑视形式——使这种人性存在于大地的极限处，也就是说存在于泥土之中”。因此，“一个简单的相互

作用法则要求他们不得不……陷入伟大的夜晚之中，在这样的夜晚，他们优美的诗句将在暴乱中被死神的尖叫之声淹没了。那是流血的希望……概括了阶级斗争的反抗内容”¹。

福柯哀叹说，法国工人阶级乐意接受资产阶级的道德。当毛主义者在工厂门口大声叫卖讨论同性恋解放的《一切！》刊物时，他们遭受了冷遇，或许情况还要糟糕。从道德的立场看，显然法国工人在他们对待家庭结构和性征的态度上已经变成“资产阶级化的”（embourgeoisified）。福柯在一篇访谈中叹息说：“无产阶级已经被彻底地灌输了关乎道德与法制、盗窃与犯罪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²在后五月时期，“扩大斗争领域”（extension du domaine de la lutte）的观念——将“五月起义”期间学会的论战方法应用到车间之外的日常生活领域——流行开来。通过倡导那些社会被排斥者——犯人、精神病患者、移民、失业者等等——的事业，福柯把自己的解释铭刻在这条后五月时期的格言上。

在福柯看来，监狱不再是以人民为代价来行使权力的唯一社会机构。监狱仅仅是权力发挥作用最明显的机构。资产阶级社会的制度结构充斥着权力，到处充斥着监狱实践和规训技术。“法庭、监狱、医院、

1 Georges Bataille, "The Notion of Expenditure," in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trans. Allan Stoek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179. (译文参见巴塔耶：《耗费的观念》，汪民安译，见汪民安编：《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乔治·巴塔耶文选》，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9—40 页。译文有所改动。——中译注)

2 Foucault, "On Attica," in *Foucault Live*, 117.

精神病院、工人的卫生保健室、大学、媒体：遍及所有这些机构并在各种形式的伪装下，存在着一种发挥作用的压迫，”福柯断言，“那基本上是政治的。”¹他曾俏皮地说，监狱“开始在它的门外运转得很好。从你离家出走的那一刻起！”²监狱有助于促成这样一种幻想，即社会的规训机制被限制在这个单一而体制性的场所。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一个福柯有时称之为“监狱社会”的浓缩案例而已。

327

以这个隐喻为基础，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初试图重新定义权力的内部运行和阴谋诡计。在他最详尽地阐述这种新方法的著作《性经验史》中，福柯开始挑战权力的“司法的”概念：权力被构想为一种“否定性的”、约束我们的自由的限制。在福柯看来，一提到权力，用个比喻的说法，我们仍没有砍掉国王的头颅，因为权力不是“被获得的、被掠夺的或被分享的某种东西”；它也不是源自于一个单一的源头。³此外，“权力关系不是处于上层建筑的位置上，只是发挥着禁止或附和的功能；无论它们在哪里发挥作用，它们都具有直接生产的功能”⁴。当权力被构想为生产性的、非中心化的、匿名的和无所不在的时候，政治的传统边界消失了；因此分析的焦点就变成了“整个社会”

1 Foucault, preface to *Enquête dans vingt prisons*, in *Dits et écrits* 1:1063.

2 Foucault, “La prison partout,” *Dits et écrits* 1:1062.

3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1:94. [中译本参见福柯：《性经验史》（增订本），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中译注]

4 Ibid. [中译本参见福柯：《性经验史》（增订本），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译文有所改动。——中译注]

(society as a whole)，而不是狭义的司法意义上的“政治”。反抗也必须被完全重新定义。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通过反对国家来进行。只要“国家”的规训机制——福柯将其重新界定为“治理术”的控制和统治的固有倾向——是无所不在的，那么反抗也必须处处爆发。换言之，“局部行动”必须在每种情形中、在各条战线上被倡导。

与福柯理解权力和反抗的新方法似乎疏远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一样，它的组成部分完全与左派激进分子的工运中心主义一致。在福柯看来，反对权力的遍在性 (omnipresence) ——其表现在监狱、医院、精神病医院和大学——最终与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相一致，因为权力的主要功能之一仍然是加强和精简资本主义制度。在 1972 年 3 月与德勒兹的一次谈话中，福柯展现了其令人赞叹的雄辩口才，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一点：

328

我们一与剥削作斗争，无产阶级就不仅领导着斗争，而且还界定了斗争的目标、斗争的方法以及对抗的地点和手段；与无产阶级联盟就是去接受无产阶级为斗争而采取的立场、思想与动机。这意味着一种完全的认同。但如果战斗直接指向权力，那么所有那些被权力损害的人，所有那些觉得权力无法忍受的人开始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上并以适当的能动性（或被动性）为基础展开斗争。在介于一种关涉到自身利益的斗争（他们清楚地理解了斗争目标，并且只有他们才能决定斗争方法）中，他们成为革命进程的一部分。他们自然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因为权力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被行使，

以便保持资本主义的剥削。通过他们在发现自己受压迫的那些地方进行斗争，他们真诚地献身于无产阶级事业。妇女、犯人、被征召的士兵、医院病人和同性恋者当时已经开始了一场反对那些施加于他们的具体权力、限制和控制的特殊斗争。鉴于这类斗争是激进的、不妥协的和非改良主义的，并拒绝任何充其量通过变换主人来达到同样权力的新部署的企图，它们实际上被卷入革命运动之中。而且，这些运动反对那些**服务于同一权力体系**的控制和限制，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有关系。¹

这种无处不在的权力观念以及与其关联的分散的、局部的反抗观念绝不是福柯的独特发现。这些戒律对1968年之后的左倾主义的社会思潮是极为重要的。在“五月事件”的余波中，学生积极分子相信没有次级的或者次要的政治斗争这回事。高中和大学里为了同性恋解放与自由表达而进行的斗争，反对种族主义、歧视和恐同症的斗争——每场反对压迫的局部斗争对于反对作为压迫的、总体化的统治模式的晚期资本主义进行的斗争是极为重要的。考察1970年激进政治的局势，左翼积极分子让-艾代恩·阿耶（Jean-Edern Hallier），左派分子机关刊物《国际白痴》（*L'Idiot Internationale*）的出版人，以这样的文字贴切地总结了后五月时期的政治精神：“‘五月风暴’的口

329

1 Foucault and Deleuze, "Intellectuals and Power," 216;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号逐渐消失了，但是它们正呈现出全新的、侵蚀性的意义，侵蚀着资产阶级文化……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斗争，长期以来被视为次要目标，但在这一战线不断扩展的同时已变成至关重要的内容。”¹

在“五月风暴”期间，学生们延迟了他们对工人运动的支持。左派崩溃，法国隐藏在戴高乐背后的沉默的大多数重新振作精神，这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使他们相信这种失败始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此后，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有人正面对抗它。反对资本的文化革命和无产阶级斗争需要相互强化。

这种局势有助于解释毛泽东文化革命的观念为什么在后五月时期会引起学生激进分子如此强烈的共鸣。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文化总是被视为附带性质的——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苍白反映。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学说反而假设了连接“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因果关系之箭可能被颠倒了。文化是革命斗争内在合法性的核心所在。左派分子仍旧相信无产阶级革命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他们继续在工厂成立组织，使工人们为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所准备。另一方面，当他们追随毛泽东时，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如若没有全面地改造资产阶级价值和道德就不能实现。

“五月风暴”使学生们的政治能量重新聚焦于法国社会特有的问题。在“五月造反”之前的那些年里，左派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政治上重要的事件总是出现在其他地方——东欧、北非、古巴和亚

1 Jean-Edern Hallier, "Editorial," *L'Idiot Internationale* 1 (December 1970): 3.

洲。因此，在推翻帝国主义的全球性斗争中，法国激进分子被打发去当声援者，举行示威游行，以支持切·格瓦拉、亚西尔·阿拉法特、菲德尔·卡斯特罗和胡志明。雷吉·德布雷和皮埃尔·戈德曼等一小部分激进分子通过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同志们并肩作战来进一步表明他们的献身精神。但是，1968年前，没有人会猜到革命可能会在法国发生，或者法国本土可能再次变成世界革命的中心。如若一部分南泰尔激进分子可能引发一场几乎要打倒戴高乐主义的暴乱，那么也许“要求不可能性”（demand the impossible）并不是不合理的，正如一幅著名的五月时代涂鸦画所迫切表达的那样。不再迷恋传统的左派，不再对工人阶级以及工会领导者的改良主义方向抱有幻想，许多左派分子在后五月岁月里觉得与社会的边缘分子同甘共苦是正确的，以便激活在此之前未被利用的革命潜力。菲利克斯·加塔利恰当地捕获了后五月时期的“革命多元主义”（revolutionary pluralism）的社会思潮，当时他评论说：“‘五月风暴’教会我们解读墙上的书写；自从那以后，我们已经开始辨认监狱、精神病院和当前公共小便池出现的乱涂乱写。一种‘新科学精神’正在诞生！”¹

暴露真相：福柯与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

监狱信息小组只是加塔利提及的“新科学精神”一种表现而

1 Le directeur de publication, "Liminaire," *Recherches* 12 (March 1973): 3.

已。到 1971 年，左派分子与反文化狂热分子不仅开始调查工厂工人的生活，而且还调查农民、移民、精神病人、妇女和同性恋者的生活。1970 年 8 月，“妇女解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诞生于同促使监狱信息小组产生的一样的毛主义背景。“妇女解放运动”立即开始调查，对此前有关妇女日常生活的禁忌主题或压抑主题产生了影响。在后五月的岁月里，日常生活微观政治层面的转变已经列入议事议程。

几个月后，法国第一个同性恋解放团体“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成立了。在最初的几年里，“妇女解放运动”和“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仍紧密地与“无产阶级左翼”这样的毛主义团体保持合作，只要他们能共享一种同源的革命观点。居伊·奥康让贴切地描述了有利于同性恋解放运动创立的解放思潮：“我们称自己是‘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这正是因为，对我们来说，最基本的不是同性恋，而是革命行动。这种表达方式意味着不仅革命者也可能是同性恋的，而且成为同性恋者大概是成为革命者的最佳方式。”¹

1971 年和 1972 年，当福柯正在调查监狱的时候，“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激进分子开始探讨同性恋者的生活——不是安德烈·纪德、让·考克托（Jean Cocteau）或让·热内等“精英”同性恋者（他们的声誉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而是不知姓名的、“日常的”同性恋者，他们从事低收入的蓝领工作，居住在巴黎郊外的贫困区或贫民窟，或者成长于巴黎的移民区。像监狱信息小组一样，“革命行

1 “Les premières lueurs du Fhar” (interview with Hocquenghem), *Gai Pied Hebdo*, March 12, 1988, 32.

动同性恋阵线”通过考察和问卷来收集有关同性恋者日常生活以及工作条件的信息：他们经常光顾的阴暗酒吧和午夜寻欢的地方，还有他们当中许多人最终葬身的监狱和精神病机构。

因为勒内·谢雷和居伊·奥康让，同性恋激进分子在文森大学频繁亮相。1971年，他们召开了第一场讨论同性恋的大学研讨班。几乎没有任何指定的演讲或阅读材料。他们反而邀请性工作者、易装癖者和变性人——他们当中没有人跟学术界有联系——来主持广泛的讨论。许多人是从臭名昭著的同性恋猎艳地点招募过来的，如巴黎西部地区布洛涅森林公园（the Bois du Boulogne west of Paris）和圣丹尼斯地区（the Saint Denis District）。¹

在早期阶段，“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努力支持无产阶级事业。当工人们开展对工作场所的斗争时，“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同性恋运动”（*tourbillon des folles*）[借用股票短语“狂风扫落叶”（*tourbillon des feuilles*）的谐谑用法]，向资产阶级的利益与习俗发起攻击。²但是这样做的话，首先就不得不劝服其他人“暴露真相”（*come out*），加入到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常态”的斗争。在一篇“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最早的武装号召中，激进分子宣布：

332

你不敢大声说出来。甚至你也不会对自己坦诚。几个月前，我们像你一样。我们的“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将是我

1 参见 René Schérer, *Hospitalités* (Paris: Anthropos, 2004)。

2 *Le Fléau Social* 2 (October 1972): 2.

们一起理解同性恋的组织。我们想摧毁家庭和这个社会，因为它们总是压迫我们……我们继续忍受着日常的压迫，冒着质问、坐牢和鞭打的危险，忍受着嘲讽的笑容和怜悯的注视……我们支持“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它的任务就是去反对和摧毁“法西斯主义的性常态”。¹

尽管福柯支持新一代同性恋积极分子，但是他与“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保持着十分谨慎的距离。他接受“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的存在，但是他担心一种积极的“同性恋认同”的真正观念可能会变成一种压迫性的社会建构。它以其特有的方式证明其与主流的异性恋成见一样是有限制性的、有约束性的。

在大部分的人生时光中，福柯的性征始终是一个棘手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当他在华沙做文化专员时，他在一次鬼鬼祟祟的同性恋幽会中陷入了华沙警察的圈套——他的伴侣是一名政府“间谍”。这一偶发事件迫使他突然离开华沙，返回法国。几年后，他因其性偏好的诽谤性谣言而未被考虑进教育部一份有声望的任命。²性取向极有可能是促使福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研究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因素之一。当一种粗鲁的、不受约束的同性恋文化开始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时，福柯像许多同代的同性恋者一样无法真的适应这种同性恋文化。福柯是一名属于阿尔卡迪协会（Arcadie）那代人的同性恋

1 FHAR, *Rapport contre la normalité* (Paris: Editions Champ Libre, 1971), 9-11.

2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1:55.

者：阿兰·包德利（Alain Baudry）¹于20世纪50年代创建的、羞羞答答的、上流社会的、彬彬有礼的同性恋组织。像美国的“玛塔欣协会”（Mattachine Society）一样，阿尔卡迪协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非公开的同性恋者提供了一个考虑周全的、紧密团结的共同体。1978年，福柯是阿尔卡迪协会年会的特邀演讲嘉宾。他拒绝了演讲费用（2000法郎），俏皮地说没有一个同性恋者应该收取费用去给其他同性恋者做演讲。²他的传记作者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证实道：“显然福柯属于‘石墙骚乱事件’（Stonewall）之前的、‘五月风暴’之前的那代人。”³福柯最关注的是“暴露真相”会对他的知识分子名声所产生的后果。⁴

同样，福柯明确地认同和支持“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对资产阶级“常态”的彻底批评。他认为，他自《疯癫与文明》以来就一直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类似的批评。1961年，福柯开创性的著作似乎有可能提前完成，而十年后左派分子仍然十分迷恋他。德勒兹和加塔利，反传统精神病学运动（一种视弗洛伊德学说和整个精神病学为内在压抑的趋势）之后出现的知识分子名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福柯早期试图撰写作为理性所压抑的“他人”的疯癫史的重要意义。他们在1972年

1 此处系作者笔误，不是 Alain Baudry，而是 André Baudry 创立了阿尔卡迪协会。——中译注

2 Macey, *Lives of Michel Foucault*, 125.

3 Eribon, *Insult and the Making of the Gay Self*, 300–301.

4 参见 Miller,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254–257.

出版的鸿篇巨著《反俄狄浦斯》中十分信赖福柯的方法。考虑到这是法国反传统精神病学运动最重要的文本，《反俄狄浦斯》也许最好理解为对拉康巨大影响的批评性回应，引申开来是对弗洛伊德传统的批评。（加塔利是一名拉康派的分析师，他曾接受过拉康本人的精神分析。）在一次与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福柯在伽里玛出版社所出著作的编辑）交谈中，福柯将1976年出版的著作《性经验史》描述为他自己对拉康所进行的批判性反驳。¹

334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拉康的“回归弗洛伊德”（recovery of Freud）是法国哲学和人文科学最具影响力的一股潮流。在其声名远播的研讨班上，拉康借助结构主义语言学将弗洛伊德的概念从生物学领域转化到语言与文化领域。同样，拉康继续支持弗洛伊德的个体发生理论或个体化理论，这种个体化在俄狄浦斯阶段（一个社会化过程的隐喻）达到顶点。“俄狄浦斯化”（Oedipalization），意味着自我的成功构建，对拉康而言是一个语言与文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过程。与此同时，在拉康的框架中，个体发生和个体化被认为是不成问题的、与历史无关的常量。首先正是在这后一点上，德

1 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2:339. 诺拉在福柯来交《性经验史》手稿时以这样的文字描述了福柯的举动：“我记得他脚一踏进我的办公室就说：‘我没有想法，亲爱的皮埃尔，我没有什么想法。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我突然想起了性征，我说了我该说的一切。’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他给我带来了一份手稿，对我说：‘你将会明白，我唯一的想法是想通过论证拉康所言的对立面来击败他。’”[译文参见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下卷），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8页。译文有较大改动。

——中译注]

勒兹和加塔利与拉康分道扬镳了。他们主张俄狄浦斯阶段并不是人类心理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而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明。作为一种意在理解和引导这一过程的话语，精神分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主体的话语实施者。因此，他们的著作起了个有争论性的题目“反俄狄浦斯”。

福柯酝酿良久，打算写一本性史——更具体的说是同性恋的历史，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的存在主义意义的主题，一个他自20世纪50年末期以来就始终迂回地进行探索的主题。¹不过，20世纪70年代之前，他沿着与《疯癫与文明》一样的方法论策略构思了这一计划：视之为一部谴责同性恋为隐秘和羞耻的排斥性行动的历史。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福柯最终迫切地决定着这项计划时，同性恋的观念正经历着一场引人注目的蜕变。

首先，同性恋者开始大批地“暴露真相”。最著名的例子出现在1972年1月，当时在一篇题为“同性恋者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Homosexuals”）的文章中，居伊·奥康让在《新观察家》上公开了同性恋身份。奥康让以坦诚的细节叙述了他意识到自己是一名同性恋的经历——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不是不可以适当地出点儿风头”²。也许比任何单一事件更具影响的是，奥康让“革命的”行动——在蓬皮杜领导下的法国，需要巨大的勇气来公开宣布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有助于牢牢地在法国公众意识中确立同性恋解放事业。这也促使奥康让一夜之间成为法国知识界的明星。

335

1 参见 Eribon, *Insult and the Making of the Gay Self*, pt. 3, “Michel Foucault’s Heterotopia.”

2 *Le Nouvel Observateur*, January 10, 1972.

当年，奥康让出版了第一部关于革命同性恋的理论著作《同性恋欲望》，在风头上胜过福柯。在宣言的开篇叙述中，奥康让就通过转换以前关于同性恋争论的术语来获得一个理论和政治的转折点。奥康让写道：“问题与其说是同性恋欲望，倒不如说是对同性恋的恐惧。”¹ 换言之，真正的问题不是同性恋是什么，而是社会为什么如此地惧怕同性恋。奥康让使用“同性恋偏执狂”（homosexual paranoia）这样的术语来描述盛行的反同性恋情感 [当时“恐同症”（homophobia）这个词还没有被创造出来。]² 在考察了法国许多关于“同性恋偏执狂”的例子（例如，围绕让·热内的著作展开的争论）后，奥康让继续挑战社会改革者宣扬的观念，这些改革者认为社会正平稳地走向对同性恋态度的自由化。奥康让断言说，随便看一看当代欧洲同性恋压抑的历史，就会暴露出这种想法是荒唐的。20世纪前十年对同性恋刚刚出现的宽容已经随着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消失了。在“二战”后匆忙慌乱的重建过程中，对同性恋的反感继续增强。实际上，同性恋在法国直到维希时期（1940—1944年）才被宣告是非法的。正如奥康让有说服力的论证那样，逮捕的人数和惩罚的严厉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开始平稳增加。

奥康让继续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如何生产同性恋者，正如它

1 Hocquenghem, *Homosexual Desire*, 49; 加粗部分系本书作者后加。

2 关于“恐同症”（homophobia）这一术语的演变过程，参见“Homophobie,” in *Dictionnaire des cultures gays et lesbiennes*, ed. Didier Eribon (Paris: Larousse, 2003), 225, Michael Moon 为1996年版《同性恋欲望》撰写的序言，第15—16页。

生产无产阶级一样，同时不断地界定了其特有的界限”¹。他说明了西方的基督教始终对同性恋存有敌意，而当代对同性恋进行的犯罪学分类和精神病学分类相对来说是新近出现的。“同性恋者”这一术语是19世纪60年代由德国性研究者和社会改革家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最先创造出来的。随着19世纪末期把同性恋划分为一种疾病或弊病，“同性恋偏执狂”已经从宗教领域转移出来，并在某种程度上被世俗化了。随着精神分析的出现，同性恋成为一个固定的科学范畴。在这一点上，同性恋者开始内化并展示了资产阶级社会为他们制造的一成不变的特征。奥康让贴切地说：“我们为了支持精神地狱而逃离了地狱之火。”²

支持所有这些发展的推动力是奥康让所称的现代社会的“成长的帝国主义”（growing imperialism）：控制人口和产量最大化的过度需求。³在奥康让看来，为了保证持续地再生产健康的劳动者和消费者，资本主义把不受约束的性欲悸动的空间分割成“异性恋的”欲望和“同性恋的”欲望。异性恋欲望，在目的论上是为了繁衍后代，被确定为规范。同性恋欲望变成它的幽灵和陪衬。通过把同性恋欲望定位在一个特殊的被遗弃群体（“同性恋者”）之中，社会成功地限制了同性恋欲望。此前同性恋欲望曾被视为一种对于每个人的可能性，而现代精神病学将其视为一种与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相关的病态表现。社会既

1 Hocquenghem, *Homosexual Desire*, 50.

2 Ibid., 93.

3 Ibid., 51.

需要异性恋者，也需要同性恋者，但是这些范畴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建构，是资本主义创造的虚构范畴，以便将区分和限制强加到无限的欲望流之上。在重构同性恋历史的过程中，奥康让显然参考了《疯癫与文明》。像福柯的疯癫者一样，奥康让的同性恋者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便利虚构而已。

一种大胆的、放纵不羁的同性恋亚文化出现了，它与奥康让轰动性的“暴露真相”和开创性著作《同性恋欲望》连在一起，这使福柯进退两难。这位哲学家觉得他被剥夺了一项长久以来触及内心的计划。他清楚地知道开创性的突破已经被实现了，他自己的贡献不再是“有冒险精神的”。此外，正如埃里蓬所暗示的那样，福柯开始估量他构想的方法基本上被误导了。福柯有意“公开指责某些禁令，打破某种沉默”。然而，从这一点看，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人们正到处为自己辩护，包括在新闻杂志上”¹。正如奥康让在其发表于《新观察家》上“暴露真相”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我们都莫名其妙地在一個以性欲或性爱著称的领域中变得畸形了。我们必须开始揭露我们被迫隐藏的欲望。没有其他人会为我们做这件事。”²

“三十亿性反常者”

《同性恋欲望》出版后，奥康让向德勒兹和加塔利提议，他们应

1 Eribon, *Insult and the Making of the Gay Self*, 297.

2 Hocquenghem, “La révolution des homosexuels,” *Le Nouvel Observateur*, January 10, 1972.

组织一批研究者，出版一期讨论“同性恋”问题的《探索》[建制性教育与探索研究中心 (Centre d'étude, de recherche et de formation institutionnelles, 简称 CERFI) 的刊物] 专号。德勒兹和加塔利爽快地答应了，开始召集一个小组。在文森大学任职期间¹（在此期间，福柯离开了这所实验性大学，去法兰西学院任职）他们与福柯在思想上和个人立场上比较接近，所以他们直接请他参加这个小组。尽管福柯起初感兴趣，但是随着像奥康让这样更年轻的、更有冲劲的和直言不讳的同性恋者接管这项工作，他也渐渐失去了兴趣。

338

奥康让通过监狱信息小组第一次认识了福柯，当时监狱信息小组与“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合作发起了一项对热拉尔·格朗蒙塔涅 (Gérard Grandmontagne) 可疑性自杀的调查，这位公开了同性恋身份的青年犯人在神秘地死于单独监禁之前曾遭受过监狱看守的毒打。直到今天，仍然不清楚他到底是窒息而死还是电刑而死。²（值得注意的是《同性恋欲望》是献给格朗蒙塔涅的一部著作。）

六个月后，也就是1973年3月，最终成果《三十亿性反常者：同性恋大百科全书》(*Three Billion Perverts: The Great Encyclopedia of Homosexualities*) 出版了。这期专号主要对下列主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诚挚而坦率的讨论：猎艳、手淫、城区（城市保障性安居工程）

1 此处不符合历史事实，只有德勒兹在文森大学任教职，而加塔利终生供职于拉博德诊所。——中译注

2 Jacques Girard, *Le mouvement homosexuel en France, 1945-1981* (Paris: Syros, 1981), 106-107.

里的性和法国北非人口中间的两性关系。它还包括了受情境主义者启发的儿童卡通画的同性恋“复原”（recuperation）讨论。

不过，这本书里显然缺少类似于《痲癲与文明》《反俄狄浦斯》和《同性恋欲望》的理论论述。而参与者，从诸如奥康让这样的“知识分子”到他们访谈的各类同性恋者，都以清晰而朴素的语言谈论了他们自己的经历、观念和幻想。

《三十亿性反常者》立即被禁了，而且加塔利被判以“公共淫秽罪”——对良好的道德的侮辱（outrage contre bonnes moeurs）——处以小额罚款，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好像没有对杂志与政府部门的财政关系产生不利影响。最终，福柯在这期专号上的唯一印记就是他的签名，同时还有德勒兹、加塔利、萨特以及其他很多人的签名。

339

福柯作为一名积极分子的经历在《规训与惩罚》中结出了智慧之果，该书是他对现代规训机制与实践所进行的权威性阐述。为了消除这样的怀疑——他参与监狱信息小组可能是为他即将到来的研究收集材料的遁词，他延期两年出版《规训与惩罚》。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极具独创性的策略是将争论的焦点从犯人转向了惩罚制度。他将刑罚首先理解为一种政治形式。规训社会的目的是自下而上回避、缓解政治挑战：由各种各样的、散漫自由的流氓无产阶级群体（所谓的“危险阶级”）所表现出来的暴动和造反。¹ 这一由社会弃儿组成的下层阶级的自发行动隐藏着一种混乱的而又强

1 参见 Louis Chevalier 的经典研究，*Laboring Classes and Dangerous Classe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 Frank Jellinek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73)。

健有力的潜能。在福柯看来，监狱制度的政治使命就是通过重新分类这些像“犯人”和“格格不入者”（misfits）一样的、不屈服的“原始反抗者”（primitiverebels）来抵消这种潜能。通过将争论从政治领域转到科学、医学、精神病学和遗传学等被认为价值中立的领域，规训社会能够把一种政治威胁变成一场关于“偏离常规”（deviancy）和“社会病态学”（socialpathology）的“客观的”争论。但实际上，监狱制度在社会“正常化”（normalization）更大的规划中只是一个小小螺丝钉而已。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极为生动地描绘的“正确训练的手段”（means ofcorrecttraining）和“监狱主义”（carceralism）的微观物理学也已经被一系列相似的机构和组织所实施：医院、学校、收容所、工厂、军队等。

出于同样的原因，历史学家认为福柯以300页左右的篇幅探讨三个世纪的监狱生活，仓促地讨论了很多问题。对细节的漫不经心、对历史变化的疏忽使这本书更像一篇生动的、思辨性的散文，而不是一项严谨的、证据充分的研究。许多学者指出福柯对“规训社会”兴起的解释完全是线性的。他们担心他只是颠倒了启蒙运动的进步叙事，以替代日益增加的社会控制的叙事。革命政府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着手进行的监狱生活人性化的努力在拿破仑时代和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就被取消了。姗姗来迟的是，七月王朝期间（1830—1848年），许多旧体制刑罚制度的严厉特征——铁领、黥刑、截指等等——被永远消除了。

评论者也觉得福柯对监狱主义霸权的描绘是极为庞大的。因此，福柯的解释没有适当地处理形形色色的对抗性倾向，这些倾向的联合

效果就是实现比他所断言的要少得多的监视。劳工历史已经有说服力地说明了 19 世纪传统生产方法和现代生产方法如何同时共存。可以说情况十分相像的是监狱。不仅旧体制刑罚制度的许多隔代相传现象存留着，而且监狱的实际管理要比福柯引导读者去相信的内容具有更多的无组织性和随意性。监狱制度和整个现代社会都要比福柯所描绘它们的方面具有更少的总体性和无缝隙性。对个体以及全部社会群体来说，经常是相当容易地溜过这些缝隙的。此外，专家的规训意图和现场的社会实践之间的分裂经常如巨穴一般深邃。因此，边沁（Bentham）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对福柯来说变成了整个现代监狱主义的象征，但它其实是很少建造的。

分析者也指出现代监狱，远非是福柯所描述的有效运转的机器，它仍然充斥着传统基督教的影响。教堂在罪行教化、改过迁善的方法和各种监督实践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毕竟，正是特伦特会议之后的天主教“谴责了各种叛逆者——女巫、怀疑论者、持异端者，发明了这种记录和戏剧性地表达道德堕落的原罪理论。而且正是教堂强调了罪的不可救药的本质”¹。就其批评巴士底狱是专制独裁的象征而论，维克多·雨果和莱昂·冈比塔（Léon Gambetta）等 19 世纪的共和主义者并非努力去建立一个新的古拉格集中营。在福柯如此广泛地涉猎各个领域时，在他简单地认为“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应对权力的暴行和阴谋负责任时，难道他不是故意地无视法国共和主义的解放成

1 参见 Jacques Leonard, “L’historien et le philosophe: A propos de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77): 2.

就吗？¹难道“自由、平等、博爱”仅仅是一个有意去掩饰和隐藏日益复杂的“生命权力”机制之意识形态托词的例子吗？

由于这些缘故以及其他原因，观察者们觉得福柯把19世纪制度实践描述为一个大规模“正常化”的例子是站不住脚的。通过在方法上把“监狱主义”¹提升到一种不可战胜的权力的地位，难道福柯最终没有严肃地削弱反抗的能力吗？通过使权力在各个方向上弥散，他自相矛盾地冒着稀释权力的核心因素和组成部分的危险，从而使之难以辨认。如若权力不再由一个特殊的群体或阶级来行使，那么权力在其重新定位自身之前就会杂乱无章地穿梭于个体之间——但是，究竟会发生在哪里呢？最终，权力的运作似乎是不具体的、模糊不清的。

一旦权力被剥夺了核心，那么反抗也就被剥夺了对象。人们应在哪里举行罢工？人们应采用什么策略？确切地说，人们应该努力去反驳谁或反抗谁？一旦权力被提升到包罗万象的“话语政体”层面，反对它的诸种努力似乎没有多大意义。它们似乎“永远”刻在了作为知识图式的“权力—知识”之中了。尽管是无所不在的、奇妙匿名的，权力似乎是处处存在又似乎是无处不在。正如一位评论者贴切地总结的那样，在福柯的方案中，“（权力）是无法抗拒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供反抗”²。

批评者也反对福柯继续依赖“考古学的”概念和方法，这些概念和方法根据定义是把“主体”（连同社会参与者和反对群体）从他的

1 例如参见极具影响力的著作 Nord, *Republican Moment*。

2 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2:251.

解释框架中清除出去了。一位批评者反驳说，“几何学词汇把人类社会变成一片沙漠”。因此，不是去突出人类主体性与意志的对抗性潜能，福柯“谈到了空间、路线、框架、片段和布置”¹。在贬低了论战的前景后，福柯对现代规训实践的描述似乎是噩梦般的、卡夫卡式的。遥遥看不到的是可以确认的参与者和社群——他们能够反抗权力的无法逃脱的饕餮之胃。

福柯的徒子徒孙们：新哲学家们

尽管福柯有力地推广“特殊知识分子”的观点，但是他自相矛盾地发现——连同许多昔日的毛主义同盟者一道——他不能抛弃普遍人权的观念。争论不休的是彻底地改组法国对抗性的政治文化：从左倾主义到人权，大家可能会这么说。在这一点上，毛主义以其后五月时期的化身发挥着不容置疑的“中继站”或“传送带”（transmission belt）的作用，使知识分子远离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并使他们暴露在一个被扩大了的人类解放的定义之下。左倾主义崩溃后，东欧异见运动（Eastern European Dissident Movement）爆发了，捕获了前左派分子们的想象。并且在这一背景下，“权力”批评者发现人权观念是必不可少的。²做得再少一点将有可能达到伪善的极点。毕竟，人们怎样能凭良心谴责“权力—知识”在西方的压迫而无视“权力—知识”

1 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2:251.

2 Grémion 在《巴黎—布拉格》（*Paris-Prague*）一书中进行了精彩的叙述。

在东方令人讨厌的、极权主义的表现呢？索尔仁尼琴关于苏联古拉格群岛的开创性著作出版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的”范式以一种全新的道德视角被理解，并且被发现是严重不足的。这两种范式被看作是赞同社会控制之压迫逻辑的“合法性的科学”。

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期，仅仅在被视为一次显著的政治大转变中，福柯与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和塞尔日·朱利等前毛主义者一道变成了坚定的人权倡导者。1977年，福柯与萨特、格鲁克格曼一起抗议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到法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通过策划一场不寻常的、为一群东欧异见人士举行的公开欢迎会。一年后，福柯与贝尔纳·库什内〔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的创建人〕一道帮助建立了“越南船”（A Boat for Vietnam），一个旨在帮助越南难民逃离左翼独裁国家蹂躏的组织。¹1981年，当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General Wojciech Jaruzelski）宣布戒严法，由此来镇压“团结工会”（Solidarity，波兰新生的独立工会运动）时，福柯成功地游说新当选的弗朗索瓦·密特

343

1 库什内年轻时曾是一名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成员，但从不是一名毛主义者。然而，他的路线——从左倾主义到虔诚的人权倡导者——充分代表了毛主义者所追求的政治轨迹。他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任职期间担任过卫生部长（1992—1993）（2001年再度出任利昂内尔·若斯潘内阁的代理卫生部长）、担任尼古拉·萨科齐总统任职期间担任外交部长（2007— ）。关于他的政治生涯的概述，参见 James Traub, “A Statesman without Border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3, 2008。

朗总统撤销政府的互不干涉政策。¹

与库什内和前毛主义者格鲁克格曼的联盟使福柯转变为一名斗志激昂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倡导者：当人权有组织地遭受侵犯时去干预一个国家的国内事务的道德律令。1981年，福柯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发表了演讲，这些主题在这次会上被辩论、讨论，目的是促进一部全新的、更加充满活力的《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²在明确地借助当时的人权理论术语后，福柯赞颂了“国际公民权”（an international citizenship）的存在，这种“国际公民权利”要求个体无论他们出现在哪里都要大胆抗议权力的滥用。“正是这种国际公民权利的职责，”他继续说，“总是将人民痛苦的证据呈现在政府的面前……人民的痛苦肯定从不是一种沉默的政策残余。它牢固树立一项绝对的权力，去支持那些掌权者，并向他们发言。”³福柯继续赞美人道主义的非政府组织，如“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人类家园”（Terre des Hommes）和库什内领导的无国界医生组织，认为这些组织是国际公民权利的新道德立场的典范，在他看来，这种国际公民权确立了“私人个体有效地干涉国际政策与

344

1 Foucault, "The Moral and Social Experience of the Poles Can No Longer Be Obliterated," in *Power*, ed. James Faubion, trans. Robert Hurley et al.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465-473.

2 参见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2:1526。编辑们解释说，福柯努力“使尽可能多的人对这一文本做出反应，希望最终产生一部新的《人权宣言》”。

3 Foucault, "Face aux gouvernements, les droits de l'homme," *ibid.*, 1526-1527.

策略之秩序的……权利”。¹

福柯与监狱信息小组毛主义者的联盟使他对统治在现代社会呈现的形式多样性很敏感。但是监狱信息小组的反应，就其有勇无谋和不屈不挠来说，仍然是分散的、临时的。毫无疑问，解决“权力”问题更加系统的、原则性的方法是必需的。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变化莫测的政治思潮的影响下，福柯伪装成一名“普遍知识分子”、一名民主价值的捍卫者。（一次故态复发——一次严肃的故态复发——是为伊朗发生的毛拉革命进行辩护。福柯认为反对伊朗国王的人民叛乱是一次值得称赞的、土生土长的反殖民起义。一位著名的西方知识分子再一次被第三世界主义的吸引力诱惑了、欺骗了——也就是说，这一次第三世界主义穿上了宗教的外衣。）²

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谓的“新哲学家们”清楚地表达了全新的人道主义敏感性。在他们的前列中，格鲁克斯曼、让-保尔·道雷、克里斯蒂安·让贝、居伊·拉尔德罗（Guy Lardreau）和菲利普·内莫（Philippe Nemo）等前“无产阶级左翼”激进分子显得尤为突出。作为一名监狱信息小组的前领导者和前积极分子，福柯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以前的同仁和同道的激进分子。

几十年来，左倾的巴黎知识分子努力把作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与

1 Michel Foucault, *The Essential Foucault*, ed. P. Rabinow and N. Rose (New York: New Press, 2003), 64–65.

2 参见 Janet Afary and Kevin Anderson, *Foucault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其各种具体的历史变形分离开来，由此抱着这样一种期望，即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所展望的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仍旧令人心动地出现在地平线上。新哲学家们的策略——更多地归功于他们著作所获得的喋喋不休的媒体报道，而不是他们的思想独创性（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社会主义或野蛮”团体阐释过了）——就是将共产主义显而易见的政治失败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失策联系起来。格鲁克斯曼首先在 1975 年出版的《炉灶与食人族》（*La cuisinière et le mangeur d'hommes*）中阐述了这一主题。在格鲁克斯曼看来，马克思是“族长”，为人性的理论控制设计了“食谱”——这些“食谱”被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食人族”贯彻执行了。

因此，1977 年，当克鲁克斯曼的《主人思想家》（*Master Thinkers*）第一次出版时，福柯在左翼大众周刊《新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事实的暴怒》（*The Great Rage of Facts*）的赞美性文章。¹ 这位法国主流的哲学家——知识分子的赞许是一个旗帜鲜明的信号，即新哲学值得广泛受过教育的公众认真对待。通过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曾自我描述为“一名幸福的实证哲学家”的福柯暗示了即使再多的马克思主义启示的理论表现也不能改变“事实”的本质，这些“事实”证实了共产主义骇人听闻的、现实生活的表现记录。（这个题目也是一个针对阿

1 Foucault, "La grande colère des faits," *Le Nouvel Observateur*, May 9, 1977; reprinted in Sylvie Bouscasse and Denis Bourgeois's *Faut-il brûler les nouveaux philosophes: Le dossier du "procès"* (Paris: Nouvelles Editions Oswald, 1978).

尔都塞的直接嘲讽，尽管有可能存在于实践中的“偏差”，但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无可非议的理论说服力。）在福柯看来，“事实”的执拗性就像一道不可克服的、妄想的信念的障碍一样，这一信念认为回归原初状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以某种方式校正世界。此外，在《古拉格群岛》（一本像一道海啸一样泼溅巴黎知识分子场景的著作）中，索尔仁尼琴不是把他的事例建立在复杂的解释范式之上，而是以冷漠、呆板的“事实”为基础。

此外，他对困苦和剥夺的叙事包括古拉格无辜受害者的朴素证据：“平民”，他们落入了像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样的复杂理论的视线之内。就其自身而言，平民注定具有一种“前理论的”意识；从知识分子诡辩的立场看，他们无话可说。然而，正如索尔仁尼琴说明的那样，正是他们的独特的证据，而不是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使真相呈现出来，并且变得众所周知。在格鲁克斯曼（他在《炉灶与食人族》和《主人思想家》中广泛使用了这一术语）的引领下，福柯在论述监狱主义的著作中接受了“平民”的概念，将其视为一种被操纵之前的存在主义基底：“纯粹是者”意义上的个体，先于现代规训之控制或“主体化”的逻辑。¹ 尽管福柯小心谨慎地把“平民”变成一个全新的“不可动摇的根基”（*fundamentum inconcussum*）或本质，但是他在很多场合中将平民的地位确认为一种前概念的、本体的反抗基础。“有平民，”福柯赞叹道，“存在于身体之中、存在于灵魂之中、存在于个体

346

1 福柯早在“On Popular Justice: A Discussion with the Maoists”（1972）一文中就使用了“非无产阶级化的平民”（*non-proletarianized pleb*）的说法。

之中、存在于无产阶级之中、存在于资产阶级之中……存在于各种形式和外延之中、存在于各种能量和不可还原性之中。”这可能是一种夸大其词的主张——平民就他或她存在于权力的界限之中而言逃避权力关系，而福柯继续写道，平民为了使权力作为论战的他人（Other）的理论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¹ 福柯使用这一概念的精彩阐述出现在《规训与惩罚》中，他在这本著作中效仿了傅立叶，赞美犯罪行为是一种针对统治的社会规范的僭越形式或反抗形式。（“也许，”福柯说，“犯罪构成了一种用以证明我们社会的解放是弥足珍贵的政治手段……的确，这样一种解放如若没有犯罪就会发生吗？”）²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福柯力劝人们去多关注下层阶级与非法行为之间的相互联系、无产阶级与“城市平民”之间的相互关系。³

在声援格鲁克斯曼的时候，福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本质是扎根于这一学说的历史政治暴行之中的。马克思主义非正统的或改良主义的潮流继续抱有这样一种期望：只要马克思的思想被正确地解释，社会主义人道终究会到来。福柯热情洋溢地赞美《炉灶与食人族》是这样一本著作——认为它采取了勇敢的最后一步，断绝了与历史唯物主义漫长的合理化和自欺的关系。⁴ 福柯总结了格鲁克

347

1 Foucault, "Pouvoir et stratégies," in *Dits et écrits* 2: 420–421.

2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1979), 289.

3 Ibid., 287.

4 参见 Foucault, "La grande colère des faits," 420–421: "在我看来，格鲁克斯曼的分析避开了所有这些如此易于实践的简化形式。"

斯曼的立场，兹述如下：

某一左派的全部成员试图解释古拉格集中营……根据历史理论，或者至少是理论历史。是的，是的，曾经有大屠杀，但那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只好重读马克思或列宁，将他们与斯大林相比较，而且你们将会明白后者在什么地方误入歧途。显然所有那些死亡只是因误读造成的。可以预言的是：斯大林主义—错误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真理、马克思主义—文本背后的主要中介之一，这是我们20世纪60年代所看到的。假如你想反对斯大林，不要去听那些受害者，他们将只会叙述他们的痛苦。重读这些理论家吧，他们将告诉你关于事实的真相。¹

新哲学家们在另一个重要意义上也是福柯的思想传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基础是福柯的“权力—知识”的二分体：知识（而非像哲学家所论证的那样是解放我们的某种东西）自身是权力形式的观念；没有知识形式是无功利的或价值中立的论点；相反，所有深刻的见解都与权力关系的生产和维持有关。当然，福柯的这一立场来源于他对尼采的批判性阅读，尼采曾众所周知地揭露了“强力意志”的本质，这种“强力意志”朝向所有所谓的知识或真理的公正主张。在《主

1 参见 Foucault, “La grande colère des faits”。关于“索尔仁尼琴影响”的精彩论述，参见 Grémion, *Paris-Prague*。

人思想家》一书中，格鲁克斯曼将这一论证发挥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境地，甚至暗示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集中营体现了西方知识分子传统的潜在目的。他似乎要从这种过于简单的、谴责的冗长叙述中驱逐的仅有形象是苏格拉底和拉伯雷——当然还有福柯，他把“规训社会”视为一种“温柔的极权主义”（soft totalitarianism）表现的描述在格鲁克斯曼的叙述中尤为突出。（东方有古拉格集中营，但是西方专攻“正确训练的手段”。）问题在于，通过将他们的思考转换到“权力”和“力量”的策略性平面上，格鲁克斯曼等新哲学家们放弃了理性领域和哲学论证。理性被简化为理论控制之意志的表现——正如福柯的“求知意志”（la volonté à savoir）的说法一样——并且“真理”只成为权力关系或“利益”的意识形态装饰而已。¹一言以蔽之，一旦人们将理性和智力活动贬低为内在压抑的东西，人们就抛弃了可以用来彻底想清楚政治和历史的现在的种种问题的唯一方法。

雅克·拉康的理论对新哲学家们产生了另外一种重要影响。在后五月时期，一种观点认为，不管人们怎么努力，都不可能逃避主人的话语。换言之，放弃一切希望，汝等进入“象征界”，或者进入语言。不可能避开这样一种事实：话语本身只是一种没有“外部”或“逃避”的“统治机制”（mechanism of domination）。拉康在一篇 1969 年的谈话中服服帖帖地宣布道：“革命抱负只是一种可以想象的议题而已，总是主人的话语。那是经验已经证明的。你们，作为革命分子，

1 参见 Jacques Bouvresse 的敏锐批评，*Le philosophe chez les autophages*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84), 44, 89。

所渴求的是主人。你们将会有个主人！”¹ 拉康的语言观点，如同滤掉了自我形成或“个体发生”的排除机制一样，本质上是一种“话语监狱”（discursive penitentiary），这与福柯对语言作为“话语政体”或“知识图式”的压抑功能的批判观点是一致的。（这两种方法所忽略的是一种“言语行为”自律性或独创性的理论，“言语行为”通过其表达能力具有了逃离结构的严格限制的能力。）因此，由前毛主义者克里斯蒂安·让贝和居伊·拉尔德罗执笔的天国基督徒的小册子《天使》（*L'Ange*）广为流传，这证明了根据语言、历史和政治的“堕落”状态，“超验性”仍旧是唯一的选择。这一选择是清晰明了的：或者斯大林，或者圣女贞德（Joan of Arc），找不到折中办法。

349

那些与新哲学家们观点不一致的人被唐突地贬为“主人审查官”（*maître-censeur*）。² 因此，在他们为人权进行辩护的过程中新哲学家们显露了一种不容批评的态度，而这种批评在许多方面折射出他们早期的、亲华倾向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福柯具有天生的反斯大林主义倾向，但是恰恰他在一切尘埃落定之时继承了萨特的衣钵，成为法国典型的介入型知识分子。同样，后极权时代的介入诉求授权回归以伏尔

1 Lacan, “Impromptu at Vincennes,” in *Television* (New York: Norton, 1978), 126. 公平地讲，拉康的评论同样是对自我形成（“个体发生”）的压抑功能的批判，他把这一点写入了著名论文《镜像阶段》（*Mirror Stage*）之中，就像拉康的评论是对象征界的控诉一样。

2 参见 Bernard-Henri Lévy, “La réponse aux maîtres-censeurs,” *Le Nouvel Observateur*, June 27, 1977.

泰、雨果和左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伦理的使命。¹1978 年，弗朗索瓦·弗雷宣告：“法国大革命结束了。”²随之，先知知识分子——善于展望人类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的政治洞察者——消逝了。普遍知识分子从其灰烬中再度重生。

1 关于这一点，参见 Bourq 的杰作，*From Revolution to Ethics*。

2 François Furet,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Elborg For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

不可能的遗产：从文化革命到结社民主

反对国家机器的斗争被实现，不再以政治权利或工人权利的名义，而是为了支持所有人选择生活的权利……经常被称为**工人自治**。政治行动无孔不入：它进入健康管理、性征、教育和能量生产……**社会中心**燃烧着社会运动的熊熊烈火。

——阿兰·图海纳，《声音与眼睛》

在“五月风暴”令人愉悦的一个月里，“治安武装力量”设法阻止春天的骚动涌入夏日的暴乱。中断庆祝的人群离开了街道，分散到大学、高中、工厂和法国被遗忘的贫民区。到处弥漫着南特校园的氛围。政治冒险的癖好回到了西方……它将成为即将到来的激烈斗争的开端。

——贝尔纳·库什内、米歇尔-安托万·比尔尼耶，

《野蛮的法国》

决战

351

1972 年，一场决定性的危机——在许多方面是“致命的一击”——降临到“无产阶级左翼”。自从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1966 年成立以来，毛主义者就以一种与被殖民的、被压迫的人民团结一致的姿态坚定地支持巴勒斯坦的事业。随着 1967 年 6 月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相互支持的誓言逐渐升级。由于毛主义者的倡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团结委员会迅速蔓延到整个法国。毛主义者就其自身而言希望他们通过援用巴勒斯坦人的斗争来诱导法国广大的阿拉伯移民来支持他们自己的政治斗争。“五月风暴”后，一些“无产阶级左翼”成员去中东旅行，并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军营接受训练。1972 年，奥利维耶·罗兰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左翼”武装派别“新人民抵抗运动”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简称 PELP) 之间开始进行对话。¹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领导人艾哈迈德·贾布里勒 (Ahmed Jibril) 希望“新人民抵抗运动”负责法国的军事行动。

然而，1972 年 9 月，一切改变了，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突击队员在慕尼黑夏季奥运会上扣押 11 名以色列运动员做人质。当全世界观众惊恐地观看电视时，这些运动员在德国救援失败的过程中被杀害。

1 参见 Bourseiller, *Maoïstes*, 225; 罗兰富有启迪意义的小说化回忆录《纸老虎》(*Tigre en papier*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2])。

以色列奥运会运动员惨遭谋杀意味着一个妄想不可挽回的特定时刻，左倾主义的政治未来令这种妄想陷入了武装斗争。自此以后，英勇的城市游击队员的形象最终丧失了荣耀。

如前所述，《人民事业报》9月14日那一期报道谴责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攻击以色列平民。“无产阶级左翼”的坚定立场与《太凯尔》团体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利用这次机会宣称他们永远与巴勒斯坦的事业休戚相关。通过杀害犹太人（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重现了现代反犹主义的逻辑。这一事件的骇人本质因下列事实而被放大了：攻击出现在德国境内，距离达豪集中营只有几里地。

对于毛主义者来说，慕尼黑事件紧随其他两个重要的政治挫折而来：一个事件是1972年2月雷诺汽车厂抗议行动中发生的皮埃尔·奥维尼谋杀案（杀害皮埃尔·奥维尼的凶手，一名雷诺汽车厂保安队成员，被判以4年监禁，不过8个月后就释放了）；另一个是布鲁亚安纳特瓦事件，在这一事件的余波中，法国毛主义的政治错误路线——福柯和萨特等“民主人士”与“无产阶级左翼”普通成员之间，维克多等“大众司法”的无情信徒与法国毛主义比较节制的“力比多”派系之间——完全暴露无遗。

但是，存在着慕尼黑事件在毛主义者中间引起深思和厌恶的另一个方面。“无产阶级左翼”领导层——阿兰·热斯马尔、安德烈·格鲁克斯曼、蒂耶诺·格兰巴克、本尼·莱维（皮埃尔·维克多）、托尼·莱维和丹尼尔·兰哈德——大多都是犹太人。尽管如此，他们是典型的“非犹太教的犹太人”，也就是被同化的、没有自我认同为

犹太教的犹太人。几乎所有人都接受过微不足道的宗教训练，拥有比较有限的犹太文化归属感。然而，慕尼黑大屠杀触发了长久被压抑的、左派集体心理的宗教维度。在五月学生造反的四个重要领导人——科恩-邦迪、阿兰·热斯马尔、阿兰·克礼文和雅克·索瓦热奥——中，其中三位是犹太人，这几乎不可能是偶然的。（索瓦热奥，法国学生联盟副主席，是个例外。）

大屠杀之后，法国犹太人逐渐怀疑共和主义者主张文化同化主义的、“移民变成法国人”的公民权模式，并且想知道他们究竟是不是被完全接受为法国人。这类怀疑引发了对法国归属感之优点与整个法国社会的更加普遍的担忧；当一切尘埃落定之时，同化难道只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剥夺了法国犹太人的犹太身份的诡计吗？许多犹太人私底下怀疑法国自从维希政权暗中进行的种族法律被实施以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真正的改变。¹ 很多左派分子自认为是抵抗运动成员，这证明维希政权的遗产、叛国通敌罪和可耻的放逐犹太人仍如此有力地残留在二战后法国青年人、尤其是犹太青年人中间。这些记忆永远铭刻在法国青年积极分子的政治无意识之中。按照标准的、对纳粹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正是德国工业家为了镇压左派才顺利地让希特勒夺权。从这一观点来看，法国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统治星座难道真的完全不同于德国 1933 年存在的统治星座吗？通过与抵抗运动保持高度一致，犹太左派分子正试图在很多方面去赢得他们父母那代人

353

1 参见 Paxton and Marrus, *Vichy France*。

输掉的反法西斯斗争。

左翼激进主义的编年史家经常会问为什么恰恰是左派分子在德国和意大利越过了界限去从事恐怖行动，而在法国，尽管左倾主义盛行，相似的趋势却遭到了牵制。¹ 在法国，毛主义者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献身革命主义的目标变得多么不现实。这场运动的工人阶级基础没有扩大，这与马克思主义革命教义问答的一条基本原理相矛盾。实际上，法国工人阶级正在缩小，而白领阶层和服务业人员逐渐增长。法国重要的工会似乎非常高兴地接受工资增长和工作条件的改善。革命是他们最不想做的事情。从工人的角度看，当集体谈判的策略是如此地成功时，为什么还要从事危险的、暴力政治斗争的边缘政策呢？对左派分子间歇期的主要讽刺之一就是，尽管经济上有特权的学生激进分子越来越认同工人阶级，但是法国工人的主要目标是加入到中产阶级的行列。

历史与国家政治文化的差异在影响各种左翼团体的恐怖主义潜能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人们禁不住对这一事实惊讶不已：在极左派屈从于恐怖主义的两个事例（德国和意大利）中，上述国家已经被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历史危及了声誉。在这两个事例中，被征服的法西斯政体与它们的议会继承者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连续性要素。

法西斯主义历史的在场在一些关键性的方面上影响了政治观念。

¹ 例如，参见 Sommier, *La violence politique*。亦参见 Varon 在《把战争带回家》（*Bringing the War Home*）一书中对德国“红军派”和美国“气象员派”（*American Weathermen*）所做的重要比较。

它阻碍了节制，并助长了一种政治极端主义的文化。它滋养了这样的信念——自由主义的建制长期以来是脆弱的——因此不能遏制法西斯主义的复发。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德国，法西斯主义出现于混乱而无能的自由主义政体之后。意大利的“红色旅”（Red Brigades）和德国的“红军派”都接受（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是天然的政治盟友。因此，这两个团体接受了这样的策略：他们试图通过暴力挑衅来“揭露”国家的法西斯本性，这一实践最终变成一个自身应验的预言，因为面对暴力反抗时，国家唯一的选择经常是以牙还牙。

意大利和德国都是“姗姗来迟的国家”（belated nations）。在这两个事例中，政治统一迟迟才出现：意大利在1861年实现了统一，而德国在1871年完成了统一。这两个国家都没有丰富的民主政治制度的经验。因此，当法西斯主义政体最终崩溃于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可资利用的、适用的政治过去。它们从它们与政治独裁者的流血冲突中得到的教训在很大程度上是否定性的。

相反，法国拥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历史。毕竟它是民主共和主义的诞生地。第三共和国（1871—1940年）尽管存在着各种缺陷和困难，但自称维持了70年健康的政治连贯性。“二战”后的法国至少援用了反纳粹抵抗运动的威望。并且在面对法国1940年6月的“奇异的溃败”（M. 布洛赫）时，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Free French）努力支持法国共和主义传统的荣誉。

最后，因为学生毛主义者几乎大都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所以教育背景似乎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许多激进分子在危急时刻发

现很难简单地抛弃他们在法国人文主义经典文本方面的训练，很难去担任城市游击队员的角色。一位前毛主义者特别指出：“不管我们是否乐意承认，我们更多地是被法国大学制度塑造的。另外，我们当中大多数人仍旧全神贯注于我们在索邦大学、文科预备班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研讨课的责任。”¹当一切尘埃落定之时，对于许多学生激进分子来说，蒙田的散文证明比毛主席的红宝书更具影响力。

355

重新界定革命

“五月造反”是一个意外结果的经典案例。暴乱的形式与内容基本上是不一致的。受新兴的第三世界主义浪潮的激发，学生激进分子采用了一种革命主义的修辞方式，这种革命主义基本上与他们内心深处的、温和的、能起改造作用的目标和情感是冲突的。学生积极分子意识到俄国革命如此糟糕地失败了。这让他们多花几年的时间去认识这一事实，即他们忠实支持的全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竟如此糟糕地、或是更加糟糕地结束了。

从一开始，毛主义者就效仿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所夸耀的、受过训练的职业革命家的行为。然而，列宁的先锋队模式已经根据沙

1 Antoine Liniers, "Objections pour une prise d'armes," in Furet, Liniers, and Raynaud's *Terrorisme et démocratie*, 197. Antoine Liniers 是 Olivier Rolin 的化名，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领导了“无产阶级左翼”的“军事派”——新人民抵抗运动。文科预备班是进入“大学校”或者法国精英教育轨道的预科阶段。

俄的政治条件进行了调整，当时在沙俄这个警察国家公开地对亟需的政治改革产生影响是基本不可能的。把布尔什维克方法转移到西方民主国家意义不大，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民主多元主义的基础容许更加公开的、更受尊敬的政治论战方式。

鉴于法国政治制度在戴高乐帝王式总统制的领导下没有任何反应，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学生们可资利用的唯一修辞——法国共和主义的话语在他们眼中始终是不足信的、是被指派的。“五月风暴”期间，在堪称一绝的革命戏剧表演中，学生们重新演绎了全部造反的可能性与选择：1848 年革命、巴黎公社、1918 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喀琅施塔得海军起义。托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情境主义国际”成员相互展开激烈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兄弟般的——去赋予正在进行的事件以意义和方向。他们一致排斥的一个历史场景是 1917 年 10 月布尔什维克精心策划的攻占冬宫战役。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及其险恶的死后事件——1956 年镇压匈牙利十月事件、1968 年碾碎了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具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实验——已经令左派分子处于马列主义危险之中。值得表扬的是，甚至他们（托派分子和毛主义者）中间坚定的新列宁主义者也反对这种起义的方法。

在“五月风暴”的余波中，法国的“政治”边界被永久地扩展了。左倾主义突破了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的界限。¹“五月风暴”期间，学生们强调“无聊是反革命的”。那么，左派盲目迷恋从罗伯斯庇尔到

1 一些重要的先例，参见 Gombin, *Origins of Modern Leftism*。

斯大林再到毛泽东这一主导西方革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等级与纪律，难道不可以这么来谈论这一点吗？难道列宁的“职业革命家”只是没有把新教伦理自我牺牲的行为准则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吗？

20世纪50年代，萨特判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无法超越的视域”¹。“五月事件”驳斥了萨特的观点，演变成一个法国左派迈向反极权主义的政治感性的决定性中继站。在一小撮悔改的前毛主义者（新哲学家们）的领导下，反马克思主义变形为巴黎盛极一时的知识分子时尚。在一些场合中，萨特和福柯——的确是奇异的政治盟友——处在了殿后的位置。

在后五月时期，纯粹坚定的毛主义者缓和了他们的激情，以便融合各种自由主义的左派潮流和团体。由此，中国的文化革命修辞呈现出全新的方向和意义。“想象力当权”是1968年“五月风暴”最重要的政治口号之一。由于这一缘故，超现实主义变成一个比毛夫人（江青）或中国人民解放军领袖林彪更重要的参照点。兰波的劝告“改变人生！”似乎与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社会化的要求一样相关的，或是进一步相关的。在学生革命分子狂热的政治想象中，中国“文化大革命”密不可分地与美国“伍德斯托克国度”（Woodstock Nation）田园曲融合在一起。一位激进分子颇有见识地评论说，美国反文化运动教导“阶级斗争也是欲望表达、交流的斗争，而不仅仅是经济与政治的斗争”²。

357

1 Jean-Paul Sart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Paris: Gallimard, 1960), 9.

2 Guy Hocquenghem, "Pour une conception homosexuel du monde," in *L'après-mai des faunes* (Paris: Grasset 1974), 164.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工运中心主义焦点与这个时代的存在主义诉求不合拍。人们不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描述来对待阶级社会。相反，社会分化的力量使斗争参数分岔。多数社会阶层和派系越来越争夺权利和社会认可，从可以被看见的、可以被听见的权利着手。19 世纪无产阶级斗争的图景被粉碎了，并完全被重构了：“移民、青年人、犯人、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每一个被排除的人、所有‘全世界受苦的人’、所有处于社会边缘的人，都变成了革命关注的目标。”¹ 激发这些群体积极性的主要议题是以日常生活问题为中心。学生激进分子及其追随者试图重新发现自我实现这样一个社会中的意义：“闲暇时间”越来越被大型组织（国家官僚机构、广告集团、大众文化巨头和跨国公司）令人厌恶的联盟支配了。因此，斗争的场所从经济与再分配问题转向了“符号统治”或者文化的领域。联合起来的个体试图捍卫他们面对公司主导的文化管理之逻辑的各种生活方式的完整性。² 事后看来，“五月运动”意味着一种从一系列相异的、他律的力量中夺回日常生活节点的努力。就其自身而言，它意味着一种逆转“内在殖民化”的加速过程的初步尝试。³

1 Picq, *Libération des femmes*, 50.

2 关于这一主题的经典论文，参见 Adorno, “Culture and Administration,” in *Culture Industry*, 107-131。

3 关于这一点，参见 Jürgen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因此，在“五月风暴”的余波中，解放的观念被改变了。它与公民或政治的解放、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目标不再是同义的。根据当代政治斗争实践，解放的这种构想似乎极具限制性。自由主义忽视了人类特殊性的本质，即我们作为个体的地位，而这样的个体具有高度特殊的、非同一般的需求。“六八分子”开始质问就大范围的社会支持者而言来谈论解放将意味着什么，这些支持者有妇女、同性恋者、移民、下层阶级，其群体特殊的政治需求和政治关注也被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普遍化框架的强调而被忽略了，这种普遍化框架单方面地把社会冲突化约为劳动者与资本的对立。

自此以后，激进政治强调本真性与自我实现的理想。因此，政治自由的意义急剧扩大了。这种社会论战的新逻辑的必要组成部分需要创造可供选择的话语和空间：一个类似的城邦或公民社会。这些地带在有益地清除交换关系或商品社会的具体效果的过程中维持下来。相对于一个被“死亡与无聊”主导的现代文明而言，主导后五月时期的文化革命分子努力促生了一个以自我肯定和力比多满足为特点的未来社会。

19世纪的革命分子坚守街垒。在“五月暴动”期间，学生激进分子反而去夺取“畅所欲言的权利”（right to speak out），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五月风暴”期间流行的一幅涂鸦画背后所隐藏的心理状态：“我有话要说，我真不知道它是什么。”¹“五月造反”无法预料的（或许是

1 参见 Certeau,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不可预料的) 结果之一就是那些以前处于社会外围的边缘群体突然索要发言权和被倾听的权利。

359

对于欧洲和美国的保守派而言, 1968 年的合法性丧失始终是一个建立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可信性以及主导地位的关键问题。2002 年, 法国财政部长尼古拉·萨科奇将“五月造反”贬低为一个传统价值丧失意义、权利优先于责任与义务、对权威尊重急剧下降的时代。¹ 前左派分子们因对“五月风暴”所预示的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没有实现而深感失望, 他们加入喋喋不休的反对者和诋毁者的行列。在他们看来, 通过消除权威与传统的阻碍, “五月风暴”的最终结果就是要尊崇一种占有性个人主义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的文化。反文化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在商业上被重构, 以便适应消费社会的目的。

“五月造反”不朽的教训之一关系到法国政治文化的本质。“五月起义”体现了一种对法国长期存在的、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模式的彻底抛弃, 人们可以将这种政治模式追溯到路易十四的绝对统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相同的中央集权和等级制的组织心态决定并涵盖了法国占主导地位的后革命政治形式: 雅各宾主义、共和主义和共产主义。通过谴责中央集权制度 (étatisme), “六八分子”努力培育和发展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鄙视自上而下的雅各宾派模式, 支持一种强调直接民主与地方自治之价值的方法。² “六八分子” (soixante-

1 引自“Faut-il rompre avec l'esprit de 1968?” *Le Monde*, May 19, 2002。

2 参见 Rosanvallon 和 Viveret 的经典研究《为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Pour une nouvelle culture politique*)。

huitard) 不再认为国家能力是一剂万灵药。他们不容许他们的要求和关注被常规的政治机制和程序所改变：竞选活动、议会、工会等等。他们反而实验了一种自力更生的新精神，努力去创造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扎根于地方的文化形式和政治形式，以及以社会自我组织的观念达到鼎盛时期的各种尝试。假如极权主义被政治领域定义为对社会的全盘同化，那么社会领域的后五月复兴是一项坚决的反极权主义事业。

当一切尘埃落定之时，一位研究五月事件的历史学家恰当地总结了这些发展，正是“五月造反”的“文化时刻”最终赢得了胜利：

360

社会风俗方面的革命实现了……还有日常生活的革命。先前僵化的社会关系消失了，象征性的等级制度松懈了……一种缓和的氛围弥漫于车间和家庭的关系中间；纪律少了一些严厉性，行为规则不那么严格了。对身体的控制——一项宗教的小资产阶级道德的遗产——松懈了，由此赋予欲望前所未有的自由度……知识分子、名流、医生、牧师、律师和法官的传统权威性遭到了一致性的质疑，并逐渐消失了。“对话”与“共识”在当权者中间变成了新型的暗语。直接性的指令、无可争辩的命令和独断专横的指示逐渐地被丢弃到历史的垃圾箱。在这一意义上，“五月造反”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五月风暴”不是一场不成功的革命，而是一场伟大的“改良主义的造反”、一场具有民主精神的起义……

而且，它就以这样的方式成功了。¹

结社民主政治

“五月运动”不朽的遗产之一是重建法国的社团生活，因为它刺激了一场对法国长期存在的政治集权传统的大逆转。²“五月起义”及其随之而来的新型社会运动成功地改变了法国人理解社会的方式。社会不再被贬低为国家管理的被动对象，它反而被视为一个积极行使公民权的场所，一个集体意志形成、社交活动、身份建构与政治参与的领域。法国共和国传统因袭的纵坐标沿着水平线被重新校准。³在

361 许多方面，以身份为导向的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解放等社会运动只是冰山一角。后五月时期见证了五花八门的自助性社团、人权组织和公民创造权的激增。这种前所未有的公民社会非营利部分的扩张改变了法国政治行动主义的本质和范围。生态学[“地球之友”(Les amis de la terre)、“绿色家园”(Les verts)]、“无国界主义”[“无国界医生组织”，随后是无国界药剂师组织(Pharmacists without Borders)、无国界兽医组织(Veterinarians without Borders)、无国界农学家组织(Agronomists without Borders)和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1 Joffrin, *Mai '68*, 319–320, 321–322.

2 例如参见 Levy, *Tocqueville's Revenge*, and Schmidt, *Democratizing France*。

3 法国共和主义的另一种观点强调了其社团基础，关于这一点，参见 Nord, *Republican Moment*。

Borders)]、反核武器主义、移民权利辩护移民劳工保护协会联盟 (Fédération des associations de soutien aux travailleurs immigrés, 简称 FASTI) 和区域自治运动也从这个时期开启了。¹ 正如玛蒂娜·巴尔迪勒米 (Martine Barthélemy) 在《参与的新时代》(The New Age of Participation) 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 “社团活力扎根于日常生活”——街坊、城市街道、地方礼堂——变成“有特权的论战场所……(它)恰当地援用了‘五月风暴’的精神”²。

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 托克维尔众所周知地比较了法国虚弱的社团能力与美国社团生活充满活力的特点。

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 不论处于什么地位, 不论志趣是什么, 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而且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既有宗教团体, 又有道德团体; 既有十分认真的团体, 又有非常无聊的团体; 既有非常一般的团体, 又有非常特殊的团体; 既有规模庞大的团体, 又有规模甚小的团体……只要美国的居民有人提出一个打算向世人推广的思想或意见, 他就会立即去寻找同道; 而一旦找到了同道, 他们就要组织社团。社团成立之后, 他们就不再是孤立的个人, 而是一个远处的人也可以知道和行动将被人们仿效的力量。这个力量

1 参见 Belorgey, *Cent ans de vie associative*, 34-35。关于这些运动的详细调查, 参见 Crettiez and Sommier, eds., *La France rebelle*。

2 Barthélemy, *Associations*, 75。

能够发表意见，人们也会倾听它的意见。¹

但是，依据最新的迹象判断，《论美国的民主》作者所辨认出来的趋势似乎经历了一次逆转。尽管近年来美国人越来越被视为“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但是1970年到2000年，法国新社团的数量以300%增长。20世纪60年代，每年平均建立2万个新社团，而自从那以后，新社团的数量每年激增到6万个。在《自由的诉求》（*The Demands of Liberty*）一书中，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解释法国社团生活的转变是后五月时期的一项基本遗产：“20世纪50年代，每年建立5000个新社团；20世纪60年代，每年建立2万个新社团；20世纪70年代，每年建立25000个新社团；20世纪80年代，每年建立4万个新社团；20世纪90年代，每年建立6万个新社团；2001年，每年建立68000个新社团。”“增长，”罗桑瓦隆说，“是成指数的，它没有放慢速度。”²当法国举行1901年《结社章程法》批准的100周年庆祝会时，据估计有2000万人（40%的成年人）是一个或多个社团的成员。

社团生活的扩张反映了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更显著的转变：

1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513, 516. [译文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35、639页。——中译注]

2 Rosanvallon, *Demands of Liberty*, 261. 关于美国社团生活衰落的研究，参见 Robert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从乡村向城市的持续移居、与福特主义（Fordism）消亡相对应的工会成员人数的减少、白领专业人员及“中层管理人员”（新管理阶层）的增加和高等教育的民主化，由此导致普通民众的文化提高。不足为奇的是，促使法国近期社团繁荣的普通成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前六八分子”和所谓的新中产阶级组成的：教师、专业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咨询工作者（information workers）等。一般来说，这种趋势反映了社会行动主义的新方式或新记录，分析者曾以“新的社会公民权”为标题描述过这种新方式或新记录：一种新人道主义的意识（关系到剥夺社会群体权力的公民责任）和一种政治参与方式（显然不同于资产阶级普遍主义的公民权理想，也不同于以无产阶级或无阶级社会为名义的传统左翼战斗精神）。

363

新型的社会行动主义也预示了“新个人主义”（new individualism）的兴起。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共和主义者都立即将这一现象贬低为对传统左派的普遍主义框架的摒弃，以支持一种不落俗套的、孤芳自赏的自我崇拜。然而，这种冷嘲热讽的描述仅仅讲述了部分实情，因为新个人主义与先赋性的阶级联系的松散进程相一致，同时预示着个体自主权的膨胀。文化归属感不再执拗地被地点、家庭、地位和阶级的关系预先决定。如今的男男女女反而能够在社会、文化、地理和职业上以更加自主的、自我指向的方式“使自身个体化”——以建立独一无二的、自主选择的身份。这一趋势允许开阔的、丰富的人格结构，允许一种在更加传统的状况或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实现的转变。

自我个体化的这类新技巧不只是否定性的。它们在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所强调的肯定意义上证明“个人主义”：道德自

律的增强，与个人选择、参与和体验的增强的前景相一致。此外，既然“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在意识形态上试图塑造人格结构，那么“对自我的作用”（work on the self）对闪避内摄的或内在化的统治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作为“五月运动”反极权主义的一项重要遗产，新个人主义与后五月时期繁荣的新人道主义有关——例如各种“无国界”团体。¹ 内在导向性不必转化为对社会参与的摒弃。在法国，它的出现充当了社交活动形式与政治参与模式之建构性突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364

社团的“震撼力量”证明是如此地具有诱惑力的，以至于法国政治精英努力追捧它。在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1974 年总统竞选成功后不久，他听起来就像一个稳健的“六八分子”一样大声宣布：“多元化国家意味着：权力掌握在公民手中。那意味着：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他们要理解他们的多样性和复杂现实、理解他们的差异权利和基本平等。”² 1977 年，社会党与前“统一社会党”工人自治派系联盟，结交米歇尔·罗卡尔和法国左翼天主教民主工会。罗卡尔的追随者以“第二左派”（la deuxième gauche）著称，他们坚决地反对共产主义，是反雅各宾派的分子，他们容忍市场，他们对地方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复兴的态度上是“托克维尔式的”（Tocquevillian）。1983 年，社会党创立了“全国社团生活会议”（Conseil national de la vie associative），

1 参见 Etienne Schweisguth, “La montée des valeurs individualistes,” *Futuribles* 200 (July–August 1995)。

2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Démocratie française* (Paris: Fayard, 1976), 167.

以便维持和增强前十年出现的政治分权和基层社交的趋势。1988年，密特朗第二次当选总统后，罗卡尔被任命为总理。他鲁莽地宣布他想调和“政治行动与日常生活、国家与公民社会”¹。

“五月造反”的批评者挑剔主要参与者不负社会责任。政治左派的诽谤者经常要比右派批评者少一些宽容精神，因为他们谴责学生积极分子是革命“演戏”。我们被告知的是学生们鲁莽地以革命纪律交换狄奥尼索斯狂欢的诱惑。索邦大学的学生公社只是一个“1789年的社会青少年公社”(socio-juvenile 1789)²。与学生激进分子相关的问题是他们效仿了安德烈·布勒东，而不是列宁；他们尊崇《超现实主义宣言》，而不是《共产主义宣言》。因此，他们混淆了革命欲望(desire for revolution)与“欲望革命”(revolution of desire)。“光辉三十年”的丰裕成果是，学生激进分子希望看到“想象力当权”。结果是他们终结了一场想象的革命(imaginary revolution)。一场总计900万人的大罢工——法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蜕变为文化革命的娱乐性自我专注与一代人的自我陶醉，也就不足为怪了。大势已去，当时政治上的左倾主义在后五月时期陷入了文化上的左倾

365

1 引自 Barthélemy, *Associations*, 92。罗卡尔担任总理到1991年。关于“第二左派”的历史，参见 Hervé Hamon and Patrick Rotman, *La deuxième gauche: Histoire intellectuelle et politique de la CFDT*(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4)。亦参见 Donzelot, *Invention du social*。

2 参见 Morin, “La commune étudiante,” in *Brèche*, 26–27, 亦参见 Henri Lefebvre, *The Explosion: Marx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Sacha Rabinovitc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和 Le Goff, *Mai 68*, 470–472。

主义——一种法国左派从未从中恢复的误入歧途。在法国研究“五月事件”的主导性历史学家让-皮埃尔·勒高夫看来，“五月风暴”的继承者推动了

一种妨碍视界的、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黑暗视觉”（black vision）；（他们）倡导一种宁可不去面对诸种可能性而做出选择的“大拒绝”。对自我作为文化继承人的过高估计和历史……滥用了批判精神，并且向他人敞开的机会，同时更喜欢懦弱的“英国风格”（angelicism）……“世界公民”。不管是含蓄的还是明确的，（大拒绝的）“不”不再被原初的“是”、积极的肯定支持；它指向自身就足够了。最初的、连接我们与世界的信任关系被中断了，由此需要一种病态的思想与行动的麻痹、一种自我毁坏的逻辑。¹

尽管这样一些指责可能包含事实的核心，但是从“五月起义”更广泛的遗产与成就的背景来看时，它们代表了一种错误识别或错误估计的古典立场。它们暴露了左翼超我的挫败，这种左翼超我不能使其乌托邦的政治期待与“五月造反”较为谦恭的、改良主义的政治遗产协调一致。

20 世纪 80 年代，虽然有某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 [“紧急反种族

1 Le Goff, *Mai 68*, 474.

主义组织”（SOS racism）和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ACT UP）]，但是基层政治行动主义减弱了。随着社会党掌权，对体制改革的传统方法的信心增强了。只有到了20世纪90年代，“五月起义”的社会论战的遗产才开始取得真正的成果。正是在那个时候，后五月时期兴盛的“运动”政治策略——这一政治策略故意避开选举政治与工会的常规的体制性渠道——再度发挥威力。

“五月造反”开启了一系列使法国道德习俗和社交模式发生永久性改变的文化政治策略。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运动预示了一种新人道主义，人们将其描述为一种新的“社会意识的政治策略”（politics of social conscience）。这些运动绕过了群体认同的问题——人们将其定义为“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因为这些斗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多都获得了胜利。而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运动以所谓的改进型经济权利与社会权利为目标。他们以合理的“社会最低保障”的观念为中心团结起来，同时声称：“不允许有人饿死在街道上”和“每个公民应该能满足他或她的基本需要”。他们试图突出第五共和国平等主义的政治理想与其惹人注意的事实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就其本身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运动聚焦于社会“排除”的议题，聚焦于与法国下层阶级日益增长的贫困化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一个全球化和新自由放任主义（neo-laissez-faire）的时代中变得尤为尖锐，因为“光辉三十年”构建的社会保障体系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这场运动主要的知识施惠者是皮埃尔·布迪厄，他在其重要著作《世界的苦难》（*La misère du monde*）一书中记录了社会苦

难的新条件。¹

367 针对法国的革命传统,20 世纪 90 年代的社会运动经常被称为“无的革命”(la Révolution des sans)——那些被排除者或“那些一无所有者”(those without)的革命。在主要参与者中间,“无身份证件的人”(sans papiers)、“无工作的人”(sans emploi)和“无家可归的人”(sansabri)特别引人注目:非法移民、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他们的抗议活动纷纷促成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组织和施压团体(pressure groups),如“住房权运动组织”(Droit au logement,简称DAL)、“一起行动,反对失业!”运动组织(Agir ensemble contre le chômage!,简称AC!)和“权力优先!”运动组织(Droits devant!)。1995 年“住房权运动组织”的开启行动就是占领一座闲置的公寓大楼,它位于巴黎时尚的圣日耳曼德佩地区(Saint-Germain-des-Près)中心的德拉贡街上,组织者将这座大楼变成一个“团结一致的积极空间”²。“住房权运动组织”积极分子的目标不是提供救济品或救济金,而是促使巴黎无家可归的市民组织起来。在这一点上,这些激进分子是

1 Bourdieu, *Misère du monde*。亦参见 Pierre Rosanvallon, *The New Social Ques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与 Jean-Philippe Mathy, “The Prophetic Exigency: Zola, Bourdieu and the Memory of Dreyfusism,” *Contemporary French Civilization* 24 (2) (Summer-Fall 2000): 321-340。

2 关于“住房权运动组织”,参见 Waters, *Social Movements in France*, 126-127。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反排除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平等主张之间的关系,参见 Jacques Ghilhaumou, *La parole des sans: Les mouvements actuels à l'épreuv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Fontenay: Feuillet, 1998)。

相当成功的：他们能够为巴黎地区大约 3000 个家庭找到庇护之处。此外，他们的行动有助于促成重要法规的通过，例如 1998 年通过的反排斥法案。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一起行动，反对失业！”运动组织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当时，失业率已经达到了长期难以根除的比例。差不多 12% 的失业率，这是自经济大萧条时代以来最高水平。40% 的失业者在两年或更长时间内找不到工作。失业从一种偶发状态变成了一种固定的、长期的状况。更糟糕的是，许多长期的失业者或是移民，或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或者两者兼有，因此缺乏打破社会排斥连同贫困的循环所必需的文化资源。

此前，失业者曾是一个“不可见的阶级”，它的成员既缺乏政治代表又缺乏工会代表。一般说来，工会犹豫不决地支持他们的事业，以免工作者丢掉工作。不是去给失业者提供可提高的临时利益，“一起行动，反对失业！”运动组织的积极分子帮助他们去理解自我组织的优点。1997—1998 年冬天的抗议行动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第一次表明失业者通过游说议员认识一个截然不同的、具有可以确认的政治目标的选民群体，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动员起来，去挑战他们的边缘地位。由此，他们成功地从社会可见性领域的阴影中浮现出来。不久，“一起行动，反对失业！”运动组织所发起的抗议行动变成了一场全欧洲的运动。1996 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佛罗伦萨举行，随后就发生了遍及欧洲的抗议活动，最后以阿姆斯特丹大约 5.5 万名示威者的抗议游行告终。在法国，抗议者接管了卢浮宫玻璃金字塔（Louvre pyramid），占领了法国的社会福利部门。

“一起行动，反对失业！”运动组织的激进分子的策略是把社会权利置于与公民政治权利同等重要的地位。实质上，他们努力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公民权的普遍模型。毕竟，社会权利的合法性在1948年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和《欧盟基本权利宪章》（*the charter of the European Union*）中都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积极分子因此强调“工作权利”，并去游说议员通过一项《欧洲充分就业法案》（*Europe of full employment*）。与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对货币联盟的片面强调和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加批判的接受相反，“一起行动，反对失业！”运动组织的积极分子试图为全欧洲的社会权利提供更强大的法律保证：健康、住房、最低收入、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利。

一般来说，“一起行动，反对失业！”运动组织的抗议活动对准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market-driven society*）的社会成本与人力成本，这样的社会轻率地忽视了下层阶级的命运。“一起行动，反对失业！”运动组织的纲领规定：“财富持续增长的同时，几百万欧洲居民生活在贫困的边缘。我们要求每个人有权获得与社会生产的财富相一致的保障收入。”¹

皮埃尔·布迪厄称法国划时代的“抗议之冬”为一个“社会奇迹”（*social miracle*）。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的那样，失业者运动：

1 AC!, *Actualisation de la "charte" d'AC!* (Paris: AC!, 1998), 17.

在一个要不然会被从社会中剥夺公民权并被边缘化的群体中间创造了一种政治行动主义的动力。他们以各种方式进行干预，重新安置被驱逐的租户、发动欧洲范围内的示威游行或满足那些失业者紧急的日常需要。他们创造了新的、可供选择的行动形式，当时常规的左翼政治活动危机重重，他们重振了地方社区内部的基层动员的活力。由于其真实的存在，他们在公民社会层面上表明正式政治领域之外的集体行动的丰富性与活力。¹

-369

受这些抗议活动的鼓舞，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邀请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们到马提翁大厦（Matignon，总理的官邸）讨论他们的要求。当形势明朗时，“一起行动，反对失业！”运动组织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特许权：（1）一笔新注入的资金，以弥补长期失业造成的经济负担；（2）常驻代表到一些关键性的、负责监督失业者命运的政府委员会；（3）颁布一项反对社会排斥的新法规，这项法规于1998年7月通过。“一起行动，反对失业！”运动组织施加的压力以及一些社团群体施加的压力，也在影响若斯潘的决定（采纳35个小时的周工作时间作为一种创造更多工作职位的手段）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这些团体使用的超越国民议会斗争的方法与新的源自于“五月起

1 Waters, *Social Movements in France*, 118-119.

义”的“社会意识的政治策略”联系在一起。¹由此，一种新的社会公民权的观念最终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它成为“五月运动”最具决定性的政治遗产之一。在这种背景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法国最持久的、最著名的人道主义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由当时的外交部长贝尔纳·库什内创建的——是“五月运动”的直接结果。²

“五月造反”关键性的政治进步之一是其以非传统的方式来察觉统治的能力。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们理解了权力机制与权力形态在质的方面扩大了。这些不再等同于或化约为国家镇压或资本主义的负面效果。相反，在一个“景观社会”中间，权力的触角到处延伸，以致权力能够渗透到国家最深层的隐秘之处。在这一点上，监狱信息小组（由 370 与“革命万岁！”有关的毛主义激进分子于 1971 年创建）基层的、策略上的革新证明是具有典型特色的，因为监狱信息小组的积极分子成功地使毛主义者的“群众路线”的民粹主义理想适应了参与型民主政治的目标。这意味着放弃了政治先锋队主义的过时模式，以支持“社会的自组织”，在这种情形下，犯人遵照监狱信息小组的模式和本着 20 世纪 60 年代自我管理的精神变成自己事业的组织者和代言人。从此，“五月造反”的乌托邦式的政治希望被带回现实，并被再次指向民主公民权的理想。

1 Crettiez and Sommier, eds., *La France rebelle*; 尤其参见关于“作为转折点的 1968”（le tournant 1968）讨论，第 17–18 页。

2 参见 Kouchner, *Malheurs des autres*。

参考文献

- Adorno, Theodor.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371
- Afary, Janet, and Kevin Anderson. *Foucault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 Althusser, Louis. *L'avenir dure longtemps; suivi de "Les faits."* Paris: Stock/IMEC, 1992.
- . *For Marx*.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69.
- . *The Future Lasts Forever*. Translated by Richard Veasey. New York: New Press, 1993.
- Aron, Raymond. *The Elusive Revolution: Anatomy of a Student Revolt*. Translated by Gordon Clough.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69.
- .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Norton, 1962.
- Aronson, Ronald. *Camus and Sartre: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and the Quarrel That Ended I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 . *Jean-Paul Sartre: Philosophy in the World*. London: Verso, 1980.
- Auron, Yair. *Les juifs de l'extrême gauche en mai '68*. Paris: Albin Michel, 1998.
- Badiou, Alain. *The Century*. Translated by Alberto Toscano.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2007.
- . *Ethics: An Essa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vil*. New York: Verso, 2001.

- . *Infinite Thought: Truth and the Return to Philosophy*. New York: Continuum, 2005.
- . *Metapolitics*. Translated by Jason Barker. New York: Verso, 2005.
- . "Roads to Renegacy: Interview by Eric Hazan." *New Left Review* 53 (September–October 2008): 125–33.
- . *Théorie du sujet*.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2.
- Barker, Jason. *Alain Badiou: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Steinberg, VA: Pluto Press, 2002.
- Barthélemy, Martine. *Associations: Un nouvel âge de participation*. Paris: Presse de Sciences Po, 2000.
- Barthes, Roland. *Critical Essays*.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2.
- . *Criticism and Truth*. Translated by Katrine P. Keunem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7.
- Belorgey, Michel. *Cent ans de vie associativ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00.
- Benda, Julien. *La trahison des clercs*. Paris: Grasset, 1927.
- Bensaid, Daniel, and Henri Weber. *Mai 1968: Une répétition générale*. Paris: Maspero, 1968.
- Berman, Paul. *A Tale of Two Utopias: The Political Journey of the Generation of 1968*. New York: Norton, 1996.
- Berstein, Serge. *The Republic of de Gaulle*. Translated by Peter Morr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Bloch, Ernst. *Geist der Utop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4.
- Boisseau, Antoine de. *Pour servir le générale, 1940–1970*. Paris: Plon, 1976.
- Bosteels, Bruno. "Post-Maoism: Badiou and Politics." *Positions* 13 (3) (2005).
- Bourdieu, Pierre. *La misère du mond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3.
- Bourdieu, Pierre,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Les héritiers: Les étudiants et la cultur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66.
- Bourg, Julian. *From Revolution to Ethics: May '68 and Contemporary French Thought*. Montrea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 Bourseiller, Christophe. *Les maoïstes: La folle histoire des gardes rouges français*. Paris: Plon, 1996.

- Bouscasse, Sylvie, and Denis Bourgeois. *Faut-il brûler les nouveaux philosophes: Le dossier du "procès."* Paris: Nouvelles Editions Oswald, 1978.
- Castoriadis, Cornelius. *Philosophy, Politics, Autonomy: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by David Ames Curt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Castro, Roland. 1989. Paris: Barrault, 1984.
- Caute, David. *The Fellow Travelers: A Post-Script to the Enlightenment.*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3.
- . *The Year of the Barricades: A Journey through 1968.*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8.
- Certeau, Michel de. *The Capture of Speech and Other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Lucy Girard. Translated by Tom Conle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 Chaplin, Tamara. *Turning on the Mind: French Philosophers on Televi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 Chevalier, Louis. *Laboring Classes and Dangerous Classe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Frank Jellinek.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73.
- Christofferson, Michael Scott. *French Intellectuals against the Left: The Antitotalitarian Moment of the 1970s.*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4.
- Cohen-Solal, Annie. *Sartre: A Life.* Translated by Anna Cancogni.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7.
- Cohn-Bendit, Daniel. *Nous l'avons tant aimée la révolution.* Paris: Barrault, 1986.
- Cohn-Bendit, Daniel, et al. *The French Student Revolt: The Leaders Speak.* Translated by Ben R. Brewste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8.
- Cohn-Bendit, Daniel, and Gabriel Cohn-Bendit. *Obsolete Communism: The Left Wing Alternative.* Translated by Arnold Pomeran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 Crettiez, Xavier, and Isabelle Sommier, eds. *La France rebelle.* Paris: Editions Michalon, 2002.
- Daniels, Robert. *The Year of the Heroic Guerrilla: World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19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De Beauvoir, Simone. *Adieux: A Farewell to Sartre.* Translated by Patrick O'Brie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 Debord, Guy.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New

York: Zone Books, 1994.

Debray, Régis. *Le pouvoir intellectuel en France*. Paris: Editions Ramsey, 1979.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R. Lane.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7.

Descombes, Vincent.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L. Scott-Fox and J. M. Hard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Dews, Peter. "The 'New Philosophers' and the End of Leftism." In *Radical Philosophy Reader*, edited by Roy Edgley and Richard Osborne, 361–84. London: Verso, 1985.

—. "The *Nouvelle Philosophie* and Foucault." *Economy and Society* 8 (2) (May 1979): 127–71.

Dollé, Jean-Paul. *L'insoumis: Vies et légendes de Pierre Goldmann*. Paris: Grasset, 1997.

Donzelot, Jacques. *L'invention du social: Essai sur le déclin des passions démocratiques*. Paris: Fayard, 1984.

Dosse, François.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2 vols.* Translated by Deborah Glassm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Drake, David.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in Postwar Franc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Sartre and May '68." *Sartre Studies International* 3 (1) (1987): 43–65.

Dressen, Marnix. *De l'amphi à l'établi: Les étudiants maoïstes à la usine*. Paris: Belin, 1999.

Dreyfus-Armand, Geneviève, Robert Frank, Marie-Françoise Lévy, and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eds. *Les années 68: Le temps de la contestation*. Brussels: Editions Complexe, 2000.

Duchen, Claire. *Feminism in France: From May '68 to Mitterrand*. London: Routledge, 1986.

Dumontier, Pascal. *Les situationnistes et mai '68*. Paris: Editions Gérard Lébovici, 1990.

Eagleton, Terry. *After The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Epistémion [Didier Anzieu]. *Ces idées qui ont ébranlé la France*. Paris: Fayard, 1968.

- Eribon, Didier. *Insult and the Making of the Gay Self*. Translated by Michael Luce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 *Michel Foucault*. Translated by Betsy W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Esmein, Jean.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chinois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0.
- Fanon, Frantz.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Preface by Jean-Paul Sartre. Translated by Constance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91.
- Faye, Jean-Pierre. *Commencement d'une figure en mouvement*. Paris: Editions Stock, 1980.
- Feenberg, Andrew, and Jim Freedman, eds. *When Poetry Ruled the Streets: The French May Events of 1968*. Albany: SUNY Press, 2001.
- Felman, Shoshana. *Writing and Madnes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 Ferry, Luc. 68–86: *Itinéraires de l'individu*. Paris: Gallimard, 1987.
- Ferry, Luc, and Alain Renaut. *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 An Essay on Antihumanism*. Translated by Mary S. Cattani.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0.
- Ffrench, Patrick. *The Time of Theory: A History of Tel Quel (1960–198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Fields, A. Belden. *Trotskyism and Maois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utonomedia, 1988.
- Finkielkraut, Alain. *The Imaginary Jew*. Translated by Kevin O'Neill and David Suchoff.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4.
- Forest, Philippe. *L'histoire de Tel Quel*.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93.
- Foucault, Michel. *Dits et écrits*. Edited by Daniel Defert and François Ewald. 2 vols. Paris: Gallimard, 2001.
- .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Vintage 1965.
- .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Translated by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Pantheon, 1971.
- .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ited by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Publishers, 1980.
- . *Remarks on 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 Trombadori*. New York:

- Semiotext(e), 1991.
- Franz, Michael, and Chung-li Cha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History and Documents*. 3 vol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6–1971.
- Fraser, Nancy, and Sandra Lee Bartky, eds. *Revaluing French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 Frei, Norbert. 1968: *Jugendrevolte und globaler Protest*. Munich: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8.
- Friedlander, Judith. *Vilna on the Seine: Jewish Intellectuals in France since 1968*.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Front homosexuel d'action révolutionnaire. *Rapport contre la normalité*. Paris: Champ Libre, 1971.
- Furet, François. "French Intellectuals: From Marxism to Structuralism." In *In the Workshop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Jonathan Mandelbau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Furet, François, Antoine Liniers [Olivier Rolin], and Philippe Raynaud. *Terrorisme et démocratie*. Paris: Fayard, 1985.
- Gavi, Philippe, Jean-Paul Sartre, and Pierre Victor [Benny Lévy].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Paris: Gallimard, 1974.
- Geismar, Alain, Serge July, and Eryln Morane. *Vers la guerre civile*. Paris: Editions et publications premières, 1969.
- Ghilhaumou, Jacques. *La parole des sans: Les mouvements actuels à l'épreuv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Fontenay: Feuillet, 1998.
- Gide, André. *Retour de l'URSS*. Paris: Gallimard, 1936.
- Glucksmann, André. *La cuisinière et le mangeur d'hommes: Essai sur l'état, le marxisme, les camps de concentration*.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5.
- . *The Master Thinkers*. Translated by Brian Pear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0.
- . *Stratégie et révolution en France 1968*. Paris: Christian Bourgeois, 1968.
- Godard, Jean-Luc. *Jean-Luc Godard par Jean-Luc Godard*. Vol. 1, edited by Alain Bergala. Paris: Cahiers du Cinéma, 1998.
- Goldmann, Lucien. *Toward a Sociology of the Novel*.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1977.

- Gombin, Richard. *The Origins of Modern Leftism*. Translated by Michael Perl. New York: Penguin, 1975.
- Grémion, Pierre. *Paris-Prague: La gauche face au renouveau et la régression tchécoslovaques, 1968–1978*. Paris: Julliard, 1985.
- 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Archives d'une lutte, 1970–1972*. Edited by Philippe Artières, Laurent Quero, and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Paris: Institut Mémoires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 2003.
- Hallward, Peter, ed. *Think Again: Alain Badiou and the Future of Philosophy*.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 Hamon, Hervé, and Patrick Rotman. *Génération*. 2 vol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8.
- . *Les porteurs de valises: La résistance française à la guerre d'Algérie*. Paris: Albin Michel, 1979.
- Hayward, Jack. *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Six Critics of Democracy and Nationali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1.
- Hess, Remi. *Les maoïstes français: Une dérive institutionnelle*. Paris: Editions Anthropos, 1974.
- Hocquenghem, Guy. *Homosexual Desire*. Translated by Daniella Dangoo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Hollander, Paul. *Political Pilgrims: 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Cuba, 1928–197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Hollier, Denis. "1968, May. Actions, No! Words, Yes!" In *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edited by Denis Hollier, 1034–4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lated by John Cumming. New York: Continuum, 1972.
- Houellebecq, Michel. *L'extension du domaine de lutte*. Paris: Editions Maurice Nadeau, 1994.
- Hourmant, François. *Au pays de l'avenir radieux: Voyages d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 en URSS, à Cuba et en Chine populaire*. Paris: Aubier, 2000.
- . *Le désenchantement des clercs: Figures de l'intellectuel dans l'après Mai 68*.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1997.

- Huguenin, Jean-René. *Journal*.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4.
- Inglehart, Ronald.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 Jambet, Christian, and Guy Lardreau. *L'Ange. Vol. 1, Ontologie de la révolution*. Paris: Grasset, 1976.
- Jappe, Anselm. *Guy Debor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Jay, Martin. *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Jeanson, Francis. *Sartre and the Problem of Morality*. Translated by Robert Stone.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80.
- Jennings, Jeremy. "Of Treason, Blindness and Silence: Dilemmas of the Intellectual in Modern France." In *The Intellectual in France: From the Dreyfus Affair to Salman Rushdie*, edited by Jeremy Jennings and Anthony KempWelch, 65-86.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Joffrin, Laurent. *Mai '68: Histoire des événement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8.
- Judaken, Jonathan. *Sartre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6.
- . " 'To Be or Not to Be French': Soixante-Huitard Reflections on 'la Question Juive.' " *Journal of Modern Jewish Studies* 1 (1) (2002): 3-21.
- Judt, Tony. *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Blum, Camus, Aron, and the French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 Kauppi, Nilo. "Tel Quel": *The Making of an Avant-Garde*. Amsterdam: Mouton de Gruyter, 1995.
- Kessel, Patrick. *Le mouvement maoïste en France*. 2 vols. Paris: 10/18, 1972.
- Khilnani, Sunil. *Arguing Revolution: The Intellectual Left in Postwar Fr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Knapp, Bettina, ed. *French Novelists Speak Out*. Troy, NY: Whitston, 1976.
- Kojève, Alexandr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lated by Allan Bloo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 Kouchner, Bernard. *Le malheurs des autres*. Paris: Odile Jacob, 1991.
- Kouchner, Bernard, and Michel-Antoine Burnier. *La France sauvage*. Paris: Editions

- Publications Premières, 1970.
- Kraushaar, Wolfgang. *Achtundsechzig: Ein Bilanz*. Berlin: Propyläen Verlag, 2008.
- Kristeva, Julia. *About Chinese Women*. Translated by Anita Barrows. New York: Urizen, 1977.
- . *Julia Kristeva: Interviews*. Edited by Ross Guber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 *The Kristeva Reader*. Edited by Toril Mo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 . *The Portable Kristeva*. Edited by Kelly Oliv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Translated by Margaret Wall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 . *The Samurai*. Translated by Barbara Bra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 Kühn, Andreas. *Stalins Enkel, Maos Söhne: Die Lebenswelt der K-Grupp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r 70er Jahre*. Frankfurt: Campus-Verlag, 2005.
- Kurlansky, Mark. *1968: The Year That Rock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 Labro, Philippe. *Mai/Juin '68: Ce n'est qu'un commencement*. Paris: Editions Denoël, 1968.
- Labro, Philippe, et al. *"This Is Only a Beginning."* Translated by Charles Marlmann. New York: Funk and Wagnalls, 1969.
- Lacan, Jacques. *Ecrits: A Selecti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Norton, 1977.
- . *Television: A Challenge to the Psychoanalytic Establishment*. Translated by Jeffrey Mehlman. New York: Norton, 1990.
- Lallement, Bernard. *Libé: L'œuvre impossible de Sartre*. Paris: Albin Michel, 2004.
- Leclerc, Serge. *Un combat pour la justic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4.
- Le Dantec, Jean-Pierre. *Les dangers du soleil*. Paris: Presses d'Aujourd'hui, 1978.
- Lefebvre, Henri.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c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 . *L'irruption de Nanterre au sommet*. Paris: Anthropos, 1968.

- Le Goff, Jean-Pierre. *Mai 68: L'héritage impossibl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8.
- Lemaire, Anika. *Jacques Lacan*. 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 New York: Routledge, 1970.
- Lévy, Benny. "From Maoism to Talmud (with Sartre along the Way)." *Commentary* (December 1984): 48–53.
- . *Le nom de l'homme: Dialogue avec Sartre*. Paris: Verdier, 1984.
- Lévy, Bernard-Henri. *Barbarism with a Human Face*. Translated by George Holoc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9.
- Levy, Jonah. *Tocqueville's Revenge: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Contemporary Fr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Leys, Simon. *Chinese Shadows*. New York: Penguin, 1977.
- . *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 Paris: Editions Champs Libre, 1971.
- Lilla, Mark, ed. *New French Though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Lindenberg, Daniel. *Le rappel à l'ordre: Rapport sur les nouveaux réactionnair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2.
- 379 Linhart, Robert. *L'établi*.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78.
- Lipovetsky, Gilles. *L'ère du vide*. Paris: Gallimard, 1983.
- Lottman, Herbert. *The Left Bank: Writers, Artists, and Politics from the Popular Front to the Cold Wa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2.
- Macciocchi, Maria-Antonietta. *De la Chin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1.
- Macey, David. *The Lives of Michel Foucault: A Biography*. New York: Vintage, 1995.
-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Macksey, R., and E. Donato, eds. *The Language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s of M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 Mallet, Serge. *Essays on the New Working Clas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Dick Howard and Dean Savage. St. Louis: Telos Press, 1975.
- Manceaux, Michèle. *Les maos en France*. Preface by Jean-Paul Sartre. Paris: Gallimard, 1972.
- Mao Tse-tung. *The Mao Papers: 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 Edited by Jerome Ch'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 *On Contradi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7.
- .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2.
- . *Selected Works*. Vol. 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4.
- Marcellin, Raymond. *L'importune vérité: Dix ans après Mai '68 un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parle*. Paris: Plon, 1978.
- Marshall, Bill. *Guy Hocquenghem: Beyond Gay Ident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Martel, Frédéric. *The Pink and the Black: Homosexuals in France since 1968*. Translated by Jane Marie Tod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Marwick, Arthur. *The Sixtie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France, Italy,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7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Marx-Scouras, Danielle.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Tel Quel: Literature and the Left in the Wake of Engagement*.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Massu, Jacques. *Baden 68*. Paris: Editions Plon, 1983.
- Mendras, Henri. *Français, comment vous avez changé*. Paris: Tallandier, 2004.
- (with Alistair Cole).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France: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Fifth Republi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Merleau-Ponty, Maurice. *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Translated by Joseph Bien.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Michnik, Adam. *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Maya Latynsk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Miller, James. *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 Monod, Jean-Claude. *Foucault et la police des conduites*. Paris: Michalon, 1997.
- Moravia, Alberto.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de Mao*. Paris: Flammarion, 1967.
- Moreau, Jean. "Les maos de la gauche prolétarienne." *La Nef* 48 (June–September 1972): 77–103.
- Morin, Edgar, Claude Lefort, and Jean-Marc Coudray. *La brèche: Premières réflexions sur les événements*. Paris: Fayard, 1968.
- Moyn, Samuel. *The Origins of the Oth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 Nord, Philip. *The Republican Moment: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Nouveau fascisme, nouvelles démocraties." *Les Temps Modernes*, 310 bis (1972).

Oliver, Kelly. *Reading Kristeva: Unraveling the Double-Bin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axton, Robert, and Michael Marrus. *Vichy France and the Jew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Perrot, Michelle, ed. *L'impossible prison: Recherches sur le système pénitentiaire au XIXe siècl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0.

Picq, Françoise. *Libération des femmes: Les années mouvement*.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3.

Ponchaud, François. *Cambodia—Year Zero*. Translated by Nancy Amphoux. New York: Penguin, 1978.

Raynaud, Philippe. *L'extrême gauche plurielle: Entre démocratie radicale et révolution*. Paris: Autrement, 2006.

Reader, Keith, and Khursheed Wadja. *The May 1968 Events in France: Reproduc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93.

Rieffel, Remy. *Le tribu des clercs: Les intellectuels sous le V^{ième} République, 1958–1990*. Paris: Calmann-Lévy, 1993.

Robespierre, Maximilien. *Ecrits*. Edited by Claude Mazauric. Paris: Messidor / Editions sociales, 1989.

Rolin, Olivier. Paper Tiger. Translated by William Cloona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7.

———. Tigre en papier.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2.

Rosanvallon, Pierre. *The Demands of Liberty: Civil Society in France since the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Alan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Rosanvallon, Pierre, and Patrick Viveret. *Vers une nouvelle culture politiqu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7.

Ross, Kristin. *May '68 and Its Afterliv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Roudinesco, Elisabeth. *Jacques Lacan*. Translated by Barbara Bra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 *Jacques Lacan and Co.: A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in France, 1925–1985*. Translated by Jeffrey Mehl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Saint-Just, Louis-Antoine. *Œuvres complètes*. Edited by Michèle Duval. Paris: Gérard Lebovici, 1984.
- Samuelson, François-Marie. *Il était une fois "Libération."*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9.
- Santoni, Ronald. *Sartre on Violenc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artre, Jean-Paul. "Les Bastilles de Raymond Aron." *Le Nouvel Observateur*, June 19, 1968.
- . *Being and Nothingness: An Essay on Phenomenological Ontology*. Translated by Hazel Barnes.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66.
- . *Between Existentialism and Marxism*. Translated by J. Matthews. New York: Pantheon, 1974.
- . *Colonialism and Neocolonialism*. Translated by Azzedine Haddour.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Smith.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 . *Les écrits de Sartre*. Edited by Michel Contat and Michel Rybalka. Paris: Gallimard, 1970.
- . "L'idée neuve de mai 1968." *Le Nouvel Observateur*, June 26, 1968.
- . *Life/Situations: Essays Spoken and Written*. Translated by Paul Auster and Lydia Davis. New York: Pantheon, 1977.
- . *Notebooks for an Ethics*. Translated by Davi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 *Situations*. Volume 8, *Autour de mai '68*. Paris: Gallimard, 1972.
- . *The Words*. Translated by Bernard Frechtman.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4.
- Sartre, Jean Paul, and Benny Lévy. *Hope Now: The 1980 Interview*. Translated by Adrian van den Hove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 Schmidt, Vivien. *Democratizing France: The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History of Decentra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Schnapp, Alain, and Pierre Vidal-Naquet. *The French Student Uprising: November 1967–June 1968*. Translated by Maris Jola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 Seale, Patrick, and Maureen McConnville. *Black Flag/Red Flag: French Revolution 1968*.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68.
- Seidman, Michael. *The Imaginary Revolution: Parisian Students and Workers in 1968*.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4.
- Short, Philip. *Pol Pot: The Anatomy of a Nightmare*. New York: Henry Holt, 2006.
-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On the Poverty of Student Life*. Berkeley: Contradiction, 1972.
- .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Edited by Ken Knabb. Berkeley: Bureau of Public Secrets, 1981.
- Sollers, Philippe. *Writing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mits*. Translated by P. Barnard and D. Hay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 ed. *Théorie d'ensembl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8.
- Sommier, Isabelle. *La violence politique et son deuil: L'après 68 en France et en Italie*.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1998.
- Spence, Jonathan.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99.
- Starr, John, and Nancy Dyer, eds. *Post-liberation Works of Mao Tse-tung: A Bibliography and Index*.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6.
- Starr, Peter. *Logics of Failed Revolt: French Theory after May '6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Tocqueville, Alexis de. *Democracy in America*. Translated by G. Lawre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6.
- Touraine, Alain. *The May Movement: Revolt and Reform*. Translated by Leonard Mayhew.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 . *Return of the Actor: Social Theory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ranslated by Myrna Godzic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 Van der Poel, lème. *Une révolution de la pensée: Maoïsme à travers* Tel Quel, Les Temps Modernes, et Esprit. Amsterdam: Editions Rodopi, 1992.
- Vaneigem, Raoul. *Treatise on Living for the Use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New York: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1970.
- Varon, Jeremy. *Bringing the War Home: The Weather Underground, the Red Army*

- Faction, and Revolutionary Violence in the Sixties and Seven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Vienet, René. *Enragés et situationnistes dans le mouvement des occupations*. Paris: Gallimard, 1968.
- Wakeman, Frederic.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383
- Waters, Sarah. *Social Movements in France: Towards a New Citizenship*.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Weber, Henri, *Vingt ans après: Que reste-t-il de 68?*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8.

索引

385

- Act Up 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 365
- Adorno, Theodor 西奥多·阿多诺 11n, 225n, 357n9
- Agir ensemble contre le chômage (AC!)“一起行动, 反对失业!”运动组织 367–369
- Agronomists without Borders 无国界农艺师组织 361
-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39–44, 51, 69, 73, 80, 87, 93, 109, 116, 156, 178, 181–182, 201, 207–208, 220–221, 228, 230, 236, 238, 261, 303; Liberation Front (FLN) 民族解放阵线 39, 44, 80, 116, 207, 220–221, 303
- Althusser, Louis 路易·阿尔都塞 75, 156, 159, 162n11, 164; and French Communist Party 阿尔都塞与法国共产党 118–119, 121, 265, 312; and Maoism 阿尔都塞与毛主义 2–3, 27, 30, 33, 116–124, 197; and May'68 阿尔都塞与“五月风暴” 2, 103, 106, 160, 193; and Sartre 阿尔都塞与萨特 183, 185–186, 187n13, 193–194; and structuralism 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 119–121, 160, 185–186, 242, 243n17, 244, 345
- Amis de la terre, Les“地球之友” 361
- Arguments group《论辩》团体 20, 59–60, 177, 317
- Aron, Raymond 雷蒙·阿隆 1, 8, 45, 91, 103–104, 117, 183, 206, 210, 225, 227, 285, 291, 353
- Artaud, Antonin 安托南·阿尔托 240, 254

Auden, W. H. W. H. 奥登 5, 236
 Ayers, William 威廉姆·阿耶斯 1

Bachelard, Gaston 加斯东·巴什拉 185

Badiou, Alain 阿兰·巴迪欧 17, 155-167, 219n79

Barthélemy, Martine 玛蒂娜·巴尔迪勒米 361

Barthes, Roland 罗兰·巴特 49, 121, 174, 186, 187n13; and the Nouveau roman 罗兰·巴特与新小说 239-241, 247; and *Tel Quel* 罗兰·巴特与《太凯尔》19, 238-241, 245-247, 279, 286; and *Writing Degree Zero* 罗兰·巴特与《写作的零度》239-240

Benda, Julien 朱利安·邦达 103, 214, 287

Black Panthers 黑豹党 14, 318-319

Bloch, Ernst 恩斯特·布洛赫 209

Bloch, Marc 马克·布洛赫 354

Bloom, Allan 阿兰·布鲁姆 6

Bourdieu, Pierre 皮埃尔·布迪厄 51n, 79n, 366, 368

Braudel, Fernand 费尔南·布罗代尔 120-121

Breton, André 安德烈·布勒东 237, 364-365

Bruay-en-Artois 布鲁亚安纳特瓦 25-38, 352

Camus, Albert 阿尔贝·加缪 44, 75, 226-227, 285

Castoriadis, Cornelius 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 57-59, 103n39, 104, 107n48, 297

Castro, Fidel 菲德尔·卡斯特罗 11, 70-71, 276, 329

Castro, Roland 罗兰·卡斯特罗 25, 96-97, 123, 321

Cause du Peuple, La 《人民事业报》27, 34-37, 116, 140, 168, 169, 171, 179, 198-205, 221nn82 and 83, 300, 303-304, 316, 351

Centre d'études, de recherche et de formation institutionnelles (CERFI) 建制性教育与探索研究中心 337

Centre Pompidou 蓬皮杜中心 63

Charléty Stadium 夏莱蒂体育场 1, 291

Chevalier, Louis 路易·谢瓦利埃 53n14, 62n28, 63-64, 339n103

-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11, 125
- Clark, Mark 马克·克拉克 318
- Clark, Ramsay 拉姆齐·克拉克 319
- Clavel, Maurice 莫里斯·克拉维尔 304, 309–310
- Cohn-Bendit, Daniel 丹尼尔·科恩-邦迪 54–55, 59, 75, 101, 103n39, 266n67;
and French Communist Party 科恩-邦迪与法国共产党 91–92, 266–267; and
March 22 Movement 科恩-邦迪与 3 月 22 日运动 81–85, 87, 193; and May '68
科恩-邦迪与“五月风暴” 80–85, 87–89, 91–93, 190–193, 195–196, 223, 266–
267, 352; and Sartre 科恩-邦迪与萨特 190–191, 195–196
- Comité de liaison des étudiants révolutionnaires (CLER) 革命学生联络委员会
136n42
- 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 (CFDT) 民主工会 91, 95, 364
-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CGT) 法国总工会 28, 91–92, 139, 155, 196,
266–267
- Coudray, Jean-Marc 让-马克·库德海 See Castoriadis, Cornelius 参见科尔内留
斯·卡斯托里亚蒂斯
- de Beauvoir, Simone 西蒙娜·德·波伏娃 29n4, 33, 168, 180, 182n, 194–195, 208,
218n78, 220n80, 222, 225n91, 267; and Amis du Cause du Peuple 波伏娃与
《人民事业报》支持者 201; *Les Belles images*《美丽的形象》64–66; and Maoism
波伏娃与毛主义 117, 140–141, 203–204; *Second Sex*《第二性》144, 146,
257–258; and trip to China 波伏娃与中国之行 203–204
- de Gaulle, Charles 夏尔·戴高乐 7–8, 10, 16, 33, 45, 50, 55, 78, 125, 134, 137,
149, 156, 218, 237, 247, 260, 354–355; and Algerian War 戴高乐与阿尔及利亚
战争 39–43, 93, 156, 181–182; and flight to Baden-Baden 逃往巴登巴登 2, 99–
103; as man of June 18 作为 6 月 18 日发表演讲的人 39–43, 182; and May '68
戴高乐与“五月风暴” 85, 87, 92–93, 99–103, 190, 196, 294, 297, 329
- Debord, Guy 居伊·德波 60–61, 74–75
- Debray, Régis 雷吉·德布雷 9n5, 106, 294n13, 325, 330
- Defert, Daniel 丹尼尔·德菲尔 17, 193, 299–301, 304–305, 316, 318
- Deleuze, Gilles 吉尔·德勒兹 37, 81, 289–290, 308, 311, 313, 323, 327–328, 333–
334, 337–338

- Deng Xiaoping 邓小平 109-110, 157-158, 165
- democracy 民主 51, 53, 57, 69, 73, 82, 83, 94, 99, 104-105, 107, 133, 155, 163-164, 167, 192, 196, 199, 208, 228, 236, 255-256, 283, 286, 344; associational 结社民主 350-370; bourgeois 资产阶级民主 354; direct 直接民主 20, 82, 106, 205, 359; radical 激进民主 57, 192, 297; revolution of 民主革命 5, 12; social 社会民主 119, 196-197
- democrats 民主人士 32, 34, 36, 304, 352
- Derrida, Jacques 雅克·德里达 18, 245, 257, 268
- Dewevre, Brigitte 布丽日特·德韦伏尔 25-28, 31-32, 36
-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MSF—Médécins sans frontières) 无国界医生组织 228, 342, 361
- Donzelot, Jacques 雅克·邓泽劳 318, 364n23
- Dosse, François 弗朗索瓦·多斯 119n20, 188-189, 193n22, 247, 251n33, 288, 289n2, 333n92, 341nn106 and 107
- Dreyfus Affair 德雷福斯事件 19; legacy of 德雷福斯事件的政治遗产 4, 21, 178, 215, 366n
- Droit au logement (DAL) 住房权运动组织 367
- Droits devant!“权力优先!”运动组织 367
- Durkheim, Emile 埃米尔·涂尔干 363
- Dutschke, Rudi 鲁迪·多茨克 84, 191
- É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 (ENA) 法国国家行政学校 53, 79, 296
-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ENS)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2, 15, 26, 33, 95, 117-120, 122, 124, 126, 129, 135, 136 192, 197, 354
- Engels,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61n25, 122, 271
- enquête 调查 18, 131, 132, 138, 303, 305-307, 315-316, 323, 330
- Esmein, Jean 让·埃斯曼 155
- European Union (EU) 欧盟 368
-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 35, 177, 181, 183, 185, 187, 235
- Express, L'《快报》199
- Fanon, Frantz 弗朗茨·法农 43, 206-208

- Fédération des associations de soutien aux travailleurs immigrés (FASTI) 移民劳工保护协会联盟 361
- Fédération des cercles Marxistes-léninistes 马列主义者联盟 15
- Ferry, Luc 吕克·费里 9n5, 105n43, 106
- Figaro, Le*《费加罗报》8, 103, 309
- Finkielkraut, Alain 阿兰·芬基尔克劳 223–224
- Fischer, Joschka 约施卡·费舍尔 2
- Fordism 福特主义 362
- 387 Foucault, Michel 米歇尔·福柯 4, 16–21, 53, 117, 121, 158, 172, 185–187, 193, 233, 240–242, 244–246, 249, 286, 352, 356; *Discipline and Punish*《规训与惩罚》289–290, 338–342; and André Glucksmann, 福柯与安德烈·格鲁克斯曼 17, 342–347; and Lens, 29–32, 36–37, 304; and Maoism, 福柯与毛主义 117, 288–349; and New Philosophers, 福柯与新哲学家们 342–349; and Prison Information Group (GIP) 福柯与监狱信息小组 17, 289–290, 304–317; and Sartre 福柯与萨特 16, 36, 178, 186–187, 233, 304; in Tunisia 福柯在突尼斯 17, 178, 193, 288, 292–298; at Vincennes 福柯在文森大学 17, 158
- French Communist Party (PCF—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法国共产党 14, 18, 91–92, 102, 117, 119–128, 131, 137, 156–157, 183, 191, 193, 196–197, 217, 245n21, 261–270, 272, 276, 283, 312
- Freud, Sigmun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50, 184, 242, 244–245, 250–253, 265, 282, 313, 333–334
- Front homosexuel d'action révolutionnaire (FHAR) 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 142, 330–333, 338; and Foucault 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与福柯 332–333; and Guy Hocquenghem 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与居伊·奥康让 147–150, 331
- Furet, François 弗朗索瓦·弗雷 187–188, 349
- Geismar, Alain 阿兰·热斯马尔 87, 91, 136, 140, 169, 201, 205, 223, 352
- Genette, Gérard 热拉尔·热奈特 245
- Gide, André 安德烈·纪德 125n28, 181, 235, 238, 261, 331
- Gingrich, Newt 纽特·金里奇 5–6
- Giscard d'Estaing, Valéry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152, 222, 283, 322, 364
- Glucksmann, André 安德烈·格鲁克斯曼 17, 34, 37, 118n18, 170, 269, 281, 342–

- 348, 352
- Godard, Jean-Luc 让·吕克·戈达尔 15, 33, 67-69, 75, 114-117, 171, 309
- Goldmann, Lucien 吕西安·戈德曼 50n9, 188, 240n11, 247, 294, 330
- Great Helmsman, The 伟大舵手 See Mao Tse-Tung 参见毛泽东
- Great Leap Forward 大跃进 13, 109
- 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GIP) 监狱信息小组 17, 305, 307-308n, 315n53
- Guattari, Félix 菲利克斯·加塔利 37, 81, 330, 333-334, 337-338
- Guevara, Che 切·格瓦拉 29, 70-71, 329
- Gulag Archipelago 古拉格群岛 / 《古拉格群岛》 21, 156, 227, 264, 342, 345
- Hegel, Georg William Friedrich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120, 180, 207, 212, 231
- Heidegger, Martin 马丁·海德格尔 120, 162n14
- Ho Chi Minh 胡志明 29, 329
- Hocquenghem, Guy 居伊·奥康让 147-150, 331, 334-338, 357n7
- Hölderlin,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240
- Houellebecq, Michel 米歇尔·维勒贝克 9
- Hoxha, Enver 恩维尔·霍查 15
- Hua Ko-feng 华国锋 165
- Huguenin, Jean-René 让·勒内·于格南 238, 243n16
- human rights 人权 5, 21, 36, 156, 164, 178, 269, 276, 285, 342-343, 349, 361; UN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世界人权宣言》 368
- Hungarian uprising (1956) 匈牙利事件 12, 59, 104, 121, 356
- Husserl, Edmund 埃德蒙德·胡塞尔 120
- J'Accuse* 《我控诉》 179, 221n82
- Jacobinism 雅各宾主义 211, 228, 359
- Jacobins 雅各宾派 4, 93-94, 113, 156, 162, 165, 208n50, 211-212, 275, 292, 359, 364
- Jambet,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让拜 37, 269, 344, 349
- Jeanson, Francis 弗朗西斯·让松 116

Jiang Qing 江青 356

Jim Crow 黑人 7

Jospin, Lionel 利昂内尔·若斯潘 156, 343n109, 369

July, Serge 塞尔日·朱利 16, 201, 219, 304, 342

K Gruppen (K Groups) k 团体 13

Kampuchea, Democratic (Cambodia) 民主柬埔寨 229

Kennedy, John 约翰·肯尼迪 118

Kennedy, Robert 罗伯特·肯尼迪 11-12, 72

Khayati, Mustapha 穆斯塔法·卡亚蒂 75-76, 292

Khmer Rouge 红色高棉 162-163, 229-230

King Jr.,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金 72

Kouchner, Bernard 贝尔纳·库什内 228, 342-343, 350, 369

Kravchenko, Victor 维克多·克拉夫琴科 264

Kristeva, Julia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and China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与中国 19, 174, 234, 274-276, 279-281; and feminism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与女权主义 250, 257-260, 283-284; and modernism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与现代主义 254-256; and psychoanalysis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与精神分析 250, 283-284; and semanalysis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与符号分析 250-254; and *Tel Quel*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与《太凯尔》 233-234, 243, 247-266, 282-286

Kuomintang 国民党 125, 137, 165

Lacan, Jacques 雅克·拉康 242-248, 259, 286, 304; and May '68 雅克·拉康与“五月风暴” 103, 193; and structuralism 雅克·拉康与结构主义 121, 185-187, 243, 333-334; and the symbolic sphere 雅克·拉康与象征界 161, 242-244, 250-253, 256, 348

Lardreau, Guy 居伊·拉尔德罗 344, 349

Le Dantec, Jean-Pierre 让-皮埃尔·勒·当泰克 9, 37, 123, 140, 199-202

Le Goff, Jean-Pierre 让-皮埃尔·勒高夫 9n5, 103, 147n55, 364n24, 365

Lefebvre, Henri 昂利·列斐伏尔 10n7, 56-57, 59-60, 62, 84, 193, 297, 364n24

Lefort, Claude 克劳德·勒福尔 103n39, 104, 297; and Socialism or Barbarism group 克劳德·勒福尔与《社会主义或野蛮》群体 57-59

- Lenin,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列宁 82, 109, 123, 160, 163, 254–255, 271, 291, 302, 345, 347, 355–356, 365; and Jacobinism 列宁与雅各宾主义 93, 113, 115, 165; and theory of the party 列宁与政党理论 20, 57, 190, 192, 196–197, 214, 226, 355; *What Is to Be Done?*《怎么办?》136, 196, 355
- Leninism 列宁主义 20, 57–58, 127, 165, 190–191, 196–197, 214, 226, 255; Neo-, 38, 157–158, 356
- Lens 朗斯 28–29, 304
- Leroy, Pierre 皮埃尔·勒鲁瓦 25–28, 31–32, 34–37
- Let 100 Flowers Bloom“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13
- Lévi-Strauss, Claude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103, 120–121, 184–187, 193–194, 242, 245, 247–248
- Lévy, Benny 班尼·莱维 29, 219, 223, 352; and *Hope Now* interviews 班尼·莱维与《如今的希望》225–232
- Lévy, Bernard-Henri 贝尔纳-昂利·莱维 227n93, 281–282, 349n124
- Lévy, Tony 托尼·莱维 352
- Leys, Simon 西蒙·莱斯 155, 277–278, 281
- Libération*《解放报》16, 201, 214, 217–220, 222, 316
- 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 (LCR) 革命共产主义同盟 137
- Lin Piao 林彪 155, 356
- Linhart, Robert 罗贝尔·兰哈尔 95–97, 122–124, 129, 131n35, 134–135, 159
- Lipovetsky, Gilles 吉尔·利波维茨基 9n5, 105–106
- Liu Shao-qi 刘少奇 110, 157
- Maastricht Treaty《马斯特里赫特条约》368
- Macciocchi, Maria-Antionietta 玛丽娅·安托尼耶塔·马齐奥奇 124, 269, 272, 275
- Madame Mao 毛夫人 See Jiang Qing 参见江青
- Mallarmé, Stéphane 斯泰凡·马拉美 239, 250, 254–255, 265
- Mao Tse-Tung 毛泽东 2–3, 11–15, 19–20, 29, 35, 116, 121–122, 124–129, 131n36, 132, 134–137, 140, 165, 193, 198, 205, 213n66, 218–219, 223, 226, 233, 255, 270–278, 281, 302, 345, 355–356;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13, 15, 57, 77, 109–115, 126, 157–158, 160, 162, 203, 217n74, 270–271, 277–278, 280–281, 329;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毛泽东与大跃

进 13, 109; *Little Red Book* 红宝书 14, 114, 118, 133, 355; and the Long March
毛泽东与长征 137; *On Contradiction*《矛盾论》112, 122, 273

Mao Tse-Tung Thought 毛泽东思想 111-112, 124, 131, 135, 197, 229, 302

Marcellin, Raymond 雷蒙·马塞兰 134-135, 137, 140, 199-202, 302

March 22 Movement (22 du Mars) 3月22日运动 56, 81-85, 87, 91-92, 190-193,
267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10, 27, 38, 49-50, 60-61, 94, 113, 120, 184, 186-187,
193, 197, 231, 270, 273, 290, 313, 345-347, 357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2, 10, 12, 15, 18-20, 35, 47, 49, 57-60, 71, 95, 106, 108,
112, 133, 136, 144, 158-162, 165-166, 177, 179, 183-185, 187-188, 192-193,
197, 217, 228, 242, 244, 265, 270, 273-274, 289-290, 293-298, 302, 312,
318, 320, 327, 329-330, 342, 344-347, 352-358, 363; Althusser's conception
of 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116-123, 159, 183, 242-244, 312; existential 存
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60, 139, 185, 215-216, 241; Freudian- 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
主义 313; Hegelian- 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 29; Mao's interpretation of 毛泽东
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 125-127, 131, 270; Soviet 苏联式马克思主义 12, 15, 57,
115, 122, 188; Structuralist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160

Marxism-Leninism 马列主义 134, 206, 300, 356。亦参见 Mouvement communiste
français marxiste-léniniste; Union des communistes français marxisteléniniste;
Union des jeunesse communistes marxiste-léniniste

Marxiste léniniste, Le《马列主义者》157

Massu, Jacques 雅克·马苏 40, 100

Mauriac, François 弗朗索瓦·莫利亚克 234, 309

Mendès-France, Pierre 皮埃尔·芒德-法郎士 96, 135

McCain, John 约翰·麦凯恩 1

Michnik, Adam 亚当·米奇尼克 93

Miller, Jacques-Alain 雅克-阿兰·米勒 17, 122, 304

Miller, Judith 朱迪思·米勒 158n6, 304

Mollet, Guy 居伊·莫莱 156

Monde, Le《世界报》31, 41, 55-56, 76-77, 105n44, 109n, 114-115, 163n15, 181n3,
189, 202, 229n95, 246, 278, 279, 281, 282, 359n12

Monot, Jean-Claude 让-克洛德·莫诺 289

- Morin, Edgar 埃德加·莫兰 59, 84, 103n39, 104, 364n24
- Moscow show trials 莫斯科摆样子公审 183
- Mouvement communiste français marxiste-léniniste (MCF-ML) 法国共产主义运动联盟(马列) 15
- Mouvement libération des femmes (MLF)“妇女解放运动” 142-147, 150-151, 330-331
-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Humanization of Prison Life (KRUM) 全国监狱生活人性化协会 317
- neoconservatism 新保守主义 5
- Nerval, Gérard de 热拉尔·德·奈瓦尔 240
- New Philosophers (Nouveaux Philosophes) 新哲学家们 163, 227n92, 269, 276, 281, 342-349, 356
- New Philosophy (Nouvelle Philosophie) 新哲学 345. *See also* New Philosophers 参见新哲学家们
- new wave cinema (nouvelle vague) 新浪潮电影 14-15, 67, 69, 75, 115
- Newton, Huey 休伊·牛顿 14, 321
- Nietzsche,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尼采 36, 74, 81, 162, 234-235, 300, 313-314, 324-325, 347
- normaliens 高师生 *See*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参见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 Obama, Barack 巴拉克·奥巴马 1
- Organisation de l'armée secrète (OAS)“秘密军事组织” 42, 181
- Overney, Pierre 皮埃尔·奥维尼 32-34, 351
-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220-221, 351
-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marxisteléniniste (PCFML) 法国共产党(马列) 137, 157
-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中国人民解放军 155, 165, 277-278, 356
- Pharmacists without Borders 无国界药剂师组织 361
- Plato 柏拉图 6, 252
- Playboy*《花花公子》114
- Podhoretz, Norman 诺尔曼·波多霍雷兹 5

Pol Pot 波尔布特 35, 228-230

politics 政治: feminist 女权主义政治 142-146, 150-153, 218, 256-260, 283-284, 307-308n35; liberal 自由主义政治 72, 82, 84, 106, 152, 164, 243, 285, 312, 316, 354, 358, 368; libidinal 力比多政治 38, 70-108, 141, 156, 218, 261, 352;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 163

Poststructuralism 后结构主义 233, 248, 262, 284-286

Prague Spring 布拉格之春 72, 119, 213-214

Red Guards 红卫兵 3, 109-112, 114, 124n25, 165, 214, 217n74, 275, 277-278, 307-308n35

Renault factory 雷诺汽车厂 32-33, 98, 138, 264, 351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无国界记者组织 361

revisionism 修正主义 15, 119, 128, 140, 157, 197, 205, 230, 270-271, 274

revolution 革命: Cuban 古巴革命 11, 70, 208; Cultural“文化大革命” 3, 10-15, 19-20, 29, 57, 77, 109-132, 135, 155-157, 160-163, 165-167, 178, 203, 214, 217n74, 229-230, 233-234, 269-281, 297, 301-303, 323-323, 329, 356-357; democratic 民主革命 5; of everyday life 日常生活革命 56-62, 77, 142, 298; French 法国革命 3, 8, 30-31, 45, 52, 85, 88-89, 94, 103, 162, 182, 207, 208n50, 227-228, 349, 367n; Industrial 工业革命 296; Iranian 伊朗革命 344; literary 文学革命 233-287; May as absence of 没有革命的5月8, 50, 70, 103-106, 164, 364; moral 道德革命 5, 7, 73, 360, 366; palace 宫廷政变 37; Russian 俄国革命 82, 162, 165-166, 182, 355; self-limiting 自我限制的革命 92-97; sexual 性革命 78, 142-151, 330-338; specter of 革命幽灵 2;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11, 13, 29, 276n89 revolutionism 革命主义 12, 32, 106, 190, 206, 209, 213, 226, 228, 231, 255, 325, 353, 355-356

Rimbaud, Jean Nicholas Arthur 让·尼古拉·阿瑟·兰波 50, 123, 356

Robb -Grillet, Alain 阿兰·罗伯-格里耶 18, 49-50, 64, 186, 239-240, 243

Robespierre, Maximilien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 113, 177, 182, 207, 211, 226, 229, 291, 356

Rocard, Michel 米歇尔·罗卡尔 33, 364

Rol n, Olivier 奥利维耶·罗兰 33n8, 218, 351, 354-355n

Rosanvallon, Pierre 皮埃尔·罗桑瓦隆 359n13, 362, 366n26

Royale, Ségolène 赛格琳娜·罗雅尔 1

Saint-Just, Louis-Antoine 安东万·路易·圣茹斯特 34, 39, 115, 211, 219, 291

Salan, Raoul 拉乌尔·萨朗 40

sans frontièrisme“无国界组织”See: Agronomists without Borders;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Pharmacists without Borders;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Veterinarians without Borders

sans papiers 非法移民 165-166, 366

Sarkozy, Nicholas 尼古拉·萨科奇 1, 105n44, 343n109, 359

Sartre, Arlette-Elkaïm 阿莱特-埃尔坎·萨特 222, 232

Sartre, Jean-Paul 让-保罗·萨特 27-36, 43-44, 60, 66, 139, 148, 159-160, 162n14, 168, 177-233, 235-241, 262, 283, 286-287, 309, 325, 338; and Althusser 萨特与阿尔都塞 103, 117, 119, 160, 183, 185-187, 193-194, 197; and Raymond Aron 萨特与雷蒙·阿隆 117, 206n47, 210, 227; and Daniel Cohn-Bendit 萨特与丹尼尔·科恩-邦迪 89, 93n26, 190-195, 223;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辩证理性批判》28, 182, 184, 204, 207, 209-213, 216, 228, 230; and Michel Foucault 萨特与米歇尔·福柯 16, 18-19, 29-30, 32, 36, 117, 172, 178, 185-187, 233, 286, 304, 308-309, 325, 342, 349, 352, 356; *Hope Now* 萨特与《如今的希望》225-232; and Judaism 萨特与犹太教 219-225, 231-232, 284; and Lens Tribunal 萨特与朗斯法庭 27-30, 32-36, 304; and Benny Lévy (aka Pierre Victor) 萨特与班尼·莱维(也就是皮埃尔·维克多) 16, 29-30, 35, 217, 219-226, 228, 230-232, 352; and Maoism 萨特与毛主义 3-4, 16, 18-19, 27, 29, 32-37, 139, 148, 160, 179-180, 191-193, 197-206, 212-219, 222-224, 226, 229-230, 304-305, 308; and May '68 萨特与“五月风暴” 89, 93n26, 103, 116-117, 119, 177-179, 188-201, 206, 210n57, 214-215, 217-219, 223, 226, 267; *Les mots*《词语》180-181, 190, 194, 235;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造反有理》16, 205n4, 213n683, 217, 219; and structuralism 萨特与结构主义 179, 183-188, 193-194; and violence 萨特与暴力 35, 43-44, 205-214

Saussure, Ferdinand 费迪南德·索绪尔 120, 241-242, 245, 250

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 (SFIO) 国际工人协会法国支部 156

Sichère, Bernard 贝尔纳·西谢尔 158

Sino-Soviet Rift 中苏关系破裂 12

-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情境主义国际 12-13, 19-20, 48n7, 56, 73-77, 82, 133, 135, 141, 177, 292, 317-318, 338, 355-356
- Socialism or Barbarism (Socialisme ou barbarie) 社会主义或野蛮 20, 57-60, 177, 317, 344
- Sollers, Philippe 菲利普·索莱尔 4, 18-19, 174, 382; and *Tel Quel* 菲利普·索莱尔与《太凯尔》233-246, 261-283
- Solzhenitsyn, Alexander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21, 156, 178, 227, 264, 269, 342, 345, 347
- SOS Racisme 紧急反种族主义组织 365
- 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 (SDS) 社会主义学生联盟 83-84, 191
- Stalin, Josef 约瑟夫·斯大林 30, 35, 57, 82, 110, 162, 191, 213, 281, 345, 347, 349, 356; pact of with Hitler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236
-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 13-15, 57-58, 92, 110, 117-121, 125, 157, 159-160, 165-166, 178, 181-182, 197, 23-234, 245n21, 262-263, 265, 276, 347, 356
- Structuralism 结构主义 14, 17-19, 50, 119-121, 160, 178-179, 183-188, 193-194, 233, 235, 239, 241-251, 259, 262-263, 284-289, 309-311, 334, 342, 345
- Tempes Modernes, Les*《现代》16, 26n, 29, 139n, 222, 225n91, 309
- third worldism (tiers mondisme) 第三世界主义 11, 13, 29, 113, 118, 122, 125, 206-207, 209, 228, 234, 276n89, 325, 344, 355
- Tocqueville, Alexis de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 52, 104-106, 285, 291, 361-362
- Todorov, Tzvetan 茨维坦·托多洛夫 245
- Torchon Brûle, Le*《怒火中烧!》146
- Touraine, Alain 阿兰·图海纳 70, 84, 88n, 103n39, 107n46, 108, 296-297, 350
- Tout!*《一切!》141-142, 147-148, 151, 179, 201, 321, 326
- Trotsky, Leon 列夫·托洛茨基 57, 272-273, 345
- Trotskyism 托洛茨基主义 82, 96, 102, 136n42, 137, 140, 148-149, 152, 191, 272, 296, 301, 355-356
- Tse-toung, Jean 让·泽东 See Lévy, Benny 参见班尼·莱维
- Unified Socialist Party (PSU—Parti Socialiste Unifié) 统一社会党 156-157, 364
- Union des communistes français marxiste-léniniste (UCF-ML) 共产主义联盟(马列)

- 156-159, 165
- Union des étudiants communistes (UEC) 共产主义学生联盟 118
- Union des jeunesse communistes marxiste-léniniste (UJC-ML)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 96-97, 118, 123-127, 129-137, 143, 156, 158, 197-198, 292, 296, 300-301, 350
- Union 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français (UNEF) 法国学生联合会 44-45, 87, 223n87
- University of Paris X Nanterre 南特大学 / 巴黎第十大学 19, 56, 79-80, 83-86, 95-96, 116, 135, 141, 143, 188, 194, 292, 330, 350
-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斯特拉斯堡大学 73, 76, 292
- University of Vincennes (ex-Saint Denis) 文森大学 17, 158, 298-300, 304, 331, 337, 348n123
- Verts, Les“绿色家园” 361
- Veterinarians without Borders 无国界兽医组织 361
- Victor, Pierre 皮埃尔·维克多 See Lévy, Benny 参见班尼·莱维
-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6-7, 11, 15, 18, 29, 44, 71-73, 83-84, 90, 118, 131, 177, 181n5, 206, 227, 260, 278, 343
- Vive la révolution! (VLR)“革命万岁!” 141
- Wahl, François 弗朗索瓦·华尔 174, 237, 279
- Wilkins, Roy 罗伊·威尔金斯 319
- Woodstock 伍德斯托克 357

国际新左派代表人物理查德·沃林

解读萨特、福柯、索莱尔斯、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让-吕克·戈达尔……

揭示法国“五月风暴”中的东方—中国因素

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学生、左翼群体、智识精英一起推动了席卷整个法国的“五月风暴”，对当时的局势与日常生活政治展开批判，意图通过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来复兴法国的市民和文化生活。

理查德·沃林指出，60年代流行于法国智识精英中的“东风”与同时代的中国现实并无实质关联。通过回顾60年代法国文化与政治生活，本书力图揭示东方因素是如何出人意料地影响了法国的民主政治进程。

对1968年“五月风暴”的写作大多数沉湎于怀旧感伤，理查德·沃林却对过往的论述却秉持审慎、公正的精神。在关于1968年法国左翼运动的所有作品中，《东风》是我读到的最棒的一部……对20世纪60年代全球的动荡局势感兴趣的读者，本书不容错过。

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作者



三辉图书



上架建议：政治哲学

ISBN 978-7-5117-3138-8



9 787511 731388 >

定价：68.00元